




海派文化丛书

上海方言

钱乃荣著



 文匯出版社

在上海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过两种上海话。从形成于南宋的“老上海话”里，我们可以领略到江南水土所孕育起来的上海市俗民风；而从“新上海话”里，我们可以感知上海开埠以来上海人在中外交融中形成的襟怀和睿智，以及海派文化的密码和基因。了解上海方言，可以深度了解上海，了解上海人民，了解上海文化，了解上海生活。

ISBN 978-7-80741-223-6



9 787807 412236 >


定价：28.00 元



海派文化丛书

上海方言

钱乃荣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方言/钱乃荣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8

(海派文化丛书)

ISBN 978-7-80741-223-6

I. 上… II. 钱… III. 吴语—方言研究—上海市 IV. 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2970 号

上海方言

作 者 / 钱乃荣

丛书主编 / 李伦新

责任编辑 / 陈今夫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10 千

印 张 / 18.25

印 数 / 1—6 000

书 号 / ISBN 978-7-80741-223-6

定 价 / 28.00 元



钱乃荣

1945年生，中国现代语言学家。

出版的著作有《上海方言俚语》、《当代吴语的研究》、《汉语语言学》、《上海话语法》、《现代汉语概论》、《北部吴语研究》、《上海语言发展史》、《上海话900句》等19本，发表的论文有《进行体、持续体和存续体的比较》、《苏州方言中动词“勒浪”的语法化》、《上海方言中的虚拟句》、《吴语中时体结合的复合时态》、《质疑“现代汉语规范化”》、《宋庆龄讲话的语音分析和诞生地南市说》、《论纳兰性德词的人情美》、《论20世纪初20年的中国短篇小说》等100多篇。

钱乃荣

编委会

顾问

王元化 方明伦 邓伟志 庄晓天 严家栋
吴谷平 徐中玉 钱谷融 龚心瀚 缪国琴

主编

李伦新

副主编

丁锡满 李友梅 郑家尧

编委

丁锡满 丁宏根 王 晨 李伦新 李友梅
忻 平 陆 廷 郑家尧 桂国强 唐长发

(注：以上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列)

总序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城市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上海，无论是城市的形成过程、发展道路，还是外观风貌、人文内蕴，抑或是民间风俗习惯等，都有鲜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些方面还颇具奇光异彩！

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这座城市，我以为唯独一个“海”字，别无选择。

上海是海。据研究表明，今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市中心地区，在六千多年以前，尚是汪洋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的奔流不息，大海的潮涨潮落，渐渐淤积成了新的陆地，以打鱼为生的先民们开始来这一带活动。滩涂湿地渐长，围海造地渐移，渔民顺势东进，于是出现了叫上海浦、下海浦的两个小渔村，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形成集镇，称上海镇。后于1292年正式设置上海县，县署就在今老城厢内的旧校场路上。一个新兴的中国滨海城市就这样开始崛起。所以我认为，上海可以说是一座水

城，上海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水是上海的血脉，水是上海的精灵。直至今日，上海的地名、路名依旧多有滩、渡、浜、泾、汇、河、桥、塘、浦、湾……这都在向人们证明，是水造就了上海这座城市。

海洋是美丽而壮观的。约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70.8%是海洋水面，如果称地球为“水球”也不无道理。海洋是广阔而有边的，是深而可测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资源的宝库……任你怎样为之赞美都不会过分。

海在洋的边缘，临近大陆，便于和人类亲密接触。我国的万里海疆，美丽而且富饶，被誉为能量的源泉、天然的鱼仓、盐类的故乡，孕育着宇宙的精华，激荡着生命的活力……任你怎样为之歌唱都不会尽兴。

上海是海。是襟江连海的不息水流造就了上海，更是水滋养了上海，使这座城市孕育了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为主要特征的海派文化。可以说，没有水就没有上海，就没有这座迅速崛起的滨海城市。没有海派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就没有上海的迅速崛起和繁荣发达。今后，上海的发展还要继续做好这篇水文章，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上海是海。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是典型的近代崛起的新兴城市，不同于在传统城市基础上长期自然形成的古老城市。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人口只有20多万，经过百年的发展，人口猛增到500多万。据1950年的统计，上海本地原住民只占上海总人口的15%，移民则高达85%。上海的移民，国内的大都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国际的虽来自近四十个国家，但主要来自英、法、美、日、德、俄，其数量最多时高达15万人。在一个多世纪中，上海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有如下几次：

太平天国期间，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了11万。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孤岛期间，仅4年时间，上海人口净增了78万。

解放战争期间，三年左右，上海人口净增了208万，增势之猛，世界罕见。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产生了新一波移民潮，人口增长势头也很猛，现在户籍人口已经超过1800万，此外，还有外来务工人员600万。每年春运高峰，车站码头人山人海、人流如潮，是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

上海是海。上海的建筑素有万国博览会之美誉，现在是越来越名副其实了。有人说建筑是城市的象征，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也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城市的表情。依我看，上海的城市建筑是海派文化的外在形象体现，无论是富有上海特色的石库门里弄房屋，还是按照欧美风格设计建造的各式各样的建筑，包括集中于南京路外滩的建筑群，和分布于各区的多姿多彩的别墅洋楼，诸如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巴洛克式、古典主义式……现已列入重点保护的优秀历史建筑就达300多处，或者是后来建造的如原中苏友好大厦等，都在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丰富而生动的历史人文故事，演奏着上海社会发展进步史上的一个个乐章。

上海是海。上海人讲话多有南腔北调，还有洋腔洋调。中国地域广阔，方言土语十分丰富。56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上海这个迅速崛起的移民城市，人口的多元化，自然带来了语言的多样化，中国各地方言和世界各国的语言大都能在上海听到。

上海是海。上海人的饮食，可谓多滋多味，菜系林立，风味各异，川帮、广帮、闽帮、徽帮、本帮……应有尽有；西菜、俄菜、日本菜、印度菜……数不胜数。

上海是海。上海的戏剧舞台百花争艳，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歌剧、舞剧……剧种之多，阵容之齐，在国内数一数二，在国际堪称少有。浙江嵊县土生土长的越剧在上海生根开花，走向全国；而上海土生土长的沪剧则别具一格地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王

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改编成功……

上海确实就是海！

海派文化姓海。

海派文化不等于全部上海文化，而是上海文化独特性的集中表现。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就像一棵根深叶茂、顶天立地的大树，巍然屹立，万古长青，枝繁叶茂，这树的主干在北京，树根深扎国土，树枝则是伸向祖国各地各民族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一种说法耐人寻味：看中华文化五千年要到西安去，看中华文化两千年要到北京去，看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要到上海去。当然，比喻总是蹩脚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伴随着上海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的崛起而形成和发展的，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的移民带来了当地的民族民间文化，在上海相互影响，有的彼此融合，有的相互排斥，有的自然淘汰，经久磨合而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因此，海派文化是吸纳了国内各地民间文化精华，孵化生成具有鲜明上海地方特色和个性的独特文化。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受世界文化特别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多的中国地域文化。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西学东渐，海派崛起，云蒸霞蔚，日趋明显。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如1865年10月18日在南京路点亮第一盏煤气灯，从此上海有了“不夜城”之名，1881年英商自来水公司成立，次年在虹口铺设水管，开始供水……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整体接触，尤其是租界上“华洋杂处”、“文化混合”，虽然于我们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客观上却是引进西方文化早而且多，使上海成了

“近代化最成功的地方，市民文化最强大的城市”，往往统领风气之先。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随着上海发展而发展的，是客观存在，有客观规律，我以为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时期：

萌芽时期：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为海派文化提供了基础，开始孕育海派文化。

成长时期：1843—1949年期间，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八面来风”似的国内外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

转折时期：这又可以分为两段：1949—1965年间，建国以后，定都北京，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队陆续迁居北京，上海在电影、文学、戏剧等诸多方面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是很正常的转移。上海虽然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了，但文化基础很好，依然作用不小，有些方面如电影、小说在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也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整个中国文化，包括海派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罄竹难书。

成熟时期：1976年，笼罩祖国天空的阴霾一举扫去，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结束长达十年的浩劫，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全中国范围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平反冤假错案，逐步恢复正常的文化活动。上海以话剧《于无声处》和小说《伤痕》为起点，海派文化开始新的阶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化重新焕发青春，健康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正在走向成熟。

当前，海派文化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存在这样那样前进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和弱点，这是要引起重视并认真对待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有哪些基本特点呢？我以为主要有：

一是开放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气之先河。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

二是创新性：吸纳不等于照搬照抄，也不是重复和模仿人家，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当年海派京剧的连台本戏、机关布景是创新，如今的《曹操与杨修》也是创新，金茂大厦则是在建筑文化方面的创新。

三是扬弃性：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在被动开放时期，特别是在“孤岛时期”，租界内某些殖民文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需要加以清醒地辨别，区别对待，避免盲目和盲从。

四是多元性：海派文化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综合性，是复杂的体系，不应该要求纯之又纯，水清无鱼，那就不成其为海派文化了。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容并存，以致落后、低级、庸俗、黄色、反动文化，在以往那特定历史时期，也夹杂其间，怎么能用这些来对今天的海派文化说事呢。

五是商业性，海派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其适应市场的商业性都有不同的表现。上海人往往对国内外市场行情具有敏感性，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比较强，有些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士，也比较有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

我认为，海派文化的“派”，既不是派性的派，也不是拉帮结派的派，更不是其他什么派。千万不要“谈派色变”，也不必对“派”字讳莫如深，远而避之，切忌不要一提到“派”字，就联想到造反派、搞派性、讲派别！不，我们这里所说的海派文化，是反映上海文化风格的最重要流派。我国有京派文化、徽派文化、吴越文化……和海派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的京剧有麒派、尚派等等，越剧有

袁（雪芬）派、傅（全香）派、戚（雅仙）派……都是戏剧艺术的流派，流派纷呈有何不好。

我认为，海派文化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海派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既不要一提到海派文化就沉醉于上世纪30年代怀旧情调中，也不要一说到海派文化马上就与当年的流氓、大亨、白相人划等号。应该看到，经历了漫长时期的风雨淘洗，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上海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派文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海派文化发展的至高境界，我想就是“海派无派”，正如石涛先生所说，“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应该要为海派文化向至高境界发展而不断努力。

时代呼唤《海派文化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是历史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趋同化的当今世界，我们伟大祖国亿万人民正在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而团结奋斗，中央要求上海搞好“四个中心”建设，发挥“四个率先”作用，还要继续搞好在浦东的综合改革试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应有贡献，特别是要主动热情地为争取办好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而努力。世界人民的目光聚焦上海，为了全面了解上海、正确认识上海，都迫切需要为他们提供新的准确而完整的图书资料。国内各兄弟省市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愿望，新老上海人同样都有这个要求。可以说，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海派文化的丛书是当务之急。

《海派文化丛书》必须力求准确系统地介绍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曾经有过争议，如今也还是仁者见仁，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也是好事。我们编纂者则要严肃而又严格地正确把握，既不要过于偏爱，也不要执意偏见。近年来，由于上海大学领导的重视和不少专家学者热情支持，

已经举行了多次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汇编出版了五本论文选集，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欢迎，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出版好这套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的创作、编辑、出版工作一经动议，就得到作家、编辑和有关领导的热情支持，得到上海大学、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文汇出版社等大力帮助。我相信，《海派文化丛书》的出版可以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新的内容，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上海的建设增强精神助推力，同时，也可为希望全面了解上海的中外人士，提供一套具有系统性、权威性、可读性而又图文并茂的图书。

我谨代表《海派文化丛书》的作者、编者、出版发行者，向所有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单位及个人表示衷心感谢！向读者和收藏者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向读后对本丛书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的朋友鞠躬致敬！

是为序。

李伯新

2007年5月20日于乐耕堂

(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目录

总序 李伦新	1
第一章 上海话的溯源	1
一、老上海话和新上海话	
二、上海话的基础是松江方言	
三、新老上海话的地域范围	
四、新上海话万变不离其宗	
第二章 上海城市方言中心的形成	13
一、移民与上海城区方言变化的关系	
二、杭州话、苏州话、宁波话等方言对上海话的影响	
三、书面语、普通话与上海话的互动	
四、上海地区的权威方言三易其主	
第三章 上海话的新旧共生和交替	33
一、从《何典》中所见二百年前的上海话	
二、古音、古语词和古语法形式的遗留	
三、160年来不断简化的上海话音系	
四、上海话语法中的新旧共存	
第四章 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话	75
一、衣食住行用语的地方色彩和现代化	

- 二、文化、宗教、商店的文化词的蓬勃多彩
- 三、华洋杂处形成的大量外来词
- 四、洋泾浜语的生成、活跃和消亡
- 五、第一商业都市中商务用语的蔓延
- 六、折射海派奇思遐想的语汇
- 七、市民社会中的惯用语成语大量涌现
- 八、市民话语中所见的上海市民精神

第五章 上海话与上海民俗 135

- 一、上海地名所见多层次的历史文化叠加
- 二、路名中的社会文化信息
- 三、浸润传统民俗风貌的上海话语词
- 四、闹巷俚俗中歇后语、谚语的沉积和变换
- 五、食文化和性文化
- 六、禁忌语、委婉语、吉利语
- 七、戏谑语、詈语
- 八、新时代中蓬勃产生的新流行语

第六章 上海话使用的社会层次 179

- 一、年龄差异、性别差异中的上海话
- 二、地域差异、文化差异中的上海话
- 三、职业差异和行业语
- 四、切口、黑社会用语
- 五、操双语、多语的上海人
- 六、上海普通话和普通上海话

第七章 上海话与海派文化 199

- 一、沪剧、滑稽戏和其他方言戏曲、曲艺与上海话的

关系

二、文学、影视作品中的上海话

三、上海话童谣

四、上海话民歌、情歌

五、上海话的绕口令、谜语和上海话 Rap

六、沪语广播、电视和沪语网站

第八章 保护和传承上海话 251

一、推广普通话和保护上海话的关系

二、展望上海方言的未来

跋 郑家尧 257

后记 261

附录一 264

附录二 268

参考文献 270

第一章

上海话的溯源

一、老上海话和新上海话

要论及上海话,我们首先应区别两个“上海方言”的概念,因为在上海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过两个上海话。一个我们称之为“老上海话”,从七百多年以前南宋形成名为“上海”的人口聚落开始,到现在还存在于上海城区四周的郊区;另一个是从上海开埠以后随上海城区快速发展而形成的城区“新上海话”。现在国内外通称的“上海话”,指的都是新上海话。本书要介绍和讨论的上海话主要是新上海话。

不过要追溯上海话的起源,还得从开埠以前的上海方言说起。虽然新上海话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变化最为迅速,到30年代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上海话,但是老上海话向新上海话的变化是连续渐进的。

自从有了上海浦,有了上海人的聚居,上海方言便开始形成。古代在长江出海处的三角洲上,有一条自西向东、水势浩大的松江(后称吴淞江,在今吴淞江即苏州河以北),在其下游近入海处,有上海浦、下海浦两支流。上海浦后来就成为今闸港(闵行区南部)到虹口港之间的黄浦江。由于吴淞江渐渐浅狭淤塞,使原在华亭县(后称松江县)城北吴淞江口南岸的青龙镇的大港口难以为继,而被上海浦所取代,由此,南宋朝廷就将市舶提举司迁到上海镇上。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上海镇已初具规模,上海后来自然成为主要出口苏松地区繁盛的棉花和布织品的新兴贸易港口,人口也剧增。到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析松江府一些地域建上海县时,上海镇已成为滨海大港,蕃商云集,黄浦江中段两岸已形成了一个巷陌纵横的人口聚居中心,户数达6.4万户,人口数十万,一种有别于松江方言的上海方言就这样开始形成了。

二、上海话的基础是松江方言

影响江南地区人口流动和方言分布的主要因素有两个：自然地理的分布和历史上的行政建置。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在现今“上海市”版图上方言的分布情况：

今上海地区处于长江三角洲的前缘，形成地域阻隔的因素只有水泊河流。崇明、长兴、横沙三岛是由长江分隔于大陆的沙洲，自西向东而流的古松江原是上海地区陆地上的主干水系，它把陆地分隔为淞北、淞南两大片。由于两地的人口来源不同，今上海地域内淞北和淞南两片平原上的方言也就有较大的不同。

历代行政区治也因循地理环境建置。崇明岛在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起属江北海门县管辖，元朝至元十四年（1277年）置州，隶属江北扬州路，至明洪武八年（1376年）改属江南苏州府，明弘治十年归苏州府太仓州。长兴、横沙两岛都在晚清才始围垦。

古松江北岸地区原属苏州昆山县，到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析昆山县东境置嘉定县，属两浙西路平江府，明朝改称苏州府，到清雍正二年（1724年）析嘉定县东境置宝山县，两县都属江苏省苏州府太仓州管辖。

古松江南岸地域于唐天宝十年（751年）起析嘉兴昆山海盐县地置华亭县，北宋时属两浙路秀州，南宋时属两浙西路嘉兴府管辖，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建置华亭府，后改为松江府，直至清朝末年。由于松江淤塞，宋时疏导后南移为吴淞江，黄浦江转为主干水系，南宋时形成了上海浦新港和上海镇治。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在黄浦江两岸置上海县，属松江府管辖。浦东地域，元、明以来属上海县，直至清雍正三年（1725年）析上海县地置南汇县，嘉庆十年（1805年）析上海县地置川沙厅。

此外，今青浦县练塘地区古代沿泖湖水系与松江府相隔，自唐天宝年

间置华亭县时起,练塘地区就属苏州府长洲县,宋代分隶于长洲、吴江两县,清雍正二年(1724年)划至吴江县、元和县、青浦县合辖,1910年划归青浦县管辖。(参见祝鹏 1989)

古代府治和州治的中心镇,一般是该区域政治、经济、文化联络中心,各地语言都以中心为重,长期以来向中心靠拢,大量居民还是从中心地区逐渐散播出去的。上海地区的方言分布与行政建置划分几乎是一致的。

就语言的分区而言,应依据语言特征来划分,地理和行政的因素只是重要的参考系。语言的分区应该选择在语言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特征来进行划分,这些特征必须是使用频率很高的,本地人语感明显的。语言中,语音和语法的概括力最强。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声调的辨义作用是汉语的本质特征之一,况且声调在语汇中的涵盖频率比其他各种特征都高。我们不妨用单音节词的声调来对上海地区的方言进行划分。声调的高低升降通常使用五度制数码表示,1度最低,5度最高,如普通话“妈、天”调类为阴平,调值为高平“55”;“麻、田”调类为阳平,调值为高升“35”。“阴平”、“阳平”等8个调类是从唐宋时的汉语中古音系继承而来的名称。下面是现今从实地调查到的确切的第一手资料。在上海行政版图上的方言,可以分为崇明方言区、嘉定方言区、松江方言区、上海方言区、练塘方言区5个区,它们归属于3个大区,正好与漫长的自然地理和行政建置历史形成的人群分布状况大致相同。

以下是5个区方言的声调比较表:

崇明方言区在清代与嘉定方言区同属于太仓州,但由于在明朝以前一直属于江北管辖,因此崇明方言以及由崇明向长江北部伸延的启东海门吴语,与嘉定区有一些差异,表现在阳平声调和阳上声调的不同,而阳平读上升的调子则与启海方言以及西面的南通等江淮官话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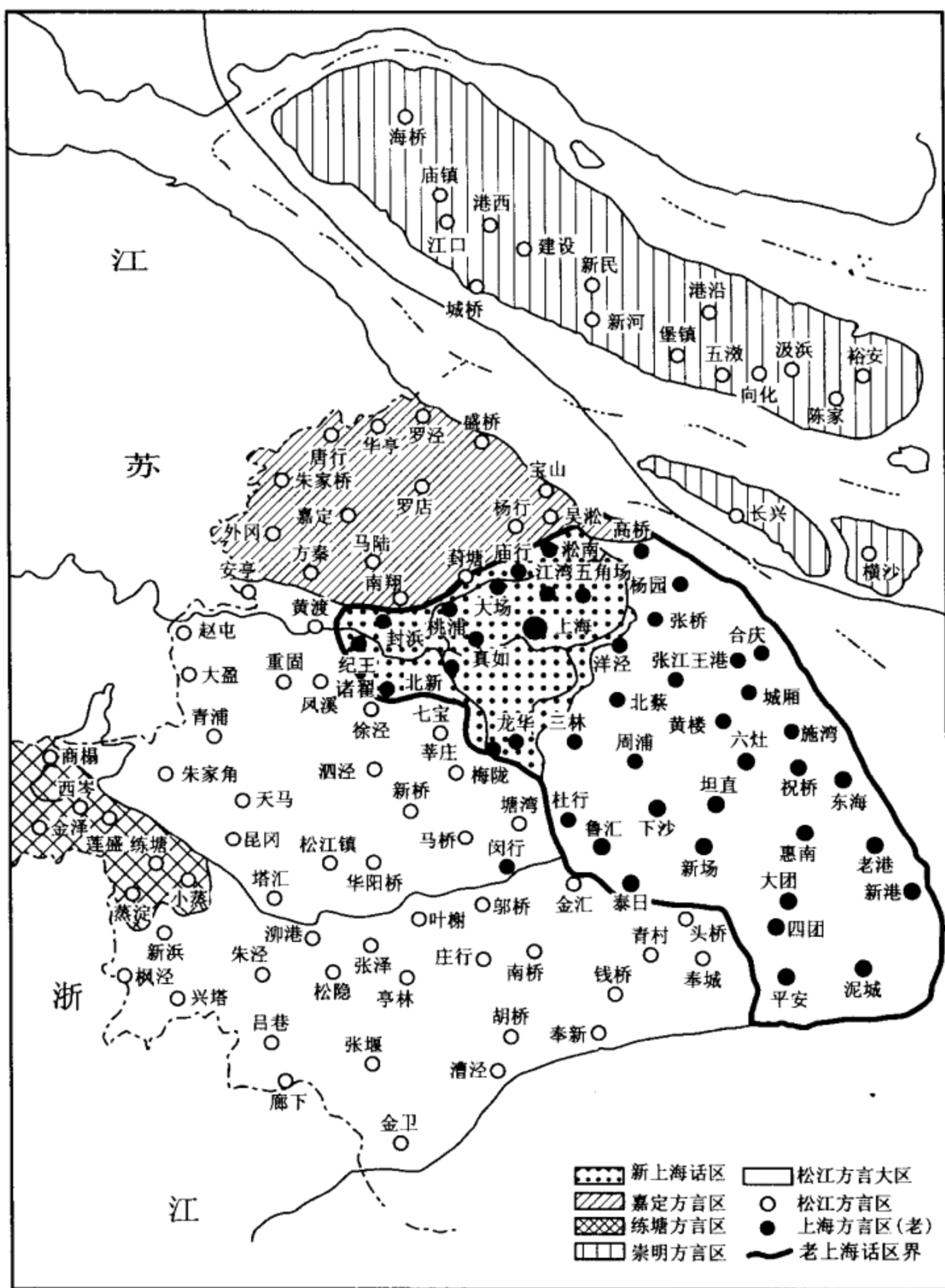
方言区		调类数	阴声调				阳声调				
			阴平	阴上		阴去	阴入	阳平	阳上	阳去	阳入
				全清	次清						
太仓大区	崇明区	8	53	435		44	5	13	31	213	2
	嘉定区	7	53	435		44	5	31	213		2
松江大区	上海区	8	53	44		35	5	22	213	13	2
	松江区	8	53	44		35	5	31	22	13	2
吴江大区	练塘区	9	53	51	44	35	4	31	22	13	2

嘉定方言区的南界是古松江,包括现今嘉定区和宝山区的大部分地区。它与古松江以南的上海方言区、松江方言区的主要区别是阴上声调和阴去声调调值相反。

松江方言区的地域很大,包括现今的松江区、金山区、青浦区和奉贤区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闵行区的部分地区,这与松江府的长期稳定建置有关。松江镇上的老年人在笔者 1979 年和 1985 年去调查时仍保持 8 个声调,阳上的许多字都没并入阳去,而嘉定方言区阳上、阳去已合并为一调。松江方言区与上海方言区同属于松江方言大区。

练塘方言区的阳平调虽与松江方言区一致而与江苏吴江方言的“13”调相异,但就其阴上声调在不送气声母(如“波、多”两字的声母)前读“51”,在送气声母(如“坡、拖”两字的声母)前读“44”而言,这种不送气和送气清声母声调有别的现象则与吴江方言的主要特征相同,与离练塘不远的吴江的黎里、盛泽镇相似。这块小区包括青浦县西南的练塘镇乡、小蒸乡、蒸淀乡、西岭乡、莲盛乡、金泽乡和商榻乡,应归太湖片吴江大区的。

除练塘区外,上海地区的方言以古松江为界,可分为南北两大区:苏州府太仓州属大区 and 松江府属大区,它们分别包括了淞北明清时属于苏州府太仓州管辖的地区方言,和淞南明清时松江府管辖地区的方言。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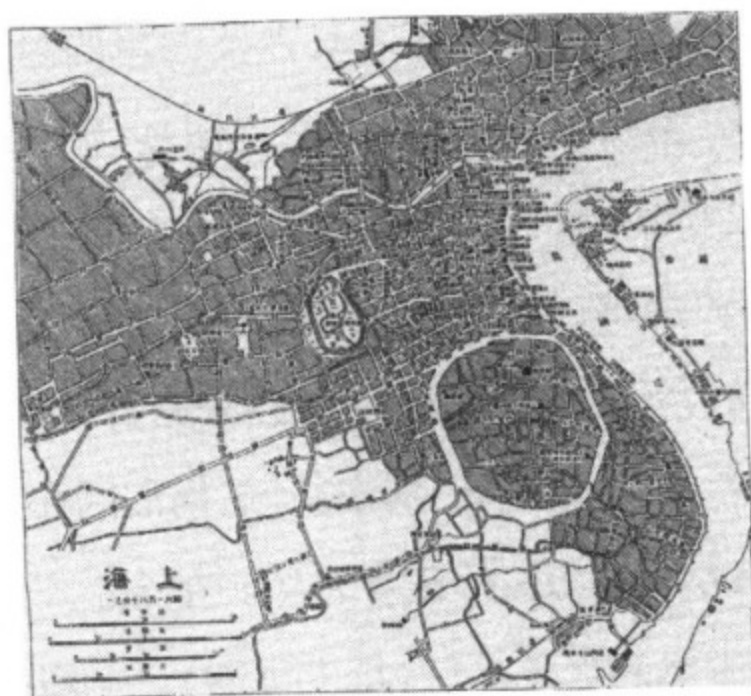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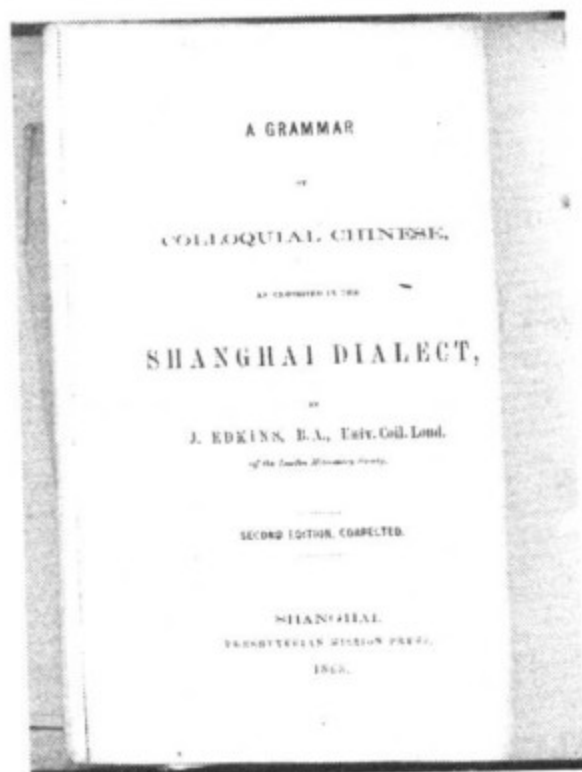
* 上海地区方言分布图

区阴上调“44”、阴去调“35”，北区相反，阴上调“435”（“4”只是开头的滑音）、阴去调“44”。北区带有更多的旧苏州府方言的特点，如：有前响复元音韵母，没有缩气音声母，是非问句用“阿 V”；而南区带有更多的旧嘉兴府方言的特点，北区的前响复元音韵母读单元音（如宝山“斗”的韵母[ɔ]上海读[ɤ]），有缩气音声母（如宝山“斗”的声母[t]，上海老派读[d̥]），能用摇头或点头代替答问的是非问句用“V 哦”（如苏州、宝山的“侬阿晓得？”在嘉兴、上海说“侬晓得哦？”）。（本书的注音方法见“后记”说明。）

综上所述，上海方言的渊源应该来自南宋时的嘉兴府，即由嘉兴分出松江，松江府中建置上海县，上海方言的基础是松江方言。上海方言大致是松江方言在古松江以南、黄浦江两岸的一个分支。老上海话的一些主要特征都与松江方言相同相似。

三、新老上海话的地域范围

在旧松江府地域内，由于从南宋时起已形成了上海浦新港，人口开始聚居，在浦东分治之前，黄浦江两岸的上海县内已经形成了一个上海方言区。这个上海方言区包括现今的地域范围是：嘉定区今吴淞江北岸的封浜镇乡，普陀区的长征镇乡、桃浦镇乡、真如镇，闵行区的纪王镇乡、诸翟镇乡、华漕镇乡、新泾镇乡、梅陇镇、虹桥镇、曹行镇乡、陈行镇乡、杜行镇乡、鲁汇镇乡，徐汇区的龙华镇乡、漕河泾镇，长宁区的北新泾镇，宝山区蕰藻浜以南的淞南镇乡、大场镇乡、庙行镇乡及葑塘（即祁连）乡东部，虹口区的江湾镇乡，杨浦区的五角场镇乡，上海市城区，浦东新区，南汇区和奉贤区的四团镇乡、平安镇乡、泰日镇乡北部和头桥镇乡北部。在这个广阔的地域里，长期通用的就是上文中所述的老上海话（见上页图）。上海



* 1853年初版后 1868年再版的艾约瑟的《上海口语语法》，是汉语第一部口语语法著作

* 1853年初版后 1868年再版的艾约瑟《上海口语语法》之两页

*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上海地图

方言最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地方一直是原县治所在地,即今黄浦区人民路和中华路环线之内的地域。

上海方言与松江方言的差别在于阳平声调。上海是 22 平调,松江是 31 降调。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 Edkins)在 1853 年时记下了上海方言的 8 个声调,也说到阳平声调与西面(即松江)的降调不同。但是经过一个半世纪,在现在上海城区内上海话的声调已合并为 5 个,只有到今城区的周围乡下才能在老年人说话中调查到 7 个声调了。据陈忠敏(1992)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调查,在那些城区外围的浦西地区,不少老年人还保留着阳平的“22”低平调,而不是松江的“31”低降调。在浦东原川沙县,虽许多地方阳平已并入阳上调读“213”,但上海的浦东地区的许多乡下,如川沙城厢镇外的施湾、六团乡,80 年代后期都能记到阳平为“22”、阳上为“213”的 8 个声调。由此可证,浦西和浦东至少在 160 年前同属阳平调 22 的地区,而以“22”阳平调为标志,则可与松江方言相区别,成为一个独立的上海方言区。到了今天,上海方言区中阳平单字的声调“22”多数已经不存在,合并到阳去声调去了,但是在上海城区外,还可以用至今还存在着的以阳平为首字的两字组词语(如:长城、媒人、铜铃、蹄膀)所读的连读变调,即“23+44”舒长调(这个读音在《庵堂相会》、《罗汉钱》、《鸡毛飞上天》等沪剧的说白中还能明显听到),从而将整个老上海方言区区分出来。(而宝山、松江、奉城是 22+52, 24+31,南桥是 23+52, 24+31)

上面所述的上海方言区是上海开埠前的上海方言分布面貌。160 年前,上海方言区内的语言演变相对来说是十分缓慢的。上海经过开埠以来 160 年的发展,在原上海方言区的地域内,形成了一块繁华的中心城区。在这新城区范围内通行的话,才是如今我们通常所称的“上海话”或“上海方言”,即“新上海话”。我们现在通称的“上海话”,是上海 1843 年

开埠以后在老上海话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新上海话。其使用范围到20世纪末,在黄浦江西面大致是今中环线以内的地域,浦东大致在黄浦江沿岸不远的地带。由于近10年来市政建设的不断扩展,上海城区迅速向四周郊区扩展,市内人口向近远郊搬迁,从而使城区扩展地区的乡下话迅速被上海话取代或处于靠拢之中,因此上海话的使用地域正在不断扩大,就目前上海城区扩张和变迁较大的情形下,一时也难以划清边界。

那些老上海话,现在通常被称作上海“乡下话”,或以地名直称“浦东话”、“梅陇话”、“三林塘话”等。如果到原上海方言区北部边缘的淞南镇乡、西部边缘的封浜镇乡、南部的梅陇镇乡去听那里的老年人的话,那些地方虽彼此被繁华城区相隔很远,但还保持着相当一致的老上海话的面貌。那儿的老年人还说着有7个声调的,与艾约瑟1853年所记语音、词汇、语法相似的上海话。

至于原松江府的西部地域,即现今是松江区、金山区、奉贤区等的广大地区,一直通行的是松江方言,并非上海方言。这些地域是在1958年才划进上海市版图的。我们不能以现今的行政版图来判别语言的区划。松江方言区除了在阳平声调上与上海方言区不同之外,人称代词等不少方面亦有明显差异。

四、新上海话万变不离其宗

老上海话在上海开埠后随城区迅速发展而快速变化。大约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老上海话已经向新上海话转变。其在语音上的一个标志是原来韵母读[e]的“半、盘、南、男、穿、占”等字变读为[ø](安)韵。现在也许也能以此标准区分“上海人”与“乡下人”。

上海方言,在160年里就像这个城市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在这么短的一个时段里,方言的变化不会太大。开埠以来,上海是个移民城市,上海土语处于占人口80%以上的移民的方言撞击下,移民的方言在不同程度上起了冲淡土著方言的某些特征的作用,在上海快速都市化的历程中,正是在这短短的160年里上海方言发生了巨变。变化之处,俯拾皆是,比如上海话的韵母从1853年的63个变成现今的32个,声调从8个合并到5个,减少都将近一半。上海话在这160年来的高速变化,使今天上海城区的新上海话与其四周乡下原上海方言区内还保留着的老上海话差异极大,大到上海城区年轻人与郊区老年人难以通话的地步,这与苏州城、郊或嘉兴城、郊等地的语言差别很不相同,这是我国近代方言发展史上的绝无仅有的奇迹。

过去有过一种权威说法,当大量外来人口迅速到某地时,力量占强势的语言就会取代弱势者的语言,成为该地的通用语言。但是上海方言的变化历史事实否定了这种观点。

大量的、压倒多数的外籍人口进入上海,上海话的整个语音、词汇、语法系统非但没有被动摇,而是在整个开埠后的一百多年里,形成了外籍人尤其是他们的子女在上海都学上海话,用上海话交际的局面,上海地区还是通行上海话。

老上海话的语音系统、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与松江话相同相似。1843年以后,各地移民进入上海,其中大多数来自江浙地区。移民们的方言影响了上海话,使上海话获得了语言杂交的优势。上海话在移民的方言的撞击下变化很快,再加上主要是上海在日新月异的都市化社会生活变化中产生出大量的新词新语,“老上海话”在城区于是渐渐变成了“新上海话”。

由于上海社会自1843年开埠后在经济文化上很快形成的中心地位,

上海话的“权威性”也随之得到确立和巩固,虽然移民来源五湖四海,遍布各业,人多势众,许多人的资力和智力也许也优于上海本地人,然而他们之间却互相抵消,在开埠后的一百多年中,在上海城区这块土地上,没有一种语言或方言能够相当大地影响上海话或取代上海话。结果,这些移民的子女从小都学会了上海话,后来都以“正宗”的上海人自居,以说标准的上海话作为其身份的代表,因此上海地区还是通行上海话。上海话于是在老上海话自身基础上稳定有序并对外来人口方言长处兼容并蓄地持续发展着。直到2003年,上海话的10个元音音位和1853年10个元音音位完全相同,上海话的22个辅音音位也始终未变,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里,上海话的基础即整个语音、词汇、语法系统没有因为移民方言的冲击而发生动摇,其语音系统的合并和变化脉络都有案可稽,其特征词、基础词语和语法系统的基础依然保持着从松江方言分化而来的老上海话的框架和主要内容。在这160年中,上海话虽变得五光十色多姿多彩,但又万变不离其宗。

现今的上海话在方言分区上归属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

上海语言的变化经验对于世界都市语言变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它提供了一个既典型又独特的样本,语言学家、人类行为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文化学家或许都可以从上海话的变化中微观地观察材料,得到灵感和启示,从捉摸五花八门的变化现象中分析总结出新的规律。

第二章

上海城市方言中心的形成

一、移民与上海城区方言变化的关系

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在1843年开埠之前,坐落在上海方言区内的原上海县城,只是一个方圆9里的小县城,开埠以后,县城西部、北部的广大的划为租界的地区和县城迅速发展成为繁华的大都市。从1843年到1949年一百多年的时期内,上海城区的人口迅速增长,1852年有544 413人,1900年为1 289 353人,1935年为3 701 982人,1949年为5 455 007人。人口增长主要原因是外籍人口的移入,当时上海人口籍贯遍及中国各省市,主要来自江苏和浙江地区。1935年江、浙籍(包括上海本籍)人数在公共租界内占总人数的87.43%,在“华界”内占总人数的83.46%。在公共租界内,上海籍人口1885年占总人数的15%,1900年为19%,1935年为21%。1946年,在上海市管辖区内,本地籍人口占20.7%,其中农村地区如高桥、龙华等地占近90%,而县城的邑庙区为8.4%,蓬莱区为11.9%,商业最集中的黄浦区为5.9%,老闸区为11.1%。1950年,本地籍人口占15.1%,邑庙区为6.3%,蓬莱区为10%,黄浦区、老闸区各为4.8%。(邹依仁1980)

外籍人口大量进入上海并占大多数,使得上海方言一时变得无序起来。其中词语使用方面的混杂兼用现象最为常见,如许多江、浙一带的常用词最易加入上海话一起使用,其次是官话的词语进入上海话。以常用副词为例,在上海话里就造成一义曾有多种说法。如“原来”这个词的同义词有“原来、原生、本生、本来、原本、本底、本底子、原本塌里”等说法,“一共”有“一共、一总、总共、共总、统共、拢共、拢总、一共拢总、一齐拢总、一齐拉起、一起辣化、一塌括子、亨八冷打、搁落三姆”,“一定”有“一定、肯定、准定、一准、板、板定、定规、定计”,“大约”有“大概、作兴、大约、大约摸、大约摸作、大约光景、约摸光景”,“忽然”有“忽然、突然、突然之间、忽

然间、忽声能、着末生头、着末头里、着生头里、辣末生头”等说法。又如方位词“外面”在上海话有“外势、外首、外头”的说法,后来又说“外面、外面头、外底头”等,“后面”原有“后势、后首、后头”,后来又说“后面、后面头、后底头、后底、后头起、背后头、屁股头”。“慢慢地”有“慢慢叫、慢慢能、慢慢介、慢慢能介、慢慢能个”,“一个人”有“一个头、一干子、一家头”。再如“净浴、恣浴、汰浴”,“碌起来、爬起来”,“话话看、说说看、讲讲看”,“衰瘡(ssadhu)、吃力”,“坍铤、勿好意思、难为情、现世、惭愧”,“时辰钟、自鸣钟”,连亲属的称呼也会有多个同义词,如“爹爹、阿伯、爸爸”、“唔(n)奶、阿奶、好婆”。上海话常用词中同义词特别多,是其他吴语中所少见的,在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人群中使用。到20世纪50年代,这些词语还到处都能听到。上海话中彼此有精细差异的词也很丰富,如“一眼眼、一点点、一滴滴、一滔滔、一屑屑”,模糊一点说都是“一点儿”的意思,清楚一点说,“一滔滔”(滔,dok)体积稍大,多指黏稠状的液体,如浆糊、痰之类,“一屑屑”则是比粉墨大一点的固体。还有些外来的词语与本地话杂交,形成中间态新词语,如“一似一式、一模一样”→“一式一样”,“一日、一天”→“一日天”,“归(读如居)去→转去→回转去→回去”。

语音的差异也很明显,如中古咸山摄字(普通话读“an”韵的字,像:男、赞、念、款、圆)的字音的变化是个典型的例子。开埠时大部分字都像现在的绍兴话那样带有鼻化音,50年后在19世纪末鼻化音消失,一部分最早脱落鼻音的读高元音韵[e] (“暗”读如“谗”)的字(如:男、贪、暗、敢、半)后受苏州话的影响,许多人变读为[ø]韵 (“暗”读如“案”),于是形成新旧两派读法,新派人把老的本地音视作乡下浦东音。语言学家赵元任1928年在上海调查方言时曾记下这种变化的生动景象:“有新旧两派,新派分类近似苏州,旧派近似浦东(两派人以‘苏州音’、‘浦东音’互相指斥),但许多人掺杂两种。”(赵元任1928)

在一个开放性的态势中,由于上海都市社会具多元性和宽阔胸襟,对外来的词语也表现出慷慨大度的吸收力和融化力,从而使语言的变化就像上海这个社会一样富有魅力。具体而言,吸收了许多外来词语使语言的表现力更为丰富生动,而这些迅速发展变化的结果,使上海话始终处于激活状态,取得了杂交优势,从而发展成为一种十分活跃、十分前卫的语言,同时也迅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移民的方言在不同程度上冲淡了上海话中的土语特征,尤其是江浙两省人的方言,因为这两种方言与上海方言最相近,他们最容易与上海人通话,而在互相通话中,他们在操各自方言味的上海话时,不时用自己的方言模式来框架或延伸上海话,于是各种方言中那些相通的部分就占了优势,在会话中自然地发展了吴语公约数的成分。如“地方”取代了松江话系统的“户荡”、“场化”,“外头”、“外面”取代了“外势”、“外首”,“左面”取代了“左半片”,“拿”取代了“担”,“汰”取代了“净”,“回去”取代了“归去”,“难为情”取代了“坍铤”。那些被取代词还有:日头(太阳),风潮(台风),名头(名字),所在(房子),图书印(图章),坐褥(坐垫),碗砂(瓷器),才情(才华),回往心(回头个想法),打切(打听),出理(整理出清),歇作(作罢),惹厌(讨厌),做闹(吵架),寻淘气(吵闹),恹 qqiu(坏),漓沥(干净),清水(清爽),出客(漂亮、高雅、体面),懈儻 xxiaza(聪明、能干),面南(朝南),生拉 ssanla(当然咯),日头直模样(太阳升到顶个样子),等等,包括那些在初通商时形成的词语,如火轮船(轮船),通事(翻译),买处、消场(销售处),时样(流行),力钱(出体力个报酬),包皮(外包装)等(这些旧词在19世纪西方传教士记录的上海话中都有,括号中是现今用法)。再比如“说”这个词原来上海话说“话”,像“侬要照我话拉个啞做”。(麦高温41页)“去话啥呢?老弟今朝舍下来味,对我有啥话头否?”(土话指南29页)绍兴等地也说“话”,丹阳、靖江、常州都用“说”,但无锡、常熟、宁波、黄



* 1862 年英国传教士麦高温《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之
 两页

* 1908 年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发行的《土话指南》之两页

* 1908 年上海徐家汇土山湾传教士发行的《土话指南》是
 一部全面记录上海话口语的佳作

岩的大多数地方都用“讲”。查看蒲君南 1941 年的《上海方言语法》里(63 页)记录,当时的上海话已经用“讲”了,但例句中还有不少用“话”。现在“话”已不说,用“讲”而未用“说”。又如原来“安放”这个词上海话说“安”,像“茶壶安拉茶几上”。(麦高温 10 页)而常州、无锡、杭州、嘉兴等地既能说“安”(除杭州又说“放”外),又能说“摆”;苏州、吴江等地区不说“安”,大部分吴语地区都能说“摆”,于是上海话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几乎全用“摆”,直到近年来青年人因普通话而趋向改说“放”,并有扩大之势。再如“洗”一词,溧阳、诸暨等地说“洗”,苏州、吴江、嘉兴等大部分地区说“汰”,只有松江、上海一带用“净”,像“碗要净净瀉沥”。(麦高温 11 页),于是上海话中很快就以“汰”取代“净”,而 1939 年蒲氏在土山湾出版的《上海话教程》已记“汰”,不再有“净”。上海话的“洗澡”原称“净浴”(土话指南 28 页),后受苏州话的影响,改称“恣浴”(蒲君南 1941, 171 页),现在称“汰浴”。

上海话在原松江片方言底层的基础上迅速发展着,使属于吴语临海僻远地带的、原来发展最为缓慢的、较苏州话嘉兴话保留更多古老特征的老上海话,在百年内却一跃领先为吴语诸次方言中发展最速的新上海话。上海话在强地域性词语的放弃更替,吴语公共成分的胜出和吸收,高频词语的公约数化的同时,上海话在流动和创新中再建序,它就自然地扩大了它在整个吴语地区的影响,这使它顺利地成为了吴方言的代表方言。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户口制度的改变制止了大规模的移民,上海话重建了稳定有序的发展局面,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但上海话的吸收外来语言的能力依然很强,自我进化机制依然十分活跃,上海话原来养成的善于拿来和进取创造的习惯已经成为传统,上海话的变速还是在吴方言中遥遥领先。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由于新一轮的全面开放,上海重新成为一个五方杂处的新移民和本地人和谐共处的城市,上海已经成为

一个多语社会,新的语言现象频频出现。

上海城区经过了 160 年的变迁,今上海市中心区的上海话比周围的老上海方言区的方言发展几乎快了近一个半世纪。这种情况大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郊区开放、城区急剧向外扩展后才有所改变,上海郊区的语言在近 20 年来已经开始发生了快速向上海城区上海话靠拢的大变化。

二、杭州话、苏州话、宁波话等方言对上海话的影响

对上海话发生影响最早的方言是杭州话,那是 700 年以前的事了。杭州话的影响起自南宋和元朝。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北宋王朝被迫南渡,首都建在浙江临安,即今杭州。宋室的大迁徙带来了中原地区开封等地的被视为正宗的北方汉语,改变了杭州话。

今杭州话是这样一种语言:它也属于北部吴语的太湖片次方言区,现今跟吴语太湖片其他的地区(如绍兴、宁波、上海)相比较,仍保持着大量吴方言的共同特征,不过由于杭州在公元 1127 年到 1279 年曾为宋都,大量中原移民改变了当时的杭州方言,使杭州话至今还带有许多官话成分。比如中古音“见”系二等开口字大致上都随官话读成相当于太湖片其他方言的文读音。如“加、家、嘉、假、价、架”等字只读“jia”而不另读“ga”。有大量的“儿”尾词,“儿”尾的读音是“er”,如“鸭儿、梨儿、袜儿、糕儿”。人称代词用“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也与北京话相似。杭州话有的声母和许多入声字也不同于其他吴语地区的读音,如“日”的声母读“sh”,“学”的韵母读“iak”。这都是古代官话留到如今的读音。

由于宋元时代以杭州为中心的文化十分发达,这些从北方迁徙来的

“中原雅音”，当时对周边地区的吴语也发生了很大的辐射影响，形成了松江话上海话中文人在读书时采用的大量的“文读音”。文读音主要用于读书，但是后来也渐渐影响到一些口语中的来自书面语的词语。直至如今，上海话中有些字音，有两种读法，有原来的口语中的读音，称为白读音，如：“大”读“dhu”；有在杭州话影响下产生的文读音：“大”读作“dha”。如“大小”的“大”，上海口语读成如“杜”的音，但是“大家”中的“大”就读成文读音，读如“汰衣裳”的“汰(洗)”音；“大家”中的“家 ka”，是读白读音的，如“咖喱”的“咖”音，但是在说“专家”时，就是文读音“家 jia”，读如“佳”的音。明清以后由于政府和知识阶层中一直看重北方官话中保留中古音较多的以南京音为主的官话“南音”，视为汉语的标准音，因此更加巩固了文读音在吴语中的地位，传流至今。“南音”本来就是南京地区北方话对中原语言的继承，很多读音与杭州音的发音相同，但是有些吴语北部地区和较发达的地区，如苏州、吴江、嘉兴，有的文读音已改用了“南音”，像“学、觉”韵母的文读音都读了靠近“南音”的[iɔʔ]或[ioʔ]，但语音发展较滞后的松江、上海话中依然保留着杭州音的iak[iaʔ]。

下面列举一些上海话的声母或韵母，白读(口语)音在横杠前，文读(读书)音在后，再各举几个例字。

(1) m—fh/hh:味、尾、万、晚、亡、忘、妄、望、网；

(2) n—sh:饶、绕、扰、人、仁、忍、认、勒、日、闰、瓢、壤、让、茸、褥；

(3) ni—er:儿、二、耳；

(4) g—j; k—q; gh—jh; h—x; nhg—yhi:家、加、嘉、假、架、驾、嫁、价、衙、下、解、街、监、舰、甲、夹、间、拣、奸、江、降、讲、学、觉、杏、行、茎；

(5) 加 i 介音，主要元音有的发生变化：o—ia 榧、丫、哑；a—ia 鸦、押、压；an—in 樱、鹦；

(6) o—a:挪、巴、芭、疤、霸、怕、爬、骂、麻、马、拿、诧、沙、花、华、

蛙、洼；

(7) a—e:戴、带、赖、太、乖、怪、拐、快、筷、歪、怀、槐；

(8) yu—ue:亏、跪、龟、柜、归、鬼、贵、围、纬(声母同时由j组改为g组)。

除了上面8条以外,还有一些散字:大 dhu—dha,画、话 hho—hhua,也 hha—yhe,五、吴、午 ng—hhu,亩 m—mu,旺 yhang—whang,生、声 ssan—ssen。

这些文读音大致都是杭州语音给上海话带来的。

在文读音方面,随着现代普通话对上海话的影响深入,一些字的文读音已经放弃了杭州音而改读了普通语音,如:n—sh—l:饶、绕、扰、人、儒、染。这六个字的白读音声母是n,文读音由原来的杭州音的sh向l或r转变。

杭州话对上海话的影响年代久远,其影响流传至今。而后面要谈的苏州话、宁波话的影响主要是在近代特别是上海开埠后的事了。苏州话在文人中的影响还要早些。从清代乾隆时代以后,苏州已经代替南北商业汇聚的扬州、金陵等地,而经济文化中心南移至江南以后,以苏州为中心则形成了强大的文化中心。其间通过文人传播,像以苏州为中心的有200年繁荣历史的南昆戏曲对江南文化有较大的影响,再发展到近代,苏州评弹、苏州滩簧对江南一带的文化也形成了影响,苏州话成为吴语地区长期的权威方言。在上海开埠以后,苏州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苏州弹词成为上海市民趋之若鹜雅俗共赏的曲艺。上海的滑稽戏在20世纪20年代雏形期,是从苏州的小热昏唱腔和苏州滩簧发展起来的。早期在上海楼外楼、大世界唱苏州滩簧的陆啸梧等就是与第一代上海滑稽演员王无能搭档的;一批滑稽唱片由徐卓呆等主唱主演的也使用苏州方言;在楼外楼开唱“文明宣卷”(也是滑稽所吸收的江南小调的前身),如著名演员郑少赓唱的宣卷和苏滩也用苏州方言说唱,不过后来蒋殿奎、庄海泉等唱的“苏州滑稽”中口音已经带上海音了。直到第二代上海滑稽演员江笑笑、

刘春山等的唱片里,他们还是用苏州话说唱,不过是带有浓厚老上海话语音的苏州话了。如蓓开唱片公司录制的78转唱片标明“著名滑稽家江笑笑”的“上海笑话《一言难尽》”,说的就是苏州话和上海话混杂,或者说上海化了的苏州话。在上海流行的曲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尚且继承苏州话为艺术语言,无怪乎在晚清及以后的一些在上海写出的带有吴语说白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九尾龟》等所用的吴语都用苏州话(也不免夹杂一些在上海说的苏州话的语词)了。

苏州话与上海话的差异主要在语音语法上,所以它对上海话的主要影响是在语音和语法上。苏州话在20世纪头三十年对上海话的实际影响最大。

在语音上上海话有一些主要的明显的标志是:[e]韵字“暗、南、半、盘、穿、占”大量转变为苏州音的oe[ø]。oe[ø]这个音,原来在上海话中并非没有,只是使用的范围很小,如“最、算、酸”等字的韵母便读此音。“暗”等在二三十年代开始已随苏州音变为读oe。后来,在40年代到70年代oe韵占上风有了一个时期。不过,这类字在上海话中一直不稳定,有的人有两读现象,如“餐”、“款”等。后来,这类字多数又受到宁波话等的影响在八九十年代有的人转为e[ɛ]韵,“男”、“南”读如“难”;也有相反的,“攀”、“盞”读如“潘”、“最”音。

苏州话对上海话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是非问句“阿V”(V为动词)和完成体是非问句“阿曾V”对上海的是非问句的影响。原来老上海话是非问句的形式是:“V哦”和“V拉蛮”,比如说“去吗?”老上海话与嘉兴、松江话一样,说“去哦?”,但苏州话用江淮官话延伸过江的“可V”形式说“阿去?”又如说“去了没有?”老上海话完成体式是用“去拉蛮?”(“蛮”是“勿曾”的合音)苏州话、嘉定话用“阿曾V?”(“阿曾”用两字合音an[ā]);否定式“没有去”老上海话用“勿曾去”,苏州话、嘉定话用“勿曾去”(“勿曾”两

字用合音 ffen、vven)。由于苏州话也可能受嘉定宝山话的影响,因此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人老派上海话中,是非问句时是用“阿去”、“阿曾去”、“勿曾去”的。苏州话与上海话在混用中还在上海话中产生了两者叠加的“阿去哦”、“阿曾去哦”的叠式用法,这在苏州话中是没有的。用了一两代人以后,在后来的年轻人中,是非问句又重新回复过去的“V 哦”,“V 哦”在当今的青年中所占使用频率高于 80%,其次是过去受杭州话而今主要是受普通话影响的“V 勿 V(V 不 V)”(去勿去?);三四十年代多数人使用的“阿 V”已经萎缩到少数几个已经形成的固定短语中去,如“阿是”、“阿要”、“阿会得”、“阿有啥”、“阿晓得”,像一个词读法一样用一个语音词的连读调发音了。至于完成体是非问句因受普通话影响读为“去了哦”、“嘅没去”。

苏州话的影响还表现在上海话中吸收了一些苏州话的常用词语,如:“惚浴、灶下间、黄落、肉痛、舒齐、标致、挺刮、茄门、料煞、啥叫啥、先勿先、煞死、勿局、少停停、势必至于、勒浪、沉倒头、捷转头、穿跟踪、吃家生、疑惑疑注、阿要现世”,有的吴语公约数词语也是从苏州话中传来的。

浙江的宁波话也是太湖片的吴语,宁波人与上海人通话没有困难,宁波话语音和语法与上海话差别不大,但是在词汇使用上有不少常用词与上海话不同。宁波话也是对上海话较有影响的一个方言。它的影响是在上海开埠后随着大批宁波商人与百姓移民上海而造成的。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从百姓下层开始,对上海话影响较大的是宁波话。对宁波话的吸收主要是词语。如上海话中“高头、窗门、薄刀、碗盏、老头浜(伯儿)、男小畏(娃儿)”等词,借自宁波话。还有一个最感觉得到的词,是从宁波方言中借来了“阿拉”,取代了上海话原有的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侬”或“侬”。还有几个称呼,如“老公”、“老婆”,有些上海人用了宁波话的连读调来读,读成“24+21”的调子。

宁波与上海是同时开埠的城市,历史上宁波比上海发展快,苏州更是发达,所以这两个方言的人声韵在 19 世纪中叶都已比上海方言简化。上海方言原来承袭了吴语中最滞后的,即与中古音相对最接近的、复杂的人声韵,有两类韵尾。但是在上海开埠以后的半个世纪以后,上海话的人声韵开始合并,合并的趋势走的是与苏州话和宁波话同样的次序。这可以说是这两种方言和周边其他方言对上海话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上海话受到各种方言的撞击下在城市化的转变中快速变化,走的方向是吴语语音演变共同规律。

上海话以宽阔的胸怀善于不断吸收移民方言中的有特色的语汇,比如借自苏北话的有“脆麻花、小巴戏、乖乖弄底冬”,借自杭州话的有“莫老老”等。

有些人粗浅地仅从表面看问题,感到上海话受苏州话或宁波话影响很大,认为上海话就是它们拼合起来的一种混合语,或者是在江浙人来了上海后,把江浙各地的话汇聚起来而成的一种新方言叫上海话。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上海方言不论是语音、词汇、语法,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连续快速发展着,几乎所有的词语只与一种上海话语音相对应,没有间断过。许多常用词,上海话率先用吴语的公约数词语或书面语词语取代了地域性强的词语,如用“地方”取代了“场化”和“户荡”,用“太阳”取代了“日头”,这种变化只是在上海发生较早而已,而其他吴语区城市后来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三、书面语、普通话与上海话的互动

上海话在文化环境发达的大城市里发展,受到最大的影响,是文化阶

层较多使用的书面语的影响。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有些常用词,渐渐以普通话的书面词语取代了上海话词语,或者处于旧词语和新词语共用之中。

由于北方话与吴语的差异较大,上海话到现在在语音音系上没有接受任何一个普通话的音位,但是在词汇上,接受书面语和普通话的影响方面在近年来有长足的发展。上海话变化之大,最明显能感受到的是新上海话不但磨去了松江府地域方言的许多特色,而且大量吸收了书面语通用词汇和北部吴语的通用词汇,并在现代社会的语言交际中发展了许多新的词语,还反过去扩散到其他吴语和普通话中去。

老上海话的一些强地域性的词语逐步被吴语中的通用词语和书面语词语更替,大都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例如时空用词“外场”为“外面”取代,“里势”为“里向”取代,“上半昼”为“上半日(今又说‘上半天’)”取代,“北首”、“南墟(音‘海’)”为“北面”、“南面”取代,“日多”、“日逐”为“每日”或“每天”取代,“各到落处”为“各搭地方”取代。许多旧名词都更替了,如:“台单”→“台布”,“地阁”→“地板”,“蓬尘”→“灰尘”,“栈”→“仓库”,“栈房”→“旅馆”,“薪俸”→“工资”,“样色”→“样子”,“篷”→“帆”,“风潮”→“台风”,“手巾”→“毛巾”,“汗马甲”→“汗背心”,“褥子”→“垫被”,“隍身”→“背垫”,“筷箸笼”→“筷筒”,“镬子”→“锅子”,“暖锅”→“火锅”,“汤盅”→“饭碗”,“酒盅”→“酒杯”,“脚桶”→“脚盆”,“香蕈”→“香菇”,“寒豆”→“蚕豆”,“游火虫”→“萤火虫”,“结珠网梁”→“蜘蛛网”,“蚰蟾”→“蚯蚓”,“娘子、家主婆”→“老婆”,“新官人”→“新郎”,“大细”→“子女”,“奶婶婶”→“奶妈”,“养新妇”→“童养媳”,“邻舍”→“邻居”,“大膀”→“大腿”,“眼火”→“眼光”,“冻瘡”→“冻疮”,“经水”→“月经”,“精虫”→“精子”。有的用了吴语中的公约数显词,如“婴儿”以“小毛头”取胜,“娃娃”以“小囡”、“小人”取胜,“小墟里”→“小辰光”。像“大老官(对

别人家里主人的尊称)”，“小官人(对别人家里男青年的尊称)”，“家慈”，“令郎”那样的词淘汰了，并无新词更代。

动词、形容词也有一批更替。如“壳张”、“考老”→“料到”，“歇作”→“算数”，“相帮”、“帮衬”→“帮助”，“买办”→“买”、“办理”，“知照”→“关照”，“应承”→“答应承诺”，“揞[liʔ]”→“拗”，“捷”→“举”，“薏 bhe”→“爬”，“盪 bhoe”→“潜 ppu”，“奘 zang”→“胖”，“稳足”→“稳当”，“快活”→“快乐”，“相宜”→“合适”，“麇糟 aozaO”→“齧齧”，“舒齐”→“妥帖”，“惹劲”→“讨人欢喜”。

上面列举的旧词似曾相识，如今偶尔也能听到，但毕竟已从大多数人口中退隐。还有一些词语现今虽在使用中然渐见其旧，正在被后面通用的书面语词替代之中，如“街路”→“马路”，“吃饭间”→“饭厅”，“写字间”→“书房”，“灶披间”→“厨房间”，“客堂间”→“会客室”，“马桶间”→“卫生间”，“节头管”→“手指头”，“雄鸡”→“公鸡”，“田鸡”→“青蛙”，“地栗”→“荸荠”，“荸萄”→“葡萄”，“干面”→“面粉”，“镯头”→“手镯”，“链条”→“项链”，“女家”→“女方”，“脚色”→“家伙”，“时势”→“形势”，“申报纸”→“报纸”，“壁脚”→“墙壁下面”，“旺日头”→“好太阳”，“膾食”→“积食”，“醉船”→“晕船”，“火着”→“火烧”，“落车”→“下车”，“预备”→“准备”，“伤风”→“感冒”，“发寒热”→“发烧”，“打金针”→“针灸”，“勿色头”→“倒霉”，“几化”→“多少”，“行情”→“交关”，“常庄”→“常常”，“啥讲究”→“啥原因”等。

开埠后在上海诞生的一批新词，也随着普通话的推广而改用普及形式。如下面一些词，前面的形式是伴随着新事物的产生而在上海诞生的新词，但如今都渐渐改用后面的与普通话大致一致的通用形式。“影戏馆”→“电影院”，“幼稚园”→“幼儿园”，“千里镜”→“望远镜”，“软片”→“胶卷”，“寒暑表”→“温度计”，“月份牌”→“月历”，“洒水纸”→“吸水纸”，

“蓝印纸”→“复写纸”，“洋囡囡”→“洋娃娃”，“自来火”→“火柴”，“自来水笔”→“钢笔”，“板烟筒”→“烟斗”，“机器脚踏车”→“摩托车”，“德律风”→“电话”，“自备车”→“私车”，“洋风炉”→“煤油炉”，“饭师务”→“厨师”，“娘姨”→“保姆”，“看护”→“护士”，“荐头”→“中介”，“坐庄”→“办事处”，“堂倌”→“饭店服务员”，“茶房”→“旅馆服务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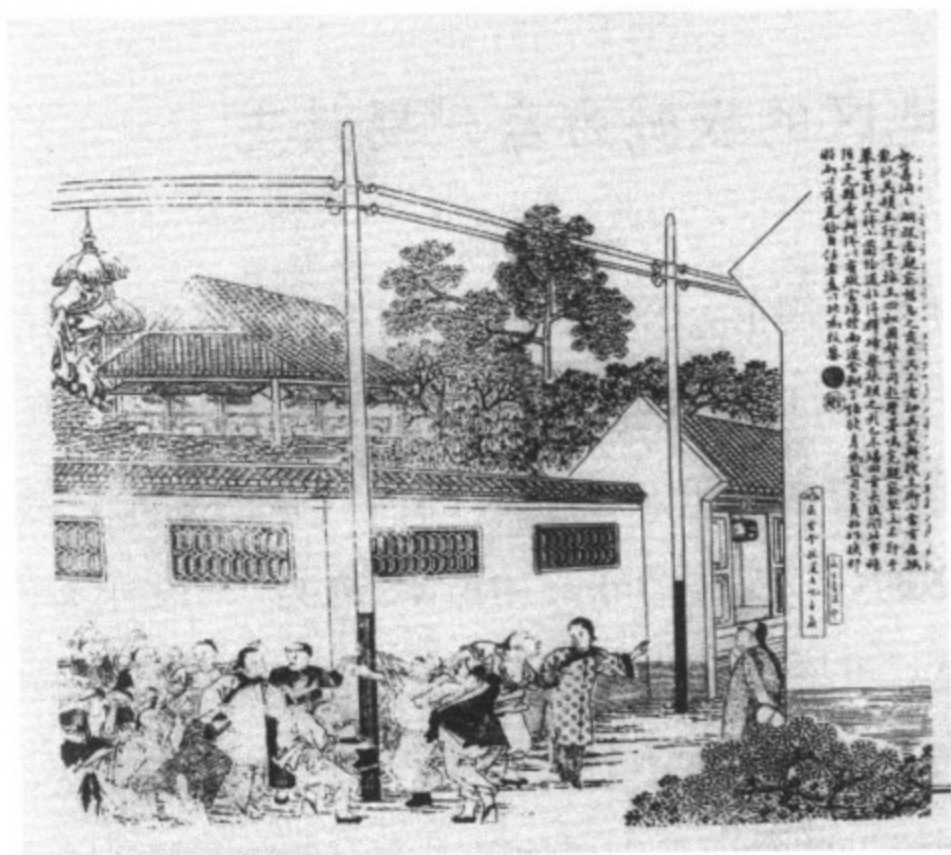
现在上海话中有一批词语正在新旧过渡之中，同义并存，但过渡的趋势已明显。如上海话原来“希望得到”用“要”，而表示“索取”是有吴方言特色的“讨”，像“问侬讨一本书”，现在年轻人多用跟普通话相同的“要”。又如下面这些单音动词等，前面的都是上海话中通用的，在近30年里，已经开始被后面的与普通话相同的词所更替。这些常用动词的替换，标志着近年来新生代正在大幅度地改造上海话。这些词有：“话”→“讲”，“跑”→“走”，“喊”→“叫”，“领”→“带”，“摆”→“放”，“调”→“换”，“陞”→“靠”，“捱”→“拖”，“搨”→“涂”，“啣”→“吸”，“寻”→“找”，“着”→“穿”，“拣”→“挑”，“疑心”→“怀疑”，“懊劳”→“懊悔”，“收捉”→“收拾”。但是，也有的同义普通话词仍被上海话拒之门外，如上海话只用“立”、“晓得”，不用“站”、“知道”。在普通话的影响下，过渡有时候用取中的办法，如表示“疲乏，劳累”的意思原来上海话用“衰瘡 ssadhu”、“吃力”两词，普通话用“累”、“吃力”两词，现在上海话“衰瘡”趋于淘汰，北方话口语色彩较重的“累”未被吸收，而“吃力”一词取胜成为上海话中的通用词。

上海话对共同语普通话语词的积极吸收是这个城市襟怀开阔、面向全国必然趋势，它使这个城市永远保持青春先锋活力，处于经济文化的最前线。上海话几乎全盘吸收了普通话书面语中的文化词，当然这些文化词的相当一部分是在上海开埠后从文化先进的上海话中先说起，然后迅速从上海的报刊流入当时的国语中的。

这种互动在 20 世纪初叶就开始了。1901 年清廷重新提出变法改革,开启了思想禁锢,全国向往立宪热情高涨,报刊新闻自由化。第二年起,晚清小说开始进入热潮。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发动“小说界革命”,1903 年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以官僚体制弊病为揭示对象的《老残游记》问世。清末新政开始后大量书报刊物和长篇、短篇的哲学、社会、理想、科幻、侦探、国民、警世、滑稽、军事、言情、武侠等小说在上海纷纷涌现,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多彩的文化繁荣局面,白话文小说在上海掀起第一轮的大潮。20 世纪初期起,上海经济高速发展,新文化运动又以“科学”和“民主”为纲,“五四”白话文运动使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从这时候起到 30 年代上海汇集了二十多万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办起数量惊人的报纸杂志,出版了无数小说电影等文艺作品,其中有占大多数的江浙皖南籍的作家用从明清小说中继承下来的和他们理解的北方话写作,共同传承和丰富了白话文书面语。尤其是将在上海都市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大量新名词引进了国语,如“马路、洋房、书局、报馆、报纸、公司、海关、工厂、商场、车票、操场、篮球、高尔夫球、足球、俱乐部、自来水、电灯泡、电车、电报、邮票、气象、飞机、轮船、笔记、粉笔、功课、开关、手表、汽车、卡车、三轮车、饼干、水果糖、牙刷、雪花膏、橡皮筋、沙发、马达、课程、咖啡、色拉、啤酒、冰淇淋、麦克风、图书馆、博物馆、资本、社会、文化、艺术、特权、具体”等等。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众语运动”也是在上海发动的,当时提倡“大众语”的乐嗣炳(1935)先生就写到上海当时语言生活的崭新面貌:“中国的现阶段是产业革命。上海港每年出入船舶二万多只三千多吨,在世界只让纽约……充实的物质文化发展了相应的精神文化,近几十年来主要的文化运动和文化人大都从上海出发……随着时代而演进,上海是现代中国交通的枢纽,产业的大本营,文化的中心点,同时是新中国语顶大的制造厂;一件新的事物在上海发现,

上海人立刻替它制造一批新的语词,大批的翻译大量的书报每天播送着新语词……最先流通在上海……它汇集了全人类语言的精华,是代表大众的思潮的,它一面不断生产,一面散布各方……”可见,先进文化和前卫语言都在上海发源,众多新词反映了现代文明在上海的渐进,并由那些作家、文化人、编辑通过上海出的报纸、书籍、小说、电影传到了全国各地,传入了当时的国语,成为现在普通话中常用词语。

* 1876年葛元煦著的《郊游杂记》中上海人看新设的“电线”图景



与此同时,上海还有建立在上海话上的大量民谚民歌、童谣、顺口溜、绕口令、谜语、种种游戏游艺、民间故事、方言话剧等,形成了方言文化的深厚的土壤。20世纪20年代以后,活跃在上海从初创、兴盛、汇聚直到

成熟的沪剧、滑稽、上海说唱、浦东说书、越剧、甬剧、淮剧等江南江北十多种用各自方言表演的地方戏的语言，也影响丰富了上海话的书面语和当时国语中的书面语，使国语的书面语中也吸收了大量的上海话色彩浓的词语，如：“名堂、尴尬、垃圾、花头、陌生、蹩脚、齷齪、瘪三、买账、买面子、卖关子、出风头、小儿科、敲竹杠、出洋相、像煞有介事”等。

这种共同语和方言在上海的共生互动的局面促进了上海海派文化的多元博采和丰富生动，而口语和书面语的交融，使上海人的语言生活经常处于活泼前卫的优良环境，也使上海话发展成为一种大器的方言，一种多元博采的大都市方言，同时使上海城市方言中心迅速形成巩固和壮大。

四、上海地区的权威方言三易其主

1843年上海开埠前，上海话只是松江方言大区在黄浦江流域的一个分支。嘉庆十九年（1818年）序刊本的《上海县志》卷一“方言”部分开头说：“方言同是吴音而视府城稍重。”“府城”指的是松江镇。同治七年（1868年）刊本的《上海县志》卷一中所附“方言”一段开头也说：“方言语音视华亭为重。”可见在那时上海人眼光里，府城华亭即松江方音才是权威性的方言，而上海方言在当时只是一个小县方言。

目前我们能见到的记载上海地区方言材料的最早的方志是明代正德七年（1512年）序刊的《松江府志》。在卷四“风俗”记“方言”部分里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大率皆吴音也。”可见在16世纪初叶上海方言就已形成了不同于邻县的上海方言区，又说明了当时上海话、松江话和嘉兴话三者的由轻至重的从属关系。

但是,到了清代的康熙二年(1663年)的《松江府志》卷五“风俗”的“方言”部分中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这个时候,苏州已经成为繁华的江南经济文化中心,其影响覆盖着整个吴语地区。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刊本的《松江府志》卷五疆域志载“方言”部分中也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大率同为吴音而微别耳。”清志已经不提“视嘉兴为重”,这说明至少是在清代初叶以后,苏州话取得了松江府地区权威方言的地位。此后三百年间一直对处于松江地域的上海话有着渗透影响。

开埠后的上海城区高速发展,上海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迅速确立,上海方言中心的权威地位也随之开始建立。上海方言自20世纪中叶起已经取代了苏州方言在吴语区的权威地位,成为吴方言的代表方言。

如今,上海话成为一个强大的权威方言中心,向四周辐射扩散,传播它的影响。不再是松江话影响上海话,而是上海话带动了上海地区各郊区(包括松江区)的方言的变化。随着与上海市区交际的频繁开展,这些区的区镇以及其他大镇上的方言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松动,近20年来都在急剧向上海话靠拢,以致青少年的语音都出现了与上海城区话接近的新派音系。这些新派音系无论是声母、韵母、声调和连读调都在走上海话近160年走过的路,不过由于可以借用的缘故,虽起步晚但发展却迅速。有些青年会同时说两种话,一种近于老派话,一种近于上海话。

当代上海话的影响也辐射到太湖片各大城市如常州、苏州、嘉兴、杭州等地,这些城市的有些青年会说上海话。在沪宁线列车上的通用语除了普通话外,就是上海话。上海话如今影响着苏州话,苏州话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如尖团音的合并、“官 uoe”、“干 oe”语音合并等都是在上

海话里率先完成的。当今上海人遍布全国各地,在传播上海文明的同时也传播着上海语言。由于港台和海外的同胞和华裔很多籍贯是吴语区的人在 20 世纪 40 年代是从上海出去的,所以在香港、台湾以及旧金山等地也通用上海话交际。

上海话无论从传播之广或者从它的权威性来说,已经取得了吴方言中的首要地位。上海地区的权威方言经历了三易其主的过程:嘉兴话(明代)→苏州话(清代、近代)→上海话(现当代)。

第三章

上海话的新旧共生和交替

一、从《何典》中所见二百年前的上海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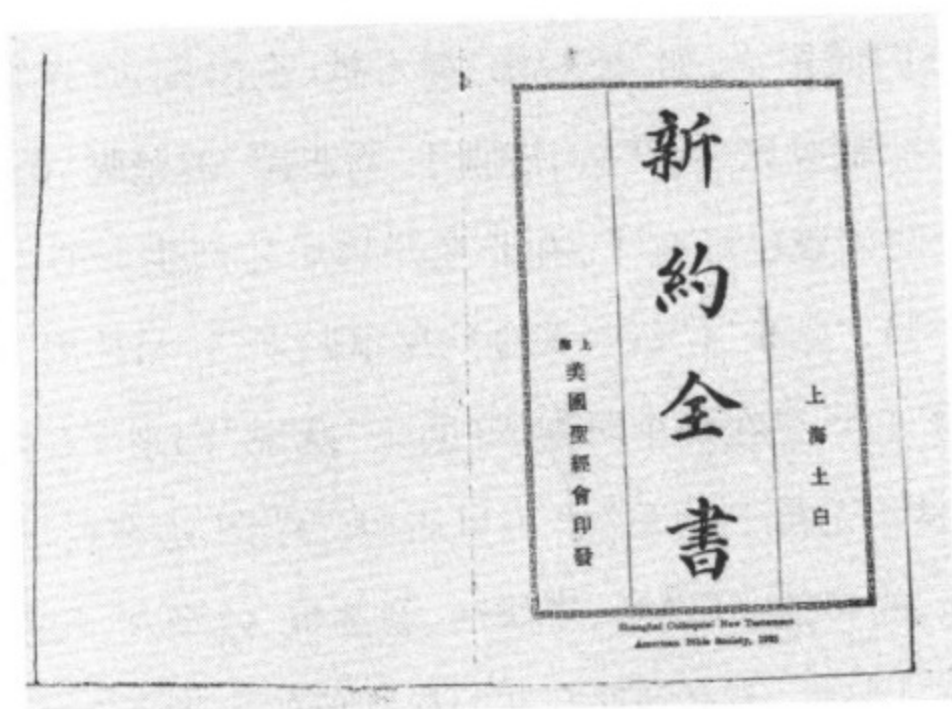
迄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上海话文字资料,是清嘉庆初年上海才子张南庄用上海话写的章回小说《何典》。《何典》全文都用上海话口语夹杂官话书面语写成,可以说是一种上海话书面语文体,上海方言的词汇、成语、俗谚以及惯用说法充斥其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200 年前的一批常用词的使用情况。

《何典》充满了当时的上海口语词语。比如写人的有:“家婆、后生、毛头囡、独囡、养娇囡、畔房小姐、斫柴团、委尿丫头、搭脚阿妈、花花公子、学生子、烂好人、囡大细、娘两个、女娘家、蟠藤亲眷”等;写动物的有“蚰蟾、跳虱、癞团、老虫、羊买买、别脚驴子、三脚猫、死老虫、肚皮里蛔虫、哈巴狗、四眼狗”等;写器物的有“汤罐、筲箕、断头香、乱头货、清水货”等;写食物的有:“塔饼、冷饭团、酒肉白米饭”等;写住地场所的有“田头宅基、所在、斜射路、阶沿砖、坑缸板”等;写人的身体行为的有:“颈骨、骷颅头、死人骷骸头、膀罉裆里、好人家、人舍、随身衣裳、苦恼子、老话头、话把戏、年纪月生、大排场、肉里钱、识狗屎字、嚼舌头根、出娘肚皮、搅家当、荐便宜、白相、远转、吃花酒、贼忒嬉嬉、上门欺人”等,还有“鬼阵头风、黄胖日头、救命王菩萨、墨测黑”等等。这些词语的部分在现今上海城里已不太听闻,但从笔者的母亲、笔者童年(50 年代初)生活的市中心卢湾区里弄里、老沪剧、上海方言区的今农村地域和笔者在 70 年代居住过的属松江方言大区的奉贤县那里都听到过,而且是常用词。

书中许多词语反映了上海地区的旧风俗。如“烧三朝、吃三朝酒、抱牌做亲”到现在还是上海农村的风俗习惯。“人舍女婿”一词里,“人”读“礼拜日”的“日”音 *nik*,现在在农村还有“人舍女婿”的称呼,指人赘女婿,“人”还读作“逆”音。“荐便宜”的“荐”直到现在还是有人读成“荐”,音 *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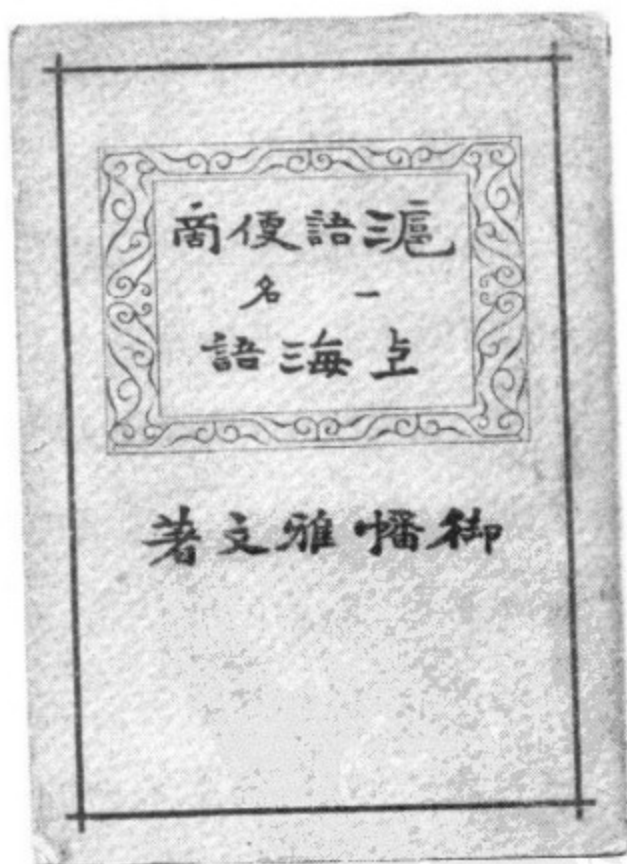
实际上是“占 zoe”字,当时与“荐 zi”同音,今市郊有的地方仍如此。还有那些上海地方的惯用语,如“拔短梯、捷木梢、吃白食、吃死饭、吃生意饭、看野眼、磕响头、翻脚底、起花头、搭脚手、看脚路、拆壁脚、掘壁洞、钻铜钱眼”等,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并非在开埠后才产生。书中不但用“归”(ju“还不见归”)、“归来”(“斫些黄金狗屎草归来”),而且用“转来”(“捉转来要打一百的”),可见在那个时候的“回来”既说“归来”又说“转来”已经通用了。从“骨头无得三两重”中可见当时“无没”还在说“无得”。至于“亏杀、睃睃他、的替他、好说话、寻快活、偷婆娘、做牵人、爬滩弗动”等,虽在今上海城区已淘汰,但直到现在在旧松江府的乡下还在使用,所以有的人就误以为《何典》一书是用松江方言写的了。有人因为看到现今上海话中许多词都不听闻,便认为《何典》的方言成分不限于一地,包括上海、苏州、常熟等地,但是上海人只要读到书中的方言词和熟语,都会说这本书的上海籍是确定无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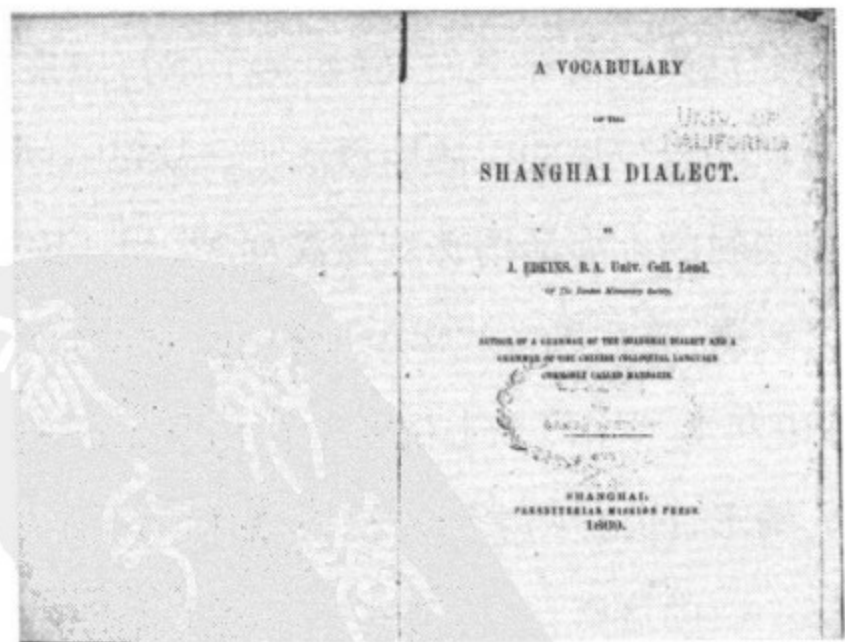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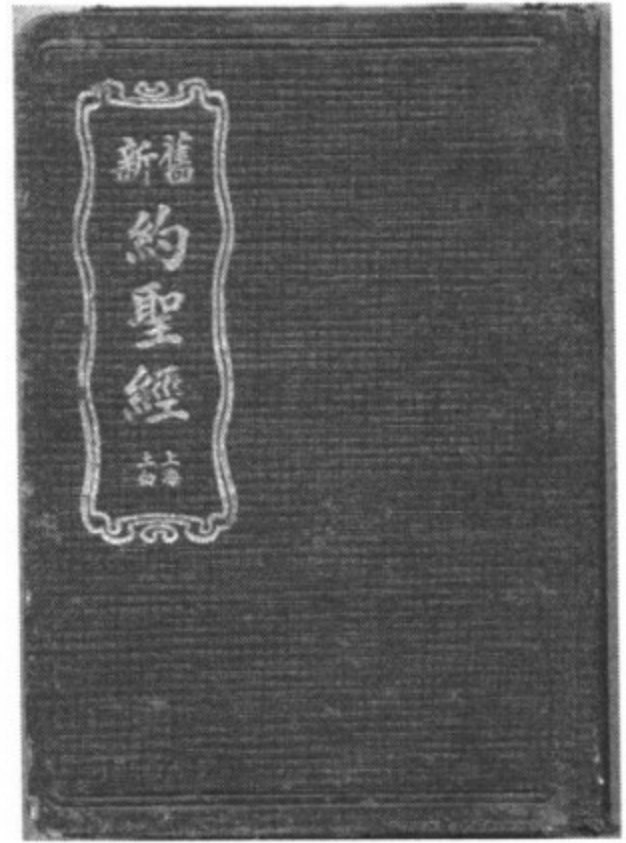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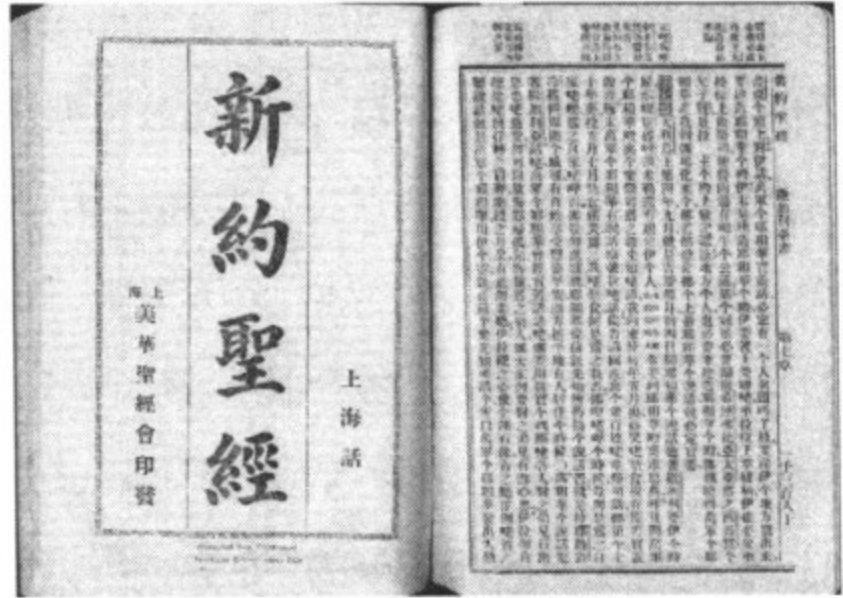
书中大量熟语至今还活跃在上海中老年人的口中,有的人自己虽不说但听说,比如“吃辛吃苦、拍手拍脚、箍头管脚、拍台拍凳、前生前世、疑心疑惑、好说好话、扛头扛脚、号粥号饭、苦吃苦熬、面长面短、挨肩擦背、抚墙摸壁、强头掘脑、哀求苦脑、牵风引头、性命交关、一无事事、斯文一脉、粗脚大手、立时三刻、三日两头、推三阻四、七支八搭、七老八十、无千无万、刁钻促掐、寻孔讨气、杜做主张、来得正好、捋舌八哥、开眼乌龟、地头脚根、亲眷来去、眉花眼笑、贼忒嬉嬉、神哗鬼叫、哀求苦恼、怨天恨地、硬做主张、会说会话、鹁子翻身、磨光石卵子、闲话白嚼蛆、摇头豁尾巴、日头晒肚皮、碰鼻头转弯、捏鼻头做梦、出门弗认货、有天无日头、关门勿落闩、盐瓶倒醋瓶翻、张亲眷望朋友、风扫地月点灯、阵头大雨点小、今朝三明朝四、钉头碰着铁头、扳只葫芦抠子、远亲不如近邻、萝卜弗当小菜、螺蛳壳里做道场、吃着朝顿无夜顿、拾得篮里就是菜、见人挑担弗吃力、夹忙



* 1923 年上海美国圣经会印发的上海话圣经

1924 年日人御幡雅文的《沪语便商》封面 *





* 1928 年出版的上海美华圣经会印发的上海话圣经封里

* 1928 年上海美华圣经会印发的《旧约·新约圣经·上海土白》

* 上海话第一部“词典”，1869 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编的《上海方言词汇集》

头里膀牵筋、乡下狮子乡下调、外甥弗出舅家门、有缘潜力来相会、细皮白肉文绉绉、朝踏露水晚踏霜、弗出麸皮弗出面、铜钱眼里翻斤斗、说嘴郎中无好药、大杀老婆触死戾、前门讨债后门畔、好汉吃拳弗叫痛、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一生一世苦吃苦熬、乡下夫妻一步弗撤离、急惊风撞着了慢郎中、打落牙齿望肚里咽、千拣万拣拣着了头珠瞎眼、一只碗弗响两只碗碌碌、闲时弗烧香急来抱佛脚、若要俏须戴三分风流孝、烧香望和尚一事两勾当、矮子爬楼梯巴弗能够的”等等。可见作者的才学,把很有特色的上海俚言土语在故事中运用自如。

作者写得很顺时,许多上海话的语法特色自然流出。如:“吃他饭,着他衣,住他房子”的“动代宾”用法;“若嫁老公弗着起来”,“摸大门弗着起来”,“只是烟出火弗着”的“动宾补”结构;“打门进来救了他”,“祝告了一番,磕了头起来”,“拨身弗转”,“摸弗着头路起来”中的“动宾趋”结构;“吃子困,困子吃,终日半眠半坐”中“子”的伴随用法;“脚头弗曾立定”,“直到如今不曾寻着”中“不曾+动”完成体否定形式;“却又并不曾长一块肉在那里”,“却又关紧在那里”,“活死人自向客位里坐地”中“在那里”和“地”(即“辣海”)的句尾用法;“便把他一记反抄耳光”中的“动+代+数量补+宾”的用法;“到得好日”,“难道天上有得落下来的么”,“闻得出了一只死老虎”,“那村里众狗听得”,“买他七八丸,便可过得年把了”中的“得”字后缀;“后来骚老子死过,骚娘招了刘打鬼来家”中的后缀“过”。这些都是现在已相当少用的上海话语法了。从每一回起首的那首词的用韵里,可以看到当时的上海话语音的点滴面貌,如:“雄、逢”,“数、错”押韵;“奔”已混入“镜、赠”等后鼻音的字中押韵,前后鼻音韵在200年前已开始归并了,直到150年前法国传教士记的上海话音系中前后鼻音字还处于能区分但混用的情形,词语“归去”和“转去”并用则在1908年的《土话指南》也如此。

上面这些语料,对我们研究上海话乃至吴语的语法语音历史变迁都

有很重要的用处。

通过《何典》这本书,可以看到 200 年前的上海话实在与今天的上海话一脉相承。虽然上海社会在这 200 年间经历了天翻地覆,但语音、语法以及那些俗谚和成语仍有着很强的传承性。

不过,时间的流逝也送走了不少词语,《何典》也为我们记下了一些淘汰了或正在逝去再也拉不回来的词语,比如“细娘、白头呈子、千端百正、千思百量、放心托胆、搭陶搭队、骂海骂山、立马造桥、扳桩相脚、因个头来答个脑”等。有些词语如“爬摊勿动、爬台搁脚、号肠拍肚、拖水夹浆、临时上桥马撒尿、捉子头来脚弗齐”等还残留在市郊远地区或老年人的口中,笔者曾听到过。从中可见,200 年来词语发展的历史与民俗的变化是相关联的。

在《何典》之后,较全面反映上海话的书要算西方传教士 19 世纪中叶起在上海编写的上海话《圣经》、《土话指南》一类书了,从 1850 年 Benjamin Jenkins 的《上海方言课本》开始,到 1950 年蒲君南的《上海方言词典》止,100 多年中,在上海出版的、今能见到的有 50 多部。

二、古音、古语词和古语法形式的遗留

上海话的历史只有 700 多年,比苏州话和松江话的历史要短得多,但是上海话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方言,这是由上海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机遇所决定的。原来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的滩头,所谓“上海滩”是对它的最合适的称呼,它在离府治较远的乡村僻地,处于经济发达地域的边缘。历史上苏州府和嘉兴府是两个大府,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松江府相对来说比较落后,而上海又在近海滩。上海地域虽然只有 700 年的历史,

但是松江地区的人类活动却有六千多年的历史。上海最早的百姓从松江移来,加上上海地区历史上语言发展缓慢,原江南地区语言中不少古老的语音、词语就一直保留至今。所以就整个旧松江府地域的方言来说,其在太湖片里是发展很缓慢的,上海方言则更为滞后,语言中的古老形式也就保存更多。这使上海话新旧交杂,语言跨越度大。

在语音方面,老上海话的音系是声母、韵母、声调比其他吴语如苏州话、嘉兴话繁多,连读变调复杂,保留着更多的古代汉语的单音节特征。因为汉语随着语词的双音节化,语音的声韵调就会渐渐简化,但在老上海话中语音还很复杂,如不但保留古汉语的全部入声字,而且保留着所有吴语方言中最繁多的人声韵母共 18 个(基本入声韵 8 个)。而苏州话入声韵母只有 11 个(基本入声韵 5 个)。上海话的人声韵与中古语音的代表《切韵》入声韵母系统可以十分对应,变化最小。在老上海话的声母(如“帮、饱”、“端、到”的声母 [b]、[d])中还保留着古老的缩气音,又称先喉塞音,其发音特点是有明显的喉部塞音的成分,有轻微的缩气动作,伴有鼻音,声带振动,喉头下沉。这种辅音如今也存在于壮语侗语和东南亚一些语言里,而为北方汉语所无。壮族、侗族人都是古越人即古代“百越”民族的后裔,吴越地区在秦汉前是百越民族生息之地,汉族人来到这里,越人中的一部分人渐渐被汉族人同化,在学说汉语时他们把自己的语音特点留在江南吴语里了,百越语音的缩气音在苏州、嘉兴等地早已消失,但作为一种语言底层还保留在比较保守的松江话和老派上海话的主要声母中。

上海话的词语中还有一些连绵词(两个字必须连着才有意义)保存着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的遗迹。上海话里的“角落”就是“角”,“鸡壳落”或“人瘦得只剩一个壳落”中的“壳落”就是“壳”。为什么有两种说法呢?这是上古汉语存在“gl”和“kl”复辅音,它至今还遗留在上海话里,“角”,说

起来有时读“glok”,有时分成两个音节读作“goklok”,有时掉了“l”单辅音化读为“gok”。上古有“gl”这个复辅音还可在汉字的形声字里找到证据,如“格、恪”的声母现读“g”,“络、洛”的声母现读“l”,单辅音化的结果使有的字声母失去了“l”,有的失去了“g”。我们还可以从上古形成的形声字“流、率、麗、吏”声母读“l”和“疏、摔、灑、使”的声母读“s”,说明上古有“sl”复辅音,而在上海话中也有一些常用的连绵词反映这个陈迹,如“垃圾”上海话原来和今郊区读音一样读“lheksek”,“啰苏”上海话读“llusu”,“弄松(作弄、欺负)”读“longsong”,“諛噪(挖苦数落)”读“llangsang”,“粩粩(零杂的东西)”读“laoshao”,“拉柴(脏、杂、湿、乱;女子高声乱嚷,不文明貌)”读“lhasha”;“煞辣齐 saklak xhi(很整齐)”和“煞齐 sak xhi”并用,都是由上古一个有复辅音“sl”或“shl”的音节后来分开来的连绵词。

在上海话中还保留复辅音声母 dl、tl 和 bl、bhl 的残迹。如:“郎当 lhangdang(碎杂的东西)”、“邈邈 lhaktak”、“浪荡 lhangdhang”、“涕拖”又作“涕里拖拉(散乱,不干净整洁)tilitala”。上海话中“笔立直 biklik shek”和“笔直 bik shek”、“半发郎当”(半当中)和“半发郎”并用,“扑落通 poklok ttong(和“扑通”并用,入水声)”、“薄落头 bhoklokdhau(常用于握住的、圆的一小段突出部分)”。这也可用形声字的声旁来证明,如“獼獼、变恋”声母不同而声旁相同。

在上海话的象声词中保留更多古代复辅音的痕迹。如“屑粒索落(因小动作而发出的轻声音;老鼠踩纸物声。就是“屑索屑索”的“屑索”)读“sikliksoklok”,第一、二字的韵母相同,第三、四字的韵母也相同,而第一、三字的声母相同,第二、四字的声母相同。此词就是古代的“slik slok”两个音节分拆成四个音节的。类似的象声词例子很多,如:“淅粒萨腊(下雪的声音;踩到砂泥吃到沙子的声音)”读“sikliksaklak”;“的粒笃落(小物件掉下的声音;重复啰嗦的说话声)”读“dikliktoklok”;“乒令兵冷(敲打或跌

落玻璃、金属物体发出的声音)”读“pinlinpanlan”；“叽里咕噜”读成“jiligu-lu”。有些词也能缩成两个音节如“乒乓”、“叽咕”讲。上海话中这样结构的四音节象声词特别多。

上海话中的“拖 ttu”有时还能说“tta”，如说“拖鼻涕”、“一束头发拖下来”时。“涕拖”还能说成“涕里拖拉”；“多”在有些场合能说“dda”音，如“苹果吃脱多只”；“破”能说“破拉”，这时读作“pala”。经历了两千多年，上海话这些词里还都保留了上古汉语的韵母 a 的读音。上海话里“锯子”读如“盖子”，“五虚六肿”中的“虚”读如“嗨”；表示“在”的“辣海”的“海”，这里记的是现今的同音字，实际本字是“许”。“许”和“虚”一样，至今读的都是遗留下的中古汉语(唐宋音)的早期江南读音。

现今北方汉语中，修饰成分和中心成分一起构成的词语，都是修饰成分在前，中心成分在后的，这种构词的方式一般称为“偏正式”，如“红旗”、“电车”。但上古汉语中可以见到一种较少见的“正偏式”的构词形式，中心语在前，修饰形容成分在后，如“鸟鸟”(《左传》)、“鱼鲔”、“虫蝗”(《礼记》)、“草芥”(《孟子》)、“城濮”(《左传》地名)。这种形式构成的词语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几乎都已淘汰，但在上海话中还保留着不少，如：“人客”、“菜干”、“鱼鲜”、“肉松”、“饼干”、“虾干”、“花红(一种果子)”、“菱角”、“肉圆”、“银圆”、“单被”、“月生”、“月大”、“天好”、“雨麻花”、“豆腐干”、“汤三鲜”、“汤山芋”、“汤芋艿”。有的词还是较晚产生的，如“饼干”、“棒冰”、“鱼片干”。现在，有些词如“人客”、“菜干”、“单被”、“汤三鲜”等因构词法的从众趋势已与“客人”、“干菜”、“被单”、“三鲜汤”并用了。但“肉松”、“虾干”等还没有偏正式与它们并用。在句法结构里，上海话也有较多的中心语在前，状语修饰成分在后的现象。如普通话中能放在后面修饰谓语动词或形容词的副词只有“很”和“极”两个词(“好得很”，“好极了”)，其他副词都是前置于中心语的。但是上海话里后置的副词就特别多，如“到

快了”(普通话说“快到了”),又如“好得来”、“好来死”、“气煞”、“讨厌煞快”、“恨得要命”、“恨死恨煞”、“坏透坏透”、“好来邪起”(旧)、“吃畅吃畅”、“吃足输赢”、“欢喜得一塌糊涂”等,这些用法也说明上海话里保留的古形式比普通话多。而在上古时代居住在吴越地区的百越民族后裔壮侗族的语言里,句法词法的特点是修饰语在中心语后面的。

普通话中动宾关系的词动词在前宾语在后,上海话中却有一些“宾动式”的词,如:“雷响(打雷)”、“水没”、“雨落(下雨)”、“冰胶(结冰)”、“心痛”、“天变”、“眼泪出(流泪)”。至于“主宾动”形式的句子则在上海话里使用还很普通,如:“我饭吃过了。”“我衣裳收起来了。”“依小菜买了哦?”“阿拉搨搭空地既没。”上海话比北方话保留更多种类的话题句,表现了汉语的更古老形式。如:“厚底鞋子依欢喜着个哦?”中“厚底鞋子”是句子中的话题,也可以放在主语的后边:“依厚底鞋子欢喜着个哦?”又如:“伊面皮老老,肚皮饱饱。”“我一只床搬脱了。”“我苹果五只吃脱了。”“我屋里电脑也有个。”“婆婆是,伊凶得来像只雌老虎。”“海鲜,生鱼片我最欢喜吃。”“松江鲈鱼,28元一斤。”“我一本书买拨依。”形形色色的话题句。还有一种拷贝式的话题句,如:“写字写得好哦?”“好是好个,到底本事平常。”

普通话中时态的表达法,“体”是用“着、了、过”语法形式表示的,但“时”是用时间词的词汇形式来表示的,如“我今天去了菜场。”“今天”表示“时”,“了”表示“完成体”。但是在上海话中还保留着“时”和“体”结合的时态完整语法形式,类似英语法语的时态。如“我家生买辣海了。”是“现在完成时态”的句子,“伊生活辣辣做了。”是“现在进行时态”的句子;“条子我写辣海个,依寻出来看看好了。”是“过去完成时态”的句子,“我看见依辣辣写个,依勿要赖脱。”是“过去进行时态”的句子。(下加横线的是其语法形式。)

还有个“笃”字,提出来说说也很有意思。几乎整个原松江府的地区乡下,也包括上海方言区,原来称女子生殖器官为“豚”,俗写作“笃”。见于《广韵》丁木切,入声尾韵:“豚,尾下窍也。”“笃”留在松江地区是一块活化石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康乃尔大学的著名华裔语言学家梅祖麟先生曾写过一篇论及“笃”的文章,大致说的是在福建和海南等地,女生殖器读“dok”音,这种用法一直延伸到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澳洲。由此从语言学方面证明在遥远的年代汉藏语系和东南亚的南岛语言都是同源的,于是有许多学者主张汉藏语系和澳泰语系应合归一体,称作“华澳语系”。人类有关身体部位的名称,是最为稳定的核心语词,尤其是像生殖器这种较隐秘的词,更有考古意义。梅先生在写此篇论文时,还没有注意到,在江南的原松江府地域,也用“笃”这一情况,我们把松江府的材料公布,就把说“笃”地域延伸到长江以南了。现在能说明问题的材料越来越多。上海输血研究所在20世纪80年代根据Gm血清血型测定,St因子和其他5个因子的共同拥有,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同一性;他们又根据Ag因子和Afb因子的频率特定值测定,证明了以北纬30度为界,我国人种可以分为南北两大体系:广西、四川、贵州、昆明、台湾等地的汉族以及侗族、壮族、瑶族、苗族、白族、高山族人作为南方型;长春、大连、山东等地的汉族以及回族、朝鲜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藏族人为北方型。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积累的资料与这个分界也相吻合。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遗址(浙江余姚)头骨的长狭颅型、偏低的面型与我国南方昙石山、河宕、甌皮岩新石器时代头骨比较相似,而和我国黄河新石器青铜时代头骨中多中长颅型、上面较高,表现出与现代东西蒙古人种接近的趋势不同。“笃”是方言词源学上的有力证明。这些发现都说明中华民族至少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两大发源地。汉语南北分化,自然与此背景有关。或者说南方人和东南亚的爪哇人也许同种。有许多历史太久的问题当然不能

很轻易地下断论,但是有些有关现象是值得注意和进一步思索追究的。比如说地球上的北纬 30 度,真是个很神秘的地方。地球上的三条最长的河流密西西比河、尼罗河、长江都在那儿出口,世界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珠峰和最深的海沟都在北纬 30 度附近,大西洋西部的百慕大群岛附近所谓的“魔鬼三角区”、金字塔都在那条线上,中国的风景最秀丽的黄山、庐山、峨眉山和钱塘江大潮也都在这条线附近。了解了这些,“笃”的北限也在这儿分界也就容易想通了。

上海话传承的古词语中,很值得一提的是它保留了极其丰富的吴语特征词。为什么称这些词为特征词,那是因为这些词可以代表吴语和上海话的特征,而且这些词的大部分在古代汉语中是使用的,在古辞书中有稽可查,尽管现在淮河以北的北方话和普通话中已不用了。这些词大多是单音动词和一些形容词,能十分细致表现人类行为动作和情感的差异,是方言在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中长期积累的词语。由于上海话过去发展得相对滞后,所以保留得就比较多。

上海话中动词保留的古词语很多,有 200 多个。其中有不少都是上海人口中用来用去频率很高的单音方言动词,所以学会了这些词的用法才可以说深层次地学会了上海话。这里仅举一些例子加以说明。

比如“藏”称“囤 kang”,见于《集韵》去声宕韵口浪切:“囤,藏也。”“洗”称“汰 dha”,见于《说文》:“汰,淅籀也。从水,大声。”《玉篇》水部:“淅,洗也。”“靠”称“隍 ghe”,见于《集韵》去声代韵巨代切:“隍,《博雅》:倚也。”皮肤、指甲、木头等裂开,翘起一丝,称“皸 qiak”,见于《广韵》入声药韵七雀切:“皸,皮皸,《尔雅》云:皸,谓木皮甲错。”上海人称脚被“绊住”而摔跤曰“搯 be”,此字见于《集韵》去声谏韵博幻切:“绊也”。称“分开、叉开”曰“版 pak”,如“拿只西瓜版开来”、“两脚‘版’开”。此字见于《广韵》入声麦韵博厄切:“分版”。又称砍去一层、削去一层曰“剝 ppi”,如“剝

脱一层草”。此字见于《广韵》平声齐韵匹迷切：“剝斫”。又如用刀平切剖肉曰“𠵼 ppi”，见于《广韵》平声支韵敷羈切：“开肉”。又如把刀在缸沿、皮布上略磨称“𦉳 bhi”，如“𦉳自来火”。此字见于《集韵》去声霁韵蒲计切：“治刀使利”。又如水洄溢出曰“𦉳 bhoe”，此字见于《集韵》平声桓韵蒲官切：“水洄溢也”。又如躲藏曰“迷 bhoe”，此字见于《集韵》换韵薄半切：“去也”，“去，藏也”。又如小口少量喝（溷两口酒）曰“溷 mmi”，此字见于《广韵》纸韵绵婢切：“说文，饮也”。又如小睡曰“寢 mmi”，此字见于《广韵》纸韵文彼切：“熟寐也”。又如液体滴下曰“滲 di”，此字见于《广韵》去声霁韵都计切：“埤苍云，滲，漉也。”又如沉淀（滲脚）曰“滲 din”，此字见于《集韵》上声迥韵都挺切：“滲，滲水貌。”又如在雨中淋曰“涿 dok（大雨～了我一身。）”，此字见于《集韵》入声屋韵都木切：“流下滴”。又如表示展开，抖搂（敲开报纸）曰“敲 tou”，见于《集韵》上声有韵他口切：“展也。”又如涂、抹（墙壁上乱搨）曰“搨 tak”，此字见于《集韵》入声合韵谿合切：“冒也，一曰摹也。”又如揉（抻纸头）曰“抻 dhoe”，此字见于《广韵》平声桓韵度官切：“说文，圜也”。又如晾曰“晾 lhang”，见于《集韵》去声宕韵郎宕切：“暴也”。又如吮吸（啣螺蛳肉）曰“啣 sok”，见于《集韵》入声觉耘色角切：“说文吮也”。又如积聚（稞水，稞钞票）曰“稞 shou”，见于《集韵》上声有韵士久切：“聚也。”又如削皮（槩生梨皮，槩脚）曰“槩 qqi”，见于《广韵》平声盐韵七廉切：“削皮。”又如手举起曰“捷 jhi”，见于《集韵》平声仙韵渠焉切：“举。”又如东西干后中间凸起（墙壁石灰皸起来）曰“皸 kok”，见于《广韵》入声觉韵苦角切：“皮干。”又如从中间折下隔开（纸头一闌两）曰“闌 yao（起来以后被头要闌闌好。）”，见于《广韵》上声小韵於小切：“隔也”。又如强加或善意强予曰“掙 oo”，见于《字汇》衣驾切：“强与人物也。”又如心里不舒服痛苦曰“殞 wek（天气忒闷，人老殞塞）”，见于《广韵》入声没韵乌没切：“心闷。”

此外还有：趵 bao(油锅里个水～起来了)、漕 ppu(牛奶～出来了)、闾 pan(出去要拿门～上)、齧 bho(牙齿勿齐～进～出)、落 dak(哭得眼泪～～滴)、虱 dok(勿要个物事侪～脱算了)、盪 tang(茶杯要用点水再～一～)、齧 lhiao(伊一点血色也勿好,面孔白～～)、捋 lek(拿袖子管～起来)、儻 cong(乘车子,头勿要～拉窗外头)、踵 cong(脚步勿稳,～来～去)、敝 cak(冷天皮肤要豁～)、煤 shak(蟹要摆坵锅子里～熟)、戳 shok(拿筷子～一个洞)、拆 jjiao(～开一只阴井盖头)、搨 niok(～面粉,～衣裳)、赅 gge(啥人晓得伊～几化钞票)、搨 guak(顺手～伊一记耳光)、搨 ghue(～炸弹;～家生)、擘 pak(两脚～开)、脞 min(～起仔嘴巴笑)、杓 dik(～痧;～牢一块肉)、捅 tong(拿台子朝前～一～)、甞 bhe(乌龟～门槛;勿要辣床浪～来～去)、缦 lhin(～好衣裳～被头)、諛 llang(勿满意也勿要～里～声多讲)、揞 lik(拿根棒头～断脱)、揞 lhik(淘米水～干)、疰 zzy(大热天要～夏)、着 zak(天冷多～点厚衣裳)、埤 cak(天干燥,木头开～)、趲 shak(我到马路浪～一块)、警 shok(冷勿防～来一句)、舁 xia(从扶梯浪～下去)、齧 ghang(手高头～开一条伤口)、眈 kkou(伊瘦得连眼睛都～下去了)、齧 nhgak(饭碗浪有一个～口;～脱两钿勿要紧)、馐 kok(～出一口痰)、窳 huak(房间里空～～)、馐 yi(蛇吃鳗鲤～长短)、馐 yhi(发条用得～脱了)、搨 hhao(依～一～缸里个米有几化),等等。

下面举名词与形容词等的例子。如上海话称“蟋蟀”为“齧虬 she-jik”,见于《广韵》去声阙韵藏滥切:“齧,同暂。”《广韵》入声质韵资悉切:“虬,蜻蛉别名。《诗经·唐风》疏:‘蟋蟀,一名蜻蛉。’”“翅膀”称为“翳鞠 jigak”,《广韵》去声寘韵居企切:“翳,鸟翳。《说文》云,鸟之强羽猛者。”《广韵》入声麦韵古核切:“鞠,翅也。”“饭粒”称“饭糝 fhesoe”,《集韵》上声感韵桑感切:“糝,《说文》:一曰粒也。”“锅巴”称“饭糍”,《广韵》上声纸韵池尔切:“糍,粘也。”“砖头”称“礲砖 lhokzoe”,《玉篇》卷第二十二石部三

百五十一音鹿：“礲，石也。”一种大竹筐称“箝 bhu”，见于《集韵》上声姥韵伴姥切：“箝，竹器。”一种竹篾编的圆形浅口器具称“箕 dha”，见于《集韵》上声駭韵徒駭切：“箕，竹器。”上海人称“果核”为“櫛 hhuek”，见于《广韵》入声没韵户骨切：“櫛，果子櫛也。”鏊 pe₃₄（小镬子要掇牢两只～）襻 pe₄（钉衣裳浪个纽子纽襻。）上海话量词中，有相当于一滴水的“滴”有时可比“滴”大一点的、可用于黏稠液体的“泔 dok”（一～馋唾），如“一泔浆糊”，见于《集韵》入声韵当各切：“泔，滴也。”上海话称“一层”砖为“一埝”，“埝 bhi”见于《广韵》去声至韵毗至切：“埝，地相次埝也。”“睡一觉”称“困一寤”。“寤 huek”，《广韵》入声没韵呼骨切：“寤，睡一觉。”上海话的形容词中，说“人坏、脾气坏”的“坏”为“恹 qiu”，见于《广韵》平声尤韵去秋切：“恹，戾也。”称赞美好为“嬾 ze”（伊两个字写得真～），见于《玉篇》第三女部三十五，作旦切：“嬾，好容貌。”又见于《说文解字》：“嬾，白好也。”“快捷”称“快”，有“豪快”一词，即“赶快”。“快 sao”，见于《集韵》去声号韵先到切：“快，快也。”黏性大，称“黏 nhin”，见于《集韵》去声震韵而振切：“黏，粘也。”“冷”和“凉”称“冷 in”，见于《集韵》去声映韵于孟切：“冷，冷也。”“蕈 pok”肥而松（依人胖得来侪是～肉）。《广韵》入声铎韵匹各切：“蕈，面大貌。”

有些字虽不见于古代权威的字书韵集，但也见于古代文献，如“措 shak，是“忽被夹伤”的意思，见于《史记·梁王世家》：“李太后与争，门措手。”颜色不鲜称“蔫 yyi”，见于《楚辞》：“蔫而无色兮。”杜牧诗：“蔫红半落平地晚。”“塘 dhang”，是“以泥粉炉”的意思，见于《齐民要术》：“其鱼草里泥封塘灰中爇之。”“瓮”和“坛子”称“瓮 bhan”，见于唐李绰云：“智永禅师有秃笔头数十瓮。”再比如“家生（家具）”见于《梦粱录》：“家生动事如桌凳凉床交椅兀子之类。”“白相（嬉玩）”见于黄山谷与范长老书：“韩十逐日上学且护其薄相耳。”“薄相”即“白相”。“索性（干脆）”见于《朱子文集·与

吕伯恭书》：“骋意过当遂煞不住不免索性说了。”“忒煞(太)”见于《朱子答敬夫书》。“壁角落头”见于《东坡集·大慧真赞》。“头面(妇女首饰)”见于《东京梦华录》。“便当(容易)”见于《元典章》。“琅当”见于《汉书·王莽传》：“以铁锁琅当其颈。”“吃醋”见于《在阁知新录》：“世以妒妇比狮子。《续文献通考》：狮子日食醋、酪各一瓶。”“三脚猫”见于《辍耕录》：“张明善作北乐府，讥时云：说英雄谁是英雄，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

以上那些字都是从《广韵》、《集韵》、《玉篇》等古代辞书中或其他书籍中考查出来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些考不出本字来的词，这批字也很多，下面列举一些动词：

biao, 液体从小洞射出：管子里个水～得老远。ppang 水，尤指雨雪因风吹如雾散飘进来：窗关起来，勿然雨侪～进来了。dek, 粘，接触一起：浆糊～盒子；两个人～牢仔分勿开了。dok, 煮，用小火较长时间：锅子里～鸭。dhen, 以反语冷嘲挖苦：伊要～～我，我当补药吃。gok, 摇动液体：汤当心～翻脱；～嘴。lhak 拦，划界：～块地方做戏；车子拨红灯～牢。guak 硬裂，燥裂：木头拨太阳晒得～开。hok, 吸住，贴近：勿要～到我身浪来；湿纸头～垃玻璃浪。qqian, 掺入：～点冷水垃海。yya, 躲：～辣壁角落里。xxiao, 揭起，翻开：～镬盖；～开被头；书一版一版～过去。

mma, 身体往下缩：小囡身体一～，矮脱交关。dok, 手握若干条形物直击使齐：一把筷子～～齐；依牙齿～～齐再讲闲话。tten, 闻，熏：我～着一股焦冒气。lhiak, 用棍棒横击：关起门来～脚跟。zzong, 手握条形物直击底面：一把筷子～～齐；～脱点席虱。cce, 用手推翻：～伊我一交；一桌酒水全部～光。gha, 嵌，插：吃鸡要～牙齿；我～进去看看。ghu, 萎缩成团：肚皮痛得人耍～下来。hru, 喝，吸：～汤～水。

直到现在,上海方言里有些词语是无法到记录北方汉语的辞书或文献中去找到出处的。这类词语有很多,有音无字或写的是别字,所以对有些上海话口语,硬要牵强附会地去找词典,往往错误。对此,首届国际上海方言学术研讨会经讨论后,对一些常用的写不出的字,用一些常用的汉字给予一个写法。

方言的词语来自生活中直接的活生生的口语,方言的悠久历史积累了大量生动细腻描绘事物、动作、性状的词汇。比如汉语的基础单音动词,我们曾经把老上海话和苏州话的动词与普通话动词做过对照,结果是方言的动词比主要来自书面语的普通话的动词要多得多,对动作细分的程度也高。随手拈来举几个例吧,比如上海话的动词“盪”,是水转圈子“洄溢”的意思,如说“发大水,阴沟里水盪出来了”,现今大多年轻人不会说这个词了,只好用“潜(牛奶煮沸才说潜出来)”或“满”或用普通话“溢”代之,却都不能确切表现原词的意思。又如普通话既表抽象又表具体的动词“挤”,在上海话中说“轧”,但“挤牙膏”这种加力使软物或液体从小洞中挤出,上海话中另有一词,叫“揞(读如‘珍’,写的是俗字)”。如果摆动身子碰到人从人群中擦进擦出,这种比较具体的挤的动作,叫“ghan”,还有一个叫“gha”,有从缝中挤进挤出的意思,所以说上海话中“挤”有各种“挤”法。又如在上海话中“找零钱”用“找”,“找人找东西”用“寻”;“挑担”用“挑”,“选东西”是不用“挑”而用“拣”;“穿马路”用“穿”,“穿衣服”是用“着”;“船靠岸”用“靠(挨近)”,“靠着墙”用“隍”;“削甘蔗”用“削”,而“槩生梨”用“槩(圆转地轻削)”;“更换”说“换”,如“换衣裳”,而“对换”是用“调”,如“调物事(东西),调位置”;上海话一步一步具体的“走”,称“走”,如“钟勿走了”;比较抽象的“走”,称“跑”,如“侬跑过来看看”(你过来看一下),“外面转一圈”称“跑一趟”,普通话的“跑”上海话称“奔”;“携带”、“捎带”称“带”,而“引导”、“带领”是称“领”的。如“我领你去看看”。乞求索

取称“讨”，希望得到称“要”；“腋下夹一本书”称“夹”，“夹菜”称“揀”，“东西被藏”称“园”，而“人主动躲藏”称“yya”。上海话中世世代代流传着大量的很有用的方言特征词，从动作的细分、描绘事物的细腻中能充分看出方言的魅力，并有许多词用普通话不能代替，或者用普通话需要用几个短语才能表达出其一个词的含义。这些词应该珍爱和传承，在使用中让普通话择优吸收，共生互补。然而可惜的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160年来失落特征词最多的时期，许多年轻人对这些上海话中辨义很细的词语已经陌生或不去使用，有的人已经不知其义不会使用了。

我们要提倡我们的语言积极向群众口语学习。目前在全国群众的母语(出生后第一语言)绝大多数还是方言的现实情况下，在方言积极从普通话中吸收大量词语的同时，普通话现在不应该是急于去覆盖方言，恰恰相反，在普通话日益扩大使用场合，在深入使用到各地群众的生活领域中去的同时，应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环境主动大量地去吸收各地方言中的好的、有用的活词语。人民群众的多样化的生活会产生和提供大量的生动活泼的词语。

三、160年来不断简化的上海话音系

语音的变化可以最方便和最典型地看出语言的变化。上海开埠后，上海话的语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使得如今上海城区的年轻人不易听懂上海郊区老年人的老上海话的主要原因。1853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 Edkins)的《上海口语语法》中准确地记录了共63个韵母，是吴语中韵母最多的一个方言，到了2003年的上海40岁以下的上海人口中，许多人已演变为32个，几乎减少了一半，成为吴语各地方言中韵母最少的一

个方言。语速的加快拉直了曲折多姿的声调,造成了声调的合并和连读变调的简化,使上海话的声调从原来在吴语中最典型的 8 个变成吴语中唯一最少的 5 个(宁波话近年来也在向 5 个进化中),使老上海话复杂型的连读变调转变成单字调延伸型的吴语中最简化的,接近重、轻音式语音的连调,这使外地人要学上海话的最复杂的统率全局的声调系统变得十分简单易学。在 160 年中,在每代人中都可以发现韵母正在合并中的几个项目,某个音、某对音已变、未变或正在变、两读的人都可以同时方便地找到,这正提供了世界语言学家要通过上海话进行语音变化来宏观和微观观察研究语音的大好实验天地。在各地不同的移民的方言的撞击这种催化剂的作用下,上海话实现了音系的充分简化而并无使语言交际发生混淆,甚至,使语言的使用更为方便润滑高效。由此,也说明了汉语词语在漫长的从单音节为主向双音节为主的进化中,其实语音系统是很有大幅缩减简化余地的。上海话语音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快速变化,和这个城市发展同步,发展成了一个十分容易表达大都市生活的语音系统,适应着繁忙、快速和理性的城市节奏,这是大都市语言发展的特点。近年来的社会语言研究证明,凡是走向大城市的方言,音系都会发生类似的简化。北部吴语地区城市比较多而集中,各地的语音都发生简化,而且虽各地相隔很远,比如江阴、宁波,但语音的变化都在走与上海话相同相似项目的韵母合并,反映了语言变化深层次上的相似性规律。而上海话的语音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已迈开超越其他江南城市变化速度的步伐了,到 20 世纪后期上海青年的语音变化又一次遥遥领先。

下面我们列出 1853 年上海县城方言的语音音系和 2003 年上海城区新派方言语音音系作一比较,从中可以看出新老上海话在语音上的差异。

1. 1853 年记的上海话音系: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 Edkins)对上海话的研究贡献很大。他在

1853年出版的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一书中记录了开埠初10年时的上海县城方言的语音。现用国际音标按现今通用的方式整理出该书第二版(1868年)上刊录的上海话音系如下(用现今通用的“国际音标”记音,音标后的字是上海话用该音的字):

声母:

p 比兵 p' 譬拼 b 婆病 m 米梦 f 夫福 v 闻佛 t 多当 t' 拖忒
 d 道独 n 暖女 l 礼粒 ts 做捉 t's 粗秋 dz 茶尽 s 所雪 z 乘象
 k 古今 k' 空去 g 共其 ŋ 我硬 h 海喜 ɦ 合皇 dz̥ 序 j 右远 w 王横

其中[k k' g n h]五母加[i]或[y]分别兼表[tɕ tɕ' dz̥ ɲ ɕ], [dz̥]声母已说明又读[z],可见是一种音变中的两读。书中用斜体字母 y 和 w 表示阳调类的零声母介母开头的音节介母[j]和[w],正体的 y 和 w 表示阴调类的介母[i]和[u]。零声母韵腹为[i][u][y]的音节,前面不标字母。

如果用现今通用的声母音系表示法,[tɕ tɕ' dz̥ ɲ ɕ]要独立标出,声母[j]、[w]归入[ɦ]。这样,声母应是28个。

韵母:

	m 唔无亩量	ŋ 五鱼五恒	r 而二耳	ɿ 诗之字世
	i 理去第些	u 做大古苏	y 句归矩女	ɥ 主处书炷
ɑ 拜解惹快	ia 邪借爷写	ua 乖坏怪垮		
o 怕遮赦骂		uo 瓜寡花话		
ɔ 好告下化	io 教笑条票			
ɤ 沟斗搜走	iɤ 求流旧修			
e 海雷对衰	ie 且	ue 块回跪会		ɥe 虽随追岁

	iu 靴		
ē 半船善全	iē 选便骗钱	uē 官完欢湾	
ø 端杆岸看	iø 杈怨愿卷		
æ 但筒三烦	iæ 念	uæ 关惯	
ū 算			
ā 张生宕行	iā 强两抢想	uā 横	
ō 双梦江丧	iō 旺	uō 光黄慌况	
Λn 根身尊辰	iΛn 勤银近今	uΛn 滚捆稳昏	
Λŋ 曾成胜亨	iŋ 心循钉亲		
oŋ 松铜风依	ioŋ 穷用	yn 训	
æʔ 法瞎煞阿	iæʔ 甲	uæʔ 括挖刮	
ak 百射石湿	iak 略约剧脚	uak 划	
Λk 直得刻色	iΛk 逆吃剔极		
ɔk 薄角乐捉		uɔk 潦槲	
ok 独国秃北	ioɔk 曲肉狱局		
øʔ 夺割脱掇	iøʔ 月掘缺越		
ɛʔ 实末说拨		uɛʔ 活阔囫	
iʔ 立切雪恤	iiʔ 热日页结		

共 63 个韵母。

艾氏说明 Λn iΛn wΛn 三韵有的字可读 Λŋ iΛŋ wΛŋ, 多数中古深、臻摄字经常标 n 尾, 其他字多标 ŋ 尾; ē 韵和 ø 韵的字是弱鼻音。

声调:

阴平:高 快 降	52	阳平:低 平	22
阴上:高 平	44	阳上:低 慢 升	113
阴去:高 快 升	35	阳去:低 快 升	13

阴入:高 短 5 阳入:低 短 2

共 8 个。

书中指出阳上声调不稳定,有的字有时读阳去。

2. 2003 年记的上海话音系

到 21 世纪初年,上海城里大多数人使用的语音系统,在此称作上海方言的新派音系。尽管上海城区的语音存在着一些内部差异,周边城区(如杨浦区、闸北区、普陀区、长宁区、徐汇区等)的语音发展快些,中心城区(如卢湾区、黄浦区、静安区)发展相对慢些,但上海 40 岁以下的人大多使用以下的新派音系。

声母 28 个

p 比搬兵百 p' 怕攀拼泼 b 婆拌病别 m 米满闷木 f 夫反方福
v 河犯闻佛 t 多单当德 t' 拖滩通忒 d 地道同独 n 乃暖依诺
l 溜乱拎粒 k 古干工各 k' 苦铅空客 g 葵环共轧 ŋ 熬鹅硬额
h 海汉烘忽 tɕ 鸡尖今级 tɕ' 去浅庆漆 dz 其求就极 ɲ 女软娘肉
ɕ 喜宣相血 ʒ 谢序像席 ts 做专张捉 ts' 粗参撑出 s 书所松说
z 茶传象食 ʅ 衣乌迂爱 fi 遗王远害

与 1853 年音系比较,声母少了一个 dz 母,多了一个 ʒ 母。

韵母 32 个

ɿ 诗字主处 i 里去念且 u 做大古苏 y 句雨杈怨
A 拉拜惹鞋 iA 邪借爷写 uA 乖坏怪垮
o 怕化瓜话
E 海雷对难 uE 块回贯惯
o 好告少包 io 教笑条票
ɤ 沟斗搜走 iɤ 旧流酒修
ø 半看算官

ā 张生江双 iā 强两抢想 uā 荒皇广况
 əŋ 根身曾春 iŋ 勤银心亲 uəŋ 滚捆稳昏 yŋ 君允云训
 oŋ 松铜风依 ioŋ 用穷兄浓
 eʔ 法百直夺 ueʔ 括挖划扩
 oʔ 独国薄角
 iʔ 立热脚剧 yiʔ 越月浴约
 əɾ 尔而儿饵 m 姆亩呀 ɲ 五鱼

o 母有些人并入 u 母；有些人有的 ueʔ 韵字如“活扩获豁”读 uoʔ 韵母；yiʔ 韵中的“肉浴玉”字有的人读 ioʔ 韵；有的人有 ei 母，拼“梅悲碎类”等字。韵母 oŋ、ioŋ 倾向读作 ō、iō。

声调 5 个

阴平 52 江天飞高心书

阴去 334 懂好土对去太

阳去 223 来同有稻外大

阴入 5 笃各脱出黑级

阳入 12 读合肉浊木及

本音系共有 22 个辅音音位：

/p//p'//b//t//t'//d//k//k'//g//ʔ//f//v//h//ɦ//ɸ//ʑ//s//z//
 m//n//ŋ//l/。(其中/n/有[n]、[n̥]和[~](鼻化)三个变体，/ŋ/有[ŋ]、
 [ɲ]两个变体，/t、t'、d/有舌尖前、舌尖中、舌面前三个变体。

共有 10 个元音音位：

/i//u//y//ɥ//a//o//e//ø//ɔ//ɤ/。其中/ɤ/有[ɤ]、[ə]两个变体，
 /a/有[A]、[ɐ]两个变体，/i/有[i]、[ɪ]两个变体，/e/有[E]、[ei]两个
 变体。

1853 年和 2003 年，上海话这两个音系的元辅音音位是相同的。

目前,在许多标音的上海话读物中,标注的上海话音系倾向于比较保守的、现今主要是45岁以上的人使用的“中派音系”,这个音系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相当稳定地在大多数上海人中使用。这里也说明一下。它的声调和声母与上面2003年的音系相同;韵母不同的是:新派的“ā”韵中派没有合并,有“ā硬杏”和“ō方双”、“iā将羊”和“iō旺”、“uā横”和“uō王广”的区别;新派的“ɛ?”韵中派也没有合并,有“A?法麦”和“ə?合得”、“uA?刮挖”和“uə?扩活”的区分;除了韵母“y虑雨”外,还有韵母“yø软圈”;除了韵母“ø半看”外,还有韵母“uø官欢”。

上海话音系160年来的简化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变化:

1. 声母 dz 并入 z。19世纪中叶,上海话与现今常熟话、吴江话和嘉兴话杭州话一样,声母有 dz(如“茶、财、长、宅”的声母)和 z(如“前、造、墙、杂”的声母)的不同,到20世纪初 dz 母大致都已经都并入了 z 母。

2. 入声韵母的不断合并。上海话与其他吴语最大的不同,是原来保留 ? 和 k 两种入声韵尾,有18个人声韵母,到现今,只有1个人声韵尾,5个人声韵母。变化情况如下图示:

分 期	入 声 韵	与介音相拼的人声韵母
第一期 1899年前 18个	æ? 掐、ak 客 e? 磕、ʌk 刻、œ? 渴 ok 哭、ɔk 壳 i? 笔	ia? 甲、ua? 挖、iak 脚、uak 划 ue? 活、iak 逆、ioe? 月 iok 曲、uok 扩 ii? 热
第二期 1939年前 13个	A? 掐客 ɛ? 磕刻渴 o? 哭、ɔ? 壳 i? 笔	ia? 甲脚、ua? 挖划 iɛ? 吃、uɛ? 活、yœ? 月 io? 曲、uɔ? 扩 ie? 热
第三期 1969年前	A? 掐客 ə? 磕刻渴	iA? 甲脚、uA? 挖划 uə? 活

(续表)

分 期	入声韵	与介音相拼的入声韵母
9 个	oʔ 哭壳 iʔ 笔热	ioʔ 浴 yiʔ 月曲
第四期 2007 年前 5 个	eʔ 掐客磕刻渴 oʔ 哭壳 iʔ 笔热甲脚	ueʔ 活划挖 (uoʔ) 活 yiʔ 月曲浴

3. uo 并入 o 韵,部分 o 韵字并入 o 韵。原来“瓜、跨、纱、花、话”等字韵母是 uo,在第二期里,并入 o 韵;同期里“瓦、可、丫、下、拿、萝”等 o 韵字也并入 o 韵。

4. 缩气音的消失: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上海南市还有极少数 70 岁以上的老年人还保留百越民族遗留的缩气音,这种音在第三期内大部分人已消失。

5. 分尖团到不分尖团: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原来分尖团的上海话到 70 年代大致变成了不分尖团音,上海人在两三代人中完成了从分尖团到不分尖团的转变过程,“绩 tsiiʔ ≠ 急 tɕiiʔ > 绩 = 急 tɕiiʔ”、“秋 ts' iɿ ≠ 丘 tɕ' iɿ > 秋 = 丘 tɕ' iɿ”、“小 sio ≠ 晓 ɕio > 小 = 晓 ɕio”。现在分尖团的发音只在沪剧、老年滑稽戏演员和上海话广播中还有滞留。

6. 雷、来、兰读音的合并。“雷”、“来”、“兰”三字代表了三类不同的韵母,即普通话中“ei”、“ai”、“an”三个不同韵母,在开埠时在上海话韵母中读音不同,到第三期大部分人已经合并成一个 E 韵。

7. ɿ、ʮ 的合并。“主、处、书、除”原来在上海话中读 ʮ 韵(有的人读 y 韵),到第三期里,并入了和“资、翅、私、字”一样的 ɿ 韵。

8. e、ø 的变化。中古咸摄和山摄韵母的字在上海话中历经最大的比较复杂的变化,至今一些字的读音还 e、ø 不定,一时不能详尽说清,下

面的表大致可以看到其变化不断的轨迹：

反攀	暖看	半南	蚕扇	变千	陷间	念	惯还	官欢	捐软	全选
ɛ	œ	e	e	iē ie	iē	iē	uē	ue	iœ	i
ɛ	œ	e	E	ie, iε	iε	ie	ue	ue	iœ	ie
E	ø	e	ø	ɪ	iE	iE	uE	uø	yø	ɪ
E	ø	ø	ø	ü	i, iE	i	uE	uø	yø	i
E, ø	ø	E, ø _少	ø	i	i	i	uE, ø	ø, uE	y	y, i _少

注：第一横行记的是中古咸山摄在一定音韵地位下的例字。以下各横行依次的记音人分别为麦高温(1862年)、高本汉(1913年)、赵元任(1928年)、钱乃荣(1978年)、钱乃荣(1996年)，“，”表示有前后两种读法。

9. 疑母的大量失落。中古“疑”母的少数字在开埠时已经失落声母 η 或 η ，变成零声母字，如“言、尧、桅、伪、月(两读)”等，但大部分字都有声母。到了第三、四期里，“迎、银、寓、遇、娱、宜、义、原、外、硬、额、碍”等疑母纷纷失落为零声母，近年来“我”也在失落中。

10. 鼻化音的单一化。第三期中的鼻化音 \bar{a} 韵和 \bar{o} 韵合并为中间音 \bar{A} ，使大量原不同音的字变成同音，如“打=党、省=赏、冷=浪、张=章、厂=唱、场=尝”。

11. o 韵向 u 韵合流中。近年来，不少青年人“巴、爬、车、瓜、华、摩”等 o 韵字读成了 u 韵。

12. 声调 8 个合并为 5 个。三个阳声调，先是阳上并入阳去，再阳平也并入阳去；阴上又在第二期并入了阴去。第三、四期中保持了吴语中最简单的阴平、阴去、阳去、阴入、阳入 5 个声调。阴、阳的区别在于声母的清浊，平、去和入声的区别在于长音和促音带喉塞，实际上，去掉了这两个因素，上海话的声调只有一个降调和一个平升调两个声调模式的区别了。

音系的简化，音节数的减少，同音字必然增加。在 160 年前的老上海话中大量单音节常用词，都变成了双音节词。语音的简化与词音节的增

加是相辅相成的。如原来“袜”与“麦”是靠入声韵中的前后 a 不同区分，现在不能区分，则用双音节词，一个称“袜子”，一个就称“小麦”、“大麦”；“米”和“面”，原来读音上可以区分，现在一个称“米”，一个称“面条”或“面粉”；又如过去说“篮”，后来称“篮头”，又变为“篮子”。

双音节词的大量产生是汉语变得更精确化的结果。上海话语汇在表达概念的复杂精确化的旅途上遥遥领先，大量复杂的近代现代社会事物和行为的引进和产生都需要用双音节词表示。

四、上海话语法中的新旧共存

过去有人说，语言中的语法是最稳定的部分，像“主谓宾”这样的语序排列一般不会发生什么变动，南北汉语方言中的语法形式也基本相同。但是如果我们对一些方言进行深入研究后，就会发现上面的看法是十分粗浅的。上海方言的语法结构不但与北方话有很多不同，而且在近 160 年中也变化挺多。

通常语法可以分构词法和造句法两部分。构词法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就构词法而言，上海话自由发展的历史，使上海话形成了丰富生动的构词形式，有不少形式是普通话词汇中所没有的或少见的，而且延续用到现今。

上海话的名词有一种构词方式是前字是具体的物，后字是该物的形态，又往往可以作为该物的量词，如：“肉丝”、“刀片”、“鸡丁”、“苔条”、“鱼块”、“肉段”、“肋条”、“柴片”、“炭结”、“链条”。它们与普通话的“纸张、船只”不同，并不表示抽象、概括的概念。上海话中有不少名词用“主谓宾”

的结构构成,如“蛋炒饭”、“电吹风”、“手拎包”、“雌孵雄”、“外插花”等。

上海话中有的名词成分等能在前直接与数词结合而不通过量词,如“百页”、“三朝”、“百搭”。上海话的名词有重叠式,如:“袋袋”、“奶奶”、“珠珠”、“囡囡”、“洞洞”、“眼眼”、“边边”、“角角”、“豁豁”、“坳坳”、“缝缝”、“坵坵”、“泡泡”、“脚脚”、“沿沿”等。“袋袋”是“口袋”的意思,“奶奶”是“乳房”和“奶水”的意思。“边边”是“边儿”的意思,因指小有的带可爱而用重叠形式,与普通话的儿化词相当。“水泡”能说“水泡泡”,“水潭”能说“水潭潭”,“洞洞”还能说“洞洞眼”,相比起来指小较明显。有时对小孩说孩儿话,可以把一些常用的单音名词重叠着说,带有可爱意味,如“粥粥”、“糖糖”、“鸡鸡”、“鸭鸭”、“花花”、“鱼鱼”、“肉肉”、“书书”、“手手”、“尿尿”。有的名词还有 AABB 重叠式,如“角落→角角落落”、“粒屑→粒粒屑屑”、“坳塘→坳坳塘塘”、“粼粼→粼粼粼粼”、“半日→半半日日”。有的词只有 AABB 式,没有 AB 式,如“节节龌龌”、“瓶瓶缸缸”。

名词性的熟语还有 A 头 A 脑式,如“布头布脑”、“纸头纸脑”、“线头线脑”、“骨头骨脑”;也有采用 ABAC 式的,如“鬼眉鬼眼”、“热天热色”、“面长面短”、“前生前世”等。

上海话中用前缀“阿”、“老”构成的名词特别多,经常用于表示称谓和指人。如:“阿哥”、“阿舅”、“阿侄”、“阿大”、“阿囡”、“阿福”、“阿囍”、“阿乡”、“阿屈死”、“阿木林”;“老虫”、“老酒”、“老大”、“老枪”、“老户头”、“老法师”、“老克拉”、“老油条”、“老古董”。除“老”外,“小”也常用,如“小出老”、“小瘪三”、“小热昏”、“小乖人”、“小毛头”、“小阿弟”、“小八腊子”、“小刁麻子”。

上海话名词的“头”尾特别丰富。“头”可以作为词尾构成名词,如与名素结合,构成“龙头、名头、肉头、排头、东风头、魂灵头、男囡头”等;也可与动素结合,构成“望头、推头(借口)、轧头(岔儿)、找头、用头、浇头、妍

头”等；也可与形容词素结合，构成“暗头、滑头、高头、嫩头、老实头”等；与方位语素结合，构成“下头、后底头、门口头、外口头”等；与量词结合，构成“班头、斤头、分头、条头”；与数量词组结合，构成“一记头、几口头、独家头”等；与时间词结合，构成“夜头、黄昏头、早晨头”等；与一些词组结合，构成“冷饭头、床横头、灶前头、早发头、辣末生头”等；与叠词结合，构成“多多头、滴滴头、脚脚头、奶奶头”等。“头”在这些结构中，有的只是为了增加一个音节，如：“名头、饭箩头、里向头”；有的表示人的称呼，如“寿头、滑头、小毛头、大块头、小鬼头、阿三头、老实头”；有的表示物的称呼，如：“扳头、插头、冷饭头”；有的表示受动的东西，如：“衬头、吃头、赚头”；有的表示一个单位量，如“班头、分头、两斤头”。有的表示时间处所的范围，如“夜快头、中浪头、年夜头、屁股头、隔壁头、里向头”；有的表示时空位置，附带有那时或那儿的意思如：“黄昏头、前日头、朝后头、胸口头、水桥头、胡梯头”；有的表示剩下少量的，如：“零头、饭碗头、脚脚头”；有的表示微小，如“结结头、蕾蕾头、粒粒头、毛毛头、须须头、囡囡头”等。

许多普通话里用“子、儿”作词尾的词，上海话里都用“头”，如“竹头、篮头、鼻头、被头、摊头、盖头、调头”，普通话里不用“头”的，上海话里也用“头”，如“洋葱头、大蒜头、胸口头、窗口头”。

除此以外，语缀“头”还可以用在量词后面，再加名词，表示某物的整体状态，如“条头糕（成条状的糕）、阵头雨、听头货”；与表示动量的数量词组合用，表示“一下子”，如“搨点书我一记头搬光了”；与“一”合用，还可以表示动作迅速完成，如“家生一攒头就跑”，“搨只球我一脚头踢出去”。如果数量词组后接“头”，还可以表示一个单位整体来计算，如“一包香烟廿支头”，“搨根绳五股头”，“十元头钞票五十张”。“头”还可以与“有”合用，表示动作持续一段时间，如：“有吃头（要吃好多时间）”，“搨眼地板有拖头”。与“没有”合用，表示“不值得”，如：“呒没吃头”就是不值得吃，“呒没

做头”就是不值得做。“头”与“有啥”或“呒啥”合用,表示值得或不值得,如“掰点钞票有啥赚头!”“呒啥叫伊头”;还可以表示“并不如此、不必如此”,如:“掰本书有啥好看头!”“呒没啥开心头”,“葛有啥哭头!”上海真是 个“头”字的世界!

上海话的“子”字尾也很丰富,如“翎子(暗示)”、“关子(紧要处)”、“头子(本领)”、“三尾子(蟋蟀)”、“叫化子”,还有些时间词后面也可跟“子”,如“前年子”、“昨日子”、“上趟子”。普通话用“儿”的上海话也用“子”,如“馅子”、“被面子”;普通话中不用“子”的上海话也用“子”,如“车子”、“鞋子”、“新娘子”、“学生子”。上海话中也有用“儿”缀的,只是一些残余,如“外甥囡”的“囡”指“女儿”,上海话中“女儿”叫“囡五”,这个“五(同音字代)”就是“儿”。吴语区有一些地方“儿子”的“儿”是读“五[ŋ]”音的,如宁波话“儿子”音作“五子”。这个“五”有时会黏在前字的韵母上,形成一个鼻音或鼻化音,就构成吴语中的“儿化”。上海的“麻雀”旧时也说成“麻将”,“雀”原在上海声母是j[tɕ],“雀[tɕiaʔ]”音变成“将[tɕiã]”音,就是“儿化”。现在“麻将”的读法还保留在“麻将牌”的“麻将”中。又如上海话屋檐下的冰锥儿叫“凌泽儿”,这个“泽”就读成“糖”音,也是儿化。还有一个“虾”字,读成“[hø]”,“安[ø]”韵,音韵地位与古音对不起来,按理应该读“花[ho]”音的,现在上海话中“虾”字两读,上面一种读法就是原来[ø]韵上的儿化后鼻化音再失落而成。上海郊区“豆腐花”还在说成“豆腐花儿[hø]”,“花儿”音如“汉”;“猫[mɔ]”读成“猛[mã]”,“捉猫猫”说成“捉猛猛”,也是儿化的缘故。

上海话的动词除了有丰富的单音动词外,还有许多独特的构词方式。有一种 BBA 的形式,如“排排坐”、“背背驮”、“团团转”,BB 表示动作的方式;还有像“滂滂涕”、“刮刮抖”、“独独滚”、“格格绕”,前面的 BB 表示动作程度的最高级。表示动作一般的程度则用 ABB 的形式,如“笑咪咪”、

“吓咗咗”、“死烱烱”、“气潜潜”。在四字格成语中有许多 ABAC 的形成，如“碍手碍脚”、“谢天谢地”、“加油加酱”、“赶要赶紧”、“有心有想”、“作精作怪”、“管头管脚”、“学嘴学舌”。上海话动词的重叠式也与普通话有所不同，如表示“V 了又 V”的：“坐个坐”、“踏个踏”；表示“V 了一下”的：“看了看”、“笑了笑”，还有“看了两看”、“动仔两动”的说法；表示动作不断的：“摇咗摇”、“翘咗翘”、“碰咗碰”；表示动作悠哉游哉、“V 呀 V 的”：“摇发摇发”、“余发余发”、“捞发捞发”、“缩发缩发”；动作尝试一下的：“汰汰看”、“吃吃看”、“戳戳深看”、“种种兰花看”、“问问伊看”、“坐脱一歇看”。上海话的单音动词重叠，可以后跟形容词：“吊吊好”、“揩揩干”、“烧烧熟”；跟“伊”，这个“伊”有时并无实义，是个“共指词”，复指前面的话题，如“大饼吃吃伊”、“头发吹吹伊”；跟“脱”，表示结束，如“汰汰脱”、“攒攒脱”；前跟形容词，如“瞎碰碰”、“毛估估”、“乱摸摸”。普通话中的“动宾结构”上海话里往往把名词提前来说，如“螺蛳啾啾，蹄膀笃笃”、“音乐听听，功课做做”，重叠表示长时间的连续。像“我、依、伊”这样的代词是代名词，上海话中有三个动词“弄”、“来”、“搞”，是代动词，比如“弄点西瓜吃吃”（代“买”或“运”），“弄只电风扇来扇扇”（代“搬”或“借”），“来一客双球冰淇淋”（代“买”或“送”），“来象棋呢围棋？”（代“着”），“点生活搞勿好了”（代“做”），“搞糊涂了”（代“缠”）。

上海话里的形容词多姿多态，形式生动活泼，描写细腻形象。许多词语与普通话不同，如“瘦”对“奘”，“贵”对“囡”（便宜），“阔”对“狭”，“早”对“晏”（晚），“稀”对“棚”（即“猛”，密），“脆”对“翻”（音“认”），“烦难”（难）对“便当”（方便）。有的词语虽与普通话意义相同，但用法有所不同，如“长”可用于人的身高，“尖”可用于耳眼灵敏，“奘”既用于人又用于动物。另外，像“头大”、“贴肉”、“推扳”、“老鬼”、“贼腔”、“扎劲”、“吃价”等，从构词上看都颇有特色。“后生”（指年轻）、“奶油”（形容漂亮）从名词转来，“造

反”(形容多)、“勾勒”(做事精细不含糊)从动词转来。“邋遢”、“尴尬”、“齷齪”等词更由于含义别致,已为普通话吸收。

重叠的形容语素可以加上一些后缀构成一些可做状语的附缀词,如加“叫”构成“好好叫”、“慢慢叫”、“静静叫”、“暗暗叫”;老上海话可加“能”构成“轻轻能”、“笃笃能”、“辣声能”;加“点”、“介”、“仔”、“里”、“乎”也能形成一些词:“轻轻点、当心点、慢慢介、明明仔、白白里、急急乎、险介乎”等。

与普通话一样,上海话的形容词有 AABB 的生动形式,如“行行情情”、“笃笃定定”、“造造反反”,有的有 ABAB 的生动形式,如“煞白煞白”、“绝嫩绝嫩”。可用 A 里 AB 形式扩展的词比普通话多,如“肮里肮三”、“疙里疙瘩”、“懵里懵懂”、“挖里挖掐”。还有 BCA:笔笃翘、墨出黑、精打光、煞辣齐;BC 势 A:夹齧势白、活脱势像、煞辣势清;A 里 A 气:洋里洋气、粗里粗气、戆里戆气、怪里怪气。

最丰富的是 ABB 式,由两个重叠的摹状形式类词缀加在单音形容词后形成。这两个类词缀有的有些实义,如“胖墩墩、瘦刮刮、紧绷绷、瘪塌塌、暗洞洞、野豁豁”;有的完全虚化,如“哆里里、实别别、酸尖尖、屈搭搭、木兴兴”。叠尾也能加在名词后,如“风落落、神炀炀、色迷迷、鬼触触”。有些叠尾词的语义看上去似乎相同,其实还是有细微差异的,如:“湿几几”形容含水的样子,“湿扎扎”形容湿有水滴,“湿漉漉”形容湿得往下淌水,“湿搭搭”形容有些儿湿或因湿而粘在一起,“湿塔塔”则形容成片的湿润或潮湿。“硬绷绷”形容事物直硬或说话态度生硬;而“硬翘翘”则形容实物硬而翘出或说话态度生硬僵直;“硬敲敲”形容硬而薄、脆或中间突出。这些不同的叠尾加上去,描写的范围略有差异,对外地人而言,真是难辨个中细味。

这类形容词的语义大致可以分几种:1. 外表:长悠悠、胖笃笃、黏搭

搭;2. 色香味:青奇奇、臭烘烘、辣蓬蓬;3. 感觉:毛惹惹、嫩几几、寒丝丝;
4. 状态:烂糟糟、软冬冬、薄噐噐;5. 性情:木兴兴、急吼吼、浮惹惹。

至于 BBA 形式,则是普通话中没有的,如“石石硬、墨墨黑、拍拍满、锃锃亮”。上海话中的形容词形容程度可由形态标志级别,“冷冰冰”是像冰一样的冷,程度较低,而“冰冰冷”则是非常冷了。程度最高的用三个字来修饰最后一字,是 BCDA,如用“石”、“骨”、“铁”来形容“硬”,真是硬得不能再硬了。此类词还有“滴粒滚圆”,“碧绿生青”,“刮辣松脆”,“簇刮辣新”等。

因此,上海话要形容一个状态,有时可有多种形式供选择,如形容“直”,有“直挺挺”、“笔直”、“笔笔直”、“笔立直”、“笔笃势直”。

形容词还有 ABAC 式,如“恶形”可说成“恶形恶状”,“少有”可说成“少有少见”,“辣手”可说成“辣手辣脚”,“行情”可说成“行情行事”;“A 头 A 脑”式:“大头大脑”、“野头野脑”、“花头花脑”。

上海话形容词的后缀很多,如“八腊”(腻心八腊、危险八腊),“头势”(恨头势、吓头势),“搭煞”(外行搭煞、寿头搭煞),“兮兮”(神经兮兮),“式气”(寿头式气),“把戏”(踱头把戏),“的搭”(戆大的搭)等。至于像“兴令哄隆”(人多声势大的样子)、“黏滋疙瘩”(黏乎乎)、“拨瞪拨瞪”(眼一闪一闪)等用拟声拟态的方式来形容人事更是妙乎其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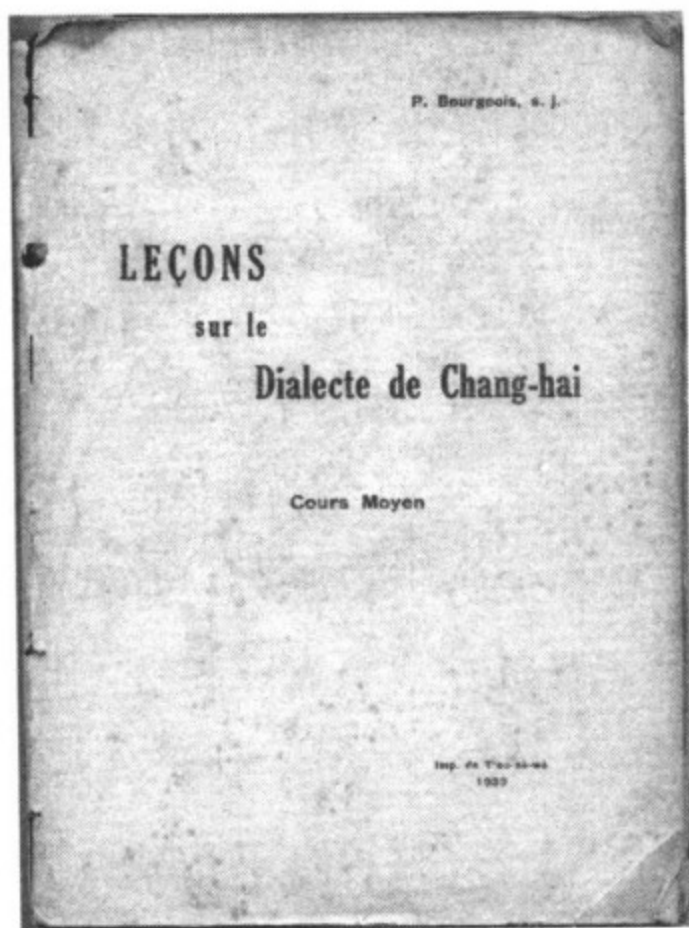
下面谈上海话语法的造句法。在开埠后,上海话在语法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造句法上,可以看到四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和趋势。

1. 上海话句子的语法关系在表达上更趋严密化和明确化。

让我们来看上海话复句中的关联词语的进化。处于农业社会中的上海话,日常生活会话使用频繁,用语往往但求简约性。老上海话用偏句后面或中间加助词的形式来表示与正句的关系的。比如:“我生病咯勿去上班。”“今年雨水多咯,野草长得特别多。”在这两句话里,助词“咯”表示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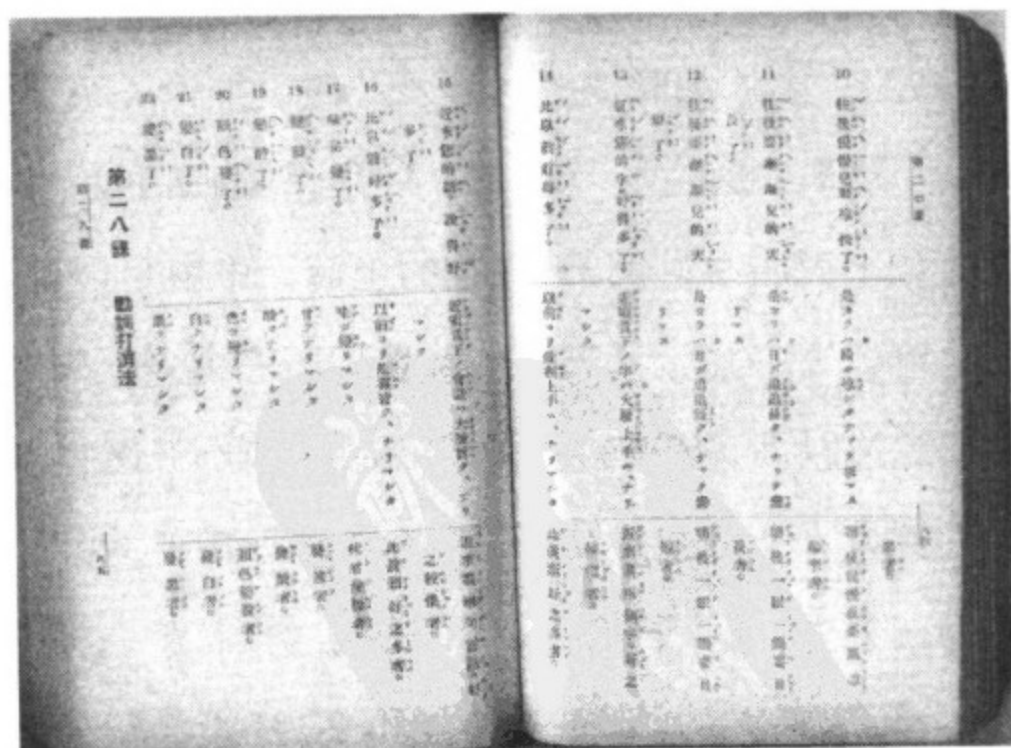
后的“因果关系”。“读仔《史记》末,就晓得历代个兴旺啫失败、人啫物事个好恹。”这句话里,两个“啫”在表示“并连”关系,“末”在这里表示轻微的“因果关系”。“铜钿付清仔啫,货色车仔去。”这里的“啫”只表示两件事的“连贯关系”。“侬要买末,便宜点好哉。”“淡末要化,浓末搨勿开。”这两句中的“末”又表示“假设推论关系”,相当于“如果……就”。再如“预备好了末,可以开始做”。这里的“了末”表示“直接推论关系”,相当于“既然……就”。“坚持吃伊三个月末,毛病再会好。”这里的“末”与“再”配合,表示“唯一条件关系”,相当于普通话的“只有……才”。“侬勿高兴写末,也要讲一声。”这里的“末”与“也”配合,表示“让步关系”,相当于“即使……也”;“车子再轧,我也上得上去。”这里的“再”与“也”配合,也表示“让步关系”;“本钿多做多,既没经验总归尴尬个。”这里的“多做多”表示“即使再多”的意思。“进口水果好是好,价钿忒贵。”“现在做末做了,好坏还勿晓得。”这里“好是好”、“做末做”这种形式,用来表示“转折关系”,相当于普通话的“虽然……但是”。在这些表示各种逻辑关联句子中,“啫”、“末”等助词就等于连词,助词“末”、“啫”等又不是专职的,因此有时表达的意思就比较含糊。

后来,上海话吸取了书面语中的关联词语表示这些上面关系。先是吸收近代汉语书面语中的关联词语,如表示“假设推论关系”用“倘若……葛末”、“倘使……就”、“假使……就”等。后来,普通话书面语的关联词语来到上海话中,如上面所举的例子,现在的上海话中就可以说:“我因为生病,所以勿去上班。”“因为读了《史记》,就想到历代个兴旺失败、人脱物事个好坏。”“钞票付清以后,货色车了去。”“侬如果要买,便宜点好了。”“要是淡了就要化,要是浓个话就搨勿开。”“既然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做。”“只有坚持吃伊三个月,毛病再会好。”“即使侬勿高兴写,也要讲一声。”“即使车子轧,我也上得上去。”“本钿即使再多,既没经验总归尴尬个。”



* 1939 年法国传教士蒲君南的《上海方言课本》的第一页

1946 年丁卓的《中日会话集》之两页 *





* 1980年代上海里弄

“进口水果虽然好,但是价钱忒贵。”“现在虽然做了,但是好坏还勿晓得。”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现代商业社会中,用语节奏变快,传话渠道多样,表达要求明确,复杂的判断推理需要清楚的形式照应,关联复句的使用频率大幅提高,这就要求配用比较专一、关系明确的关联词语。上海话从书面语中吸取了整套的关联词语,在需要表达比较明确严密的逻辑关系时,渐渐取代了过去那些一词可以泛用表示多种逻辑关系的、意象朦胧的语尾助词。上海话就变得更便于表达较严密的逻辑思维了。

在此同时,旧的一套助词依然保留在说比较轻松的家长里短的日常用语中,发挥诗情画意的模糊语言优势,各得其所。也有两者混合使用的,如:“因为生病咯,勿去上班。”

这样上海话中句子的关联,实际上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层次上的两套

关联词语,一套表示比较淡化的逻辑关系,一套表示比较明确的逻辑关系,形成两种语体风格。

2. 语法的表达形式多元化,具有更大的宽容性,使上海话在吴语区内更有代表性。

因为上海方言在一个五方杂处的环境中滚打,造成了它的表现形式多样性广谱化。是非问句(可以用摇头或点头代替答问的问句)在各地的方言中往往只用一种形式发问,如在苏州话中,用“阿 V”形式(老王阿是上海人?)在溧阳话里是“V 勿”(老王是上海人勿?)在绍兴话里是“V 勿 V”(老王是勿是上海人?),在常州话里是“V 哦”(老王是上海人哦?)上海话在原来从嘉兴话中带来的是非问句是“V 哦”形式,如:“侬是学生哦?”但是后来“V 勿 V”的形式传入了,从苏州话中又传入了“阿 V”形式,到现在汉语各地使用的是非问句的 4 种基本形式及其彼此混杂的形式如“阿 V 哦(老王阿是上海人哦?)”“阿 V 勿 V(侬阿懂勿懂?)”在上海话里并存,可使国内操各种方言的人都能在上海自由发问,上海人都能听懂。在课堂上,老师问学生“是不是”时,用“是哦?”“是勿是?”“是勿啦?”“阿是?”“阿是哦?”都可以,都听得懂。甚至与英语中的反意问句相近的是非问形式和日语中的确认问句形式,在上海话中现今也经常听闻。如:“伊勿是联络员,是哦?”“侬勿去了,对哦?”“伊是侬个老师,阿是?”当然上海话中土层的“V 哦”形式至今还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形式。

吴语的许多类型的句子都是用“主宾谓”的形式表达的,而北方话都是用“主谓宾”的语序表达,这两种基本语序的差别很大。但是在上海话中,现在这两种句型可以并存,和谐共生。比如:“要种花,侬空地有哦?”“要种花,侬有空地哦?”都可以说。“开开门”可以说:“门开一开。”“我音乐听听,功课做做。”可以说“我听听音乐,做做功课”。“我掰部电影看过了。”也说“我看过掰部电影了”。还可以说:“掰部电影我看过了。”

在上海话中一个动词带两个宾语的“双宾语句”，表达的形式也是多样的，既能表达清楚意思，句式也很灵活。比如“我给你一本书”，上海话中既能用过去南方汉语的“我拨本书依”，也能用北方汉语的“我拨依本书”，还能用“我拨本书拉依”。“拉”相当于英语的介词“to”，甚至还能说“我拨本书拨依”，“我本书拨拉依”，“(一)本书拨(拉)依。”

带兼语句在上海话中如果在意思表达上容许，可以有五种不同的语序，如：“送点药我吃。”“送我点药吃。”“送点药拨我吃。”“点药送拨我吃。”“送我吃点药。”带兼语结构句子的五种语序在上海话中兼容，体现了上海话复杂谓语句内部语序的灵活性，变换的宽容度，可使各地来沪人员用自己方言中的任何一种形式换说上海话，都能达到通话。这一点是上海话与其他城市方言相比的一个特色。这是上海语言适应上海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结果。

上海话语法在各方移民方言的影响下，达到了吴语各地同类语法现象和谐共处或中性化的程度，这种宽松现象使吴语区以至其他方言区的人更容易学会上海话，更自然地使用上海话。这是语言接触和趋向公约数式简化的模式在语法上的体现。

3. 继续向孤立语的方向发展。

上海话还放弃了不少语助词的使用，使语言向书面语更为靠近。

实词不带语法标志，句法关系主要靠词序表明，这是孤立语的重要特征；通过词形的屈折变化表示语法关系，用词尾等表示多种语法关系的语言是屈折语。由于汉语是单音节语，一个语素一个音节一个汉字互相对应，那些在实词后面表示语法意义的形态，在汉语里往往是跟在实词后面加上一个音节，用所谓“助词”表示，上海话也是如此。上海话原来有大量的助词，句子开头有提顿助词提示话题，动词前后有体助词表示句子的体，句子末尾又有丰富的语气助词(共 56 个)表示句类和语气。除此以

外,上海话表示虚拟语态也使用助词,表示各种偏正结构的逻辑关系也用助词,并列地罗列事物也用助词。但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上海话中,与从前的上海话比,使用助词频率大为降低,比如表示并列的助词“啵”为连词“脱、告、帮”代替,如“侬去买一点香蕉啵、橘子啵、荔子啵、瓜子啵啥来”。上面一句后来改用停顿或连词来表示:“侬去买一点香蕉、橘子、荔子告瓜子来。”表示连贯承接的“啵”也倾向不用,如:“换好衣裳啵出去哉。”现在通常说“换好衣裳出去了。”又比如在话题语后使用“提顿助词”,现今可用可不用,以不用频率为高,像老上海话用“末”提顿话题很普遍:“衣裳末,勿要忘记脱带。”现今常常不用“末”:“衣裳勿要忘记脱带。”比如 1939 年法国传教士蒲君南(Bourgeois)出版的《上海话课本》中有这样一句句子:“胆大个人末,惯常粗心,粗心之末,事体做勿好哉;细心个人末,惯常胆小,胆小个人末,勿敢做事体:两种人侬无啥好,所以古人话:胆末要大,心末要细。”现在通常大家不愿用那么多的“末”来提顿,一般是说“胆大个人老是粗心,粗心以后,事体就做勿好了。细心个人老是胆小,胆小个人,勿敢做事体。两种人侬既没啥好。所以古人讲:胆要大,心要细。”这样说法,与书面语更为接近了。

又比如体助词也有所衰退,像实现体助词“仔”变为“了”后,在有的偏句里,体助词“了”被“以后”取代,如:“侬到仔北京,要打个电话来。”这句话现在只要这样说:“侬到北京以后,要打个电话来。”“拉哉”表示的现在完成时态趋于消失,“我买拉哉”被表示实现的“我买了”替代;经历体与完成体过去有“歇”和“过”的区别,后来“歇”失落了,而在动词前加副词“曾经”来替代这层意义;“V 拉个”变为“V 个”,“V 仔”说作“已经 V”,原来虚拟句里表示再来一次的“V 过”(如“烧过”),从“V 过”>“再 V 过”>“再 V”或“重新 V”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原来用体助词形态的表达方法渐渐为副词修饰动词所代替。“V 个 V”(切个切)表达法消失了,“V 啵 V”(动

啉动)也很少用了,“助词”是“附着”的,而现代上海话的复句中,助词正在衰退,而呈独立语音形式的关联词语“因为”、“但是”等进入上海话取代“啉”、“末”、“是”等助词;语气助词也简化了,如表示推测的“罢”和表示疑问的“否”都用“哦”来表示;残存一点实义的语气助词“辣海”使用率减少,如“我摆仔五斤辣海”。改为“了”或“咪”：“我摆了五斤了。”必要时失落的语义在前面用其他词语表示,如上句说成“我辣里向摆了五斤”。160年里上海话助词在语句中大量失落,比较明显,这是上海话形态继续减退孤立语面貌继续加强的表现。

4. 上海话语法的发展趋势向共同语普通话更为靠拢。

上海话的时态原来有一套完整的形式。现在完成时态和过去完成时态都是用“主宾谓”的语序表示的。如现在完成时态：“我新衣裳买拉哉。”否定式是：“我新衣裳勿曾买。”疑问式是：“依新衣裳买拉末？”后来受了北方话的影响,在上海话里又产生了一种表示完成或实现的体形式,是用“主谓宾”语序表示的,如：“我买仔新衣裳哉。”“我勿曾买新衣裳。”“依阿曾买新衣裳？”用“仔”、“哉”、“阿曾”,都是受了苏州话的影响,因为这种北方话形式是先由苏州话接受,再传到上海话中来的,原来在松江话中是没有的。后来,进一步受普通话的影响,“仔”、“哉”、“勿曾”都淘汰,变成“了”、“了”、“既没”,这三句话在如今的青年人中变成：“我买了新衣裳了。”“我既没买新衣裳。”“依买了新衣裳哦？”这种语法表达形式现今与老上海话的“主宾谓”形式并用：“我新衣裳买了。”“我新衣裳既没买。”“依新衣裳买了哦？”一方面可以看出上海话语法的兼用共存特征,另一面也说明了北方话普通话对上海话语法的渗透。上海话的语法发展趋势是像普通话一样,不再用语法形式表示“时”而仅表示“体”了。

向普通话靠拢实际上也是上海话渐渐放弃南方话和吴语的特点而北方话化。比如动词带宾语和补语的语序问题,一些南方形式为北方形式

渐渐取代,如“坐惯车子了”、“通一根管子出来”、“看我勿起”、“打招呼起来”这样的老上海话语序渐渐变为与普通话相同的语序“坐车子坐惯了”、“通出一根管子来”、“看勿起我”、“打起招呼来”。

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上海社会加快发展联系更为频繁的形势下,一方面是年轻人从小受到良好的普通话教育,整个市民文化程度普遍提高;另一方面外来人口越来越多,现今外来人口的涌入,不像 50 年代之前那样大家都必须学上海话用上海话交际,而是与上海人之间通用普通话为中介语进行交际,这就加速了社会用语用普通话的进程。上海的语言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上海话语法向普通话的靠拢总的来说是社会推广普通话和广泛使用普通话的结果,也是上海走向现代化的同时社会知识化的必然趋势。

综上所述,在不长的 160 年里,上海话的发展一直处在活跃的、不断的新旧共生和融和交替之中,上海话的常用词语的公约数化,简洁的语音特征和灵活自由的语法规则,以及与普通话同质因子的增长,使上海话成为了吴语中各地移民和全国各地移民最易接受学会和找到对应换说的语言。

第四章

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话

一、衣食住行用语的地方色彩和现代化

随着上海城市面貌的快速变化,上海话的词语在多样化的社会生活中突飞猛进,上海话从一个小方言快速发展成为一个生动活泼、丰富多彩、蕴含着巨大的都市社会信息的大方言,主要的发展是上海话自身的发展,主要的推动力是来自商业化社会滋生的活力。

上海社会近代发展之速,使上海方言中汇集了自农业社会、手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商业社会带来的各类词语。上海地区从一片农田和小县城到繁华城区,再到国际大都市,160年来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反映在民间生活方面则是旧秩序旧情趣不断被新生活新格调所代替。方言词语忠实地记录着一方水土上的地方风貌,也全面折射出这些民间习俗的变化。清末民初,由于思想和社会的自由开放,面对西方思潮和新鲜事物如潮涌现,上海从这时起就开启了新生词语的高潮期。上海人不为窠臼所困,而以宽阔的胸怀,顺势而动,见一样新鲜事物,就造一个新词。造词形式也多样化,极具创造性,有音译的,意译的,有自定义的,也有直接用外文的,或者中西杂交的。由于在短期里上海话的高速发展,古代形式、近代形式、最现代的形式同时浓缩存在和积累在几代人的口语中,使上海话的日常用语成为一种时代层次丰富的语言。

城市化首先带来的是居住环境的变化。开埠以前,上海是一个小县城,房屋院落都带有典型的江南乡镇色彩,用的是这样一批词语:“引路石、踏步级、阶沿石、夹弄、正梁、桁条、瓦片、盲板、椽子、廊檐、廊棚、方砖、搁脚板、照壁、正间、厢房、穿堂”。房屋有“瓦屋、一门两簷房子、草屋、芦席棚、偏屋”,门用“门刹、门搭襻、撑头”,窗有无玻璃的“簷”和用云母片做成的“明角窗”等。上海话中这些旧词语就反映了当年上海那些有天井的“一进宅”或多进住宅的旧房屋面貌,保存着江南明清时代建筑的特点,这



* 上海中西合璧的市民建筑石库门弄堂

些词语之所以在一些人中依然流传,是因为这类住宅至今在老城厢等地的小弄里,或在保护建筑、园林中还存在。西人进入上海以后,上海的房屋面貌发生很快的变化,新式砖木结构住房如“石库门”、“里弄房子”建造起来,以“里、坊、村、园”等后缀为各条大小弄堂取名,在用词习惯上喜欢用“德、仁、惠、乐、文、义、慈、祥、庆、吉、兴、寿、康、福、裕”等组合命名,这可以看到当时时行的吉祥、慈爱、崇德观念和弄堂文化强调康乐、平安的时代风气。上海的里弄房子实际上是江南民居和西方公寓式住宅的“中西合璧”,于是有“客堂间”、“落地长窗”、“扶梯”、“灶披间”、“后门”、“客堂

楼”、“亭子间”、“晒台”、“天井”、“过街楼”等等新名词。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又有大批的“新式里弄”出现,建造外形进一步参照西式洋房,就有“矮墙”、“铁门”、“小花园”、“前天井”、“后天井”、“阳台”、“露台”、“隍司灶头”等词语产生。这种中西合璧上海特色的“弄堂”自有其市井生活趣味盎然的气氛,“邻舍隔壁”的“有事体相互照应”的协作风气及“小朋友”结伴的“弄堂游戏”之和谐,堪为世界第一。后来“花园里弄”、“公寓里弄”、“大楼房子”、“公寓房子”、“东洋房子”、“洋房”、“花园洋房”、“别墅”、“工房”以及“棚户”、“江北棚棚”、“滚地龙”等名称形形色色,各得其所。上海的房屋成了“万国建筑博览会”。上海的街道住宅,自租界开辟以后,很快普遍采用“路、弄、号”称呼,取代了以前的“街、巷、宅”等,是与这三个词跟“road、lane、house”的读音相近有关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成片的模式相似、构造简单的被上海人称为“火柴盒”式的“工房”开始建造,工房建筑形成了成块的“工人新村”。“钢窗蜡地、煤卫齐全”成了两代人的梦想,如今已经实现,90年代以后上海人的居住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住房上的新名词遍地开花:“连体别墅”、“星级楼宇”、“水景房”、“亲水楼盘”、“花苑”、“生态住宅”、“复式套房”、“凸台”、“护墙板”、“顶角线”、“踢脚线”、“无框窗”、“塑钢窗”、“软玻璃”、“视飘玻璃”、“雕花瓷砖”、“平改坡”等等,多数是采用了新世纪已成为新词主体类型的、字面很明白的书面语组词方式构成新词语。上海话中住房变更而积累的词语为市民居住空间的一个半世纪变迁处处打上了烙印。

160年来上海话在服饰方面词汇的演进也体现了上海人穿戴的不断翻新。开埠之初,上海人还盘着辫子,穿着清朝的民服,用的多为黄道婆传下的家机织布。自从有了西方传来的大机器织布后,就把纺织厂织的布称为“洋布”,家织的土布则称“老布”。有的人干脆就是西装革履。洋货大量进入上海,“羽纱、呢绒、洋绸、花布”等充斥市场,“大衣、围巾、皮

鞋、绒线(初称‘头绳’)”也传入。后来,那些反映旧式穿戴的旧名词诸如“长衫、马褂、箭衣、袍子、衬里布衫、衬里裤子、牛头裤、夹衫、背带裤、满裆裤、大襟衣裳、对襟、琵琶襟、饭单襟、爪袖拖袖、作裙、裹裙、百家衣、一口钟、叉胸袋、围身头、背搭、包头布、扎脚、束腰带、吊袜带、油衣、钉鞋、蒲鞋、蚌壳棉鞋、木屐板”等渐渐淘汰。上海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同时,服装也随世界潮流变化无穷,领导标新,集合大成。如帽子就有“橄榄帽、小滴子帽、罗宋帽、铜盆帽、瓜皮帽、鸭舌帽、贝蕾帽、八角帽、压发帽、风雪帽、风凉帽、草帽”等等式样,各取所需。中装西化,西服中化,或中上加西,表现了上海地区穿着文化的自由交融,最典型的就脱胎于满族妇女服装而由汉族吸收西洋服装式样制成的中西合璧服装——女子新式“旗袍”,而且由于其款式不断翻新,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上海风行后,历经20多年不衰。而那种参照最新海外来样,精工细作,有东方风韵,连西方人也爱穿的西装,称为“海派西装”。值得一提的是,那时产生的许多从内衣到外装的名词大多传流到如今,如:“汗衫、背心、马夹、上装、布衫、衬衫、短衫、长衫、夹衣、开衫、套衫、外套、罩衫、套衫、两用衫、绒线衫、中装、西装、茄克衫、披风、斗篷、风衣、大衣、棉袄、衬裤、罩裤、西装裤、背带裤、长统裤、羊毛裤、绒裤、开裆裤、短裤、三角裤、连衫裙、细裉裙、喇叭裙、衬裙”,等等。到20世纪80年代又一轮开放时,服装新名词也层出不穷,如:“百裉裙、太阳裙、直统裙、喇叭裙、一步裙、背带裙、旗袍裙、西装裙、直统裤、喇叭裤、牛仔裤、太子裤、萝卜裤、灯笼裤、西装裤、运动裤、卫生裤、平脚裤、T恤衫、运动衫、薄绒衫、休闲衫、滑雪衫、皮茄衫、皮风衣、羽绒衣”,等等。到21世纪初,上海时装大放异彩,上海话中又产生了大量新鲜词汇,如:“露脐装、吊带裙、超短裙、一裹裙、蓬蓬裙、蛋糕裙、一步裙、A字裙、网球裙、花苞裙、公主裙、沙滩裤、袋袋裤、连袜裤、踏脚裤、开筋小喇叭、板裤、铅笔裤、无腰裤、九分裤、中裤、热裤、丁字裤、低腰裤、皮裤、蝙蝠

衫、迷彩服、娃娃衫、高腰衫、剃削衫、雪纺衫、乞丐装、连体衣、泡泡袖、七分袖、防辐射马夹”等，其中多数以奇异的特征来命名。

至于上海的饮食业，可说是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名牌佳肴，又汇合了西洋东洋的各种名餐。单看“糕饼包团”的名称，就已琳琅满目了。传统的糕点也五花八门，有“海棠糕、方糕、条头糕、云片糕、印糕、松子糕、赤豆糕、黄松糕、松糕、寿桃糕、定胜糕、糖年糕、猪油年糕、火炙糕、云带糕、橘红糕、茯苓糕、芙蓉糕、绿豆糕、桂花赤豆糕、麻糕、糍饭糕、鸡蛋糕”等，由于各有特色，至今流传。上海历史上本有家家户户自己“熨糕”的习惯，但是开埠前糕点品种是比较单调的，只有“年糕、海棠糕、麻糕、松糕”等几种。西式糕点“奶油蛋糕”、“卷筒蛋糕”、“椰丝蛋白球”等进入上海，使上海人耳目一新，而中西兼容的结果，使上海的糕点业发展很快，如“水果蛋糕、杏仁蛋糕、水晶糕、核桃糕、白果蜜糕”等，制作越来越精致。上海民间原来也常“摊饼”，但早期上海的饼以“油饼、饅饼、芝麻饼”为主，移民引进了许多式样的饼，如“大饼、羌饼”来自山东，“老婆月饼”来自潮州，西人则引进各种“饼干”。现在上海的饼除了各种形式的饼干外，旧式的“葱油饼、麻饼、香脆饼、面饼、酥油饼、薄脆”和西式的“一口酥、蝴蝶酥、曲奇饼、蛋挞、派”等在街头巷尾争相斗艳。“包”有“小笼馒头、生煎馒头、南翔馒头、素菜包、豆沙包、霉干菜包、叉烧包、烧卖、花卷、高脚馒头、蟹粉小笼”等，“团”有“汤团、双酿团、酒酿圆子、糖圆、擂沙圆、瘪嘴团、糯米团、青团、金团”等，种类繁多。此外，面类的称名也集大成，如“阳春面、盖交面、炒面、两面黄、牛肉拉面、雪菜肉丝面、大排面、辣酱面、葱油拌面、刀削面、烂糊面”等，面包有“罗宋面包、法式长棍短棍、豆沙面包、烤面包、椰丝面包、奶油面包、香肠热狗、三明治”等。在生活条件较差的年代，上海百姓的早点喜爱在就近的早点摊上吃“大饼、油条、豆腐浆、粢饭”，后来通称为“四大金刚”。此外，加上“锅贴、馄饨、烧卖、粽子、酒酿”等，在丰富了词语



* 20 世纪初南京路上的黄包车

30 年代上海福州路上的黄包车和电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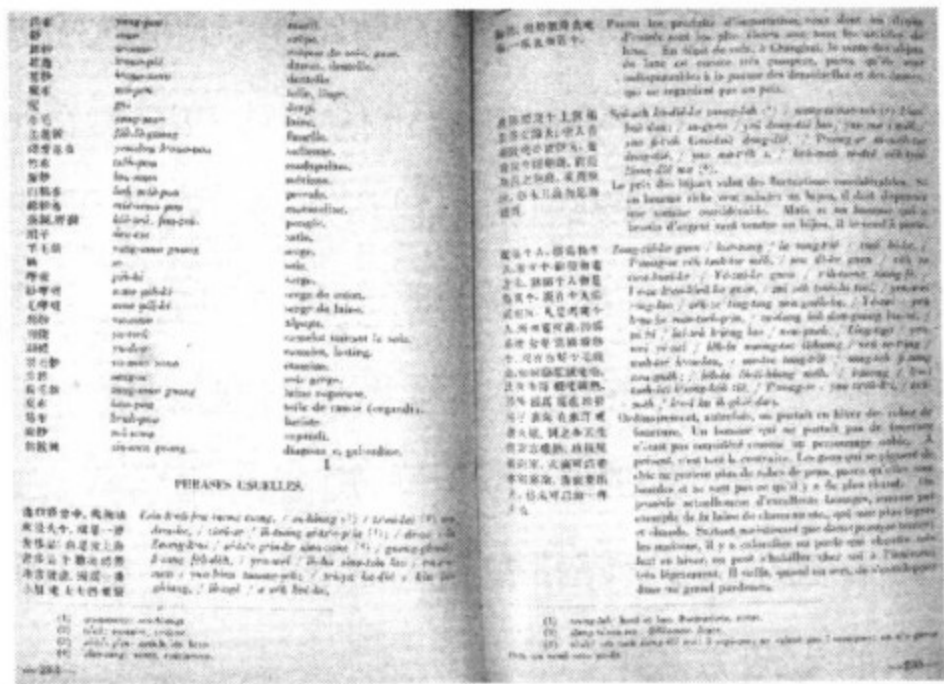
的同时,也造就了“沪语小吃文化”。80年代以来,夜市小吃重又活跃起来,又发展出不少新花样,如“熟泡面、冷面、兰州拉面、台湾牛肉面、鸡蛋面饼、三丝汤包、汉堡包”等纷纷上场;90年代以后世界名点、各地小吃抢摊登陆上海,如:“蛋黄粽、咀喱布丁、提拉米苏、慕司、泡芙、蟹派、别司忌、克力架、仙贝、雪月饼、比萨饼、南瓜饼、土家烧饼、印度飞饼、长棍、全麦面包”等等,于是又有一批新鲜名词汇入了具有宽容性的上海话语汇。

在出行方面,双脚步行,上海人称“走”或“跑”。上海人还戏称步行赶路为“乘十一路电车”或“乘十一号汽车”。回转,称“打回票”、“开倒车”、“回转来”。“闲逛”称“荡马路”,“绕一行”称“兜一圈”、“豁一埭”、“转一圈”,“玩”称“白相”,“玩玩”称“白相白相”或“白相相”。近代交通进入上海以后,几乎大部分的称名都先在上海诞生,如:“火轮船(后改为‘轮船’)、摆渡船、驳船、飞机”等。对于车名,上海也集车名大全,可谓见一种新车即取一个车名,从独轮小车的“羊角车”,到“东洋车、黄包车、三轮车、脚踏车、机器脚踏车、癞蛤巴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公共汽车、汽车、自备车、卡车、吉普卡、送货车、搬场车、篷车、花车、机动车、火车、饭车、晒车、特别快车、行李车、集装车、棚车”等,还有小搬小运的“黄鱼车、老虎塌车、平板车”等。80年代后又新增不少新车名,有的名称是从南方传来,如“面包车、大篷车、大巴士、中巴、的士”等。近几年又有“轻轨、磁浮、投币车、山地车、双层车、专线车、越野车、折叠车、桑车、避震车、面包差头、跑车、电瓶车、助动车、卡丁车、QQ车、冷巴、观光地铁”等生成。上海在造出“出租汽车”这个倾向于书面语词语的同时,口头还通用“差头”一词,“差头”是英语“charter(租赁)”的音译词,1919年祥生汽车出租公司初创时仅有一辆出租车,每出租运客一次称“一差(charter的缩略读法)”,直到现在还保留“我已经做了三差”这样的说法。“差头”在20世纪50年代

以后消失,到 80 年代重新活跃于上海的马路上,于是这个老词又重新复活。像这样在上海停用了 40 年后随着市场经济和旧事物的复活而重新复活的老词还有许多,如“劈硬柴(AA 制)”、“淘浆糊”、“接盘”、“扎台型”等。虽然,上海马路又复活了和更新着形形色色的靓车,但是上海人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在商业社会中养成的节俭处世和守规则的习惯,比如说近来上海话中出现了“拼车”、“拼的”的新词,说的是几个陌生人合起来出钱坐出租车:“此地有四个人,正好拼车到莘庄呀。”这也反映出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吧。

二、文化、宗教、商店的文化词的蓬勃多彩

上海开埠以后,西方思潮和新鲜事物如潮涌现,反映新生事物的名词大量产生。葛元煦在《沪游杂记》(1876,写作时他已在租界居住了 15 年)中记到了以下的新名词:上海广方言馆、制造局、江海关道、同文馆、通事、海军司令部(宣统初年在上海成立)、司法权、劝业会、同业公会、洋行、机关、商务、研究会、会话、租界、马路、阴沟、阴井、轮船码头、电报、招商局、会馆、公所、租界洋行、丝栈、丝号、茶栈、汇划钱庄、客栈、茶园、名班、脚色、戏馆、书场、茶会、茶围、花烟间、闲游、出局、拍卖行、照相楼、垃圾车、洒水车、大自鸣钟、工部局、跑马场、保险公司、马车、脚踏车、教堂、格致书院、申报馆、机器印书局、电线、地火、自来风扇、荷兰水、柠檬水、火油灯、煤气灯、外国影戏、焰火、马戏、盆汤、戏园、掙客、车夫、野鸡、女荐头、拆梢党、放白鸽、姘头搭脚、西崽、露天通事、巡捕、外国讼师、包打听、油画、照相、东洋车、马车、火警钟、号头(租界华洋房屋,工部局于门首用小牌编明字号)、会审公堂。



* 1939年法国传教士蒲君南的《上海方言课本》之两页

风俗变易带来不少俚言俗称。黄式权在 1883 年著《淞南梦影录》，寒食生在其序中说：“大而风俗变迁，时事更易，小而花丛标异，鸟语鸣奇，无情不移，有境皆幻，一一详记而备录之。”该书记录“沪上方言”有：“称龟子曰‘嘉定老先生’，称鸨妇曰‘父兄娘’，称挑夫曰‘野鸡’，称蜂蝶媒曰‘拉皮条’，称狎客之偶一至者曰‘丹阳客人’，称局赌害人者曰‘牌九司务’，称大言诳人者曰‘卖野人头’，称妓家佣曰‘烧汤’。”还记到“溜冰、赛花会”等新名词。

到 1924 年陈伯熙编著的《上海轶事大观》中，记“沪语”的新词更多，有“煞底、接生、骂山门、杀千刀、杀坯、猪头三、阿土生、寿头码子、寿头寿脑、曲辫子、瘟生、拆梢、茶会、瘪三、八开、小开、本家、拆白党、钉梢、阿木林、刚摆度、磨镜党、掬客、卖瓜子”。记“游民切口”，有“开码头、摆路头、拔苗头、扎绷、接头、郎德山、放生意、拉排头、失风、洋哥、阿木林、阿土生、

寿头麻子、老毛、外国卵子、阿朗、贴血、叉进去、识相、高风子、放炮”。书中还写到“报贩、托力克眼镜、讨生活、票房、票友、舞台、自来火、电灯、电气公司、救火会、小房子、荐头行、燕子窝、彩票、混堂”等词。

自 19 世纪 60 年代起到 20 世纪 20 年代,从上海滩上五花八门的新名堂中流行出来的新词俗语已经大量产生。

上海城区在 20 世纪初快速扩展,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人口汇集上海,中西文化自由交流,一时间文化、宗教、行业、店家的文化词蓬勃多彩地产生并活跃起来。

在 19 世纪末,第一批新式的文化设施在上海诞生,创造了一批新的文化词。如:“幼稚舍、学堂、书院、书坊、仪器馆、研究会、游艺会、恳谈会、会馆、公所”(摘自李维清 1907 年《上海乡土志》)。上海的文化事业迅速繁荣的同时,一大批新文化词语在上海话里生成并通过繁荣的报刊电影传播开来。如出版类的“印书馆、排字间、出版、初版、二版、装订、毛边书、洋装书、勘误表、报界、记者、编辑部、主笔、周报、画报、季刊、社评、杂志、广告栏、笑林、副刊、定户”等;如文房类的“钢笔、铅笔、圆珠笔、自来水笔、墨水、印墨水纸、拍纸簿、日记簿、名片、印油、橡皮、信壳”等。此外:钟表类有“自鸣钟、挂钟、座钟、闹钟、金表、夜光表、挂表、指南针、寒暑表、千里镜、金丝边眼镜”等;化妆品类的“香水、花露水、脂粉、生发水、雪花膏、凡士林、刨花缸、牙刷、嘴唇膏、节搯油”等;娱乐类如“台球、足球、网球、棒球、高尔夫球、回力球、锦标赛、滚铁环、打弹子、打菱角、扯哑铃、跳绳、体操、马戏、留声机器、洋琴、风琴、口琴、手风琴、竖琴、洋号、麦克风、的笃板、软片、照相、滩黄、开篇、戏法、西洋景、日场、夜场、主角、明星、行头、做功、道白”等。新场所名如:“公馆、别墅、陈列馆、图书馆、博物院、救火会、电报局、交易所、育婴堂、孤儿院、按摩院、美容室、殡仪馆、医院、诊所、运动场、游乐场、跳舞场、跑冰场、书场、跑马场、夜总会、俱乐部、同乡会、公

所、饮冰室、餐厅、小菜场”等。(选自 Bourgeois 1939 年《上海方言课本》) 这些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使用的新词语大部分都沿用到现在,当年,上海人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造出的大量新词,如“自来水、电灯泡、马路、洋房、书局、报馆、博物馆、足球、高尔夫球、黄包车、三轮车、雪花膏、橡皮筋、沙发、马达、课程、咖啡、白兰地、啤酒、麦克风、敲竹杠、出洋相、小儿科”等等,反映了现代文明在上海的渐进。后来这些词语大多进入了普通话。

从明朝徐光启时代起,上海开始有了首批的天主教徒。1842 年 7 月,法国耶稣教会在徐家汇土山湾徐光启墓地附近建立了上海开埠时候第一个教会基地,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末共有教堂 427 座。上海的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都很活跃。教会文化产生了一批有关新词。如:“耶稣会、圣母圣心会、玛利诺会、长老会、浸礼会、青年会”、“祭台、追思台、讲道台、钟楼、圣水壶、蜡台、弥撒、圣经、真主、圣体、主教、神父、修士、嬷嬷、教友、圣洗、进教、瞻礼、做礼拜”等。“教会学堂、教会医院”等教会文化对上海的影响一直很大。上海佛教有悠久的历史,敦煌壁画中就发现有上海佛教史迹画,所绘的是“西晋吴淞江石佛浮江”。开埠后佛教的寺院遍布上海,道教的道观也各处有见,佛教、道教文化传布很广。相关词语有:“城隍庙、静安寺、保安司徒虹庙”、“寺庙、庵堂”、“和尚、尼姑、道士、菩萨、观音、灶君、财神、地藏王、弥陀佛、门神、关帝”、“吃素、烧香、做道场”等。

各行各业,分布之广,名称之杂,分类之细,上海为最。在上海滩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同时,尤为纷杂繁华。如商店业有“金银业、银楼业、绸缎业、衣装业、南货业、地货业、六陈业、豆麦业、染色业、典当业、古董业、茶食业、蜜饯业、海货业、火腿业、香烛业、玉器业、珠宝业、瓷器业、竹器业、杂货业、花粉业、嫁妆业、颜料业、笔墨业、纸张业、菜馆业、皮箱业、皮裘业、顾绣业、布匹业、鞋帽业、乐器业、爆竹业”等等;行号类有“煤炭行、粮食行、棉花行、茶叶行、饴糖行、炒货行、咸货行、鲜鱼行、蔬菜行、缸坛行”

等等；杂业有“油坊、磨坊、酱园、米店、烟酒店、混堂、旅馆、茶楼、饭店、面馆、豆腐店、剪刀店、老虎灶”等等；工匠有“剃头匠、扞脚匠、成衣匠、泥水匠、箍桶匠、翻砂匠、刻字匠、打锡箔匠、补镬匠、琢玉匠、鍍花匠、铜匠、铁匠、木匠、竹匠、皮匠、石匠、漆匠、钉碗匠、弹棉匠”等等；手艺人“剃头司务、烧饭司务、裁缝司务、红帮裁缝、吹糖个、捏粉个、织补个、裱画个、做灯笼个”等等，另有“出店、清道夫、脚夫、轿夫、三轮车夫、跟班、收账人、卖票人、送报人、看门人、换糖个、削刀磨剪刀个、修洋伞个、修棕棚个、摇虎撑个、施药郎中、卖膏药个、风水先生、衔牌算命个、测字个、卖长锭个、卖拳头个、活孙出把戏个、告地状个”（选自1924年吴汉痴主编《切口大词典》），形形色色，共同构成了上海社会的众生相。

1909年《图画日报》刊载的上海社会风俗画上的上海街巷里的一些老行当，具有浓厚的上海本地民俗特征的小买卖，如：“卖炒栗子、烘山芋、卖糖粥、卖糖山楂、卖汤水圆、卖馄饨、卖粢饭、卖豆腐花、卖沙角菱、卖重阳糕、卖西瓜、卖凉粉、卖臭豆腐干、卖梨膏糖、卖芦粟、卖猫鱼、卖牛乳、吹糖人、杀猪、切药、叫哥哥担、卖蟋蟀、修洋伞、修棕榻、箍桶、钉秤、做饭箩、卖草席、卖鸡毛帚、卖蒲扇、圆竹匠、修缸补髻、推草鞋、卖草虫、扞脚、剃头、锯木匠、做斛子、成衣匠、织补衣裳、刻字匠、糊裱匠、拣鸡毛、卖小说”等，到50年代城市化程度很高的上海，除了下面画线的两种，走街穿巷和开铺设摊买卖的，依然存在；直到20世纪末，这些词语中的大部分还伴随该事物的流传而常用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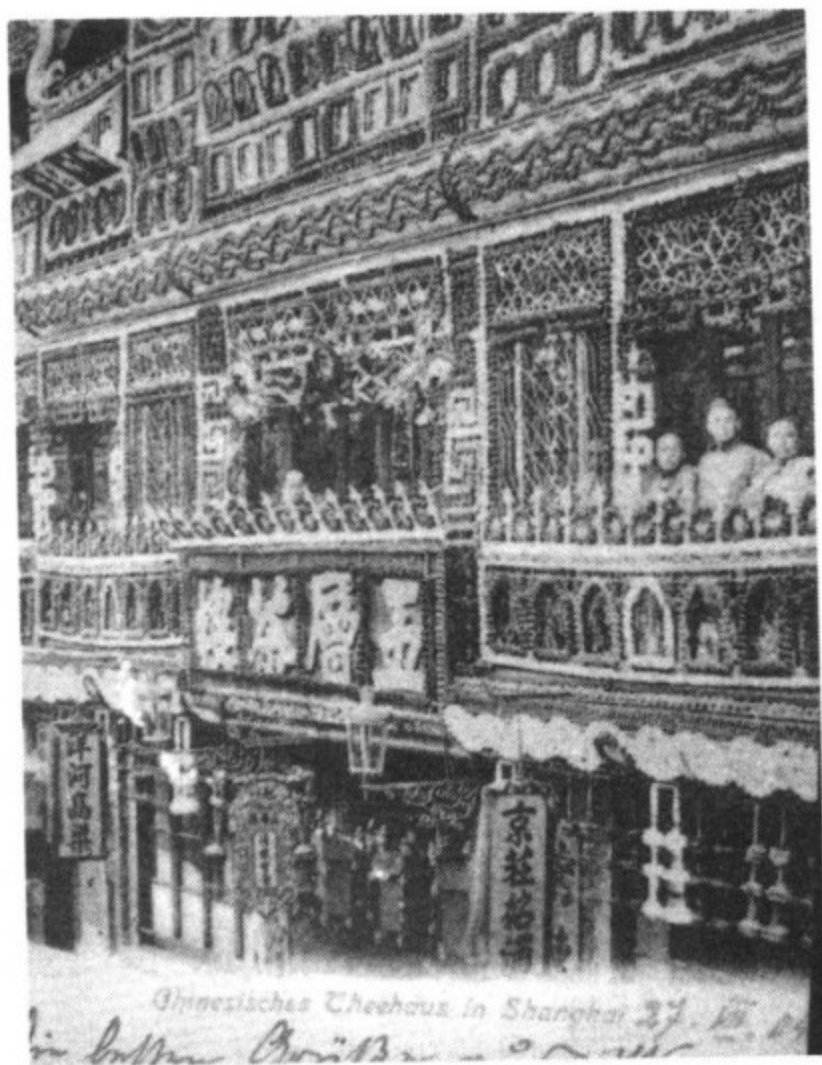
上海商业的活跃兴隆，表现在上海商店食所娱乐园地招牌名称的云蒸霞蔚，形成了上海店名称呼的纷繁多彩，集中了江南商业文化特色。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是一派繁华景象。如1883年黄式权的《淞南梦影录》中记上海的著名酒饭馆有“杏花楼”、“一品香”、“申园”、“一家春”、“同香楼”等，其名称都很风雅。上海的“茶坊”据说起自于“一洞天”，



* 1909年上海《图画日报》所刊的上海社会风俗画“卖臭豆腐干”

* 1909年上海《图画日报》所刊的上海社会风俗画“修洋伞”





* 20 世纪初的上海茶楼

1928 年陈无我的《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记下的 20 年前的茶坊名称有“凤来阁”、“玉壶春”、“得意楼”、“青莲阁”、“沪江第一楼”、“爱吾庐”、“乐也逍遥楼”、“四海萍萃楼”等；1893 年池志澄的《沪游梦影》中记上海的“书场”有“也是楼”、“天乐窝”、“小广寒”、“桃花趣”、“响遏行云楼”、“淞沪艳影楼”、“引商刻徵羽楼”等招牌。那是上海突飞猛进的时期，招牌文化诗情画意，无怪乎来沪旅客在沪居士都以如梦如影来感怀上海的市面了。

上海店名的招牌历来的文学水平就很高，这与都市的文化水准、品物五湖四海中外荟萃的优势相当。在上海的文学作品中也不时留下芳名，如张爱玲的“起士林”，程乃珊的“天鹅阁”，都是人们当时神往和别后怀旧

的休闲佳处。沪上有些“圣殿”的命名别具匠心,表现出高贵典雅的人文底蕴,如建于30年代初的“兰心大戏院”,遵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府邸风格,又仿近代装饰派风格,挂名“Lyceum Theater”。“兰心”两字,音译兼意译,而“lyceum”是亚里士多德讲学的庭院名,后成为人文荟萃、菁英辈出的精神家园和发祥地;它又巧合于唐朝诗人李勃《七夕赋》的“金声玉韵,蕙质兰心”。即使是上海店名的后缀,也集中了江南商业文化传统和创新的特色。较早的店名常用“庄、园、堂、作、局、行”等作为后缀,如:“肉庄、钱庄、衣庄、笔庄、绸缎庄、酱园、国药堂、混堂、烫衣裳作、包饭作、书局、药局、制造局、木行、车行、花行、水电行”。后来,各行各业商行林立,除了上面几种,还用很多名称来称呼店名,如:“楼、家、馆、店、处、号、阁、轩、亭、村、栅、居、廊、宫、屋、棚、社、池、泉、房、斋、厅、记、公司”等。像:“鸿运楼、得意楼、杏花楼、一乐酒家、同兴馆、泰和馆、天津馆、老日升织补店、海利专卖店、功德林素菜处、胡庆余堂药号、维多利亚西服店、百花洲、留香园、爱吾庐、清芬堂、千顷堂、青莲阁、天鹅阁、集云阁、朵云轩、沧浪亭、半松亭、蓝村、杏花村、乔家栅、远香居、同芳居、一春台、绿波廊、新新发廊、吴宫、伊藤家居酒屋、蓓蕾发屋、可的牛奶棚、德大西菜社、裕德池、日新池、天泉、冠心药房、五味斋、天香斋、巴尔扎克快餐厅、白玫瑰美发厅、先施公司、永兴搬场公司、王星记扇庄、王记成衣作、大观园、养和堂、王记成衣作、世界书局、永丰木行、飞达车行”等等。沪上的店名和路名纷繁典雅,以至学者游士选以做对,雅趣盎然,早在《淞南梦影录》里就记有:“一洞天”对“三角地”、“五圣庙”对“八仙桥”、“紫来街”对“黄歇浦”、“广东店”对“新北门”、“打狗桥”对“放牛局”、“华洋书信局”对“英法巡捕房”等,信手拈来,妙合自然。

上海的店名及其后缀一直具有深厚的文化气息。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店名后缀曾一度萎缩,千篇一律改称“商店”或“店”,80年代以

后,随着上海人的思想重新活跃和商业复兴,店名又呈百花齐放,近来又有“苑、廊、小馆、人家、专卖店、中心、商厦、超市、广场、商城”等的新名称诞生,中西融合,南北交汇,表现了上海繁荣的商业特色。我们从这些店名中可以窥测上海人多彩的商业文化心理。有的干脆用上海方言命名,体现大众文化街谈巷语的亲切气息。“鲜得来”、“好吃来”、“顶好”、“顶顶好”、“好再来”、“日日来”等店名,就是这样的大众化通俗文化命名。“马大嫂”自助便餐店,“一只鼎”黄泥螺店,更以上海流行语命名,在上海人听来,特显其亲切。还有日语上海话北京话三兼的名称“一级棒”(日语“一番”是最好的意思,这是音、义兼译,上海话流行语“一级”也是最好的意思),取名也别具匠心。有一家“吧”干脆取名为“来吧”,英文名字叫“come to bar”。

三、华洋杂处形成的大量外来词

从晚清起,自由出版书刊和办报逐渐成风,翻译西方理论和文学,产生了许多借词。十里洋场开辟,外来新鲜事物接踵而至,对于应接不暇的西洋近代文化的外来事物名称,上海话反应迅速,马上吸收,除了用意译方式对如“火车”、“飞机”、“细胞”、“蜜月(sweetmonth)”、“黑板(blackboard)”这些新生的事物冠以称名外,对有些源源而来的新事物,因为一时来不及新创词语的,干脆冠之以“洋”字命名,如:“洋货、洋钿、洋布、洋琴(西洋琴类乐器)、洋油(煤油)、洋灰(水泥)、洋袜、洋装、洋红、洋伞、洋刀、洋火(火柴)、洋房、洋台(阳台)、洋线、洋线团、洋风炉(煤油炉)、洋铁碗、洋囡囡、洋娃娃、洋泡泡(气球)”,其中“洋房、洋钿、洋伞、洋泡泡”等一直使用至今。加以“洋”头称名以外,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吸

收外来词的第三次高潮。上海人的兼收并蓄态度使外来文明通过上海话借词的使用很快地本土化,且以外来词的引进为起点形成了20世纪初期的新词新语涌现大潮。

首先是向日语借来新词,它主要通过近代报刊如《申报》、《时务报》、《民报》等,用照抄汉字的方式引进,并不涉及语音。这里有三种情况。(1)古汉语里原有的词,日语在近代使用它表达了新概念,现在再把它们借回。如:想象、乐观、主义、社会、文明、思想、意识、具体、演绎。(2)日语用汉字新造的词语。如:谈判、方针、政策、自治、反应、科学、物理、资料、哲学、客观、集团、原理、特权、体操。(3)日语中固有的词,原用汉字书写,我们直接引进。如:场合、手续、服务、话题。借自日语的词,除了“味之素(味の素)”等极少数词外,都已进入普通话。

上海人以带有洋派情调为荣,上海话也就常常夹带一些洋人词语。如:先生称“密司脱(mister)”,第一称“那摩温(NO. 1)”,钞票称“大拉斯(dollars)”,脸蛋称“番斯(face)”,有钱有势的大人物,称“大亨(hundred)”,传球称“派(pass)”,重来称“厄隍(again)”,对分称“哈夫(half)”,末班车和最后称“拉斯卡(last car)”,通过称“派司(pass)”,再会用“拜哎拜哎(bye)”,拿来就用。妙龄少女或潇洒公子在说话中以夹带西文来附庸风雅抬高身价,特别是生活在市中心租界区内的与西方文化接触较多的地方和家庭,加上“华洋杂居”的各种交际场合的需要,对话语句中夹杂英语便不足为奇了。

于是,身穿“阴丹士林布(indanthren)”、“法兰绒(flannel)”风靡一时,吃“三明治(sandwith)”、“罗宋汤(russion)”成家常便饭,从“道林纸(dauling)”、“米达尺(metre)”开始研习科技文化,在“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罗曼蒂克(romantic)”气氛中创作新文学。一众海上少年,头上戴副“托力克”,嘴上衔支“茄立克”,手里拿根“司的克”,出门乘部“别尔克”

(名牌眼镜、烟、拐杖、轿车),引以时髦。在20年代,已有前面三“克”,被称为“三克党”。(严独鹤主编的《红杂志》1922年第三期刊登饭牛写的《海上打油诗》记下当时的时尚:“海上少年盛行目上戴托力克镜,手中携司的克棒,嘴里衔茄立克香烟,谓为‘三克党’。”)新词是新思潮、新生活的直接反映,“洋里洋气”和“洋泾浜”的结果,主要的是中外优势的杂交,带来上海的繁荣。

借词主要来自英语,少数来自俄语、法语和德语。对于应接不暇的外来事物,直用其音称呼最为方便,也不易因意译而引起事物与称名走样。西洋近代文明无论工艺、建筑、交通、衣饰、饮食、医学、教育、音乐、体育、娱乐和生活用语等都在上海的词汇中留下痕迹。如:马达(motor)、阀(valve)、腊克(lacquer)、克罗米(chromium)、泡立水(polish)、马赛克(mosaic)、水门汀(cement)、水汀(steam)、戛司(gas)、卡车(car)、摩托车(motorcycle)、派力司(palace)、开司米(cashmere)、柠檬(lemon)、色拉(salad)、土司(toast)、布丁(budding)、三明治(sandwith)、白脱(butter)、咖啡(coffee)、可可(cocoa)、咖喱(curry)、阿司匹林(aspirin)、来苏儿(lysol)、凡士林(vaseline)、课程(course)、戛子(chop)、麦克风(microphone)、披耶那(piano)、梵哑铃(violin)、萨克斯风(saxophone)、倍司(bass)、沙蟹(show hand)、道勃儿(double)、司到婆(stop)、脱去包(touch ball)、搞尔(goal)、捎(shoot)、派(pass)、维纳斯(venus)、沙发(sofa)、派对(party)、德律风(telephone)、朴落(plug)、司答脱(start)、违司(waste)、司的克(stick)、行(hong)、康白度(comprador)、台头(title)、克拉(colour)、圣(ssint)、安琪儿(angel)、磅(pound)、打(dozen)、听(tin),等等。

有些口头传播的外来词,含义有一定的宽泛性和不稳定性。比如与海派经济和文化有关的“老克拉”一词。欲探其由来,“克拉”来自英语“carat”,是宝石的重量单位,一克拉等于200毫克。在过去的珠宝店里,

司务们遇到三克拉以上成色的钻石宝戒,常常会把大拇指一翘,称一声“老克拉”。后来用它主要喻指那些从国外归来见过世面的、有现代意识的、有西方文化学识背景有绅士风范的“老白领”。紧接着从他们的文化追求和生活方式着眼,又延伸了从英语“colour”(彩色)和“classics”(经典)来的特色含义。这个阶层收入高,消费也较前卫,讲究服饰和休闲的摩登,在休闲方式上也领潮流之先,精通上海中西融合时尚和社会,追潮恰如其分。今又扩指到遇事在行、处世老练、有生活经验、有绅士风度的年长者。如:“我想告侬介绍,搵两位上海滩浪个老克拉,上海三四十年代个事体,可以问问伊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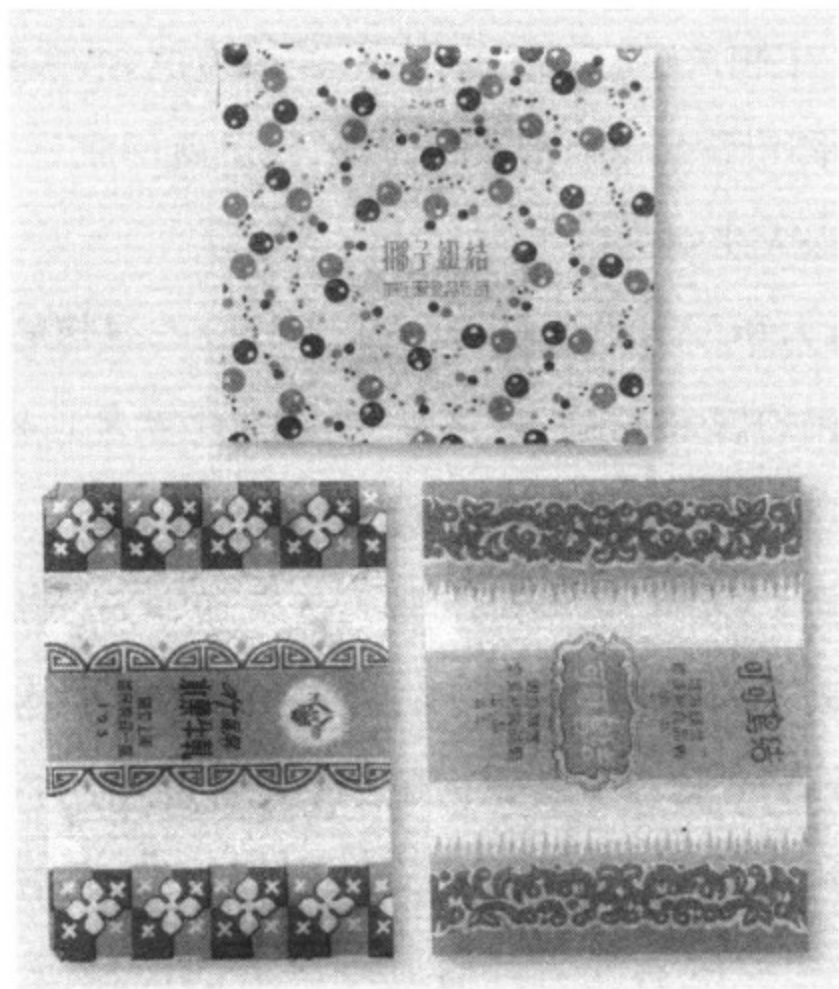
有些方面,外来词一下产生很多,如糖果食品,饮食如西餐,菜名常直接音译。有的东西音译词有两个形式,如“巧克力”,又称“朱古力(chocolate)”,“牛轧”,又称“鸟结、纽结(nouget)”。现在已进入普通话的许多外来词,可以从中看出上海语音的特点,如“沙发(sofa)”,上海读“沙”为“[so]”,又如“白脱”、“加仑”、“派司”、“马达”、“伏尔加”、“秘鲁”、“加拿大”等都是。

在音译外来词时,不少词语在形式上屈于上海话的特点而有所变化,如“brandy”原来只有两个音节,上海人把它译成三个音节“白兰地”,“普罗列塔利亚”又因太长根据我们的习惯缩略成“普罗”,也有把两个借词复加在一起成为新词,如“吉普卡(jeep、car)”。

为了提示词义所属类别或凑足双音节,许多借词采用音译加上汉语语素的形式。如:卡片(car)、啤酒(beer)、酒吧(bar)、沙丁鱼(sardine)、雪茄烟(cigar)、雪纺绸(chiffon)、卡宾枪(cabine)、米达尺(meter)、法兰盘(flan)、杏利蛋(omelet,炒鸡蛋)、司必灵锁(spring)、道林纸(dauling)、拍纸簿(pad)、高尔夫球(golf)、华尔兹舞(waltz)、茄克衫(jacket)、车胎(tire)、老虎天窗(roof)。有的纯音译的借词也会再与汉语的词或语素合成新词,如:咖喱+粉→咖喱粉。这样的词又如:色拉油、可可粉、番茄沙

司(sau-se)、苏打饼干(soda)、求是糖(juice)、插朴(plug)、派克大衣(par-ka)、派司照(pass)、罗宋帽(russion)、沙发椅等。还有缩写词,如普罗(prole tarian)、C. C(cubic centimeter)等。

* 50年代的三张糖纸头上“nouget”有三种不同译法



中西合璧、音译和意译结合的词也不少。一种是音译加意译,如:冰淇淋(ice cream),“冰”是意译,“淇淋”是音译,此类借词还有如苏打水(soda water)、霓虹灯(noon light)、弹性女儿(dancing girl)、南斯拉夫等;另一种是用音义双关的造词法,如:俱乐部(club)、维他命(vitamin)、引擎

(engine)、幽默(humor)、乌托邦(utopia)、香波(shampoo)、迷你(mini), 这些词读起来是音译的, 看起来又是意译的。

借词也有转义的, 即在上海实际所指的事物和外国的事物并不完全相同。如:“卡车”在英语中是指一般的“车子”和“汽车”, 而在上海话里成了“载货汽车”;“那摩温(number one)”在上海话里后来词义缩小到仅指“蝌蚪”和“工头”;“司答脱(start)”仅用于日光灯的继电器;“拉斯卡(last car)”已从“末班车”扩指“最后一次”或“最后一个”的意思了。

海派文化是一种自由、开放、民主的文化。上海话就浸润在这样的海派文化的天地里, 它与上海这个城市一样, 敞开着宽阔坦然的胸膛, 对国内国外的各种文化和语言, 都用“拿来主义”的方法, 而兼用、借用、杂交的结果, 使上海话取得了充满生长点的优势, 使上海话成为一种蓬勃活跃前卫创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言。

一种充满活力和创新的语言, 首先在于社会的思想的活跃前卫, 事物的兼收并蓄, 文化的博采多元。而海派语言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博采性的语言文化, 一种开放创新性的语言文化。

《新英汉词典》主编陆谷孙教授有次在华东师大作报告中说:“英语还有个优势呢, 就是它本身的祖宗比较杂, 所以它是比较丰富的。它可用的词汇据估计有四十万左右, 一般法语或者德语的词汇在二十万左右, 所以它可表达的, 用来表达的这个材料特别的多, 特别的丰富。为什么呢? 因为它过去既有北方的日耳曼民族的海盗侵入了英伦三岛, 带来了日耳曼语系的语言, 又有从南边, 甚至从罗马带去的拉丁文, 从 Roman Conquest 带去的法语, 你看它是这么一个大杂烩, 它的祖宗比较杂, 所以生出来混血儿大概比较健康一点。所以它有那么多的词汇。林语堂做了个统计说, 英语里头会有 125 种骂人撒谎的话。”(陆谷孙, 2005)

汉语普通话的可用词汇量与英语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在汉语方言口语中却存在着丰富的词汇源泉。如果普通话能在各地推广的同时注意到保持群众使用语言的自由度,积极地把全国方言中的好词语吸收进来,并积极从外国语中吸收词语,那么接近英语的可用词汇量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因为汉语的方言资源实在丰富。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普通话的词语更丰富多彩,不断与人民群众的口语保持密切联系。

四、洋泾浜语的生成、活跃和消亡

华洋杂处,语言互受影响。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流行一种“洋泾浜英语”。姚公鹤在1917年版的《上海闲话》中描述过这种混合语:“与华人会话,同一英语,则英人反茫然不知所对,盖上海商场中久已通行一种不中不西之洋泾浜英语矣。查洋泾浜英语,系以中国文法英国字音拼合而成,为上海特别之英语。即此一端而论,英人来华其不能不先有研究可知矣。”

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于上海洋泾浜地区的“上海洋泾浜语”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在语音上受上海话影响。把辅音“r”说成“l”,如:“all light (all right)”、“loom(room)”;把英语词尾的辅音加上“ee[i:]”,延伸成一个音节,如:“Talkee he(Tell him)”,“My wanchee walkee. (I want to go for a walk.)”,“What side catchee. (Where is that from?)”;把辅音“t”读成“chee”,如:“My no wanchee. (I don't want it.)”。

2. 语法上用自由形式取代了词尾变化,放弃了数、格、人称等形态变化。如“I”、“me”、“my”、“mine”都用“My”表示,像“My no savvy. (I don't un-

derstand.)”, “Pay my. (Give me that.)”, “This b’long my (This is mine)”。又如不用冠词: “My wanchee bath. (I want a bath.)”; 不用动词时态形式: “No likee. (I don’t like that.)”, “No can do. (That will not do.)”。

3. 受汉语量词的影响, 泛用“piecee(piece)”当量词用。如: “Catchee my one piecee rickshaw. (Get me a rickshaw.)”, “Pay my two piecee. (I will take tow of them.)”。

4. 泛用“time”表示时间, “side”表示空间。如: “another time. (again)” “What time? (What o’clock is it?)”, “Time bye. (Afterwards.)”, “This side. (Here.)”, “all side. (around)”, “What side? (Where is it?)” “Go topside. (Go upstairs.)” “top-side. (above)” “Go bot-tomside. (Go downstairs.)”。

* 1914 年填没前的洋泾浜, 开始是“华界”与“英租界”的分界线, 后是英法租界的分界线



5. 用“belong”表示“属于”，泛用代替系词“to be”。如：“That b'long bad pidgin. (That is a bad job.)”，“What this b'long? (What is this used for?)”，“True b'long bottomsides, last time talkee. (I can't take any lower price.)”。

6. 用上海话语法和语序组装英语词语成句。如：“Can do. (That will do.)”，“No can do. (Stop that.)”，“What thing? (What is that?)”，“That side. (here)”，“Barber have got? (Is there a barber in the hotel?)”，“Hotel side can sendee? (Can you send this to my hotel?)”，“You look see tslikee my. (Go and see, and come back and tell me.)”，“No have got. (He is not at home.)”，“Talkee he come this side. (Tell him to come back.)”，“Too muchee dear. (That is too dear.)”，“Talkee my. (Please let me know.)”，“Pay my look see. (Just let me look.)”，“My too muchee fear makee rain. (I am afraid it is going to rain.)”，“No have got. (He is not at home.)”，“what fashion no can? (what not?)”。

7. 词汇基本上来自英语，也用英语俚语，如：“Savvy? (Do you understand?)”。也有来自上海话及印度带来的词语。如：“Man man. (慢慢 Wait a bit.)”，“Auso. (豪躁 Be quick.)”，“Auso di. (豪躁点 Go quicker.)”，“Dang sing(当心 Be careful.)”，“Faung au lay. (放下来 Put the rickshaw 黄包车 down.)”，“Chin-chin. (请，请。 How are you; Good bye.)”，“Doo-maloo. (大马路 Nanking Road.)”；“chit(信、账单)”，“godown(货栈)”。

8. 常用词的使用范围比英语大得多，这是对生词的回避策略。如：“Come chop chop. (Come at once.)”，“Catchee tea chop-chop. (I want some tea at once.)”，又用“numa one(number one)”引申表示“顶呱呱”，用“catchee(catch)”表示“得到”。用“Man-man”表示“stop”。

9. 简化的表达，这是用缩略弥补口拙。如：“No likee. (I don't like them.)”，“No can do. (That will not do.)”，“Talkee true? (Do you mean

it?)”, “What fashion?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Wanchee all same. (I want it like that.)”, “Pay my. (Give me that.)”, “Pay my hot water. (Get me some hot water.)”, “Can secure. (Will you se to do it?)”, “Pay my two piecee. (I will take two of them.)”, “Twelve piecee wanchee wallop. (I want these twelve plates developing.)”, “Talkee cook three pie-
cee man dinner. (Tell the cook to prepare dinner for three to-day.)”。

10. 换话表达。“What side my room? (Show me my room.)”, “No can cuttee? (Is that the lowest price?)”, “Pay my look see. (Just let me look.)”, “Can puttee book? (Is the bargain settled?)”, “You can lolly my? (Can you make an allowance on damaged goods?)”, “S’pose no do, my makee largee bobbery. (If you don’t do this, you will get into trouble.)”, “This b’iong number one. (This is very good.)”。

以上的例子主要来自1902年出版的《上海旅客和居民手册》。1912年上海出版的英文版的《上海旅游指南》里也列举了一些洋泾浜话,如把“Do you understand?”说成“Savvy?”,把“stop”说成“Man-man(慢慢)”,把“Can you tell me what this is?”说成“What thing this b’long?”,把“Can you do this for me?”说成“Can do?”。情况大致与1902年书相同,可见当时的上海洋泾浜语还是比较稳定的。

上海的洋泾浜语一时十分活跃,以至有些人把它编成顺口溜,下面一则洋泾浜歌诀选自1934年出版的《上海俗语图说》,笔者配上了英语。这则歌流传很广,笔者父亲、至今还有老年人会用带宁波口音的上海话哼上几句:“来是‘康姆(come)’去是‘谷(go)’,廿四块洋钿‘吞的福(twenty-four)’,是叫‘也司(yes)’勿叫‘拿(no)’,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 and so)’,真崭实货‘佛立谷(fully good)’,靴叫‘蒲脱(boot)’鞋叫‘靴(shoe)’,洋行买办‘江摆渡(comprador)’,小火轮叫‘司汀巴(steam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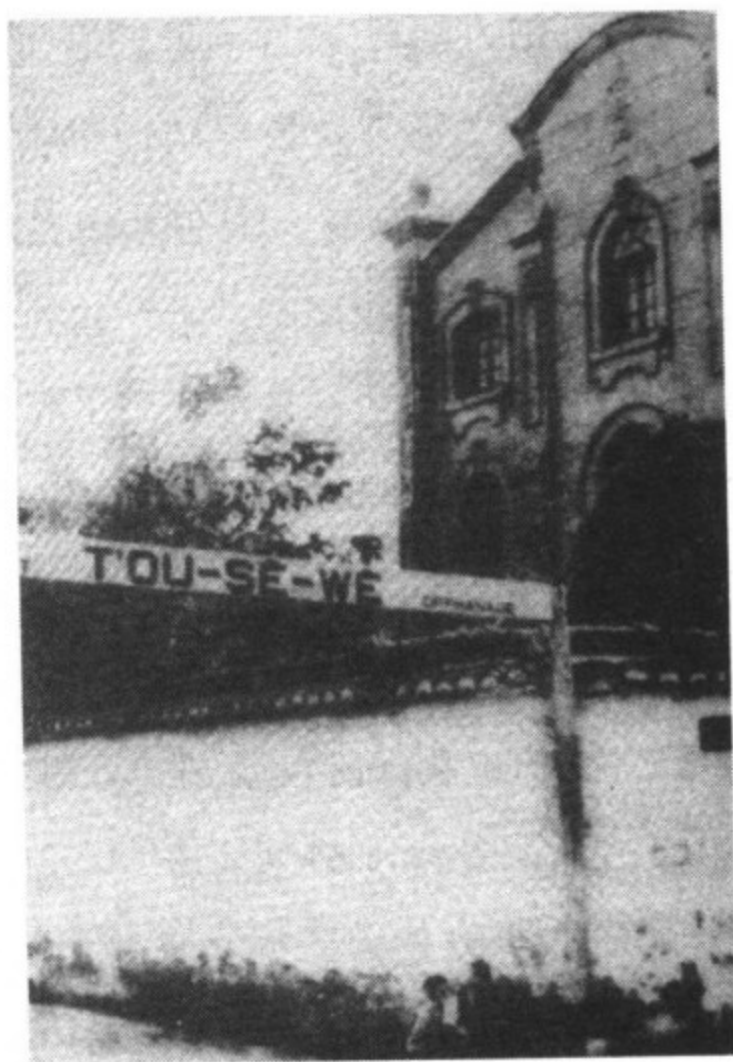
‘翘梯翘梯(tee)’请吃茶,‘雪堂雪堂(sit down)’请依坐,烘山芋叫‘扑铁秃(potato)’,东洋车子‘力克靴(rickshaw)’,打屁股叫‘班蒲曲(bamboo chop)’,混账王八‘蛋风炉(daffy low)’,‘那摩温’先生(number one)是阿大,跑街先生‘杀老夫(shroff)’,‘麦克麦克(mark)’钞票多,‘瘪的生司(pitty cents)’当票多,红头阿三‘开泼度(keep door)’,自家兄弟‘勃拉茶(brother)’,爷要‘发茶(father)’娘‘卖茶(mother)’,丈人阿伯‘发音落(father-in-law)’。”

随着上海人英语学习水平的提高,上海洋泾浜语在 20 年代以后消失。但是在洋泾浜语影响下产生的一些词语依然流传在下层群众中,有些洋泾浜色彩浓郁的外来词和俗语,一直流传至今。如把“丈夫”称“黑漆板凳(husband)”,“管门人”叫“抛脱(porter)”,把“服务生”叫“仆欧(boy)”,把“蠢人”叫“阿木林(a moron)”,把未婚妻称为“飞洋伞(fiancée)”,把扑克中的一种玩法称“沙蟹(show hand)”,把“找机会”说成“混腔势(chance)”,把贬了值、感到理亏认输叫“吃瘪(cheap)”,把“办法、窍门”说成“挖而势(ways)”,把“倾向、模样”说成“吞头势(tendency)”,把“全部”说成“搁落三姆(gross sum)”,把钞票多说成“麦克麦克(mark mark)”,身无分文说成“瘪的生司(pitty cents)”,把一文不值者称为“瘟生(one cent)”,把“一点”说成“一弥弥(a minimum)”,把“拥挤”比喻成“轧沙丁鱼(sardine)”,把“星期天”说成“生头(sunday)”,把“星期六”说成“杀脱头(saturday)”,把低等妓女称为“咸水妹(handsome maiden)”。由于洋泾浜语把“Never mind”说成“Marskee”,“笃定马思开”一语就从此而来。又如称“寿头码子”、“小刁码子”的“码子”来自“moulds”。

这些中西合璧具有海派民俗特色的词语还有:“嗲(dear)”,由亲爱的、可爱的引申为娇柔的、媚态万千的;“轧朋友”的“轧(get)”,搞到的意思,“轧朋友”为搞女人、结交异性;“拉三(lassie)”,由少女、情侣引申为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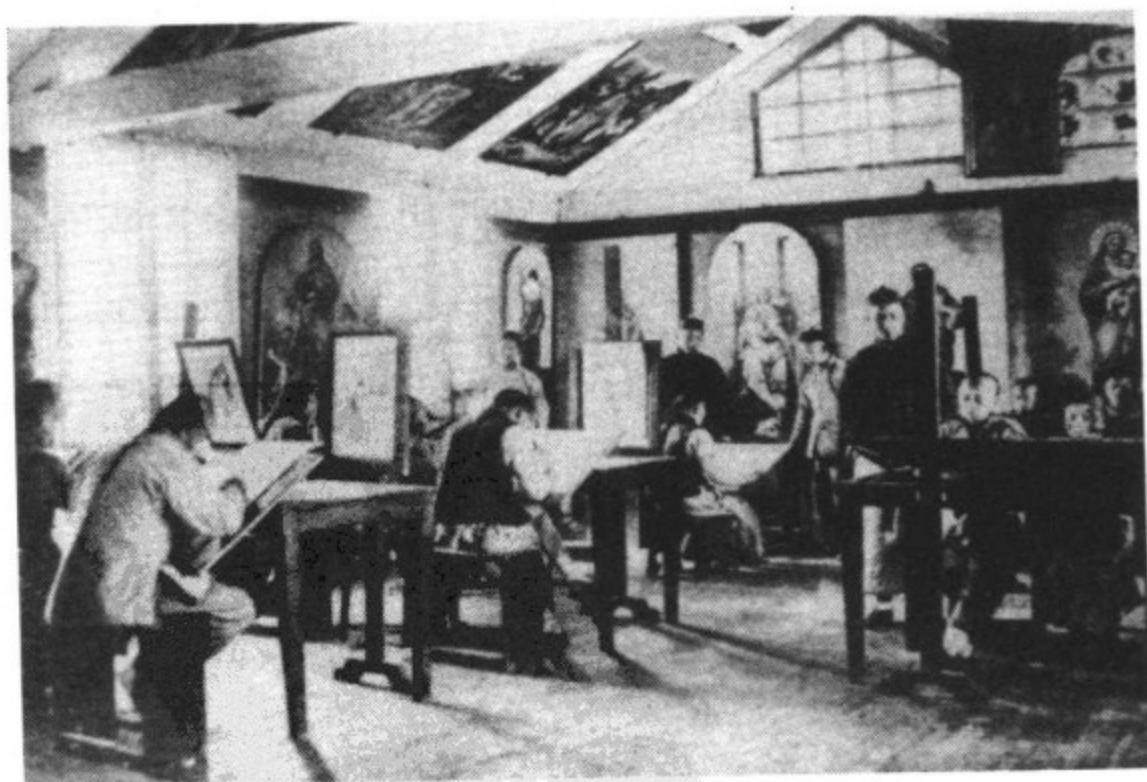
女或不检点青年女子；“大班(banker)”，由大银行家引申为大老板、富豪；“退招水(juice)”，本为流氓退还敲诈得来的油水，引申为丢脸、失面子；“克拉(colour)”，由色彩引申为时髦的、衣着光鲜的；“接领子(leads)”，接受提示或暗示；“着台型(dashing)”，由穿着很漂亮引申为出风头、自我炫耀；“噱头(shit)”，由胡说、大话、蹩脚的商品或表演，引申为引顾客上当的骗局和华而不实、哗众取宠、引人发笑的手段；“茄山河(gossip)”，聊天闲谈；“邋遢(litter)”，由杂乱、四下乱扔废物、东西引申为杂乱、凌乱和不修边幅；“蹩脚(bilge)”，由船底污水引申为肮脏的、下三滥的、劣质的；“大兴(dashy)”，由浮华的、华而不实的引申为假的、冒牌的、劣质的；“肮三(on sale)”，由二手货贱卖引申为垃圾货和人品低劣；“瘪三(begsir)”，乞丐先生，用来形容叫化子、难民、逃荒者等以及泛骂用语；“戆大(gander)”，傻瓜、呆鹅、糊涂虫；“赤佬”的“赤(cheat)”，本义是欺骗；“门槛精(monkey 精)”，由猴子精引申为聪明的、精明的。(朱大可,2001)

下等平民学到几句“洋泾浜”，也用于应付与外国人交际。如“非常感谢你(thank you very much)”说成“生发油卖来卖去”，把“让我看看(let me see)”说成“来脱米西西”。平时说些上海话语法的英语，又如把“一只船有两只眼睛，没有眼睛，如何能看见？不能看见，如何能够走？”说成“A boat has two eye. No eye, how can see. Nocan see, how can go.”(曹聚仁,1996)范敬宜(2000)先生说到过几个“洋泾浜”例子，如：外国主人回家，见玻璃窗打碎了，问仆人缘故，仆人很流利地用“洋泾浜”回答：“inside 吱吱吱，outside 喵喵喵，glass 克郎当！”洋主人一听便知是猫抓老鼠闯的祸。洋行老板让中国司机到大光明买电影票，司机空手而归，说：“Man mountain man sea, today no see, tomorrow see, tomorrow see, same see.”这些自造的临时用的“洋泾浜英语”外国人都是听得懂的，在当时看来也是有用的。



*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徐家汇土山湾,上海西方文化滥觞的摇篮

晚清上海徐家汇土山湾画馆*



反之,在上海的一些外国人则有说“洋泾浜沪语”的。这里举一例:从1907年起出版了一版又一版《上海方言教程》的上海话研究专家、曾长期任圣约翰大学校长的美国人卜舛济,有一次在大会上说:“我有两个屁放(警方),一个屁放拉美国,一个屁放拉中国。”圣约翰的学生至今还记得这句曾引起哄堂大笑的话用来打趣。原来他是用了英语的语法在说上海话,当时的上海话“比方”是说“警 pi 方 fang”的,与“屁 pi 放 fang”同音,问题出在说话语音上分语音词和连读调上和上海话实际稍有出入。

上海洋泾浜语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上海人英语水平不高的通商场合上,对上海的商业起步和国际交流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申江服务导报》在上海开埠160年时特别策划的专刊中记者阿弥(2003)说得好:“毕竟沟通才是语言的重要功能。洋泾浜英语中的一些词汇早已成了上海话的一部分,成了上海人的集体记忆。”“这便是上海人个性中极具创造性的部分。不以新事物为惧,不为窠臼所囿,如水中鱼,优游自在,顺势而动。洋泾浜英语看似拙劣,其中却可识得上海人的灵动,从此便无往不利了。”

近年来由于上海社会的开放,一些中西混合的新“洋泾浜”词语也产生了,如:“奥特曼”,意思是“落伍的人”,也戏称“外地人”,是 out man 谐音的引申。“打开水”是“打 kiss”的音译,意为“接吻”,“开司米”现作为英语 kiss me 的音译,意为“吻我”。还有些是用上海词语语法排列说的英语,与“洋泾浜语”更为接近,如:“让我 see see”,“Old three old four(老三老四)”,“give you colour to see see(给你点颜色看看)”,“我 call 依”,“long time no see(长远勿见,这个汉化英文已经被英语吸收)”,“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此外,还有“Down 脱了(学分被关,考试不及格)”,“University(由你玩四年,谐音)”。进而用阿拉伯数字的也有,如:“419(一夜情,for one night 的英语谐音读法)”,

3.72×3.72(十三点八三八四,谐音‘十三点,不三不四’)”。但是现在的上海年轻人英语水平很高,说一些上面举例的“洋泾浜话”多少带有俏皮的游戏情结。

五、第一商业都市中商务用语的蔓延

上海社会自开埠起,迅速从农业社会走出,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建设成了很成熟的商业社会,由于商业词语应用频繁,就渐渐扩大其使用范围,连民间用语中也处处渗透着商务气息。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种是日常用语用到商业方面去,赋予商务专门意义;另一种是商务词语的词义扩大为一般用语经常使用。

先讲赋予商务专门意义的日常用语。上海人最先把商业范围中的职业称作“饭碗头”,“铁饭碗”指稳定的职业,“吃饭家生”即工作的用具。又把没有经济收入叫作“吃死饭”。“有饭大家吃”,就是提倡生意一起做,有福同享。“吃进”用于不合算的交易上,如说“掰点剩货我只好吃进”,现在又能用在褒义上,如说“一看苗头好,掰点股票我豪俊吃进”。“敲碎饭碗”,指失去了职业。还有一种“橡皮饭碗”,敲来敲去敲不碎的,指的是那种甚为稳固的职业,旧时指邮政、银行等行业。上海人把不少习惯用语用于商业行为。如:“孵豆芽”指无工作或不参加工作呆在家中,坐待时机,用“卷铺盖滚蛋”表示被辞退而离职的意思,“开眼乌龟”喻见钱或见物眼开的家伙,“钱”就叫它“孔方乌龟”,“塞狗洞”喻把钱花到无用之处,“垫台脚”指行贿,找靠山,“卷地皮”指席卷财物而光,“敲竹杠”指借端要素,或故意抬高物价,“刮皮”形容占人便宜或吝啬,“拉皮条”原指从中勾引男女相识而成暧昧行为,后来还泛指介绍双方相识促成商业行为,

“劈硬柴”用指按人头平均分付账单，“拿摩温(No. 1)”指工头，“螺蛳壳里做道场”，形象描绘即使在局促的寸金之地也办厂做精密仪器的聪明才智和适者生存的能力，“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描绘商场上竞争兼并的你死我活景象。

近年来，这类词又有新的发展。人们讽刺请客送礼风，于是有“烧香”喻指行贿、“进贡”喻为利用他人而送礼两词。“撬边”指从旁帮腔助阵，怂恿买者购物的行为；“割肉”喻股价下跌而忍痛抛出，“放血”指花掉大钱。“斩一刀”指敲掉一笔大钱，受敲诈或被骗钱称“拨人家斩”。“下海”原指京戏票友下舞台唱戏，现指改变职业去经商；“跳槽”原指牲口到别的槽头吃食，后指嫖客更换妓女，现指离开原职自动改变职业；“承包”、“加盟”两词也主要用于商业活动了，如“名家加盟创作”；“立升”一词原是度量词，常用说冰箱的容量，现在可用作指资本的充足程度、实力的雄厚程度。许多词语纷纷向商业倾斜。

由于人们的商务活动频繁，又使很多原来在商业范围里使用的词语扩散到群众的生活领域，成为大众生活中的常用语。这也是大上海语词词义变化的一大特色。

“买卖”是商业行为，但上海人在日常生活里用得出神入化。如用“卖相”称人的外表，用“卖样”指炫耀出示给人看，用“吃价”称赞人的有能耐、与众不同，用“勿值铜钿个”喻人差劲无价值。形容地位轻贱、受人鄙视或毫无价值，说“一钿勿值”、“一个屁钿也勿值”。给人情通融说“买面子”或“卖人情”，会做而故意不做不说以要挟，说书说到紧要处不说称“卖关子”，行贿叫“买关节”，承认对方的长处表示服从说“买账”，使劲称“卖力”，拼命干叫“卖命”，用“拼血本”指不顾性命拼着命去干，以娇媚诱惑人称“卖俏”，摆老资格叫“卖老”，装作精通，实际弄假骗人，叫“卖野人头”。有的商务词语已经一般词语化，如“卖狗皮膏药”现指自我吹嘘，弄虚作

假,本义已不用。

“货物”也用到指人品上去。如用“好货”讥讽品质不好的人,用“宿货(因滞销而积存的货物)”讥讽或詈骂胆怯易屈服的人,用“大路货”喻很普通的人,用“推扳货”称品质差或胆小、能力低的人,用“蹩脚货”喻品质差、能力差的人,用“次货”、“次品”、“处理品”称等次低下不合格或淘汰下来的人,有时指生活上有污点的女人。“大兴”一词起源于与“正宗货”相对的“大兴货”,指的是假货冒牌货劣质品,后来也延伸到人或其他东西上去,如“伊个人勿要忒大兴噢!做出个事体样样大兴!”还有直接把对人品的特征用于类词缀“货”上,如骂“浪荡子”为“浪荡货”,骂“烂吃乱用的人”为“烂料货”,骂“粗鲁的人”为“粗货”,称十分差劲不守信用的人,称为“垃圾货”。“清水货”原来指外装很清洁的货物,后来称“不涂脂抹粉的妇女”;“好货色”,常用来反讽品质行为差的人;用“一票里货色”称一丘之貉。把“不懂”、“搞不清”或“没眼光”称作“勿识货”。

算账也翻新扩用到日常生活上。如“出账”、“进账”用于广义的支出和收获,“倒扳账”用指事情结束后又重新翻出来,“翻老账”是把过去的事情抖搂出来,“勿关账”就是不管的意思。对人与事不服或不给面子,常说“勿买依个账!”把事情做糟了,理不清头绪,称“一笔糊涂账”。还有说说一段时间做了些什么,叫“报报流水账”,骂人时说,真是“混账”、“混账王八蛋”。一事当头,就要讲究“合算勿合算”,算账的观念人人皆备。某人非常会为自己利益着想,说他“算盘珠拨了勿要忒响噢”、“算盘珠打得滴笃转”,或者说他会“打小算盘”。有的人是“一分洋钿拗两半”,说它节约;有的人是“戆进勿戆出”,说它“门槛精”。

上海人的生活有时也像在做生意,“叫人勿折本,舌头打个滚。”把“不折本”这个商业行为用于讲礼貌会有好处。上海人把看不入眼不像话的行为都斥责为“勿是生意经”,表达坚决不答应或不妙了的意思,也叫“勿

是生意经”。抢事干,叫“抢生意”,推介,也叫“兜生意”,足见“生意”在上海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用“放伊一码”表示饶他这一遭,在江湖上用“放生意”指设圈套,用“耳朵打八折”怪罪对方没听清自己的话,用“闷声勿响大发财”比喻因沉默而得利,用“一分行情一分货”称货真价实,不差分毫。以生意买卖作话题的,还有“买空包”指受骗上当,“掂斤两”指试探估计对方人或事的力量或重要作用,“讲斤头”是从买卖用语比喻而来的,一斤一斤死扣地谈,现移用作日常生活中的各不相让地谈条件,“有还价”原指可以还价钱,现指有商量余地或有条件需议。当场给以发难或回击,称“现开销”。以交易票据为议题的,如“打回票”,现用于一般的人或东西的退回的意思,“打包票”原是写下保证成功的单据,现就指保证,包在自己身上的意思。“空头支票”、“远期支票”都可指不能兑现的虚空允诺。“三下五去二”是打算盘的口诀,喻做事干脆利索,“三一三十一”用作一分作三的意思。“肮三(源自 on sale)”原是大减价的意思,现在用作令人失望不快或不正派。“勿管三七廿一”,其词源出自赌场,骰子六面共 21 点,与孤注一掷是同出一源的,现在指不顾一切的意思。“拨依一只五分头”更是用形象作比喻,实是“打你一个耳光”的意思。

“洋盘”一词在 20 年代诞生于上海商场上,从指商品行情的“盘子”(19 世纪刚开埠时已产生此词,见于 1862 年麦高温书 23 页)开始引申而来,“盘子”来自计算价钱的“算盘”,后来开店称“开盘”,打烊就“收盘”,清理存货就说“盘点”。后来“盘”字就变成“价额”的意思,大减价称“大放盘”,此词现今也已复活,并又有“爱心大放送”、“旺情大派送”的引申。现在“洋盘”已广指不内行、不识货、对事物缺乏经验的人,常指在都市里遇事上当又不觉察的人;它还可作为形容词,称不内行、不识事。在股市恢复重新活跃起来的 90 年代以后,许多股市上的专用词语很快都扩用到生活中来,如“垃圾股”、“绩优股”、“原始股”原来都指各种不同股票,现在已

分别引申到不理想、拙劣的恋爱对象或爱人,成功男士、发展有潜力的恋爱对象或爱人,从未谈过恋爱的纯情男孩。“托盘”引申为“危急关头朋友相助”,“套牢”原用于股价下跌资金被困,现可活用作结婚后想离婚不成,或指感情陷入爱河,以至引申作被某事情牵绊,或用作“打住”的意思。“抛脱”原指抛掉股票,现用作甩掉男友或女友。“解套”扩指解除婚姻关系,再扩指摆脱困境。“踏空”原用于投资失败,现又用作婚后感情不和。

许多商业行为被赋予日常生活其他含义。如“开码头”指出门去外地闯荡,“闯市面”指闯荡打开局面,“上台面”指很体面,“照牌头”喻依靠别人的力量做靠山办事,“塌便宜”、“揩油”原指买卖中讨便宜或占便宜,后指轻佻地打人或抚摸女人某些地方的侮辱行为。“摆摊头”原是小贩设摊卖货,现引申为东放一些,西放一些。以钱财为对象的,如“捞外快”,本义指捞取额外的收入,现引申为捞到意外的好处;“讲价钱”原指做买卖时的讨价还价,现喻指接受任务时提出要求的条件和回报。凡一事要新开张新操作,上海人称“新开豆腐店”。“生活”在吴语里有一义是指“工作”,即“活儿”,但“吃生活”在上海话里引申作“挨打”;“真生活”从“真吃重”和“真实功夫”变成“真棘手”的意思,又称“真叫生活势劲!”“价钱”用于“心理”称“心理价位”,不仅指你买货物时的价格承受度,也扩用指对许多事情的心理评价了。“资产重组”喻指再婚,“资产评估”又喻指谈恋爱,“中外合资”指称混血儿。“地方粮票”是在特殊年代使用的一种证券,上海知识界把它引申到享受限于某范围中承认的职称及其有关的利益中去。女子出嫁,一切依赖男方,即把此男子称为“长期饭票”。商店要像模像样,就要“装门面”,后来“装门面”就用来指人摆阔摆样子;某人思想不合时尚,就说他是“勿领市面”。

90年代以后,上海商业大发展,社会活力增强,思维更趋活跃,有些词语出现了连续蔓延式的扩义运用。群众用“移就”的修辞方法,渐渐形

成了不少短语格式,在日常生活中,有把商务词语翻新用到各个地方去,如感情“赤字”,“热门”专业,“亏空”精力,“损耗”元气,“消耗”脑力,智力“消费”,“花费”精神,“支出”感情“本钱”,“支出”时间,“支出”精神、情感,“付”了不少“学费”,“欠”了“感情债”、“养育债”,欠了“孽债”,“储蓄”感情,在她身上“投”了点“资”,“搞”了点“基本建设”,在争权夺利上“讨价还价”,用漂亮的“牌照”,要名大学的“牌子”,打红色“招牌”等等。另一方面,由于上海商业的繁荣,催使一些原本用于其他场合的词语带上生意场上的气息。如“敲定”原出自男女谈恋爱,“拍板”出自政治会议的集体决定,现在都常见用于商业谈判;“白板”原是麻将中的一张牌,今用作没做成任何生意;“拗断”指朋友之间的绝交,现在也用在商务关系上的断绝关系。反之,又把“清仓”、“割肉”等词用进股市。此外,由于一时间里新词新语纷纷出笼,商业用词和生活用语也大杂交,如“资金短路”、“名人包装”、“离婚解套”、“联手炒作”、“盘活无形资产”、“进行功能开发”、“玩价格魔方”、“开发感情资源”、“抓菜篮子工程”、“再就业工程”、“夕阳工程”,等等,旧词新用,“瞎七搭八”,新意层出不穷,这充分反映社会思想的活跃。

商业社会真是无底洞,推来变去,而词语在这方面即时反映其存在的真面目。上海是一座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中国大陆其他任何一个城市,从民间使用的层出不穷的商业语词里,我们也能寻觅到这种商业繁荣的深刻痕迹。

六、折射海派奇思遐想的语汇

上海话语汇之所以丰富多彩,它经历了一个相当完善的过程。上面

说到过,上海话的系统生活语汇最早是从历史悠久的松江方言传承而来的,丰富细致,为人们基本生活用词打下了基础,至近代,在融会各地方言的杂交优势中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优化。许多打底的最基本的单音节词随着语音的简化变成了双音节词,而双音节化的同时,则使词语的分工精细化,大大扩充了词汇的信息含量。晚清以来文人在上海的集聚,随着大上海的文化水准迅速飙升,一跃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上海话产生了大量的文化词,并实现了与书面语的交融,书面语字面明白的构词形式(如:周报、名片、书市、场景)在上海话新词增长中所占比率大幅度提高。更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上海这个社会的大都市化,海纳百川,拿来主义,兼收并蓄,社会实现了多元文化造成的多样化生态,形成了强大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是一种中外文化相撞、建立在商业化的经济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新文化。伴随着发达的流动的商业社会的形成,都市多元化社会的形成,折射海派奇思遐想的语词如雨后春笋般的产生出来,都市市民各阶层、各职业的人群都参与了新词语的创造。上海话词汇表现新事物时,除了许多用字面意义明显的语素组成外,还有大量的则包含着更多的语义蕴含量以及更具生动概括的市井流行语、习惯用语而在市民口头产生传播出来。看上海话语汇的活跃发达,最明显的表现是:通过比喻、借代、比拟、通感、拈连、移就、双关、仿拟、夸张等修辞方法,和通过语义空心化扩用或文字缩略后定型的习惯用语大量涌现。这类语词,用概括的形式表达了丰富和复杂的概念,富于表现力,是词语形成的更高一个层次。

原来上海话浸润了江南发达的经济文化,在生活词汇中已有一批用比喻义、借代义构成的词语,如“鸡毛菜、珍珠米、荷包蛋、粽子糖、瓦片饼、蜡烛包、田螺眼、海瓜子、兰花节头、牛踏扁(一种大而扁的菜豆)、叫哥哥(蛭蛭)、大肚皮(怀孕)、鸳鸯(东西不相同而配成一对)、贴肉(十分亲热)、磨光石卵子(圆滑)”等。

19世纪末直至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话新词产生和活跃的第一个高潮时期。那时,随着社会生活充满活力,一大批有生命力的新词语应运而生,并迅速地传播开来。比如:杖击屁股,曰“吃毛竹笋附肉”;用拳头殴人,曰“吃皮榔头”;张开手指打耳光,曰“吃五支雪茄烟”;被洋人足踢,曰“吃外国火腿”;用冷水浇头,曰“吃大菜”;喝倒彩,曰“开荷兰水”;眉目传情,曰“打无线电”、“拍电报”;以伪劣品求高价,或骗没头脑的人,曰“卖野人头”;装腔作势,炫耀,曰“卖样三千”;拆穿秘密,曰“踏穿镬盖”;露馅,曰“拆穿西洋镜”;称衣服不贴身者为“跌散铺盖”;称卧被絮中者为“面煎蟹”;称尚未结婚而上岳家之门者为“毛脚女婿”。又对各种职事者加以特称,如称印度巡捕为“红头阿三”,称米商为“米虫”,称棉业商贩为“花虫”,称拐骗妇女儿童者为“白蚂蚁”,称陪茶女为“玻璃杯”,称游民临时翻译为“露天通事”。这类词都不乏造词者丰富的想象力。

后来,这类词语不断在生活中由各个阶层创造出来,到现在还在使用的有:黄牛(掙客)、黄鱼脑子(记性不好、不开窍的脑袋)、黄牛肩胛(卸肩不负责)、芋艿头(像芋艿样头发稀疏的头)、和尚头、板刷头、电灯泡(光头)、荷包蛋(秃顶)、薄脆(一种饼)、花瓶(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办公处摆样者)、饭碗头(职业)、照会(面貌)、空心汤团(不能兑现的许诺)、橡皮饭碗(不会失业的职业)、吃萝卜干(手指关节被击扭伤)、背米(赚钱)、皮拆天(贪玩)、刮皮(刮小利,得便宜)、咬耳朵(凑近耳边说秘密)、拆烂污(做事不负责任)、打回票(退回)、吃鸭蛋(得零分)、吃豆腐(挑逗、猥亵)、吃野食(偷汉)、打野鸡(嫖娼)、隔枪篱(夹在中间受挫)、做揩台布(为人包容)、新开豆腐店(新开张)、揪头割耳朵(硬逼)、打杀夹墙里(受人诘责,抱不平之冤)、老爷(质差,碰不得)、奶油(可爱,讨人欢喜)。

利用谐音或和韵也能使语言生动活泼,如:嘲讽健忘者,称他“王伯伯”;故意说反话触人的霉头,称“丑煤球”;讨厌人话多,说“烦得像饭泡

粥”；不喜欢对方胡搅蛮缠，就说“依来搅啥个百叶结！”讥刺喜欢炫耀的人则用顺口溜来唱：“希奇勿煞，卖样勿煞，烂泥菩萨，一脚踢煞。”

海派的奇思遐想、领导标新使上海话中用此种手法构成的词语比比皆是，比起其他方言来，突显优势。这类词语产生越多，标志这个城市的思想越活跃，多元文化越发达，都市化程度越高。

海派特点还表现在民间用语的赶时髦，崇尚新发挥，生活用语不断吐故纳新。自从上海很快用了“电车”以后，当时的电车都是有轨的，接着上海人又把额上的皱纹喻称为“电车路”，后又把步行称作“十一路电车”，可见其造词之快和思想之活泼，这两个词语沿用至今。上海商业发展有了交易所，每天要“开盘”和“收盘”，这个“盘”字，原出于算账的“算盘”（汪仲贤，1935，6页），因为那时，旧式小商店开了排门后店主摇摇算盘以示“开盘”，商店清点货物也常说“盘点”货色，于是定价格就成了定“盘子”，大减价就说“大放盘”，一下子“盘”的词族很快形成了。暗里高抬物价，就说“暗盘”。听到口音不同的“客边人（外地人）”，就放“客盘”。对付外国人，便开出“洋人加倍”的“洋盘”来了。后来，不仅是指外国人，对那些花冤枉钱的人也冠之以“洋盘”的雅称，于是“洋盘”就成了“外行不识货”（形容词）和“遇事上当又不察觉的人”（名词）的代称，与乡下来的“阿木林”、“阿土生”义同。由“算盘”到“洋盘”的词义发展，可以看出上海人思路的开阔，造词的灵活性，他们常常不拘一格组词，随其新意比喻引申，约定俗成得快，传播也快。有的时髦的流行语一旦出现，上海人一般不采取保守的抵制态度，而是由青少年带头，以创造和附新为荣，跟着用新弃旧，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此外，滑稽、说唱等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俗文艺形式也随时会引进新名词和新语言形式，使生动活泼的口语词汇得到传播。由此，一大批海派语词产生并流行起来，如：窍槛（窍门）、路角（门路、旁道儿）、路道（原因、门路、办法）、当势（时机）、头子（交际能力）、上路（够交情，合

情理)、大路(做事大方)、落桥(故意为难作梗)、轧头(碴儿)、吃相(争怒时的脸色和架势)、落场势(下场、下台)、领盆(折服)、台型(面子,时髦)、花头(花样,不正当的苗头)、花巧(花招,不正当关系的苗头)、噱头(滑稽,引人发笑的话头、样子)、挖儿司(办法,窍门,名堂,噱头)、肮三(令人失望,弄僵,不正派)、派头(气派,架势)、吃价(有名望,过硬)、着底(最差,13点)、乐开(说话做事在理上,公正大方豁达)、杀搏(健壮,厉害)、厥倒(吃惊于意外之事)、吃酸(棘手,搞僵而难堪、懊恼)、揩油(占便宜)、老交(深交)、买账(认输,看在情分上)、候进(正可得逞)、外快(意外或份外所得,意料外的成功)、豁边(搞坏,露馅;出格,越轨)、放一码(网开一面,放宽),等等。海派的传统在上海是根深蒂固的,因此那些表现海派特色的语词生命力强,不易传失。

上海人利用数字也构成了许多具有夸张色彩的成语,表示“多”和“泛”的虚义,十分利落,比如“一天世界(到处都是)、一刮两响(十分干脆)、三日两头(经常)、三等四样(几种样子)、瞎三话四(胡说)、五颜六色(色彩丰富)、五虚六肿(各处肿得厉害)、七歪八牵(不整齐,不端正)、七支八搭(乱搭腔,胡扯)、九腔十八调(形形色色的调门)”,一个人被搞得昏天糊涂时说,现在已是:“五荤六素(胡里胡涂,晕头转向),七丁八倒(颠三倒四,不整齐),七支八搭(搞不清楚,乱答腔),十七八搭、搞七廿三(搞糊涂了,胡缠)”,弄得“投五投六(冒冒失失,没有头绪),六神无主(心慌意乱,没主意),半死半活,死蟹一只(不能动弹,一筹莫展无法挽回)”了!还有形容主观上的时间很长,曰“半半六十日”;形容遥遥无期,曰“开年礼拜九”。

极言圆,有“的粒滚圆”;极言脆,曰“刮辣松脆”;极言绿,说“碧绿生青”;极言烫,称“热炙潜烫”;极言倒霉,可以说“霉头触到印度国(20年代说)/哈尔滨(50年代以后说)/西伯利亚(90年代以后说)”或说“倒一百廿

四个霉”了；极言不顺利，可以说“碰着七十二个大头鬼”；极言变化之速，说“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极言精明之甚，曰“门槛精到九十六”；极言侥幸之至，曰“额角头碰着天花板”，这已经是在意识流中的“瞎七搭八”了。

有些词语，从字面上看，会与实际意义相差颇远，从中可见构词中的自由联想之微妙之幽默。如：“想勿通”是出乎人意料，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意思：“伊会去告小王要好，想勿通！”“笑勿动”是特别高兴的意思：“阿拉能够请到依介好个阿姨，真是笑也笑勿动！”“勿要忒开心噢”是太高兴了的意思，同如“不亦乐乎”。“一脚踢到十六铺”是恨之而发，踢得老远，有踢出上海之嫌，滚蛋之意，因为十六铺是外来人口入沪的码头。“贯依三条横马路”却是比你好的意思：“依勿要看伊一声勿响，伊个本事一显露，贯依三条横马路！”“勿要介可爱好哦”，是说“别装模作样啦”的意思。也有的词语，褒义贬义分用，各得其所。如：“百得胶”，可以指怎么甩也甩不掉的人：“算我霉头触到西伯利亚，碰着一个百得胶！”有时是针对甩不掉的女友而言的；此词又可指交际广泛：“伊是路道粗，百得胶。”这些语词在当今青年中使用比较活跃。

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上海青少年用词中出现了新流行语的高潮，涌现了大量新海派词语。这些词语中联想自由、幽默形象，字里行间散发着21世纪新新人类的童话心理、幽默情调和猎奇趣味。比如说用“四方会谈”指打牌，“跟包”，指的是跟在后面拎包的意思，“神童”指的是“神经病儿童”的意思。这是用现代最常见的缩略词方式巧妙幽默的变通，构成戏谑语。称又痴又烦又搞的女子，即很“作”的女子叫“粢饭糕”，“本草纲目”则是嘲笑某人又笨又吵又蠢又木。用“小白”称白痴。“洋山芋吃多了”指笨，因为“洋山芋”即“土豆”，与“土头”谐音。“少女系男生”是揶揄从大学“少女系”里培养出来的男生，幽默地指那些长得比较女性化的男生。又从“淑女”那儿仿拟出一个仿词“淑男”与“辣妹”相对：“嗲得来，斯

文得来,掰两个是淑男。”“校草”就是校内最漂亮的男生了。用“根号3”指称那些身高欠高的男生,只有1.73米高,在现代上海女孩眼界里还是不够格。再小一点干脆称他“袖珍男”:“伊是个袖珍男,老可爱!”用“排骨美人”、“排骨美女”称很瘦的漂亮女性;瘦得过分的女人,称之为“白骨精”,“白骨精”又是“白领、骨干、精英”的缩略合称。用“月光美少女”指称每个月在月头就潇洒地把零用钱花光的女孩子。这是“超前消费”,与以前的“脱底棺材”是根本不同的。这一类人统称“月光族”。“月抛型”原来是一种隐形眼镜,每月换掉一副,现在喻指每月更换一次男朋友的人。“先上车后买票”,喻未婚先孕。“绝代佳人”趣指结婚不要小孩的自由女性。“绝代”是用语义双关法,又指无生育的女性。时尚、对社会对自己要求均高的女子,称为“高维修女子”;对那些年龄较大的女子,则称为“资深美女”、“成熟美女”。对公司经理级以上人物,有车有房,懂得享受生活的那种人,称之为“高级灰”。

谑语趣言所特有的轻松自由的语义建构方式,使比喻型的意象从深层与“意”契合,是都市语言的灵动之处。

现代上海话中,幽默诙谐的词语也真是多:路边食摊称之“黑暗料理”;无证食摊的马路,称为“黑暗料理街”。“依死机啦!”是对某个处于发呆状态人的质疑;“兼容机”则用来喻指谈三角恋的人。承“做爱”之后,又派生出“造人”一词,即生孩子。“依长得老有创意”是对长得其实很难看的人要说又不能明说的戏语;相貌难看婉言“长得影响市容”、“长得对勿起人民”。“前公尽弃”,利用“老公”的“公”与“功”的谐音,趣指离过很多次婚的女人,并且“祝依再结(接)再离(厉)”。“养眼”指受用或形容女子漂亮看了舒服。“惹火”是好漂亮的意思,主要形容女子的身段。用“高中四年级”称呼“高复班”,又叫“高四3班”,因为“高复班”有语文、数学、外语三个班。“香蕉人”指称黄皮白心的华裔后代。“缺钙”指笨,“缺血”

指缺钱花，“爱神”指爱发神经病。“透视装”指布料轻薄几近透露肉体的衣装，“通心粉”指虚有其表没有内涵的人。“鬼摸大蒜头”，指乱来的，无厘头。“接了张罚款单”指收到了一张婚宴请柬。过去说“买块豆腐撞杀”，形容人之软弱无能，不如死了吧，遇到某不顺利的事，受气或受挫后常常这样自嘲或揶揄，现在又说“买根线粉吊杀”。此外还有排比形式的说法：“用面条上吊，用豆腐砸头，用棉线割脉，用维生素 E 做毒药，用碰碰车撞山，用降落伞跳崖”这些都是去自杀的新方法，十足戏言。

上海人变得越来越幽默和风趣了。

七、市民社会中的惯用语成语大量涌现

上海的市民社会渐渐形成之后，反映市民生活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迅速崛起，反映新兴市民阶层的新鲜用语不断涌现。轻松幽默，不避俚俗的上海话惯用语独树一帜，表现了国际大都会的生活。从 20 世纪初始，这种海派风味的语汇随着上海社会和经济起飞和迅速发展而大量兴起，成为吴方言中之最，大量传播到上海周围的大城市，以至进入普通话。

惯用语，是结构比较固定、意义有所引申的一种固定短语。这些十分形象的惯用语使得有上海特色的思想和行为取得了语言形式上的习用性和定型性，人们通过这些语词可以窥见当时快速成长中的上海的社会风貌和良莠不齐、雅俗并举的风土人情。到 21 世纪初这类语词产生依然十分活跃。这些惯用语多数和典型的是三字格形式的，笔者收集到的三字格的惯用语有 600 多个。

上世纪头 20 年是 20 世纪中上海城区发展和经济发展最快、思想异常活跃的年代，民间新词和惯用语也十分活跃地产生，如：“一只袜、一塌

糊涂、一千三百零九、大舞台对过、小白脸、小老公、小热昏、三只手、三点水、三壶客人、火车龙头、五分头、文旦壳子、毛脚女婿、丹阳客人、打秋风、打电报(男女眉目传情)、打野鸡、出彩、出风头、出码头、仙人跳、皮榔头、包打听、外国火腿、老枪、老蟹、老李相、老蔬菜、吃讲茶、吃豆腐、吃大菜、吃牌头、吃死蟹、曲辫子、坍台、吞土皮、李相人、扳差头、炒小货、那摩温、垃圾马车、拆份头、拆姘头、拆搭子、拆壁脚、阿三、阿木林、阿洋哥、两脚车、拉皮条、来路货、放龙、放白鸽、放红老虫、洋盘、洋行小鬼、香烟钿、看冷铺、背娘舅、活络门门、钉棚、钉梢、盎三、茶会、时髦、郎德三、捐牌头、捐轧车、掉包、淌牌、恣浴、做花头、脱帽子、寻开心、寻野食、扫青码子、崇明芦粟、混账黄浦滩、开天窗、开房间、脚碰脚、发松、硬黄、喔尔蛮、搭浆、搭架子、搭讪头、碰和、照会、跳老虫、敲竹杠、铜生丝、对百筋、寿头码子、撒洋烂污、乐胃、捞锡箔灰、头挑、璧的、烧路头、豁边、讲斤头、翻梢、蹩脚、蟹脚、礼拜九、苏空头、烂污三鲜汤、听壁脚、缠夹二先生、瘪三、戆大、戆皮、洋腔、拔苗头、无线电报、霉头触到印度国”，等等。(摘自严芙孙《上海俗语大辞典》，1924年出版。)

这类流行词语到30年代颇具规模，更为活跃。1935年出版的汪仲贤著《上海俗语图说》集中反映了上海都市生活中下层市民的流行俗语。除了上面列举的外，还有：“白蚂蚁、大放盘、大菜盆子、走脚路、花瓶、孵豆芽、乡下人勿识开路神、剥猪猡、掉枪花、炒小货、揩油、老头子、抬老三、抛顶官、告地状、斗狠劲、扎面子、吃白食、讨冷债面孔、倒堂龙套、排三和土、镶边客人、么六夜饭、兜得转、摆堆老、电灯泡、放鹞子、劈把、白相人嫂嫂、立角子、十三块六角、捐钢叉、人家人、搭壳子、三光麻子、打图书、鬼迷张天师、戳壁脚、顶山头、过期票子、坐房间、吃雪茄烟、开条斧、落门落槛、装笋头、叫花子吃死蟹、地鳖虫、放野火、老爷、瘪的生司、混俏、吃排头、黑漆板凳、松香架子、空心大老官、搭架子、板板六十四、翻门槛、嘴硬骨头酥、

死人额角头、黑吃黑、睏水门汀、捞外快、跑生意、打回票、捧角、朝阳麻子、翻戏、蹩脚生、吃斗、活招牌、吹横箫、吃空心汤团、抖乱、叉鱼头、暴出头、大亨、出后门、约约乎皮老虎、小东门十六铺、拆台脚、开倒车、电车路、蛙割卵子筋、识相、酥桃子、崇明人阿爹、跑弄堂、把脉、大好老、白脚花狸猫、玉皇大帝、脱底棺材、卖羊三千、拆空老寿星、吃瘪、吊人中、小刁码子、尖头把戏、强出头、定头货、双料头货色、发吼狮、勿领盆、摆拆字摊、跟屁头、一对大拉酥、鸭脚手、泰山、辣底蹦”，等等。

下面举一些现在常用的例子：出风头（显耀自己；有光彩）、牵头皮（提起或数落人家一个旧过失或把柄）、收骨头（对人严加管束，不得松松垮垮）、戳壁脚（背后挑拨，说人坏话）、敲竹杠（敲诈）、淘浆糊（敷衍塞责、混）、望野眼（眼望别处有趣的看）、咬耳朵（凑近耳边说秘密）、拆烂污（做事不负责任）、吃鸭蛋（得零分）、敲木鱼（再三告诫）、吃汤团（舞女一夜无客）、吃豆腐（挑逗、猥亵）、起花头（耍花招，另出新点子）、轧苗头（见机行事）、搭讪头（为与生人接近而找话拉）、避风头（避过人为灾祸或其最激烈的阶段）、装樨头（硬加把柄）、煞风景（妨碍兴致，使人扫兴）、吃白食（不掏钱吃喝，欺诈财物）、轧一脚（插一手）、捞外快（捞取以外的好处）、搭手脚（插进来增添麻烦）、调枪花（善于玩弄言词变换手法）、顶山头（碰钉子，被顶住）、摆噱头（耍花招，逗引人）、翻门槛（变换各种窍门）、吃排头（挨批）、买面子（讲情面）、绷场面（勉强支撑场面）、装门面（摆阔装样子）、瞎和调（乱附和）、寻开心（闹着玩，挑逗）、隍牌头（凭借靠山，依仗金钱）、三脚猫（会而不精通某事或这样的人）、百有份（对任何事情都有份、爱打听、去拉关系、插一手的人）、软脚蟹（喻胆小、意志薄弱的人）、软耳朵（没主见听别人话即改主意者）、脚碰脚（差不离）、搞七廿三（乱搞一气，胡缠）、勒杀吊死（吝啬）、牵丝扳藤（拖拖拉拉）、一手一脚（一人包下，善始善终，中途不停）、一点一滴（认真不越轨）、有心有想（有耐心）、熟门熟路（得心应手，门

路很熟)、落门落槛(内行,恰到好处)、缩头乌龟(喻遇事退缩在后、无能的人)、卖样三千(装腔作势,炫耀)、卖野人头(哄骗)、烧夹生饭(事情做得不上不下,搞糟了)、炒冷饭头(重复)、做揩台布(为人包容)、新开豆腐店(新开张)、像煞有介事(装作真有其事,摆足架子)、小鬼跌金刚(弱者战胜强者)、开年礼拜九(遥遥无期)、悬空八只脚(离得很远)、吃空心汤团(被不能兑现的允诺所骗)、老虎头上拍苍蝇(胆大包天)、勿识相要吃辣货酱(警告对方如不知好歹,就要给颜色看),等等。其中,字数六字以上,通常又称作谚语。这些从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出发而创造的固定短语抓住特征的描写惟妙惟肖,传达的信息言简意赅,它们在海派文化的开放的思想中形成,上海话因此成为一个对都市文化非常有表现力的方言。

上海话中有的惯用语一个就包含着相当多的社会信息。如:“吃牌头”(或写“吃排头”)是“受人批评或责骂”的意思。其中“牌头”一词就很有讲究。当时在上海要想混迹“做市面”,走捷径是找个“牌头”即靠山,靠在他身上。凭借靠山,依仗金钱,这叫“靠牌头”又叫“隍牌头”;欲兜揽主顾,叫“拉牌头”;依靠别人的力量去办事,又叫“照牌头”。拉出有名有势力的人来支撑自己,叫“捐牌头”……在上海话里,“像煞有介事”的一条意义又叫“搭架子”,即“摆架子”。“架子”也有多种多样,有若古董精品的“红木架子”,有不愿借钱不想求禄,搭“穷架子”;内里虚空硬撑着场面的,叫搭“空架子”;不应搭架子的场合乱搭架子的,叫搭“臭架子”;架子上再搭架子,对人毫无礼貌,叫搭“辣架子”;并无资本,一带就倒的虚架子也搭,叫搭“豆腐架子”;外表富丽,一点火即化为乌有的架子,叫“松香架子”了。(汪仲贤 1935, 246 页)

又比如产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 50 年代至 70 年代消沉了一时,如今又广泛流行的“淘浆糊”一语,也是一个十分活跃、语义信息容量较宽泛的惯用语。1935 年汪仲贤写《上海俗语图说》时,在第 108 篇“一塌糊涂”



* 1935 年汪仲贤《上海俗语图说》中俗语“戳壁脚”的插画

* 1935 年汪仲贤《上海俗语图说》中俗语“地鳖虫”的插画



中就提到了那个年代也有“浆糊”在“淘”。他说：“我们的一塌糊涂太多了，就是请了会计师公会里的全体会员来清理，也算不清这千万票的糊涂帐，那时只得想个变通办法，把盈千累万淘过的‘浆糊竹罐’，一齐埋藏在坟墓里，这也有一句俗语，就叫做‘烂厠’。”可见“淘浆糊”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就流行于商业社会中。不过方言口语词首见于书面也不等于就是它的民间流传开头。“淘浆糊”一词，从字面上看，像是有一个人拿了一根棍子在一个浆糊桶里把黏稠的浆糊搅啊搅的，搅得一塌糊涂。把它比喻和形容那种不认真的态度，形象而传神。“我今朝淘了一日个浆糊！”是指做事马马虎虎、敷衍塞责，混了一天；“依认真来死做啥？我看依只要淘淘浆糊就可以对付过去了。”这是指遇事只求蒙混过关；“回答勿出，淘浆糊会哦？”这是叫人不分青红皂白、不懂装懂、搅和一口气应付正事；“伊末，只会淘浆糊，依可以相信伊个闲话个啊？”这是指有的人只会胡说一气、插科打诨，靠不住的；“大家侬辣排练，我也轧辣当中淘浆糊。”这是指凑热闹、滥竽充数。“淘浆糊”一词，有人说相当于北方话的“和稀泥”，但这只能说是对应其一义；有人说如南方话的“拆烂污”，可淘浆糊的人要比“拆烂污”的人有能耐。“淘浆糊”不但用于贬义，有时还可用作褒义和中性义，如沟通关系、调和矛盾也是一种“淘浆糊”，可以说：“我辣伊拉两家头当中淘浆糊”；客气的时候表示谦虚、出力不多，也可说：“我是弄勿来个，只不过淘淘浆糊呀。”问人在何处高就，也可说“依辣啥地方淘浆糊啊？”大家在很高兴要去做某事时，就说：“淘浆糊去！”似乎很潇洒从容；如要表示宽容随意，对人说：“依就去做好了，淘淘浆糊也可以个，何必太认真。”“伊浆糊淘得好，路路通！”则是对善于处事处理人际关系人的褒词。更有一种“淘浆糊”是在双方中求同存异，说“今朝订货会上，要看依淘得来浆糊哦了！”“淘浆糊”居然还是一种本事，现代社会需要一种妥协合作，协调关系，才能前进。

其实,在一个开放宽松的气氛里,事物本不是非好即坏的。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使有的常用词语也在一个基本意义上繁衍出多项相关的引申意义。在上海的民间社会里,就有好多词语可以褒贬一体。比如“避风头”一词,用作贬义褒义都可以。如在“文革”批斗高潮中,有人逃到乡下隐藏了起来,后来回忆当时情景说:“我躲记风头总算避过去了!”这里用于褒义;“警察就要上门,伊还想避得过风头!”这里用于贬义。这个词语可能原来是一个贬义词,1924年出版的吴汉痴《切口大词典》上记上海青帮的“切口”有“避风头”一词,意“逃官司也”(当时是否仅是青帮在用也未必);今词义空心化留其主要义素,排除了“逃官司”的特定含义,扩大使用范围至全民通用了,表示“逃避人为灾祸的风口浪尖”的意思(与化学行业语“腐蚀”扩用于“腐蚀青少年”相似)。这类词语由于其基本义素的概括性和生动性,流传开来,又由于词语经扩义和外壳化的脱俗脱黑过程,经过大众的改造而广泛使用,从而成为现今常见的普通通用惯用语,如“小白脸、跳槽、下海、摆饭局、照排头、避风头、讲斤头、装樨头、戳壁脚、捞外快”等。

另有一些词是从词义本身的延伸派生出去形成新的意义。如惯用语“帮帮忙”,表义颇为宽泛,正说反说都可以。它从“帮一下忙”为起点,后来引申到“请人让一让”意思,如:“帮帮忙,开水来了!”再引申到“帮我个忙吧,别为难我了,别添麻烦了”和“多关照,给我点面子”的意思,如:“朋友帮帮忙,勿要拆我台脚了!”这就是叫你别帮倒忙,省点力气不要去帮忙、添乱。后来连“不要瞎说”和“对别人表示不满或提出异议”都可用“帮帮忙”说,如“帮帮忙噢,依勿要当仔我钞票交关!”“帮帮忙,依再去学伊几年!”讥“对方不领行情,搞错了”也说:“帮帮忙,依睇眼都勿懂,还要去轧啥个闹猛!”再虚化到表示不相信“算了吧”,如:“有依讲得介好味,帮帮忙噢!”

上海话里,这类的词语还有不少。如:“谢谢”一般认为是表示感激之情,如接受馈赠表示感谢。但是上海人还将此词用作“辞不受也”之意。如小张要来送礼,我怕引起麻烦,就说“谢谢了!”实是不接受的意思。又如:“小王请侬吃饭,去哦?”回答:“谢谢。”这时你须得辨别一下,到底对方是真心感谢小王,还是很不满意的拒绝。表示不同意,劝人别上当,都可说“谢谢”。非常讨厌地回绝,还可说“谢谢一家门”这个惯用语。“拜哎拜哎”原来是“再见”的意思,但是有时是“从此不再见了,再也不理睬他了”的意思,如:“‘觅知音’活动结束后,除了一二对青年约好再见面外,大多数人则拜哎拜哎了。”“打朋”一词本是“朋友淘里打打白相相”,开玩笑进而寻开心,完全是好意。后来从中作梗使人谋事受障,也是“打朋”:“我刚刚搞出一点头绪,侬又来搞乱,勿要打朋了!”“戳壁脚”也是一种“打朋”;不想做的事,尝试去做做,也叫“打打朋,做做看”。闯祸,也叫“打朋”。打大朋可以使人大触霉头大受损失。因此有人与他作乱捣蛋,他说:“朋友侬勿要跟我打朋了!我明朝请侬吃大菜。”意欲挽回。

从淘浆糊一词如今又派生出一些新的词语来,如“浆糊桶”,指那些处世圆滑、能说会道的人:“老张是只浆糊桶,侬帮伊讲啥伊侬讲对个对个有道理。(老张是个圆滑的人,你跟他讲什么他都说对的对的有道理。)”又指稀里糊涂的人,做事过日子惯于混混的人:“碰着甬只浆糊桶,侬倒一百辈子霉了!(碰到这个稀里糊涂的人,你一百辈子倒霉了!)”还指会把气氛搞得热闹又混乱的人:“还勿是来了甬只浆糊桶,瞎讲一通,拿大家个心侬搞乱了。”还有“浆糊兄”,戏称糊里糊涂、只会混的老兄或糊涂虫:“喔哟,我托着个王伯伯,侬原来是个浆糊兄啊?”更有“尊称”为“浆糊师”,既指遇事善于搅和蒙混的人:“甬种事体,有啥争勿清爽个,请浆糊师来撻撻平算了!(这种事,有什么争不清的,请和稀泥的来撻平它算了!)”又指有协调各种关系能力的人:“人家摆勿平个事体,只有伊去淘浆糊,大家侬叫

伊浆糊师了！（人家摆不平的事情，只有他去协调才行，大家都叫他浆糊师了！）”“浆糊”一词又可代称糊涂和糊涂虫：“张老师绝对一个浆糊哦，居然自家也搞勿清爽啥辰光考试个。”

21世纪初，上海话中又冒出了一个惯用语，叫“有腔调”。这个词语为什么会发生在上海发生，其实也是有其深刻背景的。上海城原是个“腔调”十分发达的地方。有沪剧、滑稽、上海说唱、浦东说书、评弹、越剧、甬剧、锡剧、淮剧等十多种江南江北的地方戏曲，从19世纪末开始在上海草创、汇聚、改造，到20世纪40年代成熟，直到60年代初达到成熟顶峰，所以上海人耳濡目染的演戏腔调和演出姿态层出不穷。所以在30年代就有一个惯用说法，把“看你这种鬼样（包括姿势）！”“看你这种态度！”称作“侬啥个腔调！”含有“真难看”的意思，有时直说“侬个腔调真难看！”含说话的样子，身体的姿势，均可指。从中也可见上海人说的腔调和姿态总是在一起的。新生的“有腔调”，指的是人的行为举止时髦、潇洒、有个性，风度翩翩，有型，有内涵有气质。如：“跟有腔调个男小囡辣辣一道，真是一种享受！（跟有内涵有气质的个男孩子在一起，真是一种享受！）”又指事情做得有章法，像样，样子好。如：“侬做个事体老有腔调。（你做的事情样子真好。）”引申出来这个人“腔调老足”，就是说此人很有个性，或指他架子十足。如：“王先生腔调老足，与众不同。（王先生很有个性，与众不同。）”于是各种人都有自己的“腔调”，或曰“风度”，记者有记者腔调，教授有教授腔调，英雄腔调、大佬腔调、学者腔调、情圣腔调、小人物腔调，各有腔调！

从大量的这类词语的使用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话的勃勃生机，具体而言，新词语传播流动极快，群众勇于创新，快速翻新，使一个词语的信息量大而生动简洁。

20世纪末21世纪初，年轻人的思维空前活跃，本来他们就有创新和

从众两大优势,加上社会思潮的多样化,新生的惯用语又造出来又很快大家说开去。如:寻方向(找恋爱的对象,找去玩或做事的地方)、调频道(换话题)、发调头(发指示,发命令,发话)、抢跑道(强把别人的事揽去,打麻将时抢各种可能争取和牌赢钱,先取得向电脑配对系统输入股票交易行情的申报通道)、吃弹弓(要求被人拒绝,尤指示爱或求爱未被接受)、摆POSE(摆个架势,做出让人觉得很特别的姿势,装模样,发傻)、拗造型(摆人体姿势,摆造型,塑造个人,打扮)、吃冰淇淋(让别人白欢喜一场)、做功课(对某项数据变化进行记录、研究)、吃救济粮(考试没考好,低于平均分数)、搭节目(设计、安排内容)、有花头(有看头,有戏;有婚外恋;有本事)、有立升(实力雄厚,有本事)、吃下脚(偷窃露天仓库或路边所堆的货物)、吃上风(运气好)、发电(发出求爱的信息)、放电(男女之间感情迸发四溢,眉目传情;放出自己的魅力去吸引人)、关脱(不谈了,断了;闭嘴!没通过,特指考试没通过。这个词与英语 shut up 有关,它的本义“关闭、锁掉”和引申义“不谈了、住口”与英语对应,而“考试没通过”则是上海大学生们发明的新义)。

上海话口语中的四字格成语,仅笔者收集到的就有 500 多条。大部分的成语口头使用的频率仍很高。上海成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那些略带夸张和幽默地描写丑陋习性的成语,如:“好吃懒做、有要嘅紧、混天糊涂、无天野地、昏头落踵、神魂颠倒、神志无主、直腰懒贯、死样怪气、假痴假呆、寿头板气、鬼触臂把、牵丝扳藤、半死半活、自说自话、夹嘴夹舌、嬉皮塌脸、踱头把戏、勿二勿三、勿着勿落、笑话奇谈、辣手辣脚、作精作怪、卷头缩颈”,等等。有的成语使用形象的比喻,如:“黄鱼脑子、绣花枕头、橡皮饭碗、糯米心肠、豆腐肩胛、粉皮耳朵、冷粥面孔、活孙屁股、蟹手蟹脚、空心汤团”;还有的四字格描写那些贬义的行为,如:“炒冷饭头、唱独角戏、捞锡箔灰、着连裆裤、热大头昏、嚼舌头根、拆洋烂污、看西洋景”。

其次是歌颂优良品质的成语,如“一门心思、一点一划、一头一脑、熟门熟路、正行正经、毕工毕正、鲜龙活跳、快手快脚、另有一功、要紧勿煞”等,再次是夸张描写频繁动作行为的词语,如“爬死爬活、投五投六、作精作怪、牵风引头、寻死作活、更转落转、挑嘴隔舌、学嘴学舌、拯求苦恼”等。相对来说,后两种成语比较少些。频繁使用成语是因为人们经常需要一言中的地评价人类行为或劝善惩恶。

八、市民话语中所见的上海市民精神

说起上海人的传统文化,一种是继承本地百姓古老流传下来的民俗传统,另一种是上海城市在近代都市化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上海这个城市特色的传统,后者是更为重要的体现城市魅力和内涵的一种民俗文化,一种市民精神。它积淀下来潜移默化,已成为上海市民的基本民风 and 处世态度,成为这个城市的味道,乃至这个城市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而这些特色和味道也浸润和散布在都市市民生活的话语中,在上海话中都有概括而精辟的词语或固定短语来表现。

上海是移民城市,大量移民来到上海以后,多数人都是“脚碰脚(差不离)”,面对几乎相等的地位和机会,大凡睡一个统铺,白手起家,积极谋生。上海自由竞争的经济行为培养了上海人的一种重实际、负责任的实干精神,有不少上海话惯用语就是反映这种品质的,如:“硬碰硬(实事求是,经得住考验)”、“实打实(踏踏实实)”、“明打明(光明正大的)”、“乌龟攢石板”、“担肩胛(承担责任)”、“吃辛吃苦(含辛茹苦)”。而对有悖这种态度和精神的人则讥之或斥之为:“做黄牛(滑头,不负责任)”、“淘浆糊”、“空口说白话(信口开河)”、“夜壶里炖鸭——独出一张嘴”、“飞机上吊大

闸蟹——悬空八只脚”、“做大头梦(白日做梦)”。为了寻觅到自己最合适最舒服的工作,他们的进取精神之用语是“落门落槛(内行,恰到好处)”,再用自己的实力去“搏一记(拼一下)”。上海人从开埠以来在一个机会相对均等的社会里自然养成了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平等竞争和踏实从事、正大光明创业的社会风气。

竞争的商业社会磨砺陶冶了上海人善于精明估算和精干从事的精神。做事前会先“盘算”,“盘算”这个词便来自算账用的“算盘”,主张行事要“精打细算”。上海人强调直觉机遇,“轧苗头”、“看山水”、“看颜色”、“讨口风(探口气)”、“鉴貌辨色”,窥视方向,见机行事。他们善于“接翎子(很快领会别人暗示的意思)”,又会“掂斤两(估计、捉摸物的轻重、人的本领作用)”,做事情“晓得轻重”、“识货”。在上海人看来上面这些常用词语都不是贬义的,而真要贬斥的只是坐着空想,那种“晒扁头(异想天开)、热大头昏(想入非非)”的人。

上海人办事,讲究能力和技巧,灵活和精练,所谓“门槛要精”,开放的社会交际频繁,在各种交往和机会面前,养成了上海人的“精明”和“活络”的性格,讲究行为“懂经(在行、精通)”,事事“来事”。“掰个人来事来死”就是“这人很能干”。上海人与交涉对方可以不厌其烦地“讲斤头(各不相让地讲条件)”,“讨价还价”,追求最大的利益或利润。“老鬼勿脱手,脱手勿老鬼。(精明的人到手的東西不能轻易给人)”也是一种精明。把做事总要出错的人贬称为“烂人”,叫那种稀里糊涂、惯于混事的人作“浆糊桶”,或喻为“老油条”,他们的行为叫“混腔势”。上海人对精明内行的“老门槛(精于各种窍门或这样的人,老手)”不像外地有些人那样贬斥,往往反而赞赏:“办桩事体伊门槛老味! 攀得牢! 阿拉勿必担心。”因为“门槛精”会带来竞争中的成功。上海社会崇尚精明能干,“头子活,路道粗,花露水浓,有法道,会算计”,对于那种在某一方面富有精致的经验很有办

法的精通者,上海人尊其为“老法师”;对有一点年纪、有地位、做事有分量的一套一套“老拿得出个”的人,称为“老家生”,都是佩服的。“老拿得出个”这句话可以一直表扬他到很有型有款有腔调的程度。上海人反对的只是那种专为私利着想又“门槛太精”的行为,认为这种人“小家败气”、“勒杀吊死”、“狗屎倒灶”、“派头忒小”,没有开阔的视野和心胸,甚至指斥他为“老刮铲”,贬为“老屁眼(老谋深算,只想得私利丝毫不肯吃亏的人)”。

上海人做事“着实”、“讲实惠”、“看工夫”,为了办事成功,欲使无关系变为有关系,他还会主动找上门去“搭讪头(为与生人接近而找话拉)”。上海人讲速度,重效率,讲究手脚勤快,喜欢“快手脚(做事敏捷利索)”,“一脚落手(一口气,不停歇)”、“限时限刻”地把事赶完,主张当面清账的“现开销(发生纠纷当场清账)”。不要那种“搭手脚(插进来增添麻烦)”、“添手脚(凑上来添麻烦)”的人。为了成事,上海人会“一手一脚(一人包下,善始善终,中途不停)”、“有心有想(精力集中,有耐心)”地做,“一点一滴(认真不越轨)”、“熟门熟路(得心应手,门路很熟)”认真对待,反对“磨洋工(吊儿郎当地做事)”,反对“半吊子(说话不直爽,做事不上不下不彻底)”。他们还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究根寻底)”、“敲钉转脚”的精神。上海人也讲究灵活机动,主张抓住现成机会的“有吃勿吃猪头三”;如果一时成功不了,也不屑“孵豆芽”作充分准备,卧待时机。有时,可以“闷声勿响大发财(沉默而得利)”。但是上海百姓过着实实在在的民生,跨出每一步都要算一算,不能“野豁豁”,鄙视“侃”得“一天世界”而不收场。

上海人也讲究体面风光,“门面功夫”向来注重,现在叫做“包装”。做事要“上台面(体面)”,在人前要“扎面子(争面子,有面子)”,办事要“买面子(讲情面)”,他们懂得真假的界限,反对虚伪的“绷场面(勉强支撑场面)”,“装门面(摆阔装样子)”。他们不贬“调枪花(善于玩弄言词变换手

法)”、“摆噱头(打花招,逗引人)”、“扎台型(争面子,显示自己的优越)”、“翻门槛(变换各种窍门)”以至“做花头(做小动作,玩花样)”、“起蓬头(造声势)”,相当在意发挥聪明才智。汪仲贤 1935 年就曾描写到过:“一样开店铺做生意,会掉枪花的老板,三日二头大减价,常常叫一班乐队来吹吹毛毛雨,唱唱无锡景,生意自会兴隆发达。”(《上海俗语图说》266 页)

上海人十分崇尚进取开拓精神,敢于冒险“拼死吃河豚”,“勿管三七廿一”,不惜“攒铜钿银子(花钱下本)”、“横竖横,拆家棚(横字当头,豁出去拉倒)”来孤注一掷,去“钻天打洞”。因为上海是个“冒险家的乐园”,所以上海话中敢于冒险、崇扬创造性的成语也特别多,如爱“碰碰额角头(碰运气)”。他们不怕“出风头(显耀自己,有光彩,很神气)”,不怕“顶山头(碰钉子,被顶住)”,不怕“老虎头上拍苍蝇(胆大包天)”,“一蓬风”勇往直前。许多人有“闯市面”、“开码头(出外闯荡)”的勇气。他们深知“小钿勿去,大钿勿来(吃点小亏而占大便宜)”、“旧个勿去,新个勿来(除旧迎新)”的道理。会做生意的上海人还常常对常例“勿领盆(不买账)”,认为可以各有千秋,企望“小鬼跌金刚(弱者战胜强者)”,“棉纱线扳倒石牌楼”。在竞争中,主张力争略胜一筹的“掐掐人家小辫子”。他们连孩子也褒扬从小“野得出(闯得开,做得出过分的举动)”,“出汤(闯得出,善于表现自己)”,而对那种“脑子勿转弯个”,“寿头板气(呆头呆脑)”个,“戆答答(傻乎乎)”个“呆木头(呆愚迟钝者)”、“阿屈死(不识事、不识货、不内行的人)”,十分揶揄;对于意志薄弱、胆小不敢作为者,什么“软脚蟹(喻胆小、意志薄弱的人)”、“缩头乌龟(喻遇事退缩在后、无能的人)”、“缩货”一类的,是十分鄙夷不屑的。但在他们的闯劲和翻身中,也注意到中庸,都忌“豁边(过头,出错,栽跟斗)”,怕“老鬼失撇(资格老、能耐大的人遇失策)”,而忌“豁边”的另一常用义是怕“超出预算”,成为“空心大老官(貌阔实空)”。

处于开放型、进取型文化氛围中的上海，养成了上海人建立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和而不同的心理品性和人际关系。这些特征也同样反映到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话中通用的惯用语上来。如在办事中常常崇尚信誉，待对方宽容，“打包票（保证，包在身上）”，“一句闲话（没二话）”。上海人崇尚“派头”，往往宽待对方，对人家“好白话（好商量）来死”，“小菜一碟”；没有完人，“好人勿生肚脐眼”，应待人宽容，遵守和推崇 Fair Play 的游戏规则，处事不“五斤吼六斤”的“猴极”，贬斥那种气派小、干那些不起眼的事的人为“小儿科”：“甭种事体小儿科来死，阿拉勿做个。”

上海人讲究识时务，他们深得“识相（知趣）”之道，即给自己选择一个最适宜的地位，常常敬告别人不要“勿识相”，“勿识相要吃辣货酱（警告对方如不知好歹，就要给颜色看）”，“贪心吃白粥（贪心没好下场）”。他们要做“识相朋友”，像郑板桥“难得糊涂”一般“乐得识相”。这就涉及到遇事讲究“拎得清”还是“拎勿清”。正如李浩然说的：“上海人对理性最集中的描绘是要‘拎得清’，这既是上海人群体性自我评价，也是对他人的要求。”（李浩然，2006）“‘拎’是思维过程，也是操作成果。无论他‘出身’怎么样，都是对他个体生存质量的高度评价，是对他的精明的非常欣赏；如果用‘拎不清’来形容一个人，就是对他的素质彻底否定。”在大家的心目中等于被“揩脱”了。“拎得清”的人就是很“扎乖”，遵守规则，守规矩，甚至对潜规则也一清二楚，遇事“打开天窗说亮话”，“坦坦和和”。而“拎勿清”就是“戆”；“拎勿清”的人就要“丁三倒四”、“出洋相”，被人鄙视，讥为“蜡烛（不知好歹）”、“黄鱼脑袋”、“戆大”、“缺钙”、“脑子拨枪打过了”。“上海人的才华还体现在天生的‘接翎子’上，只有‘拎得清’，才能‘接翎子’。”这是上海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已经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基因里。

上海人主张在商业上和生活中都崇尚“产权分明”，饭馆消费也很早

行出“劈硬柴(AA制)”,以至“海派AA制(这次男的请,下次女的请)”。他们看不起“一笔糊涂账”,将凑热闹乱附和的“轧闹猛(凑热闹)”、“瞎和调(乱附和)”斥为贬义,认为这种行为只能“骗骗野人头(骗那些没头脑的人)”;也不喜欢那种“百有份(对任何事情都有份、爱打听、去拉关系、插一手的人)”、“百搭”爱管闲事的人。他们向往自由自主,喜欢自己来“唱重头戏(做主角)”,反对别人来“轧一脚(插一手)”,“捞外快”,“搞七廿三(乱搞一气,胡缠)”,或者“碍手碍脚(给人带来障碍)”、“添手添脚(凑上来添麻烦)”。“各人头浪一片天”,各做各的,“脱依浑身勿搭界”,对于他人的干涉,说“帮帮忙,依勿要来拆台脚!”“帮忙帮忙,越帮越忙”。同时也不占人便宜,主张“勿来勿去,大家清爽”,不相互牵涉。碰到别人要来干涉,或“听壁脚(偷听管闲事)”,或“戳壁脚(背后挑拨说坏话)”,回应的最常用词语,就是“关依啥事体?!”以此保护私人的自由空间。不关我的事,不去介入,不去凑热闹,插一脚。别人有什么嗜好,“桥关桥,路关路(各管各,互不相关)”,任他“七荤八素(晕头转向,这样或那样)”,“关我啥事体!(不管我的事)。”

上海人已经在商业化社会中养成了可贵的遵守规则、重理性的契约精神和合同精神。上面说到的“懂经”这个词语,也包括做事要“规规矩矩”,按章办事,“关门落栓(把话说死)”,言行严谨无更改。他们也讲究协调、谈判和谦让、双赢精神,做事讲“摆平”和“撮蹙(互相抵消)”,办事最好“刀切豆腐两面光(两面都讨好摆平)”,不要弄得“七桥八裂”,“谈得拢就上,谈勿拢拉倒”,不要“敲橡皮图章(决议不算数)”;当然,在交往谈判中,不排斥“面皮老老,肚皮饱饱”,主动争利。他们反对“空口说白话(信口开河)”,讨厌“闲话多,饭泡粥(形容多废话)”,叫人家“讲闲话,下巴托托牢”,不要“神志无主”;务实的上海人讲究信用,要守约,十分鄙夷“放空炮”、“开大兴(说大话,不能兑现)”、给人“吃空心汤团(答应而

不兑现)”和“放鸽子”给人“吃药(爽约失信)”的人,也讨厌“黄牛肩胛(靠不住)”、“小滑头(不守信用、只会耍嘴皮)”,害怕“托着一个王伯伯(拜托给了健忘者)”。

上海这个社会商业气息重,最早通行“薪俸”制、红包制。大家合法“赚钱”,认为“有钿百事可安排”。在交往中,主张“一分行情一份货(花怎样的价钱就得到怎样质量的货色)”,“大家勿吃亏”。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不惜充分利用寸金之地,“螺蛳壳里做道场”,把握机遇。上海城中有许多市民也养成了会消费的习惯,购买欲强,极端点地说:“吃光用光,身体健康”,现在称之“月光族”。“开销”一词跟随着“销场”(在开埠初的上海话中写为“开消”和“消场”)在上海话中首先随商业行为产生,现在已经普及到市民生活的日常行为,一天的支出和支出的费用都叫“开销”,而且延伸到“感情支出”、“智力开销”等语。在办事中,“讨价还价”和“讨扳账”这类的事情时常发生,连各种谈判中也说要“讨价还价”,还需要有人出来“淘浆糊”甚至“烫平(彻底摆平,使无法作梗)”。

在上海话里,有些词语像英语中的一些词语那样,没有明确的褒贬,含义很宽容广泛,就看用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比如:在什么时候“显山露水”,要看火候;“轧苗头”、“有花头”、“出风头”这类词也要看用在什么人什么事情上,褒贬可以不同。“铜钱眼里穿跟斗”这词,如果是一个人见钱眼开,唯钱是尊,那用这个熟语是对他的鄙视;但如果用在有的人在生钱上面会动脑筋精打细算、善于理财方面,就是褒义的了。这也说明在一个宽容的社会里用词上的自由度。

第五章

上海话与上海民俗

一、上海地名所见多层次的历史文化叠加

在上海话的名词中,地名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因为地名是代代相传的,有顽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带有浓烈的地方色彩。上海人的繁衍、迁徙、社会变更和文化交融,都在上海地名上留下了带有层次性的历史发展痕迹。

在今称“冈身”的界线以西的上海地区,现在还保留着不少最古老的地名,反映着上海初民的生活。《清嘉庆一统志》松江府下,就记有在青浦县东40里,有一条“沙冈塘”,“沙冈”就是沪渎故道以南的“冈身”之一,“沙冈塘”就是沿着“冈身”的泄水道。今还有“北沙港”,流经“沙冈庵村”接黄浦江。(祝鹏1989,第96页)嘉定的“外冈”镇名也与“冈身”有关。远古称太湖为“震泽”,太湖以东的沼泽地带留下了不少称“泽”的古地名,今上海原始文化遗址“崧泽”便是之一。此外,在这附近,现今的“金泽”和吴江的“盛泽”还保留着远古的地名。初民用“火耕水耨”的方法开田,称为“疇”,“疇”是本地最早的农业,秦时将今嘉定以及闵行、松江、青浦的北境等地置为“疇县”,今嘉定还有“疇城乡”的地名。松江(又称青龙江,后称吴淞江)流经之地,现留有“松江”、“青浦”的区名。上海原是捕鱼的渔滨,渔民中用一种叫“扈”(即“鱼簖”,“簖”、“扈”都是吴方言词)的渔具,这就是上海简称“沪”的来历。古松江东泻海称“沪海”或“沪渎”,故上海又称“沪渎”。上海西部地区据称是战国时代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地,所以上海又称“申”;“黄浦江”又称“黄歇浦”或“春申江”。

所谓“南江北河”,即我国的江河在北方一般称“河”,在我国南方称“江”,这是我国水系的最显著的地名差异,因此“黄浦江、吴淞江”等大水系,在上海都称“江”,此外还称“浦”,“青浦、黄浦”便是。“江”和“浦”的称呼读音与古越语有关,和南亚语同源,是在上海积淀着的最早的第一层历

史文化的称名。

今上海城区和上海东部成陆较晚,许多地名都是唐以后定名的,是南方地名的延展使用。北宋熙宁年间郑亶的《水利书》中称松江南岸最近海口的几条浦是“上海浦、下海浦、南及浦、江苎浦、烂泥浦”。“上海”这个地名由此而来。现以“浦”定名的地点在上海版图上留下很多,如“周浦、月浦、彭浦、杨树浦”等,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已没有同名的河流了。

小一点的河流,在上海地区称“浜”最多,“浜”是最具太湖片江南特色的河名,现有的较大的河流是宝山的“蕙藻浜”,地名如“肇嘉浜、陆家浜、张华浜、南塘浜、洋泾浜、北厍浜”等都已无水了。还有“泾”、“港”、“塘”、“荡”,也都是江南的水名后缀,如:“横潦泾(在松江)”是河名,“漕河泾、白莲泾、泗泾、枫泾、朱泾、泖泾、洞泾”都已是镇名;“大泖港、横泾港、向荡港”(在松江)都是水名,“泖港”却是镇名;“胥浦塘(在金山)、泗泾塘(在松江)、步石塘(在青浦)”都是水名,“练塘、五里塘、蒲汇塘”是地名;“石湖荡(在松江)、淀山荡(在青浦)”都是地名。“溪”在浙南是常见的水名后缀,在上海很少,在青浦有个“凤溪”镇。水湾边突入的土地称“堰”,防水的土堤称“圩”,金山有著名的“张堰”镇,青浦有“章堰”、“港圩”、“官字圩”的地名。翻开上海版图一看,青浦、松江、金山的地名用字都较古老,那儿还有以“厍”、“埭”、“堵”、“甸”、“行”为后缀的地名,如“长厍”、“陈厍”、“王家厍”、“林家埭”、“沙家埭”、“陈堵”、“龙甸”、“陈家行”等。此外,“宅”、“桥”、“亭”、“渡”、“巷”、“楼”、“湾”、“庙”、“寺”这些在农村引人注目成为标志的地方都成为常见的地名后缀,“左家宅”、“张家桥”、“米市渡”、“沈巷”、“金家巷”、“沈巷渡”、“梵巷浪”、“王家楼”、“柿子湾”、“张翁庙”等,“巷”也有写作“衡”的,如“韭菜衡”。还有一种地名称呼叫“更”、“更浪”,疑为“田埂上”的意思,在已建市的1927年上海地图上还有这些村名,如“陈更”、“高更浪”。这些地名后缀都表现了第二层次南方文化的

积淀。

第三层文化是北方书面语南渐,代表北方正统文化的地名。因上海东部地区成陆较迟,反映这种表层文化的地名就很容易找到,如“赵屯”的“屯”,“朱家角”的“角”,“大团”的“团”,“罗店”的“店”,“顾路”的“路”,“新场”的“场”,“十六铺”的“铺”,“梅龙镇”的“镇”等。再如新近开通的“淀浦河”、“随塘河”(在奉贤)、“川杨河”(在浦东)等,都以“河”来称呼,可见北方文化对上海人文化定位的巨大影响。

有不少地名表现出重叠地名后缀的现象。如“洋泾浜”、“向荡港”、“横泾港”、“漕河泾”、“沈泾塘”。一般可以作此理解:如“横泾港”,开始叫“横泾”,后来“泾”代表“水”的后缀渐渐淡漠了,于是学周围的河流的后缀一样,再加个后缀“港”上去。像“漕河泾”这个地名,是三个都是“河”意思的字的叠加。就像“吴县”升“市”后称“吴县市”类似,松江还有“茜浦泾”的。从叠名中,可以看到该地建置和文化变迁的轨迹和历史积淀。

由于地名的沿袭性,有些地名还保留了很古老的称呼,有现今不用的生僻字,如“崧”、“嚆”、“庠”等。“龙华”的“华”读如“花”,“古猗园”的“猗”读如“奇”,“金泽”的“泽”读如“石”,“芦墟”的“墟”读如“呕”,这些都为我们考察古音或地方音变提供了证据。

二、路名中的社会文化信息

上海城市化后,每筑成一条马路就要定个名,而这些路名往往带有时代色彩,潜藏着一定的文化信息,尽管遇到大变革时,许多马路易了名,然而总会留下一些历史的陈迹可供人们去寻找推敲。

上海城内不少地名反映了开埠以前农业社会生活方式的地域面貌,

如农村的农民往往以“桥”作为一个地方的显著的标志来标记地点,于是就有“提篮桥”、“打浦桥”、“斜桥”、“南阳桥”、“东新桥”、“横浜桥”、“程家桥”等地名保留至今,像“东新桥”便是原来“洋泾浜”上的一座桥,1915年“洋泾浜”虽被填没而在地图上消去,但“东新桥”作为一个地名却流传至今。有的地方筑路以后,即留下“大木桥路”、“小木桥路”、“虹桥路”等路名。寺庙也是农民生活中重要的集市地点,于是有“静安寺”、“庆宁寺”、“高境庙”、“张庙”、“姚家庵”、“净土庵”等地名。有河就有“湾”,就有“唐家湾”、“卢家湾”。有河就有“渡口”,于是有“董家渡路”、“曹家渡”、“老白渡”等。后来又设“码头”,有“公义码头”、“王家码头”、“丰记码头”、“盐码头街”、“油车码头街”等。以家族姓氏定名也表现了农村村舍文化的特征,如“徐家汇路”、“张家宅路”、“沈家宅路”、“董家宅路”、“黄家路”、“毛家弄”、“俞家路”至今还保留在上海城区的地图上。

上海的地名,有历史形成的成块的地名名称,如“八仙桥”、“漕河泾”、“梅陇”、“曹家渡”、“徐家汇”,也有以后来建成马路的路名名称。现今新建的地铁站名或公交车站名,应以“八仙桥”等地名命名为主,马路太长,名称用字也过长,以此命名站名,不利于市民和外来人口的出行辨认,不利于城市的国际化。

今黄浦区中华路、人民路环路内,还保留着不少原县城风貌的路名,折射着当年的集市繁华和商业行为。比如当时发达的手工业作坊使大街小巷以手工业命名的地名应运而生,如“篾竹街”、“花衣街”、“盘香街”。繁忙的副食品贸易市场也集中在那儿,至今还留有“外咸瓜街”、“豆市街”、“面筋弄”、“磨坊弄”、“猪作弄”等路名。像“咸瓜街”就是当年福建和宁波商人在那儿集中开办的新鲜海货贸易市场所在地,而福建人把“黄鱼”称作“黄瓜”或“咸瓜”,又值当年上海有一半的海鲜业都集中在那儿,想必就成就了此名。至于“文庙”周围,则反映了儒家文化的特点,于是有

“学前街”、“梦花街”、“学院街”、“育堂街”、“尚文路”等。为了纪念倡导西方科学文明的徐光启的行踪,黄浦区还有长长的“光启路”。此外,“宝带弄”、“丹凤路”、“跨龙路”等都与上海县城的旧城墙有关,如“丹凤楼”本建于宋代,后置于明代建造的城墙百军台边,是当年眺望上海江景的胜地。现城墙已拆,但同古城墙有关的地名依然被保留了下来。“制造局路”,则是洋务运动“江南制造局”留下的名字。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古今多种“价值”或“现象”共存的社会文化信息。

“马路”一词的诞生,原是因为马车从西方输入租界代步后,修筑较宽的街道而取的名称。自从租界开辟以后,租界范围内出现了成批的以外国人名和地名命名的“马路”和“新村”,以法租界为最甚。外国人名和地名命名的马路多是纪念性的路名。如:1901年建成的“宝昌路”的“宝昌(Paul Brunst)”是法公董局中的连任六次的一名法籍董事名,开辟此路时他正荣任总董。此路在1914年改名为“霞飞路”,是为了感激在欧战中挽救了危亡的法国的、曾以工兵士官资格来过上海的总司令“霞飞(Joffre)”。“吕班路”的“吕班(Dubail)”是1898年时的法国驻华公使。“辣斐德路”是用欧战时法国陆军名将“辣斐德(Lafayette)”名。“爱多亚路”是用英皇爱德华七世(Edouard VII)名的法文读法。“金神父路”是取曾任法公董局董事的天主教神父(Père Meugniot)命名的。为了纪念在上海首次试验驾机飞行而陨命的法国人环龙(Vallon),在法租界的“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前的马路就取名“环龙路”。“克能海路”的“克能海(Cunningham)”原是为来沪经商的美侨,1852年做了美国驻沪的副领事。“同孚路”的“同孚(Yatos)”是当时美国南浸信会的牧师晏玛太的姓氏。租界收回之后,这些路名都已荡涤,但人们在回忆和研究这段重要历史的时候,仍要提及或查询这些旧的路名。有的名字背后还藏有一个故事,“大八寺”本无大寺也无大树,近来改名上海话谐音的“大柏树”称名,就

因为原名是日占时定的“大八辻”的缘故。循察这些路名可以了解租界发展史。如今,市内大多数马路的称呼虽已按汉语习惯(2+1+1)改了,如把原来的“北四川路”改成“四川北路”,但还遗留下“西江湾路”、“东宝兴路”、“南苏州路”等没有更改,依旧保留了外国语的名词语序(1+2+1)。

路名还反映了革命和政治的痕迹。如:“中华路”和“民国路”是民国时代的定名,而其中“民国路”,现改为“人民路”。“中山路”、“逸仙路”都是为了纪念孙中山,“自忠路”、“晋元路”都是纪念抗日名将定名的。今五角场地区有许多“国”字和“政”字起头的路名,如“国顺路”、“政肃路”等,这可算是30年代国民党政府本拟在该地建设新上海、后因日军侵略而中止的遗迹。至于“延安路”、“淮海路”等路名则是共产党革命历史的记录。

三、浸润传统民俗风貌的上海话语词

民俗学家可以从民间的方言俚语中获得大量的时尚风俗信息,因为无论是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还是信仰的民俗,游艺的民俗,都与众多的地方土语共存,而方言的区别则能反映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世俗生态。如果多样化的民俗世情永存,则方言与方言的魅力永存。

首先来看上海的岁时节令。春节,上海称“大年初一”,又是“开春”,起身后旧习要“拜天地”“拜四方”,再向长辈“拜年”,见人拱手“恭喜发财”,吃年糕(谐音年年高发),吃“糯米圆子”或“汤团”,喝“盖碗”里的“元宝茶”,碗上可放一只青的“檀香橄榄”。正月初五,“接财神”,又叫“接路头”,大放炮仗烟花。如果老板不通知你去店里“吃财神酒”,那就是“回头生意”,解雇你。元宵节又称“灯节”,正月十三起就“上灯”,灯的花样五彩

缤纷,小孩多玩“兔子灯”。直到正月十八歇灯,有“上灯圆子落灯糕”的吃法。二月初二叫“龙抬头”,象征春天生命的跃动,男子这天要剃头,称为“剪龙头”。二月十二叫“百花生日”,又叫“花节”,宜种花草。正月二十是上海主要经济作物的“棉花”生日。在1935年上海市民投票选市花时,棉花居然一举当选。二月第一个“丁日”,上海要举行“春丁祭”,到文庙祭孔。“秋丁祭孔”时在八月。上海的城隍神,生日在二月廿一。二月十九,是“观音菩萨生日”。在阴历二月里,上海有“报春冷”,俗称道“老和尚过江”、“张大帝生日”,总有定时的寒潮来,冷热变化大,而夏秋转换较慢,所以上海有“秋冻春捂”之说。清明节,去郊外“远足”“踏青”,放“鸽子”,“插杨柳”,上坟祭祖,有的人家要吃桃花粥。清明节在阴历三月里的,叫“长三春”,在二月里的,叫“短三春”。三月十五,著名的龙华庙会开始了,历时半月。立夏要“尝新”、“称人”。端午“赛龙船”、“裹粽子”、“点艾蓬”熏屋辟邪除毒,小儿挂“端午老虎”。五月十三,上海关帝庙举行描绘祭祀关公,又是“磨刀日”。夏至日,吃面,上海俗语有“冬至馄饨夏至面”。“夏至勿去蒨秧,冬至勿去望娘。”这句谚语形容这两个日子是“日长”和“日短”之最。七夕是“七巧”,又作“乞巧”。七月半“中元节”是鬼节,“斋田头”(转为“斋弄堂”)。七月三十是“地藏王菩萨生日”,实际是“涅槃日”,遍“插地香”。中秋是“团圆日”,举家团聚,家家户户“举头望明月”,吃送月饼。八月廿四,观潮,最为壮观。九月初九“重阳日”,又称“登高日”,家家“装糕”,取“糕”与“登高”的“高”的谐音,以“步步高”相祝,“重阳糕”上还插“重阳旗”,而高桥的“松糕”久享盛名。去佘山登高,豫园看菊花会,持螯赏菊。冬至家人隆重祭祖,吃“冬至夜饭”,“有钿饱一夜,嘅钿冻一夜”,“一九”的第一寒天也就开始了。“腊月”初八吃“腊八粥”,十二月廿三“祭灶”,做“谢灶团”,焚送“灶家菩萨上天”,迎新灶神。十二月廿五,除残“掸遗尘”,汰门窗。除夕上海话有好多说法:“年脚边头”、“年夜卅边”、“年三

十夜”、“大年夜”、“年夜头”等,此时,合家“吃年夜饭”、“守岁酒”、“通夜守岁”、“贴门对”,给孩子“压岁钿”,“放炮仗”爆竹除旧等。以上这些表达节令活动的风俗的上海话词语是年年与百姓的生活习俗相关的。除此以外,还有农事节日、纪念节日等,都有一批相关词语。

上海话中,表达婚丧、生育、寿辰等方面的词语也是很有特点的。婚事称“喜事”,结婚旧称:“做亲”,“圆房”,“好日”;新称:“结婚”,“出嫁”,又称“出门”。双方家庭旧称:“男家”,“女家”;现称:“男方”,“女方”。结亲双方旧称:“新官人”,“新娘子”;新称:“新郎”,“新娘”。入赘女婿旧称:“人(音逆)舍女婿”;新称:“上门女婿”;招赘的女儿旧称“坐家因”。这反映了过去以男子为中心的农业社会的婚嫁观念。现在上海新婚夫妇一般都自买新房,或谁家有钱,就在谁家成家,男女平等。未婚女婿在上海 20 世纪 20 年代就有“毛脚女婿”的称呼,现在又有仿词“毛脚新妇”与之对等。过去婚嫁尤其是有钱人家的婚事有繁缛的程序,伴随着这些礼仪活动,就有一系列的词语,如“说媒”、“攀亲”、“过庚”、“出八字”,用“花轿”“迎亲”,赠“财礼”,送“陪嫁”。现在崇尚自由恋爱,或亲人熟人“介绍”,因此“介绍人”的称呼代替了“媒人”,“婚姻介绍”简称为“婚介”。现今结婚要办“结婚证书”,结婚仪式仍保留“证婚人”的角色,男方女方各有“伴郎”、“伴娘”,过去叫男女“傧相”。“吃喜酒”大致是必有的,这时由证婚人致词,双方长辈说话,热热闹闹,还发“喜糖”,有的还要“闹新房”,吃“喜果”、“喜茶”。不过有的婚宴过于铺张,来宾又要送等额礼钱,有的疏远的朋友会讽刺地说:“接着一张罚款单!”然而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时起,上海的婚俗就有革新,如举办“团体婚礼”、“集团婚礼”,旅行结婚,外出共度“蜜月”等。原配,上海话称“花烛夫妻”,妻歿再婚的老婆称“填房”。妻子旧称“家主婆”,现在叫“老婆”,对称“老公”。另外一些有关性方面的词语后来也在上海产生,如“同居”、“情人”、“轧姘头”、“姘居”、“吃软饭”、“小

房子”等。怀孕称“有喜”，怀孕的妇女称“来喜妈妈”，新法直称“孕妇”了。“达月”“临盆”后，土法请“收生婆”“收生”，新法当然是送孕妇进“妇产医院”分娩“接生”。产妇于是坐月子叫“做舍姆(som)”，因坐月子过去需15天坐床休息，“15”在老上海话中一种读法叫“son”，“som”就是它的转音。产妇就叫“舍姆娘”。“舍姆里”又称“月里向”。生孩子后要送亲友邻居吃“红蛋”，包裹婴儿的小被包法如同蜡烛形状，称为“蜡烛包”、“抱裙”。旧时小孩出生后三天要“做三朝”，这天请吃的酒，叫“三朝酒”；出生一百天后称“一百朝”，现在有些家庭要郑重其事地给婴儿拍照留念；一周岁时，也时兴在桌子上放许多东西让孩子抓阄，看孩子将来喜欢干何种事业，据说很准。夜间常啼哭的小孩，称为“夜啼郎”，喜爱宝宝叫“宝贝肉心肝”。

在人生的礼仪中，“过生日”祝寿也是很重要的一项民俗。祝贺生日现在最常见的仪式是送“生日蛋糕”，由被祝贺者“吹小蜡烛”，齐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曲，这是西式的祝寿法，现在已经普及。老的传统是“吃长寿面”。如果给尊敬的长辈做寿，老法要“扎寿幛”，点起“寿烛寿香”，端上“寿桃”，吃“寿面”、“寿酒”等。生日前全家人吃祝寿酒饭叫“暖寿”。

旧时丧葬礼仪也较繁琐，死人穿的叫“寿衣”，用纸糊扎“寿器”，焚烧“冥钞”，棺材叫“寿材”。家属“戴孝”，穿衣扎带都为白色。近代从西方传来佩戴“黑纱”，所以现在上海追悼会既戴黑纱又佩白花，黑衣白带，中西合璧。过去“出丧”前要设“灵堂”，又叫“孝堂”，“结采”，“吊孝”，吊孝者头戴“孝兜”。选择墓地“落葬”，讲究选“风水宝地”。另立“牌位”，请名人写“神主牌”。有的家庭还有“做七”，请道士念经，超度亡灵，奉周年“做斋”，清明节“上坟”，点烧“香烛”和“锡箔纸锭”。随着上海社会的近代化，人们对做丧事上除了做一定的仪式用于寄托哀思外，革除了许多繁文缛节。不过，这些留在上海话词汇中的民俗还是可以成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考察人类行为和心理的依据之一。

反映民间游艺的词语大都还活在现今人们的口中,而且随着民间游艺的变化不断翻新。游艺从嬉戏、娱乐到经济、运动、歌舞、传说等,很能体现地方风貌。上海历史悠久、每年一度的“菊花会”在旧县志中就有记载,元宵中秋等节日中的喜庆伴随着“扎彩灯、搭戏台、调龙灯、舞狮子、踏高跷、荡河船、调花枪、滚绣球、豁虎跳、竖蜻蜓”等游艺至今依然搞得热闹非凡。随着西风的进入,“游艺场、跳舞场、跑冰场、俱乐部、酒吧间、饮冰室、咖啡厅、影戏馆、夜总会”和各种体育场所如“健身房、游泳池”和体育活动如“体操、游泳、打网球、打落弹、保龄球、高尔夫球”都首先在上海出现。就以孩子们的游艺说吧,孩子主要的活动空间是校园和弄堂,即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校园和弄堂游戏之多还不胜枚举。如:stop,马林打,造房子,抬轿子,跳橡皮筋,弄堂溜冰,踢小橡皮球,拉扯铃,打菱角,抽贱骨头,打弹子,搨香烟牌子,套砖头,盯橄榄核,老鹰捉小鸡,我们要拣一个人,东南西北,弹簧屁股,盗界山,官兵捉强盗,看字,丢绢头,钩脚跳,跳绳、踢毽子,滚铁环,打康乐球,着各种游戏棋,捉帖子,捉麻将牌,打手拳(搭拉里头),折飞机,折糖纸头,拉瓶盖,拉木偶,打电话,七巧板,弹皮弓,等等。每到夏天晚上,掇起小凳,围在一起一帮孩子,挑绷绷,金锁银锁,斗洋火棒,拼灵碰冷起,乘凉游艺多多,有接口令,一号两号,开飞机,讲鬼故事等。校园活动,经常跳集体舞,歌咏比赛,化妆舞会、诗歌创作朗诵,做对联,自己动手制作标本,制作幻灯片,自做玩具,自作西洋镜,蜡光纸制作,结玻璃丝,气象观察,天文望远。孩子在家,穿珠子,结网线袋,绣花,编织,做十字花,包丝线粽子,集邮,收糖纸头等,花样繁多。有的孩子聚集一起做小人家,或办小学堂做先生,或者头戴珠子,身披彩衣,咿咿呀呀学做绍兴戏。还有养蝌蚪,养扬虫,养蚕宝宝……如此丰富多彩的游戏词语,反映了当时儿童游戏之丰富多彩和可供选择,无怪乎那时的孩子多么快乐,而不是像现今许多孩子只对着一个电脑“操机”了。

四、闾巷俚俗中歇后语、谚语的沉积和变换

上海正处农业社会时,民间谚语特别多。一种是“气象谚”和“农事谚”,现今城区内“农事谚”很少听说,“气象谚”只有少数还在传说,但在郊区使用还很普遍。如说雨水分布的:“邈邈冬至干净年,干净冬至邈邈年。”“小暑一声雷,倒转做黄梅。”“重阳勿落看十三,十三勿落一冬晴。”说明风雨的:“东北风,雨太公”,“三朝雾露发西风”,“雷公先唱歌,有雨也勿多。”“太阳颜色黄,明日大风狂。”预测晴雨的:“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云朝东,车马通;云朝西,披蓑衣;云朝南,雨涟涟;云朝北,好晒谷。”“乌云结得高,明朝晒断腰。”“早晨毛头霜,隔日天气晴。”预言天象气候的,如“吃过夏至面,一日短一日”。“吃了端午粽,还要冻三冻。”许多气象谚语都是上海地区人民世代生活经验的总结,如“东风两头大,西风腰里粗”。这个谚语是说:春天的风大都为东风,早上和晚上比较大,容易使天气转阴或雨;如吹西风,一般在中午较大,傍晚时就会减弱。春天吹西风,天气较干燥,不会下雨。观察物象,也能了解天气。“蜻蜓满天飞,要落雷阵雨。”“蚂蚁结群,明天勿晴。”“乌龟看天,天气要变。”“芦花秀,早夜寒。”“农事谚”往往与时令天象有关,如:“三伏勿热,五谷勿结。”“天浪鲤鱼斑,明朝晒谷勿要翻。”还有一种是“卫生保健谚”,有说明常识的:“白露身勿露”,“心定自然凉”,“药补勿如食补”,“饭后百步,勿上药铺”;有经验性总结的:“春要焐,秋要冻,一年四季没病痛。”“人勤病就懒,人懒病就勤。”“食勿言,卧勿语,酒勿醉,色勿迷。”“天天晒,眼睛肿;天天坐,腰背痛;天天立,腿脚重;天天动,筋骨松。”“三天勿吃青,眼睛冒火星。”也有劝戒性的:“宁吃四两,勿吃半斤。”“气气闷闷成毛病,嘻嘻哈哈添寿命。”“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裤带越长,寿命越短。”有说明人生生理规律的:“二十勿发,三十勿长。”“字怕上墙,人怕上床。”“树从根老,人从心



* 1922年胡祖德著《沪谚》之两页

老。”人生的哲理就从平平常常的零言碎语中道出。养生保健与人的一生息息相关，这些谚语是长期得到验证的结论，等于是求医治病外的又一部民间口传医书，听听带有俚俗性的养生经也能使长久困于书斋的人感受一点沃野之气。

世代流传于民间的“社会生活谚”，上海人称之为“老古闲话”，现在上海人的口中依然流传，虽是间巷俚俗，然其描摹之深刻，趣味之浓郁，字句之通俗，或寓劝惩，或杂诙谐，相传民间，为人民喜闻乐见。过去有些文盲虽不识字，但往往口中谚语连珠呼出，出经验，出哲理，风土人情，耐人寻味。

开埠前后的大量谚语，都带有浓厚的乡土气，反映了农业社会中的社会风貌和思想意识，语句上也反映了旧上海话的特点。比如：“出门一里，

勿如屋里。”“吃尽滋味盐好，走尽天边娘好。”“金窠银窠，勿如屋里只狗窠。”表现了闭塞自足不求发展的农民意识。“千算万算，勿如老天一算”，表现了人们在天灾面前无能为力的叹息。“碗底朝天只只空”，“半夜暍拉姐身边，半夜暍拉债身边”，“穷人生病，阎王讨债”，形象地描绘出穷人的困苦境地。“天浪旡没跌杀鸟，地浪旡没饿死人”，“天无一直雨，人无一世穷”，又反映了穷人幻想找到活路，指望否极泰来的良好心愿。“痴子望天坍，穷人望命反”，表达了穷人对幸福生活的空向往。“雨落勿登高墩，穷人勿攀高亲”，告诫穷人穷得要有志气。“吃勿穷，着勿穷，算计勿通一世穷”，“扳节头，过日脚”，歌颂了勤俭持家的优良民风。“日图一顿，夜图一窟”，鞭挞了得过且过的懒汉思想。“上勿欠官粮，下勿欠私债”，表达了农民向往和追求一种理想的世外桃源式的生活境界。

随着商业社会的形成，1922年出版的胡祖德《沪谚》中大部分谚语在城区渐趋衰落（笔者在50年代听到过《沪谚》中将近三分之一的谚语，可见主要的淡出是在60年代初以后），但有一部分谚语使用频率却在升高，有的谚语的常用场合或言下含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下面的谚语大多沿用到现在：“小钿勿去，大钿勿来”，着眼商业前程，愿下血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比喻顺势开展商务或办事；“螺蛳壳里做道场”，形象描绘上海人即使在局促的寸金之地也办厂做精密仪器的聪明才智和适者生存的能力；“略知百行，勿如精通一行”，表达了中小商人钻通技术凭手艺吃饭的职业精神；“勿怕勿识货，就怕货比货”，表现了生产器物合用、商业行为合理的求实道德；“工夫卖铜钿”，既指时间、劳力就是金钱，又指公关周旋换来生意；“一钿勿落虚空地”，说明做生意必须有利可图和精明；“靠人侪是假，跌倒自家爬”，歌颂不依赖别人，即使受挫也要自力更生的硬骨头精神。“狮子大开口”，比喻要求高，胃口大，或者夸大口，常用于对对方提议的暗自吃惊；“阿木林关进”，嘲笑失算者受骗上当；“有饭大家吃”，提倡生

意一起做,有福同享;“买卖勿成仁义在”,主张商场宽容互让心胸旷达;“一拳来,一脚去”,反映利益争夺的白热化;“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描绘商场上竞争兼并的你死我活景象;“有钱能使鬼推磨”,则是对金钱万能迷人心窍的讥刺;“铜钿银子,生勿带来,死勿带去”,又是对金钱的鄙视和揶揄。“羊毛出拉羊身浪”,常用在指花去的钱财自可从与之有关的生意上得来;“有借有还,再借勿难”,言简意赅地说明商业社会里互相资助的准则;“远亲勿如近邻”,说明社会关系已走出家族为基础的封闭社会;“男做女工,越做越穷”,指出工业文明对人的分工更为精细,男子应花更多时间从事更精细的工作,努力挣更多的钱。“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说明时间就是金钱。

不少谚语在抨击不良现象、赞扬优良品质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战斗力。这些道德褒贬性的谚语至今还有流传。比如:“爬得高,跌得重”,是嘲笑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人;“自扳砖头自搭脚”,讽刺一心害人者的自作自受;“叫花子勿留隔夜食”,抨击吃光用光的懒料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形象地批评寄生生活者;“一只嘴,两片皮,话好话坏侪是伊”,指斥某种人善于狡辩;“一心勿能两用”,告诫人做事要集中注意力;“求人勿如求己”,赞美自力更生精神;“千朵桃花一树生”,教育人们兄弟姐妹要和睦;“圣人也有三分错”,“东耳朵管进,西耳朵管出”,主张人们宽容;“叫人勿折本,舌头打个滚”,提倡礼貌待人;“篱笆扎得紧,野狗钻勿进”,提倡对自身的严格要求;“若要人勿知,除非己莫为”,主张慎独,不做亏心事;“马屁拍足,苦头吃足”,说明能媚人者必能害己;“跌得倒,爬得起”,夸赞转机灵捷。

最有教育意义的谚语是大量的训戒谚。如“勿怕笨,就怕混”,鼓励人们上进;“做人勿贪心,家富靠手勤”,告诫人们勤劳发家,不贪不法之财;“行得正,立得正,哪怕和尚尼姑合板凳”,说明心正自敌闲话;“一动勿如

一静”，主张审事动作；“屋宽勿如心宽”、“吃亏就是便宜”，提倡心宽处事；“吃人个嘴软，拿人个手短”，说明受贿就得为人办脏事；“十只节头只只痛”，是说每个子女都是父母的心头肉；“若要天花粉，采起杜瓜根”，说明做事的寻根重源原则；“吃人一口，报人一年”，主张重报人恩；“越睏越懒，越吃越馋”，劝导慵懒者改变生活方式；“功夫要拼，时间要争”，引导人们奋力拼搏；“蜘蛛丝扳得到石牌楼”，说明弱者有决心可以战胜强者；“做事要顺人心，讲话要凭良心”，则是说为人须立则。

形象生动又是谚语的突出特点，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使深奥的事理浅显化，生活知识情趣化。“伸头一刀，缩头一刀”，表明不可避免；“老螃蟹打洞，小螃蟹受用”，形象地描绘了儿辈坐享祖上之福；“小狗跌辣污坑里”，比喻可尽吃尽享受；“面皮老老，肚皮饱饱”，表示不怕羞才要到东西；（以上两条多用对孩子）“马屁拍拉马脚浪”，指拍马而适得其反；“暴躁个人跳拉叫，智慧个人坐拉笑”，对比两种人处事姿态十分传神；“三只节头捏田螺”，比喻稳稳抓住；“七石缸里撩芝麻”，比喻难乎其难；“万宝全书缺只角”，指聪明人偶尔失误，人无十全；“刮辣松脆，檀香橄榄”，是说说话或性格十分爽快；“笑嘻嘻勿是好东西”，用于戏言或忠告两可，警惕对手心怀歹意；“老鬼勿脱手，脱手勿老鬼”，回环地说明精明的人不把到手的東西轻易放掉；“牵丝扳藤牛皮糖”，形容拖拖拉拉慢吞吞；“锣鼓响，脚底痒”，形容行为心役之貌；“若要俏，冻得括括叫”，讽刺爱美姑娘；“瞎猫撞着死老虫”，比喻碰巧幸运得胜；“象牙筷浪扳敲丝”、“豆腐里寻骨头”，表示对找茬儿的憎恨；“鱼勿动，水勿响”，比喻事有蛛丝马迹；“搓搓圆，捏捏扁”，形容任凭摆弄；“拆东墙，补西墙”，比喻顾了这儿，顾不了那儿；“吃光用光，身体健康”，可用作劝人想得穿些；“依客气，我福气”是说对方谦让我正好接受；“送佛送到西天”，预言帮忙到底。这些生动的语句现今还时有听闻。

不少谚语之所以至今在民间使用还很活跃,正在于它浅近通俗的直率口语形式,典型经验的形象格式化,以及幽默锐利的语锋。

上海曾有一些描写上海的风土谚,如“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是对比北部上海四大名镇的富荣程度的;“金铃塔,塔金铃,三月十五撞金铃”,是唱趋向龙华赶庙会的得意的;“白相要到大世界,三日三夜看勿罢”,是歌颂“大世界”游乐之盛的;“若要苦,杨树浦”,是写工人住宅区劳动、生活之苦的。这些谚语主要流行于50年代前。

上海地区的歇后语在历史上是很多的,胡祖德的《沪谚外编》里记下了大量的本地歇后语,既有乡下的,也有城里的。但是现在大多已经不用了。下面分谐音、喻事、喻物、故事四类来略述一些现在还在少数人口中使用的歇后语。

谐音类的歇后语有:丝瓜烧豆腐——清清(青青)白白,青染缸里沐浴——一身轻(青),心里生草——慌(荒)了,一二三四五六七——王(忘)八,一辈子做寡妇——老手(守),扯铃扯到半空中——空想(响),强盗进学堂——摸到就是输(书),隔年蚕做茧——没心思(新丝),光郎头撑伞——无法(发)无天,狗吃青草——装洋(羊),六月里睡觉——勿要面皮(棉被)。上海话语音中前后鼻音、平舌音翘舌音不分,构成了许多不分的歇后语,如:稀饭泡米汤——亲(清)上加亲(清),南瓜丝炒鸡蛋——合适(色)。

上海的地名歇后语原来也很丰富。那些地名都是属于谐音类的。如:嘴里出血——虹(红)口,旧佛添相——莘庄(新装),踏板头浪写愿——上海(床许),四面八方是水——周浦,两亲家公拜年——南汇(男会),三斗米糍饭——大团(大糰),鳊鲈上滩——萧(捎)塘,七石缸里打拳——松江(缸),额角头浪插引线——航(绗)头,两个三十二两——泗(四)斤,打虎英雄——吴淞(武松)。这些地名歇后语在《沪谚外编》里记

下很多,现在农村还时有听闻。

喻事类的歇后语是用一件事来做比喻的。如:头浪向插扇子——出风头,墙头浪绣花——戳壁脚,五更天下海——赶潮流,拖牢脚后跟——拉倒,石头浪向撞乌龟——硬碰硬,赤膊捅马蜂窝——勿惜血本,红木当柴烧——勿识货,酒盅里拌黄瓜生——兜勿转,和尚敲木鱼——老一套,七个铜钿对半分——勿三勿四,三个铜钿买一个夜壶——好一只嘴,脑袋浪向搨猪油——滑头,三斤面粉调四斤油——稀里糊涂,船头浪跑马——走投无路,撅起屁股看天——有眼无珠,瞎子照镜子——看勿到自家啥样子,打扮进棺材——死要面子,烧香望和尚——一事两合当,烧香赶和尚——反客为主,橄榄核垫床脚——活里活络,四金刚摇船——大推大扳,城头浪出棺材——远兜运转,蚊子叮菩萨——看错人头,老虫跳进米缸——尽吃,叫花子吃死蟹——只只好。

喻物类的歇后语是用物体作比方。如:三月里芥菜——早生心,杨二郎个兵器——两面三刀,栈房里个臭虫——吃客,羊肉里个萝卜——骚货,蒸笼里个馒头——自高自大,青皮橄榄——先苦后甜,山沟里个田鸡——目光短浅,向阳坡个竹头——横生枝节,灯笼壳子——外头好看里向空。

故事类的歇后语是引用常听的故事、典故作比。如:牛郎约织女——后会有期,击鼓骂曹——现开销,白娘娘斗法海——精打光,东郭先生救狼——好心勿得好报。

沪上大多数的歇后语都从农业文化中产生,在上海郊区还在沿用,城内有的还见在用,如:脚馒头浪打瞌铤——自靠自,蜻蜓吃尾巴——自吃自,砬糠搓绳——起头难,三月里个芥菜——早生心,六月里着棉鞋——日(热)脚难过,棺材里伸手——死要铜钿,驼子跌跟斗——两头勿着实,床底下放鹞子——大高而勿妙,聋彭的耳朵——空招牌,老鼠跳进白米

囤——尽吃,王小二过年——一年勿如一年。

后来又造出一些新歇后语。如:山东人吃麦冬——一懂勿懂,叫花子吃死蟹——只只好,乡下人勿识打更——敲竹杠,弄堂里摆毛竹——直进直出,上了八宝饭,酒宴就散席——点到为止,卫生口罩——嘴浪一套,湿手插辣干面粉里——甩勿脱,九曲桥浪散步——兜远路,红头阿三踢飞脚——吓人一跳,大舞台对过——天晓得,大世界里照镜子——现出怪样,隔了黄浦江换手——搭勿够,大闸蟹走淮海路——横行霸道。有的歇后语有两种引出语,如:四金刚腾云——悬空八只脚,飞机浪吊大闸蟹——悬空八只脚,螺蛳壳里做道场——团团转,螺蛳壳里做道场——摆勿开排场/小地方做大事体。这两个歇后语前一个都是老的,后一个都是新产生的。

还有一种歇后语是四字格的词语只说出前三字,最后的一字是本义,又称“缩脚语”。在上海,这类歇后语不多。最有名的就是詈语“猪头三”,歇“牲”,骂人“猪头三”,即骂他是“畜牲”,据说猪头的形状是三种牲口的头形的合一。此外,还有“城隍老——爷”、“坑三姑——娘”、“七撬八——立(裂)”。还有一个缩脚在“落”字上的象声词歌:“别立扑——落,极立阁——落,屑立索——落,的立笃——落,结立角——落,逼立剥——落,笃落笃——落,阁落阁——落!”

通俗简单的比喻大多出自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和文盲口中,随着城市文化水准的提高,人们变得反而喜用喻体比本体深奥或思维发散性的比喻,粗浅的以至粗鲁的比喻渐渐失去它的优势。随着城市语言节奏的求快,说话喜欢直说,歇后语那种先设喻后引出本意的言语形式已经不为年轻人所喜欢,要用也常在游戏或逗玩的时候才用。所以大部分的歇后语正处于消亡之中,有的只降作做比喻用,如说“生病人脱鬼商量”时,其实义“空费口舌”反而淡漠或遗忘了。

五、食文化和性文化

“民以食为天。”进入商业社会的上海食文化，一直丰富多彩。上海人的五方杂处，使上海的食文化博采众长，独具优势，全国各地的名菜佳肴汇集沪上，各现春秋。

看上海的食文化，可以先看上海滩上的小吃，因其异常丰富精美，由此在上海话中留下各种美名，比如有一种两面煎成焦黄的面条，称之“两面黄”；一种色状似蟹壳、内含酥油外加芝麻的小烘饼，叫“蟹壳黄”；还有一种正面形状似老虎爪子的甜烘饼，冠名“老虎脚爪”；一种做时用手按出一个凹形的无馅小团子，人们称为“瘪嘴团”。还有像“油墩子”、“麻球”、“牛皮糖”、“兰花豆”、“袜底酥”、“开口笑”、“一捏酥”、“三黄鸡”、“八宝饭”等的取名也颇有特色，不同凡俗。这一切形成了上海话小吃语词的丰富性。这些糕点名称，已经贴上了上海人对它的厚爱之情，我们如果在外地一看到它，就会知道是上海的土产，动了思乡之心。

上海的许多小吃有长久的历史。像城隍庙的“奶油五香豆、梨膏糖”已成为上海的特产，还有那些以鲜美出色的“鸭肫干、鸡鸭血汤、油豆腐线粉汤、面巾百叶包、咖喱牛肉汤、排骨年糕、五香茶叶蛋、荫凉绿豆糕、豆腐花、鸭膀鸭舌头、桂花赤豆汤、白糖莲心粥、鲜肉小馄饨”等，都已深深贴上上海市民的厚爱之情，代代相传。上海小吃的丰富又是上海人善于融汇异地风味吸收中外特长的结果，“南翔小笼、宁波汤团、嘉兴肉粽、潮州老婆月饼、绍兴霉干菜”，各地佳味都在上海得到发扬。那些伴随西方文明而来的“土司、色拉、红肠、罗宋汤、沙嗲牛肉”等也在民间扎下了根而口味上海化。

上海话词汇具有融汇性，山东人“大饼摊”上的“大饼”，“大”字不读“dhu”而读“dha”，在语音上留下了北方音；苏北的“油馓子”使“馓”字进入

了上海方言字汇,“脆麻花”的“麻花”读“mhahua”也包容了苏北话的读音(上海原称“绞捺棒”);宁波的“黄泥螺”、“鳗鲞”、“鳊蟹”,绍兴的“霉干菜”、“霉干张”、“醉方”等方言词都是随着这些食物流入上海;广东的“鱼生粥”,“鱼生”是“生鱼”的意思,其构词法先正偏再偏正,在上海话词语中留下了粤语的特征。从这些特殊词语的吸收,可以看到上海话词语面对各地民俗文化聚汇交融的兼收并蓄性。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小吃就争相呼吆,本地人卖“擂沙圆、糖粥、熏肠肚子”,苏州人卖“甘草梅子、盐金花菜、小虾米豆腐干”,广东人卖“鱼生粥、云吞面”,宁波人卖“鸭膀鸭舌头”,苏北人卖“槩光嫩地栗、麻油撒子”……当夜色笼罩春申之时,小吃的呼卖声便在风中荡漾开来:“桂花赤豆汤”、“白糖莲心粥”……余音袅袅,回味无穷。

80年代以来,夜市小吃重又活跃起来,四川火锅、重庆麻辣烫、兰州拉面、新疆牛肉串、烤鱿鱼、油氽鹌鹑、蚝油田螺、浦东三黄鸡粥、涮羊肉,小吃词语表中一时又增加了许多新名称。90年代以后世界各方名吃济济一堂,眼花缭乱,象征着上海向世界的全面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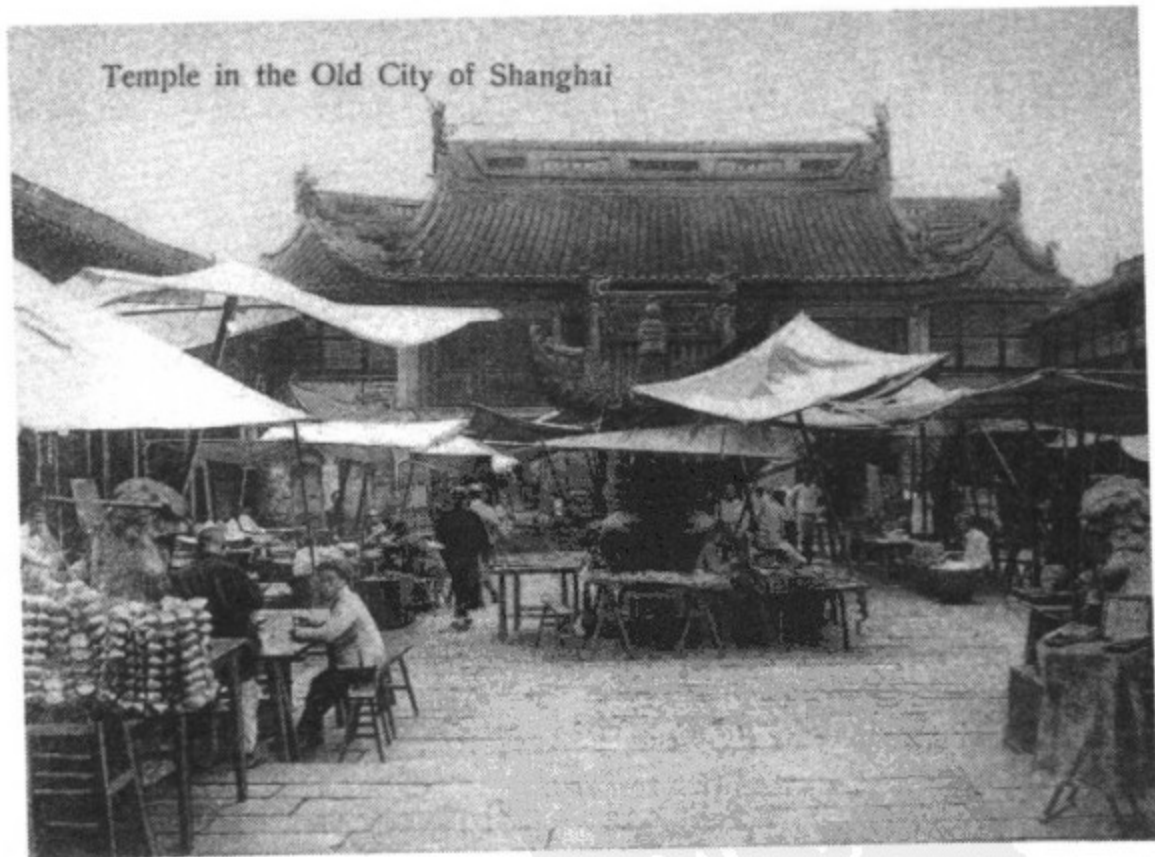
再说上海的菜肴,其实原来老上海县城并没有太多的名菜,倒是一些家常小菜传留下来比较普及,如“百页炒肉”、“咸肉豆腐”、“咸菜黄豆芽”、“肉丝黄鱼汤”、“草鱼粉皮”、“八宝辣酱”等。

从早餐来说吧,50年代的上海,多数人清晨早起,熬上一大锅粥,拿出自家腌制的咸菜、咸蛋,几分钱买一两块“乳腐”。偶尔父母到弄堂口去买回些大饼油条和豆浆,调剂一下简单的生活。双职工为了上班,只好改作隔夜饭加水烧煮成“泡饭”,或曰“饭泡粥”。连煮泡饭时间都没有时,“大饼、油条、粢饭、豆浆”四大金刚便大行其道,表现了吃苦耐劳的上海人的精打细算特色。到60年代,更是普遍贫穷,粮食要定量供应,蔬菜要排队争购,要吃一盆几根肉丝的“炒年糕”还得凭每人为数几张的“就餐券”

在餐店就餐,至于吃“光荣菜”、酱油汤、素肉的日子,人们也度过来了。那个时候,还谈得上什么“小吃”、“大吃”呢?

70年代是特色继续消失的年代,上海的食文化和上海其他文化一样都趋于萎缩,“海派”一词就根本不能提起。一直到70年代后期80年代以后,上海的饮食重新活跃起来,一家家小吃店竞相亮相,路边的排档也热气腾腾,小吃市场人气十足,三四十年代就活跃于上海的小吃品种纷纷重新登场,如“生煎馒头、小笼馒头、菜肉馒头、锅贴、粢饭团、糯米团、大小馄饨、阳春面、桂花酒酿圆子、豆浆、鸡粥”等。到90年代,山德士老爷爷带着他的上校鸡块开进上海,接着麦当劳叔叔在上海屋檐下为我们烤制热烘烘的汉堡包,于是快餐革命高潮刮起。上海人民的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早餐桌面的大变化。顺应历史潮流,锐意改革,以“永和豆浆”

* 20世纪10年代上海城隍庙前的小吃摊



为代表的中式快餐店也出现了,以后早餐连锁店纷纷登场。90年代末,中西合璧式的早餐款式为不少上海市民接受,独特创制了海派早餐,如“干果早餐”,把干荔枝、桂圆、花生、胡桃肉等干果作早餐,富有营养;又如“水果蔬菜早餐”,把水果蔬菜制成沙拉或洗净食用。还有“课堂早餐”、“可提式早餐”等,有适应快节奏的,也有慢慢品味的,“蛋饼”、“煎饼”、“奶黄包”、“叉烧包”、“茶叶蛋”、“油墩子”,各取所需。上海的百无禁忌,形成了有所选择改造的、独创的亮丽明快的现代化都市的餐饮气质。

家庭聚餐,请些亲戚朋友,已成经常性的餐饮活动。大圆台面,先冷盘,再热炒,最后大汤和点心。通常所见最普通的,冷盆拼盘有“门腔、肚子、肫干、熏鱼、油爆虾、红肠、方腿、白斩鸡、酱鸭、海蜇皮”等,热炒素小菜有“双菇爬菜胆、油煸生菜、炒茄子、油焖笋”等,荤菜有“清炒虾仁、蟹粉炒蛋、炸猪排、炒猪肝、雪菜目鱼、宫爆鸡丁、酱爆鳝背、霉干菜扣肉、密瓜炒牛柳、萝卜焐羊肉、煎麻雀、炸鹌鹑、砂锅鱼头汤”。有的人一人空闲在家,拷点老酒,“蹄膀笃笃,螺蛳啾啾”,像神仙般的悠闲乐惠。

上海的宁波籍人从浙江带来的家常菜“霉干菜、黄泥螺、炆蟹、鳗鲞、熏鱼、腌笃鲜、豆瓣酱、糟鸡、糟肉、糟猪爪”,这在上海已形成了一组很有特色的食文化,“糟钵头”的范围也扩大,如“糟肚、糟鸡尖、糟凤爪、糟鹅肫、糟门腔、糟顺风”,成了本帮名菜了。还有“咸菜”也是宁波人的爱好,他们说:“三日勿吃咸菜汤,脚里有点酸汪汪。”

20世纪末的上海饮食,已经迅速完成了国际化都市的餐饮业的发展历程,这当然与上海的传统食文化的深层底蕴有密切联系。从今天来看,东南西北、东洋西洋的五花八门的菜谱纷纷登陆沪上,已经分不出划不出“上海菜”的内涵和外延了。有人说,北京的烤鸭、醋椒鱼,杭州的“东波肉”、“西湖醋鱼”,广东的“蚝油牛肉”,四川的“干烧鲫鱼”、“麻婆豆腐”,无锡的“青鱼划水”、“蟹黄油”,苏州的“松鼠鳜鱼”、“黄泥煨鸡”,上海的八宝

鸭、塘鲤鱼、松江鲈鱼、虾子大乌参都已经成了海纳百川的海派菜。迟到一点的四川的“麻辣火锅”，新疆的“烤羊肉串”，云南的“过桥米线”，兰州的“牛肉拉面”等也已成了上海的时髦菜。有个广告中介绍所谓“以本帮为骨集各派之长”的“新派上海菜”是什么呢？是“热炆骆驼峰”和“竹荪云腿煲仔翅”，据说这叫“北菜南用多元化餐饮风格”。再加上，美国的“汉堡包”、“薯条”、“黍米棒”，日本的“寿司料理”，韩国的“烧烤”，意大利的“比萨”，法式“牛排”，都成上海人出门消闲的常选对象也不足为奇了。

休闲餐饮业在上海奇快发展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低档的，也有高档的。法国梧桐笼盖下的衡山路成了香赛丽街式的高层次的休闲街。年轻人打头阵，白领是中坚，不断求新求变。从泡沫红茶坊热到巴西现磨咖啡，从哈根达斯的冰淇淋到 Friday、纽约假日的美式餐饮，到避风港的港式，从必胜客的比萨文化到日式的圆禄寿司，那些膨化“土豆片”、“立体脆”、“品客薯片”、“妈咪虾条”等也上了小酒台，至于各大商场的“大食袋”之类更是汇集种种风味的排档式餐饮。

上海人在休闲餐饮上兼容并包，今天某人可能衣冠楚楚地坐在哈根达斯甜品店吃几百元一客的冰淇淋，明天你就可能看到同一个人穿着汗衫短裤在街头大排档吃得不亦乐乎。上海人的特点是乐意享受雅，但也不回避轻视俗，这有点和香港一样，总之任何一种乐趣都是不会放弃的。他不会因今天在三黄鸡店里喝鸡粥就感到生活品质下降，也不会因明天在新锦江参加外国美食节就感到自己高人一等。穿梭于雅俗之间却始终保持自己本色，是历史造就了上海人的眼界，所以上海不会拒绝任何一种文化，而所有种类的餐饮，从生煎馒头、大饼油条摊到麦当劳、肯德基和茶坊、吧，全能在上海找到立足之地，新潮餐饮一浪胜过一浪。这是上海，你永远说不清它是俗是雅，是文明是落后，是激情是理智。这就是“海派”。

工作生活质量的改变和提高，带来上海人生活方式、用餐习惯的变

化。不再是“早餐像打仗，泡饭加酱菜；中午大锅菜，排队吃食堂；夜里开伙仓，汰烧真够忙”。现在许多人已是“早餐随意，花色众多；午餐简易，套餐盒饭；晚餐着意，宽松实惠；夜宵写意，享受一番”。

这就是上海人的“翻翻花样”、“吃吃白相相”。

上海话中集中了江南人烹调食物用火制作方法的几乎所有的动词：“烧、炒、煎、蒸（清蒸甲鱼）、炖（清炖鸭）、笃（笃蹄膀）、焖（油焖笋）、煊（煊咸菜）、芻（芻油肉）、焯（焯毛豆）、爇（爇面饼）、余（余油条）、焐（焐酥豆）、熨（熨糕）、烘（烘山芋）、余（余芹菜）、溜（溜鱼片）、熬（熬白菜）、爆（爆鸡丁）、脍（脍三鲜）、炸（炸虾球）、扣（扣肉）、烤（烤鸭）”，除了融江南特色于一炉外，北方南方的一些烹调称呼如“涮”、“煲”等词也开始在沪扎根。

“吃”的乐趣使上海人把“吃”这个词的含义也到处引申，“吃”到各种文化中去。除“吃饭”以外，“吃”比北方话多用于一些用嘴的动作，如“吃开水、吃茶、吃香烟”。还用于表示在某一出售食物的地方吃，如：“吃食堂”、“吃排档”。依靠某种事物或职业来生活，也叫“吃”，如：“吃木行饭”、“吃老本”。吸收液体，如：“吃墨”、“吃水”。以下的用法似离嘴吃东西较远了。如耗费：“吃劲”；受：“吃一拳”；侵占：“黑吃黑”；惹、欺负、占便宜：“吃吃依”；得到、接受无异议：“吃进”；敬佩、被人所羨：“吃伊漂亮”；钻、嵌：“吃进去深”；按进：“吃错排挡”；碰到、遇上：“吃硬档”；吞没：“吃没”；受欢迎：“吃香”；入时、拿准：“吃准”；拉扯住、咬住：“吃牢”；“老吃伊（很在乎他）”、“我吃煞依！（爱你没商量）”

此外，还有许多惯用语，如：“吃相”、“吃头塔”、“吃屁股”、“吃耳光”、“吃生活”、“吃皮榔头”、“吃五支雪茄”、“吃外国火腿”、“吃鸭蛋”、“吃豆腐”、“吃野食”、“吃汤团”、“吃排头”、“吃火车”、“吃红灯”、“吃轧档”、“吃夹档”、“吃软档”、“吃瘪”、“吃价”、“吃得开”、“吃白食”、“吃官司”、“吃赔

账”、“吃轧账”、“吃情”、“吃酸”、“吃醋”、“吃软”、“吃药”、“吃下脚”、“吃上风”、“吃火锅”、“吃心吃肺”、“吃老公”、“吃地段”、“吃房型”、“吃冰淇淋”、“吃红笔”、“吃两头”、“吃皇粮”、“吃救济粮”、“吃弹弓”、“吃馄饨”，直到“吃错药”、“吃错人家”、“吃勿消依”、“吃勿落去”等等。这也是一种发散性的“吃”文化吧。

上海的性文化与食文化一样发达，只是比较隐蔽不便言说罢了。谈到性文化，有些人比较忌讳。孟子说：“食色，性也。”可见他并不忌讳，现代文明也不忌讳，普通老百姓也不怎么忌讳。

可以在此举例的，有不少谚语，写出了对两性文化的理想观念和性心理。

那些男女恋爱婚嫁方面的谚语，至今还具有生命力，这些谚语反映了民间社会的纯洁朴实的性道德，反映出包括性心理在内的各种情感心理。如喜爱年轻细嫩的：“自古嫦娥爱少年。”“十八岁姑娘一朵花，三十岁姑娘豆腐渣。”说明两性欢悦寻常的有：“阿里个猫儿勿吃腥，阿里个男人勿吃荤。”说明男女不同性向的：“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层纸。”巧说婚姻择偶的重要的：“嫁得好，哈哈笑，嫁勿好，双脚跳。”说明性生活的深远意义的：“一夜夫妻百日恩。”指出情人本质的：“家花勿及野花香，可惜野花勿久长。”说明女性性欲的：“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说明爱情专一性的深邃的：“勿怕身隔千里，就怕心差毫厘。”“有情哪怕隔千里，无情哪怕门对门。”说明爱情的力量无可阻拦的：“男有心，女有心，铜墙铁壁钻得进。”说明性行为的自愿原则的：“两相情愿脱裤子，一相情愿吃官司。”说明择婿惟贤的：“勿贪门前十亩田，只贪女婿出人前。”说明择夫貌俊有才的：“勿贪金，勿贪银，只贪丈夫俏玲玲。”说明择夫重要的：“早浪饱一日饱，老公好一世好。”说明丈夫比父母、儿子都重要的：“爷娘修勿着半世苦，男人修勿着一世苦。”“儿子生一百，勿如丈夫一只脚。”说明首选家风的：“造房子

看梁,讨新妇看娘。”说明贫富转移与嫁娶择偶之间的微妙关系的:“嫁因要嫁暴发户,讨新妇要讨败落户。”说明爱情的纯洁性的:“三两黄金买勿到,四两茶叶定终身。”说明门当户对总有配对的:“破扫帚配鬻畚箕。”说明新婚甜蜜的:“乡下小夫妻,步步勿脱离。”说明夫妻争吵寻常转瞬和好的:“船头浪相骂,船肚里白话。”“天浪落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勿记仇。”说明女人花七花八的:“小囡口里讨实信,女人面前看功夫。”表现常见的亲新娘忘老娘的:“衔牢奶头嫡嫡亲,有仔娘子黑良心。”表现未得已得的不同心理的:“勿有新妇要新妇,有是新妇骂新妇。”形容岳母爱婿心理的:“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丈母娘看女婿,铜勺铲刀像做戏。”这些民间谚语有的流行于农业社会,如今30岁以下的上海人已经知之甚少。

在30年代,《上海俗语图说》中记载了不少有关性活动的惯用语,如:“拖车、小皮夹子、肉弄堂、开房间、打图书、养小鬼、白板对煞、吃精麻子”等等。还有像一些顺口溜,如“一只床,二个人,散散心,试试看,焐心来,落勿起……”等,在民间流传。

上海开埠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人口流动频繁,艳帜高张,娼妓一业在上海19世纪末起就称名繁多。妓院称“堂子”,最高等的妓女原是悬挂“书寓”牌子的,标榜“卖嘴不卖身”,被称为“唱书先生”。妓女第一次“破瓜”,叫“点大蜡烛”,点过大蜡烛者,称为“大先生”,而那些身犹处子者,称为“小先生”。在妓院中,老鸨又称“本家”,还有一个雅号,叫“七十鸟”。高等妓女,俗称“长三倌人”,“长三堂子”是气派非凡的头等妓院。在这类妓院中,喝茶银洋三元,侑酒、留宿也各三元,故称“长三”,这个名称巧合三十二张牙牌里的一张牌名。“长三”出局,有坐轿子的,也有坐在龟奴肩头上或坐在有电灯的包车上的。二等妓院,称“么二”,因为这类堂子出局二元,如要住夜,算一个双局,需四元,连移茶一元、侑酒一元,共计六元。“么二”门前的招牌往往带个“堂”字,所以上海人概称“妓院”为“堂子”。

下等妓院叫“咸肉庄”，那些妓女藏在家里，等客人上门任选，到此嫖妓称之为“斩咸肉”。出入这类下等妓院的，大都是地痞、流氓、帮会之流。既供吸毒又供宿娼的场所，称“花烟间”，这儿的妓女也是下等的。更下于花烟间的妓女居地，称“钉棚”。还有一种雉妓，称为“野鸡”，所在的妓院，称“开门堂子”，是最下的一流，她们常常躲在电线杆的黑影里，由“搭客娘姨”跟着，一见男人便死活拉去。没有固定场所，常在栈房的“茶房间”等候机会的“野鸡”，称“跑堂口”。专门接待外国水兵或外国人的妓女，称“咸水妹”，从英文“hand-some maid”译音变来，又叫“抛岗女郎”。在40年代，一种由“向导社”、“按摩院”演变而来的变相妓院滋生，“向导女”以导游为名，“按摩女”以推拿为名，实际上在行卖淫或变相卖淫之实，“酒吧女”、“玻璃杯”是那些在酒吧间、茶室等场所以侍女身份出现的卖淫或变相卖淫者。在私娼的队伍中，有一种称作“淌排”的时髦女子，专在马路上往来勾引路人，活像浮在水面上的无主木排，被人涝去，称“涝淌排”。秘密卖淫俗称“半开门”、“私门头”。有人租屋给男女野合的，称“台基”；公开野合，称“露天牌九”；滥交滥嫖兼收并蓄者，称为“垃圾马车”；妇女中老而圆滑或善淫者，称“老蟹”；征妓侑酒，当场唱曲，称“叫堂唱”；嫖客向妓院中报效，称“做花头”；妓女巧取嫖客财物，瞒过老鸨占作自用，称“炒小货”；下等苦力用血汗钱急趋作乐，叫“跳老虫”。

还有一些妓院卖淫的专用语，比如“仙人跳”，说的是有种女人打扮得艳如仙女，诱骗得那些“阿木林”欲仙欲死，“开房间”刚上床，同谋的男子在关键时刻或充仙者丈夫，或三四成群突然闯入，除了请吃一顿“皮榔头”外，必要挟对方献金，不够还需留下借据等才罢议。还有一种丑事叫“拉皮条”，说的是上海滩上有一种“皮条客人”，专门充当《金瓶梅》中王婆的角色，给“姘头”搭角牵线，乐此营生。还有一个词语叫“放白鸽”，并非现今某些青年中说的讲空话开大兴之意，而是借喻一种骗术，那“白鸽”狠心

串通“皮条客人”，觅得“瘟生”，用尽花功，伪嫁从良，待得衣饰钱财到手，不久便席卷之远走高飞。另有一种妓女负了债，即选一个富翁嫁之，不多时尽卷所有遁去，清偿债务，再操旧业，此种行为，旧上海话谓之“涩浴”。通过这些词语，我们可以认识这段历史。

在阮恒辉、吴继平先生著的《上海话流行语辞典》(1994)里，为我们留下了七八十年代一些青年中流行的有关性的词语，对于人类行为学和社会学研究性生活性心理是有意义的。如：“两喇叭、克拉司、跳台、老朋友、老鬼三、水落管子、封条、奶油、白脱油、放白脱油、画地图、脱枪头、毛坯、毛琪、童子鸡、木壳、木卵、单吊、鸳鸯派、拼板、小老公、煤子、煤饼、煤饼生意、煤饼老板、煤饼模子、元宵模子、元宵、尖先生、公车、公共厕所、半开门、打开司、对口型、戴帽子、吹洋泡泡、炒腰花、花、花插插、花板、搭壳子、白相我、白相味道、嫖、对嫖、调排、吃豆腐、进棚、揞电铃、打跳台、摸田螺、开荤、对口径、开房间、小房子、打桩子、凿榫头、过元宵、开两叉戟飞机、车、车赖三、车三头、车煤饼、车模子、敲煤饼、敲玻璃杯、打野鸡、打野食、吃野食、开后盖、吃女饭、拆白、咬卵、搓卵、缩卵、狗卵子、发屎疯、窑口、24K”。

现今，有关性方面的词语倾向于幽默化。如：“大波霸、太平公主、老朋友、小白脸、戇卵、屁精、太监、小老公、小花、花花、花边女友、小妖精、波斯猫、阿那达、小秘、朱丽叶、绝代佳人、不婚族、花心大萝卜、伟哥、同志、人妖、小狼狗、小鸭、兔子、蕾丝边、同人、放电、来电、拨电到、走光、意淫、情流感、情圣、蜜蜂、超快感、打开水、打K司、互相喂饭、飞一个、开司米、打波、单飞、双飞、见光死、网婚、试婚、敲定、阿根廷、奉子成婚、先上车后买票、成交、敲钢印、做人、做人成功、踏空、红灯、解套、资产重组、更新了一个、过去式、复盘、灯泡、劈腿、发春、发浪、嫖人、白相我、有花头、外插花、野插花、打野食、419、搓、搓妹妹、搓模子、泡MM、泡妞、倒搓、开倒车、

养小蜜、老牛吃嫩草、看 13 频道、开牙、开荤、开浪、百得胶、同居蜜友、同城恋爱、异性合租、异租、后花园”。参见笔者 2006 年《新世纪上海话新流行语 2 500 条》。

六、禁忌语、委婉语、吉利语

世界各地的语言或方言中,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禁忌词语,上海城区和郊区流传的禁忌语大都相同,城里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洗刷,多数禁忌语已淘汰,但在老年人和郊区群众中还有不少流传。

忌讳同音的禁忌语,最突出的是“死”字,在老上海话里是没有同音字的,就是为了避免在说别的词时触及这个音。北方话中的“洗”由于在上海话里与“死”同音,所以上海话从来不说“洗”而说“汰”,“洗澡”称“汰浴”。现在由于尖团音不分合并,“死”与“喜”居然在上海话里同音,人们也不觉得有什么不便。在上海话里,“鹅”和“我”同音,“杀鹅”如同“杀我”,而且“鹅”有“呆头鹅”之称,上海人很忌讳“呆”和“傻”,于是大家改称“鹅”为“白乌龟”。有人在送礼时忌讳送“钟”,因为“送钟”和“送终”同音。其实结婚或搬家时送朋友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何况现在艺术钟也很漂亮,聪明的上海人又想出与书一起送的方法,因为在上海话中“书”和“始”又同音,于是叫“有始有终”就转为吉利语了。在探望病人的时候,有些人忌讳送“苹果”,只因它与“病故”同音。有的人在家吃“生梨”时,不愿切分,就因“分梨”和“分离”同音。因为“伞”和“散”同音,“分散”、“拆散”都不吉利,至今在松江、奉贤的乡下,还把“伞”称为“聚立”,取其反义。“舌”与“折本”(又写作“蚀本”)的“折”同音,于是“猪舌头”就唤作“猪赚利”。

过去,上海的交通主要靠船,船民的忌讳最多。他们忌“翻”、“沉”等词,乾隆《宝山县志》中记载宝山人俗称“幡布”为“抹布”(即“擦桌布”),船民则由“幡”和“翻”同音,“抹”又和“没”同音,就改称“转布”。船上也很怕“失火”,讳言称“走水”。“筷”原来叫“箸”,上海至今还有人把插筷的器具称“箸箸笼”或“箸箸筒”,就是因为“箸”的含义后来渐渐淡忘了,加上一个“筷”字形成“箸箸”的同义重叠,但由此可见“筷”在上海过去是说过“箸”的。原来“箸”和“滞”在上海话里不同音,但后来因为语音的合并变得同音了。开船人不喜欢“滞”船而希望“快”,于是反其意称“快”,后来又加上形旁“竹”,称“筷”。英语里原来没有“筷子”这个词,现在称读“chopsticks”,就来自清末民初的上海租界的洋泾浜语“chop chop(快)”,它的构词法也与中文“筷”的造字法大致相同:“stick”是“棒”,加“s”就是因为有两根。可见在19世纪“快”和“筷”确有联系。

忌讳与生殖器官有关的词语也是世界共有的现象。在松江方言大区内,现在还有大片地方称女生殖器叫“豚”(俗作“笃”),是个人声字。它成为可以证明上古人种同源的鉴别词。上海人骂人时还有“侬只笃脸!”这样的骂法。这个词在明末就有记载:冯梦龙著的《山歌》中有一首来自松江的民歌题目叫《笃痒》。这里的“笃”和“痒”都是今松江地区的避讳词。于是女阴在现在还称“笃”的地方,凡是与“笃”同音的词就得让位,如“丢脱(丢掉)”读作“得脱”,用火“笃蹄膀”只好说成“托蹄膀”;他们还忌说“痒”,因为当地“痒”有“发骚”的意思,于是“身上痒”说成“身上叮”,这种说法在别的地方听来就觉得很怪。他们还忌讳“52”这个数字,问某人“今年几岁?”(顺便说一下,有一次笔者问一个18岁的北方青年人:“你今年几岁?”他很不高兴认为我小看他了,这又犯北方话的忌,因为他们只有是10岁以下的人才能问“几岁”)答曰“刚过51”或“开年53岁”,因为“52”的手势语像男子生殖器的形状。至于“66岁”,据说是要到“棺材板上碌一

碌”的,所以也忌说。

日本忌说“4”,因与“死”同音,所以不但在数数字时改了读音,还有许多大楼没有四楼或四室房间。西方也有忌“13”的。上海没有那么普遍的数字忌讳。但最近几年也跟着广东人开始喜欢“8”忌讳“4”等,这在文明大都市里实在是一种倒退。

禁忌语是迷信形式在语言中的反映,随着城市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高,年轻人都对此不以为然,禁忌语在衰退之中。然而,另有一种委婉语,却是为了文雅、礼貌、不触及对方痛处或表示某种特殊的感情色彩而采用的含蓄的用词方式。

比如说“死了”太直截了当,就改称“旣没了”、“故了”、“去了”、“百年”、“过世”、“老天年”。“翘辫子”也是一个讳称,在他称时带有贬义,在自称时却带有戏意。把死人用物称为“寿衣、寿材、寿器”,将“死”称为“有长短”、“有三长二短”,“生病”称“勿适意”、“上勿上”、“勿称心”,“诊病”称“看医生”,“月经”称“老鬼三”,“来月经”称“老朋友来了”、“身浪向来了”、“身浪转”,“遗尿”称“画龙”,“遗精”称“画地图”,“性交”称“敦伦”、“同房”,“怀孕”称“有喜”、“坐床”,“拉屎”称“出恭”、“办公”,“拉尿”称“方便”,“上厕所”称“去一号房间”,“小便”戏称为“唱歌”。抱在手里的婴儿“漏涎”和“拆尿”在衣裤上,利用同音讨个吉利就说“有财有势”。现在为减少刺激,把“涨价”说成“调价”,把“失业”称“待业”,把“辞职”称为“下岗”也属委婉语类。至于像当教师称“吃粉笔灰”,考试不及格称“开红灯”,得零分称“吃鸭蛋”更是运用比喻借代等修辞方法构成了委婉的惯用语了。

除了委婉语外,人们还喜欢互相说些吉利话,用些吉利语,以欢庆贺喜,祈保安康幸福,尽管有些吉利语显得有点牵强附会。比如看到有个蜘蛛(足长的上海人称为“喜蛛”)从梁上或窗上吊下来,就说是“喜从天降”;

画两个铜钱,说是“富贵双全”;挂一个帆船(“帆”上海人又称“篷”)模型,称“一帆风顺”或“鹏程万里”。吃甘蔗时,说“节节高”;吃“圆子”时,说“团团圆圆”。在婚房里,放上“红枣、花生、桂圆、瓜子”,是谐音“早生贵子”四个字。过年时要吃“全鱼”,说是“年年有余”;吃年糕,象征“年年高发”。有时在放鱼头的碗里,又一定放上鱼尾,叫做“有头有尾”。有一种“炮仗”称作“高升”,在年初一凌晨燃放,祝愿在新的一年里可以高升。近年来,在门上把“福”字倒贴,预言“福到”,把“黄金万两”四字竖着拼连写起来,把“招财进宝”四字拼合写在一起,以数字“8”代“发”(来自粤语)图吉利,以至在电话号码、汽车号码都要图个吉利,又活跃起来了。不过,多数人在使用这些吉利语的时候只是表达一种追求吉祥向上的愿望,并不迷信。

七、戏谑语、詈语

上海人在开玩笑时喜欢使用戏谑语。比如:戏称近视戴眼镜者为“四眼”、“四眼田鸡”;称身材高瘦者为“长脚鹭鸶、电线木头”、“衣裳竹竿”、“竹竿”;戏称矮小者为“矮老卜头”、“矮冬瓜”、“矮掇髻”、“石秤砣”、“二等残废”、“根号2”;称矮胖者为“柏油桶”,戏称肥硕者为“大阿福”、“排门板”、“烂大块头”、“吨位大”、“三段论”、“卡门”、“大块头呒清头”;戏称臀大者为“圆台面”,腰壮者为“柏油桶”;称长满粉刺者为“赤豆棒冰”;称瞎了一眼的人为“独眼龙”;戏称人呆为“火烧木头”;戏称饶舌多言者为“烦老太婆”,戏称坐在别人家里多言不走者为“烂屁股”;戏称夜里精神抖擞积极活动的人为“夜神仙”;称懒料吃光用光者为“脱底棺材”;称听别人话即改主意者为“软耳朵”;戏称思想顽固守旧的人为“老古董”;戏称是非不分谁也不得罪的人为“好好先生”;戏称“十三点”为“B拆开”“十一点八

刻”、“十二点多一点”；见人夏天被蚊子叮过的腿，称“香雪糯”；说一个人已睡着了，是“到苏州去了”或“去昆山了”；说一个年轻女子追求人之多，谓“排队从南京路排到王府井”；对于离婚者，戏说“祝你再接（结）再厉（离）”。由于谚语趣语具有轻松自由的语义建构方式和比喻夸张型的意象，给人一幽默感受，一般是用在关系较好的亲朋同事之间之“打朋”，有的词虽近于骂人或揭人之短，但一般不带恶意，有时不过是一种调侃，人们听了后会笑出声来，可见不是正式骂人，笑过也就罢了。因此创造这些词语的一大条件是幽默含蓄形象，逗人发笑，常常运用委婉、借喻的修辞方法。不过，有的戏谚语和詈语是难以划清界限的。

现在新一代人过日子越过越幽默，上海话中新流行的戏谚语越来越多，如：月光美少女、月光公主（每个月在月头就把零用钱花光的女孩子），信生活（短信生活，由‘性生活’谐音而来），信骚扰（用手机发短消息骚扰别人），根号3（身高欠高的男生，只有1.73米高），袖珍男（身材矮小的男子），月抛型（原指一种隐形眼镜，每月换掉一副；现喻指每月更换一次男友、女友的人），排骨美女、骨感美人（很瘦的女性），资深美女（称年龄较大的女子），内存忒少（对付人家的修养不够，肚里知识少），洋山芋吃多了、肚皮里塞只洋山芋（笨。‘土豆’与‘土头’同音），University（由你玩四年，借音），粢饭糕（又痴又烦又搞的女子），本草纲目（又笨又吵又蠢又木），老痴（人笨，患老年痴呆症），烧饼（廉价多情的女子），少女系男生（长得比较女性化的男生），神童（神经病儿童），小白（白痴），可爱（可怜既没人爱），爱心（爱钱没良心），爱神（爱发神经病），放牛娃（男友），校草（校内最美男生），扑克面孔（不拘言笑、板着的脸），秦始皇（写情书高手），恐龙蛋、飞利浦（秃头），原始股（无恋爱经历的纯情男孩），黑暗料理（路边食摊），高四3班（高复班。有语文、数学、外语三个班），关公、关婆（指不给学生考试及格的男女教师），中外合资（混血儿），资产评估（谈恋爱），资产

重组(再婚),垃圾股(没用的丈夫),练美女功(睡觉),南极人(穿得多的人),胖头鱼、航空母舰(胖人),救生圈(腹部多肥肉),前公尽弃(离过很多次婚的女人),买根线粉吊杀(形容人之软弱无能,不如死了吧),接了张罚款单(收到了一张喝喜酒请柬),耳朵放辣蒸笼里(没有听到,没有听懂),乘 89 路到底(去精神病院),长得影响市容、长得对不起人民、长得老有创意(长得很难看),养眼(受用、形容女子漂亮看了舒服),等等。

詈语即“骂人闲话”。它有两大类。一类是骂某一特征或带此特征的人的,如:强盗坯(骂乱抢乱夺乱闯的人),碰哭精(骂动辄要哭的人),饭桶(骂只吃饭而无用的人),阿木林(骂头脑不灵巧什么都不懂的人),轻骨头(骂性情轻浮者),阴司鬼(骂明里不言暗中会盘算损人的人);此类词还有:赖极皮,刮皮精,吵客,宝货,搅家精,现世报,半吊子,下作坯,馋痨虫,呆木头,浪荡子”。另一类是通骂,如:小鬼头(骂小孩),孙子王八蛋(骂人为低劣之种),浮尸(骂人如水面上的尸体),娘个东采(不满时骂语)。由于嬉笑怒骂是人之常情,所以几乎人人都会用詈语,说詈语不等于人品低下。詈语不就等于脏话或污秽语,有的詈语还造得十分形象。

从詈语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民众的生活状态、社会心态和人性特征。

市民文化的特点是开放度大,兼容性强,尤其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江、浙、皖、粤等全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人口都来上海,不同的文化互相碰撞和融合,连詈语也五花八门,如苏州的“杀千刀”,宁波的“乌龟强盗坯”,宝山的“阿污卵”,浦东的“佘江浮尸”,奉贤的“研草皮”,还有夹杂洋泾浜英语的“出老码子”,等等。

由于詈语由衷发出,直率无忌,其反映的各类人的人之常情甚为赤裸,是人类行为研究的一面镜子。

不少詈语生动形象,喜用比喻,带戏谑味。商业社会带来生活趣味上的闲适性,嘲骂方面变尖刻为调侃,变讥讽为幽默,于是趣味性的、深层次对应而表层上疏远的比喻,或情节性的描摹,就用在詈语表达的幽默上。如“三光码子”指“吃光、当光、用光”的人;“缩头乌龟”骂头不伸出,尤指天冷懒得缩起来如缩在被窝里的人,又比喻遇事退缩者;“烂泥菩萨”喻自身难保的人,或无回音无补于事的人,或和气、笑容满面的人,泥菩萨的几个特征都被借用到了;又如“蜡烛”可喻不知好歹不识抬举的人,也可喻一贯有利于别人因而消耗自己的人,褒贬两义都在用,而且后面一义也可褒贬两用,贬义的法如:“侬只蜡烛,人家一点点也勿感谢侬!”又如“老油条”是一根油条煎好放着时间长了,变得很韧不受欢迎。上海人用它来比喻那些处世经验多而油滑的人,或骂历事或阅世久、做事马虎推拨不动又不听劝戒的人。对于那些在国有单位经常捣蛋、惹事生非、难以管束的青工,老师傅常厌称他们为“小爷叔”,用此词是常带善意的。对于一帮歹徒,上海人比作“乌龟狗强盗”。还有像“跟屁虫”、“软耳朵”、“墙头草”、“鸭屎臭”、“买块豆腐撞杀”等等,都很形象有趣。

詈语的构成使用大量的后缀。骂一般的“初犯”或带稚气的,常用“小”当头;资格老的,陷入深的,即用“老”字,以示其“老吃老做”;带有亲近感的有点可爱的,前带“阿”缀,因是从“阿哥阿嫂”引申过来用的;“头”、“人”则仅代表一种人;“种”则代表一种“种气”了,可能其基因都不好;深一层的则骂到人身上的一部分“皮”啊“骨头”之类,直到生殖器,指某一方面长坏了;再进一步就是那个“坯”和“模子”坏了,即还没放进炉里窑前就是坏的,或者是个半成品;“货”则把人当成蹩脚的“货色”不屑一顾;如虫如狗也不把他当人看待;最精彩的是“出精出鬼”,即惯犯到家了,用那些“精”、“星”、“鬼”作后缀挺合适。下面列举一些:

“老”缀:老糊涂,老刮采,老油条,老门槛,老面皮,老甲鱼,老古董,老

十三。

“小”缀：小贼，小祖宗，小鬼头，小滑头，小塌皮，小热昏，小毛贼，小乖人，小瘪三，小出老，小棺材。

“阿”缀：阿慧，阿土生，阿污，阿猫阿狗。

“子”缀：痴子，婊子，浪荡子，石卵子，灰孙子。

“头”：杨树头，寿头，踱头，怪人头，三吓头。

“人”：懒人，外星人，吃官司人，柴草人。

“种”：忤逆种，杂合种，坏种。

“皮”：泼皮，赖皮，厚皮，赖极皮。

“骨头”：贼骨头，贱骨头，软骨头。

“坏”：懒惰坏，懒料坏，强盗坏，下作坏，杀坏，杀头坏。

“码子”（新又作“模子”）：连裆码子，滑头码子，小刁码子，出老码子，精乖码子，煤饼模子，青海模子。

“货”：顶头货，缩货，丢脱货，垃圾货，骚货，烂污货，宝货，蹩脚货。

“虫”：磕头虫，跟屁虫，馋痨虫。

“狗”：疯狗，哈巴狗，癞皮狗，落水狗。

“鬼”：懒鬼，馋鬼，赌鬼，牌鬼，捣蛋鬼，讨债鬼，刮皮鬼，促掐鬼，枪毙鬼，极鬼，小气鬼，吊杀鬼。

“精”：马屁精，搅家精，碰哭精，赖学精，狐狸精。

“星”：霉鬼星，丧门星，扫帚星，白虎星，克星。

有的是言辞激烈，骂得厉害就有解恨之感，于是言辞夸张，如“杀千刀”、“死脱依祖宗十八代”等。这还感到太虚，便骂骂着实。如用疾病死亡来诅咒：“烂嘴巴，生疮，生癌，去死，短命鬼，到西宝兴路报到”等。但是有的是爱恨交加，口心不一。因此表面是骂心里是爱，或怒其不争。如骂“冤家”，实是“亲爱的”的意思，称丈夫“迭只老棺材、死浮尸”，都是把词义

用虚化了,与称“老爱人”没两样,如不这样称,改为“我个老爱人”反而说不出口听不惯。有的詈语常用在“倒反”的修辞手法上,用作反语,骂“小出老”、“小鬼头”、“瘪三”、“神经病”,实际上却怀有爱昵之心。“侬只臭棺材到啊里搭去啦?”父亲“骂”他孩子说。“出老伊夜饭还呒没吃过,死辣外头辣海!”妻子常常这么“爱”丈夫。

从詈语中还可以透露一些其他信息。如城市人的自豪感,看不起外地人乡下人,缺乏平等意识。如有些人一概把外地来沪的人统称“阿乡”,叫乡下人为“巴子”(是“乡巴佬”的简称)。把外国人呼作“老外”,而过去“红头阿三”、“罗宋瘪三”、“洋盘”等都是对外国人的鄙称。

詈语反映的是最底层的方言文化,地方色彩很重,直接折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及其喜怒哀乐。毋庸讳言,詈语中也有一些下流词,文化教养低、道德素质差的人甚至使个别下流词语成为口头禅,成为有的人说话中时不时流出的“标点符号”,污秽詈语的出现频率也是衡量某个地方的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标志。

由于中小学稳定教育的成绩,由于城市的国际化进程的加速,由于知识阶层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上海社会的流行语言层次变高了,这使得一些詈语变了味,变得不那么粗俗不堪了,比如现在大学生、青少年和白领中的骂语:“侬脑子烧坏脱了”,“脑子要大修了”,网上称长相不算好看的女性为“恐龙”,与“恐龙”相对的男性是“青蛙”等,其“詈骂度”大为降低。

五方杂处的上海曾经汇集过各地的粗俗詈语。但是随着90年代都市的加速现代化,像公共场合吵架大为减少、公交车上大为安静、青年吸烟大为衰落一样,大家一早醒来,发现上海的詈语这几年来已大大简化和减少了,这叫文明一旦扣上门来,也是势不可挡的。

现在一代的年轻人,是上海人中间詈语使用最少的一代。这个最少,

有两层意思,一是大部分人不会骂粗鲁的詈语,即从不出口粗话;另一个是常听到的詈语仅是少数几个了,下流的詈语不用了。“詈骂度”变低,而且常带幽默。现今年轻人中用的频率最高的詈语是骂对方“蠢”、“拎勿清”。

上海人的“蠢”,是针对“精明”而言的。现代商业社会中的上海人都把“精明”奉为神明或护身符,它是一个谋生的必要手段。因此聪明人人人喜欢,反之就是“阿木林、阿屈死、洋盘、阿土生、阿乡、巴子、蜡烛、寿头”等,有一串的反义词。

其中有一个最典型的称呼便是“阿蠢”了,“阿蠢”是“蠢大”的“雅称”,就是傻子。上海人,尤其是越年轻的人越对“蠢”看不起,用种种的话语来羞辱嘲弄“蠢”。比如说他“脑子拨枪打着了”,或“脑子抽牢”,“脑子缺氧”,“脑子烧焦脱了”,“脑子别筋”,“脑子开过刀”,“脑子装过拉链”,“脑子进水”,“脑子短路”,“脑瘫”,“老痴(老年痴呆)啊?”“依近亲结婚啊?”;女生还可延伸到“寿头怪气”,“神经兮兮”,“十三点兮兮”,“人老痴个”!

说一个人,“蠢头蠢脑”,“拎勿清个”,“内存忒少”,“黄鱼脑子”,是“386(反应太慢)”,真是个“菜鸟(外行新手)”,常常“摆 pose 发蠢”,“练蠢(做傻事)”,发“脑膜炎(脑子有问题)”,“脑子里一笔浆糊”,像个“浆糊桶”,“算数了(没救了)!”这样便是将骂“蠢”进行到底了。

如果是自己后悔把事搞糟,他也会自我检讨,而他第一个想到责备自己的词儿就是“蠢脱了”,就像日本人骂自己“八格”一样(日本人骂“八格呀鲁”,出典是“指鹿为马”,也是在骂“蠢”)。“蠢”字一用上“脱”,也就贬义到位了,因为只有“坏脱”没有“好脱”,只有“臭脱”没有“香脱”的。“蠢脱了,我去买一只介蠢个写字台来!”把事做坏,错过一个机会,都可说“蠢脱了”。而且东西之丑、之笨重、之难看、之不时髦、之不酷,一言以蔽之,都叫“蠢”。“依买罴只蠢物事来做啥? 脑子出问题了!”

社会知识化,上海人现在最怕“蠢”也最忌“蠢”,不学习,老是那样“蠢”下去,就难以在上海的竞争社会里立足,怎么能适应 21 世纪的知识经济呢?人人都忌“蠢”也就很自然了。人们恐蠢的形成原由,有一个是来自孩提时代。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是从中小学出来的,考试测验身经百战,考不出要被老师同学看不起,家长责备,坍台哦?孩子们最怕的事即被老师斥为“拎勿清”、“笨”,于是也难怪大家都患恐蠢症了。上海的“蠢卵”与北京的“傻逼”遥相对应,“蠢”在上海已被列为最不受欢迎的词。一个有力的佐证是:上海的詈语中,“蠢”已脱颖而出,成为骂词之最。

八、新时代中蓬勃产生的新流行语

在新词新语中,最活跃的部分,是新的民间流行语。

流行语产生于民间深厚的土层,生动具体地表现了人民群众在当下的思想、情趣和生活面貌。只有贴近民间生活、思想、情趣的语言,才是最有活力的语言,流行语是活语之一。

市民社会天生具有产生流行语的深厚土壤。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流行语异常活跃,1924 年严芙孙著的《上海俗语大辞典》和 1935 年汪仲贤著的《上海俗语图说》,记述了上海当时作为远东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全盛时期中的俚词俗语,如:“洋行小鬼、红头阿三、白相人嫂嫂、掙客、小白脸、毛脚女婿、外国火腿、看脚路、吃讲茶、卖野人头、捞锡箔灰、驼子跌跟斗、拆空老寿星、叫化子吃死蟹、崇明人阿爹”……这些当时的流行语,为我们今天研究当年的社会风貌、历史文化民俗保存了一份难得的资料。

流行语有以下几个特征:(1)流行性。许多词语反映表现了一种时髦的概念行为,如用“斩”称一种敲竹杠的商业行为,由于被斩人之多而流行

开来;“吃青春饭”因时装模特、礼仪小姐、宾馆服务员以至陪酒女郎的兴起而流行开来。“大兴(非正宗)”一词的通行,与社会上流行冒牌货盗版货和假冒行为有关。天下万物,周而复始。大量的流行语有一定的流行时期。有的词语随岁月而逝,如“大团结”(10元人民币,80年代用)、“6点05分”(戏称头歪向一边者,50年代用)现已销声,而“辣妹”、“粉丝(fans)”、“拼的”、“煲电话粥”、“操机”、“有 feeling”、“脑子格式化了”、“秀了一把”等,则时兴当今。好的流行语经过时间的考验,会一直保留下去。如在上海话中产生于20年代的流行语“戳壁脚”、“出外快”、“收骨头”、“敲木鱼”、“扎台型”、“阿木林”、“脚碰脚”等,至今还在使用,成为上海话固定词语。(2)方言性,社区性。流行语从一个地区一群人中先用起来,由于大多数人的母语和日常用语是方言,所以它很自然起自方言,如“火爆”来自粤语,“套牢”来自上海话。同用粤语,还有社区的不同,如“炒鱿鱼”来自香港,“爆棚”来自广州。“作 show”则来自台湾,是社区词。(3)俚俗性。由于流行语往往出自闾巷民间的下层,带有俚俗风味。如“马大嫂”(忙于家务的女人),就谐音“买、汰、烧”;“泡 MM”指追女孩,都表现出俚俗的一面。(4)惯用性。常用特定的比喻义取得一定的习用性。如用“劈硬柴”指“AA制”,用“瞎猫碰着死老虫”称运气好。(4)阶层性。“爬格子”流行于作家知识阶层,“背猪猡”流行于中学教师,“砌墙头”流行于里弄退休职工,“关脱”流行于大学生,“二进宫”流行于小流氓,“打样(窥探动静)”流行于小偷,“打底脚(包装时在底部放劣质食物,多指水果)”流行于个体商贩,“拉网”流行于警察。开始时,有些词在某个阶层里使用,后来才用开来。如“孵豆芽”旧指“英雄落难”卧待时机,是从瘪三升到大亨的应有过程,现在成为通用的流行语,意义引申扩大到无工作或不参加工作呆在家中。“充电”原流行于青工上业余夜校学习,现扩大为进修补充知识意思。(6)形象性。流行语来自生活,民间的生活本身新鲜活泼,

幽默诙谐,宽松不加讳饰,流行语也往往因其生动性而取得流行资格。如用“调频道”称换说话内容,用“吃老公”指用公家的钱,用“来电”指男女一见钟情,用“打电报”称眉目传情,用“插蜡烛”称不知趣地处在两恋人所在的地方,用“脱底棺材”称吃光用光身无分文者,用“黑猫(警长)”称警察或门卫,用“童子鸡”称“未有性经验的男青年”,用“垃圾股”喻不理想的恋爱对象。又如“勿要忒……噢”的形式,相当于古汉语的“不亦……乎”,因为它的生动而迅速流行开来。用“11点8刻”称“十三点”,“567保密厂”称环卫所(是567乐谱谐音“扫垃圾”的缘故),用“61”谐音“拉倒”,用“学习144号文件”称玩麻将,用“本草纲目”谐音“又笨又吵又戆又木”。流行语中经常闪烁出群众从生活中来的睿智和创造力。(7)青春性。青年人是最有创造力的一群,如用了一系列单音形容词,像“爽”、“酷”、“蔻”、“跳”、“炫”、“妖”、“牛”、“逊”、“草”、“巴”、“戆”等,表现了他们的概括力较大的现代感受;他们用了许多极端程度副词,如“瞎嗲”、“暴嗲”、“绝嗲”、“恶嗲”、“嗲得一塌糊涂”、“勿要忒嗲噢”,来表达激动心情和狂欢情绪。可以说,新流行语几乎都是30岁以下的人群创造的,因为他们有创新和从众的两大优势,新的词语就很快造出后又很快流行开来。

群众中的流行语,最贴近人生,最反映群众的思想情绪,表现群众各方面的生动活泼的原生状态,是新鲜的时尚的生活缩影。“五四”时代,胡适的“八大主义”之一就是“不避俗字俗语”。我们站在发展语言的立场,应使我们使用的语言摆脱墨守成规干瘪无力,而大量吸收新鲜活泼的口语,以利于创造性地健康发展。

我们还可以透过那些流行语,了解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区域、不同的文化群体是如何组成复杂多层次的社会行为的。从人类行为学的眼光看,不同层次的人创造不同的流行语,反映着他们不同的行为生态。流行语多角度地提供了我们各阶层社会风貌的真实信息。

上海市民的海派情结和语言创新精神已经形成一种潜流,即使在语言生活很压抑的年月里,仍然不会消亡。六七十年代,社会封闭,舆论一律,思想没有活力,只有在街巷底层或僻远之处有些词在悄悄流传,如五七干校中有“屁股架子(凳子)”,农场职工有“外国礼拜(临时休息日)”,小流氓中有“对开(一对一较量)”、“让地皮(把好的势力圈让给胜方)”。上海市民意识的重新觉醒、市民俗语的重新崛起和活跃是在70年代后期,从那时起,民间流行新造的词语成批涌现,一般从当时最活跃的地方产生和流传开来。在70年代末流行开来的词语有:“立升、浪头、帮帮忙、兵兵响、腔水浓、一只鼎、一级、顶脱了、戇脱了、开大兴、攒浪头、拎勿清、挺账、开洋荤、通路子、起蓬头、攀模子、搭错经、二进宫、八零八、下只角、上只角、刮三、煞根、隔手、硬档、软档、阿乡、马大嫂、差头、我秤辈子认得依(我算被你耍了一次)、碰着依算我路道粗(对于对方的行为无计可施)”等。有些是30年代流行语的复活(如“扎台型”)和转义(如:“放白鸽”)。什么地方成为热点,往往就从那儿流传出新流行语。80年代初,自由市场开始活跃起来,成为民众比较关注的地方,于是在该处集中产生并传开了诸如“扒分(赚取额外收入,后泛指挣钱)”、“大兴货(低劣冒牌货)”、“肉里分(血汗钱)”、“一张分(十元钱)”、“跑秤(缺斤两)”、“撬边(从旁暗里帮腔推销)”、“攒浪头(夸海口信口开河)”以及“斩一刀、斩冲头、翻跟斗、开棚、校路子、黑猫(警长)”等词。90年代初,随着股市的兴起,又出现了“牛市、熊市、火棒、跑道、刮盘、放盘、接盘、割肉、套牢、解套、吊篮头、垃圾股”等词语。市民社会天生具有产生流行语的土壤,上海市民的海派思维和语言创新传统根深底厚,只要环境宽松,民间流行语自然会滋生出来。

90年代起至今,社会全面开放,上海的流行语蓬勃兴起,上海人造词中的想象力比以前更丰富了,如:爆人(能干厉害的人),跟包(跟在人后拎包),正卡(正宗的、原装的、原版的。与“大卡”反义。),条干(身材),粉

丝(发烧友),免提听筒(经常自言自语、没人去听他的人),操机(玩电脑,打游戏),操网吧(去网吧上网),有节目(出去玩,有安排),跌停板(运气差到极点;绝对不受异性青睐),调频道(换话题),搭节目(设计、安排内容),解套(解除困境或负担;离婚),复盘(复婚),撬课(逃课,旷课),操夜(熬通宵),吃红笔(生意不好做,不景气),联网(谈恋爱),泡吧(在“茶吧”、“氧吧”、“陶吧”、“酒吧”、“网吧”等各类“吧”中长时间消磨),天吃星(很会吃的人),红头苍蝇(穷追不舍的记者),搞笑(让人觉得好笑),搞脑子(惹麻烦瞎捣乱),房虫(专做租房生意的人),练蠢(做傻事),发调头(发指示发话或下命令),发飙(大发其火),翻毛腔(突然发脾气),转会(用高价请人转单位),空手道(不花钱占便宜或无本赚钱的手法),拉头发(用负离子做头发),拗断(中断交往友谊),拉风(有派头),看电影(洗澡),惨(糟糕),近亲结婚(笨),拜菩萨(贿赂),看13频道(年老者看青年男女谈恋爱亲热),香飘(得体、漂亮、有气度),贴边去(闪一边去没你的事),宕分(欠款负债),拨依一盒水彩笔(给你点颜色瞧瞧),脑子格式化了(脑中空无一物)。

笔者2006年出版了一本《新世纪上海话新流行语2500条》,我们从这些流行语可以了解到一些20世纪末年的新生活风貌。

网络的开通对世界的语言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流行语的许多特征进行了颠覆,网络语言改变了流行语,流行语的生态发生了大变化,表现在:从底层到高层,现在活跃在网上的首先是青年知识分子、白领等,流行语不再是从社会较底层的群众中产生而从知识阶层产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流行语的俚俗性,网上流行语常常反映了时尚和科技、文化新潮流,由于网络流行语是用汉语拼音输入的,又是在世界范围传播的,因此现在的流行语从方言性到普通话化,从社区性到世界性,从阶层性到全民性,从口语性到书面语性,这种趋势日益明显。但是流行语的青春性和流行性永远不变,所以流行语还是流行语。

第六章

上海话使用的社会层次

一、年龄差异、性别差异中的上海话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上不同的年龄、性别、职业、阶层的人在使用同一种方言时都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来。现代诞生的社会语言学就着重研究分析导致语言差异的各种社会因素。现代语言学中方言的概念也不再仅指一种语言在地域上的变体,它同时还指时间、社会和风格的变体。

观察上海话的人都会发现,上述诸因素之中,年龄差异是上海话最显著的一种差异,年龄差异也就是语言历时的差异。

由于社会发展迅速,上海的老中青三代在语音、词汇、语法的使用上差异都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1. 简化的趋势。上海话声调从160年前的8个,到现在只有很少老年中合并到6个,绝大部分人只有5个了;韵母在1853年时有63个,现在在中年以上的人中合并为42个,中年以下并为32个,或正在向32个韵母合并之中。语音一合并,就会增加一些同音词,如原来老派“舌头”与“石头”不同音,有些青年人就同音了;还有“拆尿”与“出书”“测试”,“出版”与“擦板”都变得同音。同音词的增加,借以汉字来区别,在语流中一般是不会引起混淆的。还有像“十五”这个数词老年人有特殊的读音,说成“[son]”,现在青年一般用与“十四、十六”一样的说法,读“shekn”,音同“拾五”不再采用特别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简化。青年人语音上声韵调的合并,伴随着同音字的增加,于是双音词就增加,原来用单音表达的意义就只能用双音词来表达,如老派多说“袜、嘴、鸭”,新派就多说“袜子、嘴巴、鸭子”。双音词的结合紧密,又带来了连读调的简化、单字调化。这些都是语言内部的清楚、经济两条规则自动调节的结果。现代汉语个体量词纷繁复杂,众多搭配并无规则,为古汉语所无。近年

来,上海话个体量词有简化趋势,优势词是“只”字。过去,“只”字的使用范围已很广,如“牛、马、鸡、狗、羊、凳子、帽子、馒头、床、收音机、箱子,学堂、井”都可与“只”搭配;后来“只”又能指“一种、一类”,如“一只布(一种布)”、“掰只菜(这种菜)”,如说“掰只布颜色勿大好看”即指“这一种布颜色不大好看”。“只”字现在青年中使用范围更大了,如“一只班级(原用‘个’),一只(个)指标,一只(个)任务,一只(个)报告,一只(个)文件,一只(个)地方,一只(部)机器,一只(门)题目,一只(部)扶梯,一只(部)片子,一只(盆)盆菜,一只(份)青菜,一只(把)扫帚,一只(个)戆大,一只(个)老太婆(贬义)”,与“掰只”相配还要多些,如“掰只玫瑰花开了”,“掰只铅笔太淡”。

2. 语速增快的趋势。老年人双音词少于青年人,三音词的结合有时读起来也不够紧密,如有时会把“三鲜汤”、“芭蕉叶”中的前两字和后一字分开读。双音节词的连读声调老派也是复杂多样,比如“胆小”读“44 长调+44 长调”,“洒水”读“34+53”,连读时曲折而后字较高较长,但新派上海话这两个词非但大量连调形式合并成相同的调型,而且都读成前一个字的声调 334 的形式的延伸 33+44,后字失去原声调而前附,这样连说两个音节的时间就缩短了。北方方言声调简单,一般只有 4 到 5 个,所以,词语连读时,发生的连读变调很简单;吴方言因为有浊音声母,一般都有 7 到 8 个声调,这样在连读时就发生较复杂的连读变调现象,实际上变调是声调简化的开始,而上海方言不但单音词声调简化成最简单的 5 个,而且中年青年上海话的双音词的连读调绝大部分都简化为前字单字调的延长,末字几乎都中性化了,三音节词的连调也变得十分程式化,在第二、第三字地位上的字不论什么声调,都失去原调而随第一字声调而变化。这说明在双音词、多音词多的语流中,上海话的声调作用已很减弱,倾向于向重音化的语言发展。上海话的连读调成

为吴语中最简单的延伸式的型式,声调曲折的简化拉直导致语速的加快,说话在单位时间内提供的信息量就大大增加。老上海话在一个句子里常用提顿助词“末 mhek”,将话题明确提出,如“女朋友末,寻一个吹一个”,“饭吃到明朝末,也吃勿好”。现在青年人已很少用“末”提顿,也是一种简化。

3. 向吴方言通用语靠拢的趋势。老上海话中有些词语乡土气浓重,使用范围小,有的只是在旧松江府的范围中通用。比如“墟头 hedhou”,“东~”即“东面”,“床~”即“床那儿”,在上海话高速发展的阶段,这类词逐渐被吴方言通用词取代而淘汰,新派的上海话就成为各地吴语中最容易学的代表方言。这类词在动词、形容词中也有很多,比如“拿”这个词,上海原说“担”后来就改用“拿”了。“麤糟 aaozao、扎致 zukzy、傻 sao、兴 xin”为“齷齪、结实、快、多/盛”取代。这种发展趋势使上海话逐渐摆脱其地区狭隘性,而易为更多外乡人接受。

4. 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上海话中的一些不同于普通话的语法结构,有的吸收了普通话的表达形式。如原来老年上海话说“打伊勿过”,现在年轻人多说“打勿过伊”;原来说“拨(给)本书依”,“拨本书拉依”,现在说“拨依本书”;老派上海话凡有时态的句子都用“主宾谓”的语序,如现在完成时态的“我饭吃拉哉”,现在年轻人可变为“主谓宾”语序,说“我吃了饭了”。中青年人从小受过系统的普通话训练,经常使用普通话,青少年说的上海话显著地表现出普通话影响的渗入,他们的语音、用词等更接近普通话了。如古代的“疑”母字,在普通话里除了“牛、倪、拟、孽”几个字外,绝大多数已经失落声母,而上海话原来只有少数字如“言、谚、危”等失落声母,“月、狱、尧、寓”等字在老年人中失落或不失落两读,但是在80年代以后的青年人中,大量“疑”母字的声母“n”或“ng”失落了,前者如“银、迎、娱、语、遇、愚、源、疑、义、宜、玉”等,后者如“额、碍、硬、外”等,现在一直

发展到“疑”母字的“我”，多数年轻人已经将原来的“nhgu”读“whu”了。但是，也要看到，青年人在韵母上有五处系统合并都不是受普通话的影响的自身简化，如“o”向“u”的合并，“碗 uoe”向“暗 oe”合并，似乎都走到了北京话音变的前头了。

首先创造和推用新词语的往往是青年。上海话在有详细文字记录的近 160 年里，表示“很、非常”的常用副词就经历了几次变化，最早用“邪 shia”和“野 yha”。19 世纪 50 年代英人艾约瑟(Edkins)在其《上海口语方言语法》中记录：“黄浦水险来野。”后来以说“邪气 shiaqi”为主，先有后置的，如“风大来邪气”，后多用前置：“风邪气大”。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从青年中产生一个“穷”（“风穷大”），70 年代后“穷”修饰动词还在用，如“穷做”，“穷吃”，修饰形容词则已为“老”字取代。直到现在“老”成为占优势的词，如“风老大个”。80 年代又从青少年中产生一个“瞎”（“风瞎大”），先在部分青少年中使用，后来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年龄层次也上升到中年，才被社会各界注意到。于是老派有的人认为“瞎”不登大雅之堂，青年则认为“瞎”生动，而“野、邪气”等太土，多数人认为用“老”最好。90 年代初又从青年中产生“勿要忒……噢”来形容“很好”和“太……了”，现今又新生“恶”、“绝”、“暴”、“狂”的“非常”形式。还有一个从老到少都稳定使用的“交关”最无异议，但词义色彩上又有些不同。由此看来，对最通用的词，人们的心理感受最好。正因为这类词是常用词，到底哪个“合法”就会引起争论，代表着创新和保守的两种立场。然而争论往往没有结果，语言自会择优除劣。在用词方面，年长者比较稳健，年轻人偏于创新，青少年似乎是常用新词的制造工厂，什么“顶脱了、一级、乒乒响、一只鼎”这些原不见经传的新词在青少年中先流行开来。开始流传时，大家称之为“流行语”，一旦流传开了，就成为新的通用词，有的还会取代老的词。这是词语中的新陈代谢吐故纳新正常现象。

语言总是要发展变化的。老年人和青年人的话都代表上海话,老年还有更老年,没有哪一代人、哪一个人可以说自己在说的是最标准最纯粹的上海话。只有两点是绝对的:(1)上海话是在不断发展着的,社会言语中没有纯的形式。国人过去总有一种守旧的心态,认为老的就是标准的准确的,这在开放性的语言环境中行不通。(2)从总的趋势来看,年轻人使用的语言代表着上海话的方向。占社会上的说法的百分比最高的说法就是最为常见语词,可以认为是较标准的形式,而上海话的变化往往是吴语中领先的。

如果仔细地考察一番,在使用一种语言的社会里,由于男女性别不同而产生差异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这些差异可以从生理不同、性格不同和社会地位不同等方面找到原因的。

赵元任先生在1927年调查苏州话时,发现苏州话“好”字的韵,男的发音舌位靠后,读[ɐ],女的则舌位靠前,读[æ]。也有人注意到,过去北京人发jqx音的时候如“休息”的声母,男的多发jqx,而女的更多一些的人发成zcs。在几次对上海话一些项目的调查中,笔者都发现,在职业系统和活动能力几乎相同的人中,男性在发音和用词上比女性随便,语言形式一旦形成,也不易动摇,比较保守;而女性易于接受社会影响,易于接收新形式,比如她换了一个语言环境,像到乡下去,她较快适应新形式,学会乡下话,一旦她愿意讲好某种话,她也容易比男子更快使自己的语言学得标准。中学校里女教师说较标准普通话的人比男教师多。香港城市大学廖国辉教授有篇论文《从外来词使用情况看男女生对西方文物冲击的反应》,文中证明,香港女学生对外来词的兴趣和使用比男学生频率高,外来词的优势也是女子带动的。这些都可能证明,女子记忆吸收语言的能力和体会语言差异方面的细心一般都强于男子。

上海话中,“男人”一词在各种场合使用不带贬义,呈中性,而“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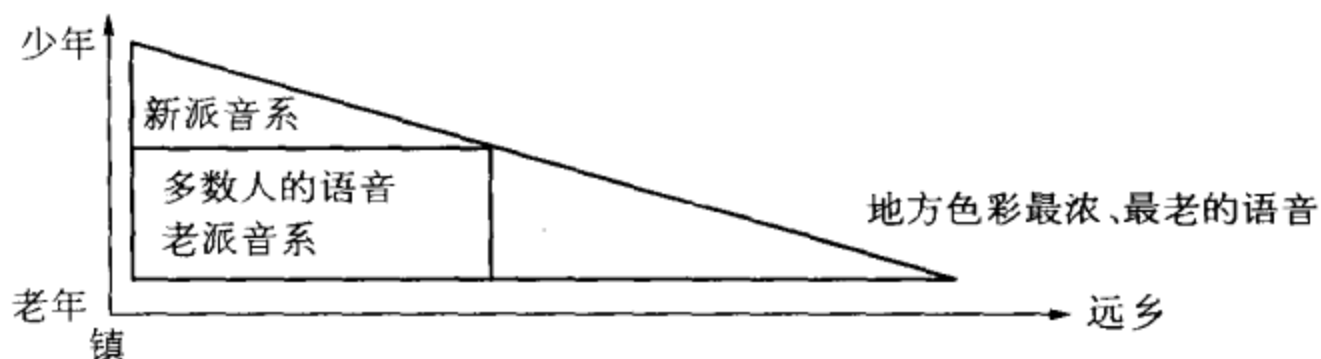
一词往往要带贬义,尤其在前加指示代词时,“搨个男人”不带贬义,“搨个女人”常用于贬义,带有“瞧不起”、“蔑视”的含义,否则要改用“搨个妇女”。这可能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男尊女卑观念遗留下来的影响,是社会因素形成词语褒贬。还有些语句,几乎只出自女子之口中,如“断命”、“死腔”、“触气”、“肮三勿啦”,男子少用。“阿拉勿睬侬”,“啥人睬侬!”“侬算好煞咪!”“怪勿啦!”“伊老触气个!”“惹气勿啦!”“侬有毛病啊?!”“痴头怪脑!”“嗲勿啦?嗲勿啦?”“好,好,侬算好煞了!”“神经病!”“十三点!”这些话经常出自女青年之口,而男青年一般不用,用了就会被认为是他有“娘娘腔”的“奶油小生”。女子较少使用粗鲁、下流的词汇,这些都与男女青年的性格、心理特征有关。

“我搨辈子认得侬”,是“我算被你耍了一次”的意思,用于不满记恨;有时是在戏言时用,可以是轻描淡写的。“碰着侬算我路道粗”,是对于对方的行为无计可施自认倒霉时说的,如:“喔唷,我认得侬!我吃煤球!碰着侬算我路道粗!”“真输拨侬”则是说得更直接点,表达的是“服了你,无可奈何”的感叹。这些话往往是男子在交往中说的话。女子表达这些意思似乎话语要轻一点,如说:“碰得着个啻!”“碰得着个啥?”是“见了大头鬼”的意思。还有些话是女孩常说的:如遇到男孩“打朋”的挑逗性言行,淑女们会反弹地说:“侬好好叫!”言下之意是“你要正经点!”如果男孩再进一步,她怎样回应呢?“侬去死——”“侬好去死了——”比如:A.“侬今朝打扮老性感个对哦?”B.“侬去死——”语调往往很好听,如有如此回应,说明她与你的恋爱或交情又上了一个台阶了。如果对方是一个不精通上海话的男子,往往会把意思理解得完全相反,以为碰了一鼻子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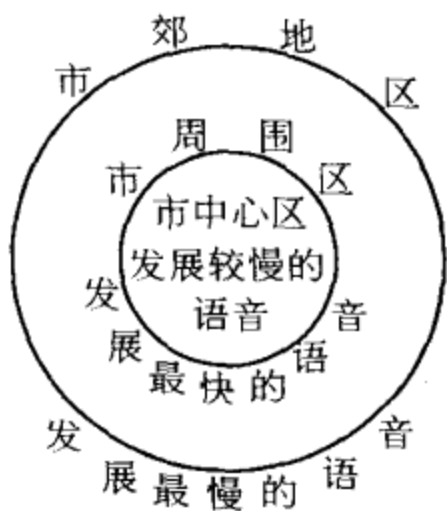
有的词使用中男女有别,如“发嗲”一词,说女孩子“发嗲”是很娇美的事,但说男子“发嗲”,则是指“摆臭架子”了。

二、地域差异、文化差异中的上海话

我国方言主要特征是地域差异,不同地区有的只隔一山、一水或一村,语言就有差异。地区、年龄与语音变异的关系一般可用下图来作一个大概表示:



上海郊区的语音变异就是这个模式。但是,由于上海市内交通发达、交际频繁,在城市里就不能套用上面的图。市内语音是否存在地域差异呢?根据笔者的调查,可以用下图作一个大概表示:



这说明,上海话从市中心到市外围不是依次渐变的。我们上节说到的疑母字读音变化中也可以看到市中心区和市周围各区青年语音变化的这种情况。这种现象可能与原来市周围各区外籍人口比重高有关。因为市区是不断向四周扩大的,迟来上海的外地人以前大都居住在外围。他们长期在上海居住,由于他们自身

方言的作用,语言的撞击加速了那儿的上海话语音的发展。这种双圈图形的语音差异情况在江南许多城镇都可见到。

尽管全上海的人都用同一种方言——上海话进行交际,但是我们有时能够凭某人口中的言语作为证据来判定说话人的社会地位甚至身份,

这说明在说同一种上海话时,不同的社会阶层都说着有差异的上海话。这种差异,被称为语言的社会变体。在说话时,工人常用哪些词,商人常用哪些词,农民常用哪些词,教师常用哪些词;甚至分得再细一点,老职工常用什么词,青年职工常用什么词,都会有些不同。因为不同阶层的人生活环境有差异,交际范围有差异,说话的内容也不同。这种差异常常并不是一些阶级习惯语和行业语、切口隐语上的差异,即附加在语音、语法系统外的特殊成分的不同,而是可以有一套语音、语法系统上的差异或某些成分上的系统差异。有的人甚至还会在不同对象的人面前交换两套有差异的变体。比如有一个青年在学校里与老师说话时既文明,又用较谨慎的标准方言,但在家里对文盲的父母说较土的、较保守的老派话。这在上海郊区的大镇上尤为明显,这也证明了方言社会变体的存在。

在现今上海城内,各种社会方言变体中,最为突出的是文化程度高低不同的人所操的上海话的差异。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如教师,技术人员、机关干部、大学生,和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如老的文盲、一部分工人和近郊的小生产者或农民比较,他们在用词等方面确有差异。具体而言:(1)文化高的人在常用词方面多用保守的词,在非常用词方面多用新的词,前者表现出他们的稳重,后者表现出他们对新事物的敏感。如青少年新词“有型”、“慧脱了”等,他们往往感到不登大雅之堂,觉得原有的常用词已经足以表达,有的人还视新词为异端;而在文化程度偏低的社群中,以说这些词为时髦,有泛滥之势。然而,对一些非常用的新词,如“赏析”、“书市”、“紧俏”、“取向”、“平价”、“电化室”,“遗传工程”等的使用情况则反之,因为文化高的人对新事物敏感,善于吸取新信息,对词语的精细差异也易体会。(2)文化高的人说话使用的书面语词汇量高于文化程度低的人。有时一个概念同时有两个表达方法,一个近于普通话书面语,一个是上海话词汇,他们倾向用书面化的词,比如多用“办公桌、本领、再见、猴子、喉咙、

一面……一面……”而少用“写字台、本事、晏歇会、活孙、胡咙、一头……一头……”在上海话中存在一批书面语词汇,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上有一大批新词,现在一般全国通用,如“收录机、立交桥、电脑、离休、飞碟、空调”,只是用上海话语音去读而已,有的青少年甚至在用到这些新词时干脆用一个普通话读音。而许多文化低的人生活口语较多,语言偏土,有的人“俚言野谚”较多。由于文化高的人书面语词汇量大,土气重的词相对地少,所以如果一个外地来的人与上海人交际,容易听懂他们的话,而最不易听懂那些生活较为闭塞的文盲老太的话。(3)文化高的人语言中很少有黑话或污秽语言,文化低的人詈语、不文明的口头禅、下流话较多,且不感到需要回避。在中小学中的学生中我们也能看到,成绩优秀的学生语言也美,成绩差的人粗话也多。

语言的社会差异有时大于地区差别,因此我们在上海调查上海方言的时候,单靠调查没有受过较多教育的老一代说的话,得到的上海话资料显然是不完全的,不确切的。调查方言最佳的方法是:(1)不只调查少数几个人;(2)通过科学设计的社会抽样办法来选择对象;(3)让调查对象在录音机面前能正常地说随便的话;(4)语言资料的定量分析。

三、职业差异和行业语

由于人们的职业差异,形成了一些本行业中通用的行业语。长期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总有一批与其职业有关的词语活跃其口中,为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所生疏的。比如:工人有“班头、三班倒、行车、钻头、嵌模子、阀”等,木匠有“作马、捻凿、刨、锯、墨斗、三夹板、洋钉、榔头、尖头钳、老虎钳”等,泥水匠又有另一批词汇。近郊区的农民有一套做工的名称,如“斫稻、

捉花、薅秧、攢麦、扬乱柴、拾落花、拔花萁、搨草、搨花，歪壅、盆行头、掀稻、筑埭头、抄地、削泥、挑塘泥、撒榭、拾鸡污、罨泥、叠柴堆、盖麦泥、洒药水、牵砬、筛谷、轧麦片、拷浜、捉鱼、摸蟹”等。在茶叶店里的人也有他的专用行业语，如：茶品之最贵者称“龙团”；极言茶嫩而尖的，称“雀舌”；茶叶之嫩者，称“嫩尖”；茶叶仅一芽一叶的，称“旗枪”；茶叶如青螺之旋转者，称“碧螺”；粗绿茶则称“绿片”，等等。再如酒店的行业语，“高粱烧”称“硬货”；“老酒”称“软货”；酒色红香烈的上品，称“状元红”；质佳惟色淡黄带青的，称“竹叶青”；烧酒之次者，称“白皮”；绍兴酒，称“绍兴”，等等。

在旧上海的民间产业中，操业具有地域传承性。如澡堂、理发店等服务行业，人员大都来自苏北；开店经商的人，多来自宁波；设立大公司商场者，来自广东；浪迹江湖、街头卖艺或设摊卖饼等，来自山东；兴办实业，办厂开矿的，又以苏南籍人为多。这些行业中，流传着这些移民来源地区带来的语言或同行习惯语，所谓“同郎中”讲的话。比如“剃头店”里，剃刀称“青子”，磨刀石称“起快”；剃头称“扫青”，修面称“光盘子”，修额角称“开光”；“茶房”手巾称“缆子”，“澡堂”称“混堂”，澡池称“大汤”，盆池称“小汤”，茶称“苦水”，沸水称“漂汤”，这些都是苏北人说的行业语。而在唱弹词的苏州人那儿，称唱者为“柳叶子”，唱正角的人称“上档”，配角称“下档”，人家请去唱称“出堂差”，拍木称“惊堂木”，单唱一段称“唱开篇”，露天演唱称“敲白地”，能博听客哄堂大笑的称“松”。上海滑稽戏中，也有一些行话，如引人发笑叫“出噱头”，列出全剧大纲情节概要，演员上场自行即兴发挥的演出，叫“幕表制”，演说台词不顺口，叫“拗口”，吐字清晰、一气呵成，叫“贯口”，触景生情、即兴发挥，叫“活口”，两人对白前后衔接，叫“接口”，运用技巧产生笑料的组合词句，叫“卖口”，受外因变化、冲击包袱未抖响，叫“冲脱”，因没组织好台词失掉

了逗笑的时机,叫“冷脱”,过份乱出噱头,叫“恶做”,观众报以热烈掌声或喝彩,叫“吃彩头”。

由于移民各操各业,他们的生活习惯、饮食各不相同,这些方言中的某些词汇就进入上海话,如:山东人“大饼摊”上的“大饼”(“大”字音 dha,而不读 dhu,可见是北方音留在上海话里)、“羌饼”、“高脚馒头”;苏北的“油馓子”、“脆麻花”(“麻”字读 mha 音,“花”读 hua,上海原名“绞捺棒”);宁波的“黄泥螺”、“鳗鲞”、“齑蟹”;绍兴的“霉干菜”、“醉方”、“霉千张”。从这些特殊的词语中,我们还可以寻根追源地了解移民来源地区的习俗和特产。

四、切口、黑社会用语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的上海,无论商铺、行号、杂店,还有工匠、手艺人、行医者、巫卜星相者、狱卒役夫、武术优伶、娼妓乞丐等,各行各业普遍都有切口,它反映了上海一定时期的社会关系面貌。切口是一种隐语,局外人不明其义。切口的出现大致有以下的用途:通过切口保护行业自身,别人哪怕与他是同乡,也听不懂他用的词语,就不易了解内情,干扰破坏他的行业事务;通过切口还能联络本行业的同行,以语识人,联合内行振兴同业;在做生意时有时商议的话语不便被顾客知道,也可以用切口来遮人耳目;也有的仅是行业中的底层流行语。但是,切口充满神秘色彩,它使各行各业孤独奋斗,带有浓厚的帮派性,是于大生产不利的。50 年代后,各界切口基本消灭。

银楼业的切口,簪称“横云”,钗称“压黛”,耳环称“连理”,盘称“落珠”,别针称“不离”,酒器称“错落”,似乎都从意义上派生的;绸缎庄的切

口,罗纺称“平头”,纺绸称“四开”,绉纱称“桃玉”,花缎称“闪面”,素缎称“平面”,尺称“横子”,剪刀称“叉开”,又多数是与绸面和剪绸有关的。许多切口都与物品的形状颜色有关,有的又是隐晦的比喻。南货店的切口,豆腐皮称“白衣”,白糖称“满口”,上等白糖称“本间”,砂糖称“泉水”,冰糖称“满块”,红枣称“红皴皮”,南瓜子称“小相公”,木耳称“云头”,金针菜称“黄引子”,蜜枣称“琥珀”,水笋称“羊角”。咸货行的切口:黄鱼鲞称“松瓜”,带鱼称“银面”,青鱼干称“旗青”,鲳鱼称“手照”,鲫鱼干称“菊花”。老虎灶的切口:烧水灶称“老虎头”,水称“天青”,煤屑称“黑砂子”,大镬称“坦口”,水缸称“青”,通火铁杆称“直达”,锅盖称“兜帽”,水桶称“提子”,水沸称“起势”。豆腐店的切口:豆腐称“白字田”,百叶称“千张”,豆腐衣称“净白衣”,大油豆腐称“块方”,小者称“小方”,油条称“寸子”,豆腐干称“香方”,臭豆腐干称“臭方”,黄豆称“小圆”,切豆腐刀称“老头牌”,石磨称“车心子”,水称“三点头”,火称“二点头”。那些手艺人、巫卜者、杂流类的切口更为隐匿,如吹糖人的切口“糖担”称“饷担”,插糖人的架子称“独立旗杆”,铜锣称“迎贵人”,糖称“饴子”,竹签称“脚子”,生意好称“顺”,生意不好称“周”。鸟衔牌算命的切口:衔牌算命称“追子巾”,衔牌之鸟称“剪牙”,牌纸称“叶子”,鸟衔称“禽推”,配妻称“己才”,成婚称“披红”,天称“云表”,太阳称“阳乌”,月称“阴宗”,星称“在东”,雨称“天线”,火称“分炎”。卖拳头的切口:卖拳头称“边爪子”,好场子称“碾地”,使观众环立如堵称“打圈子”,好称“坚”,看称“板识”,吃称“赏”,跪称“丢干”,拜称“剪拂”,讨铜钱称“探巴子”。小热昏的切口:唱不取钱,只向人兜售糖块,称“放甜头”,专唱不卖糖,向人乞钱者称“叫苦子”,所耍木偶称“聚仙”,箱子称“百宝”。(以上切口,大多见于1924年出版的《切口大词典》)

不同的行业,数字的切口也是不同的。如猪行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分别是“平、竹、春、罗、语、交、蛇、分、旭、老平”；老虎灶则是“豆、欠、台、长、人、耳、木、另、王、合”；金钱业的是“欠丁、挖工、横川、侧目、献丑、断大、皂底、分头、少丸、田心”。

从切口的字里行间，我们有时能窥测到该行业的人的某种心理和对本行业财物行为的一些看法。现在，这些切口中有少数的词由于流传开来还留在上海话中，如上面列举切口中的“干张”、“臭方”等，其他都已成为陈迹。

不能把各种行业中的切口都贬称为“黑话”，只有黑社会秘密会党流氓地痞中间的切口，大家称之为“黑话”。了解黑社会中的黑词语，对于全面考察和了解近百年的上海历史，无疑也是有用的。

旧上海，鸦片烟馆的别名叫“燕子窠”。那些吸烟上瘾的“老枪”、“榻上客”像燕子那样盘旋不离左右，出没其间。吸鸦片烟称“吹横箫”或“装电”，男烟鬼又叫“片荚子”，女烟鬼又叫“片荚子”，年轻的称之“毛色”，年老的称之“老杆子”，烟枪又称“火龙”。这些都是烟馆中的隐语。

上海黑社会的会党帮派中著名的有“青帮”、“红帮”。上海“青帮”的隐语有：入帮称“进门槛”，收徒弟称“开香堂”，帮中人尊称为“老大”，拆梢称“斤头”，向做小赌者索钱拆梢称“吃小虫”，逃官司称“避风头”，以拳殴人称“背皮榔头”。“红帮”的隐语：“杀人”称“放台子”，贩私盐称“走白马”，杀称“劈堂”，以人缚大石投洋中称“种荷花”。上海的流氓分赃称“劈霸”，包探巡查称“摆路头”，寻仇称“上腔”，放走称“脱梢”，出门称“开码头”，做套圈愚人称“放生意”，事情败露称“失风”，奸情败露称“踏脱镬盖”，有事求人而行贿称“垫台脚”。上海的拆白党又称“青皮”，是不务正业的青年终日游荡骗奸妇女结合成的组织。四处遨游引诱妇女称“兜圈子”，眉目传情挑逗妇女，称“吊膀子”，反而见欺于妇女称“失匹”。男女非正当结合称“轧姘头”。专以引诱男子骗取财物的为“女拆白党”。女拆白

党勾引男子淫欲致死以领保险费称“做黑手”。以色诱人方图好事，有串通之男子闯入，威逼倾其所有称“仙人跳”。还有不轨男女滥淫靡乐的“雌雄党”、女同性恋的“磨镜党”。还有一种“白相人”，是游手好闲遇事生风的无业流氓。那些女流氓，游荡无业，交际甚广，经常兴风作浪的，称“白相人嫂嫂”。还有无赖称“泼皮”。一种乞丐，称为“瘪三”，这种瘪三饥瘦褴褛，是流氓中的穷极无聊者，破坏性很大，往往结集成帮，由那些“丐头”带领专事拦路拦河抢劫。刻薄聚敛席卷而光叫“卷地皮”。争执事理双方到茶肆宣事于众评理称“吃讲茶”，此词原出于小瘪三切口。他们的头目称“爷叔”、“老头子”。吃光用光当光者称“三光码子”。在马路上漂荡的二流子称“马浪荡”。专贪小利者称“精刮码子”。至于那些常见于闹市和码头偷窃的称“贼伯伯”、“三只手”等。伴随着这些黑势力猖獗的，是一连串的黑行为。黑行为者，污秽之举也。搜身上的钱财称“抄把子”，抓路人剥光身上衣服的行为称“剥猪猡”，裸体浇以冷水称“吃大菜”，晚上用绳子勒住路人头颈勒索钱财的称“背娘舅”，聚蹲露天赌博称“倒棺材”，美貌女子假意与某男子结婚不久倾其所有逃之夭夭，称“放白鸽”、“恣浴”。像“仙人跳”、“放白鸽”那种生意在旧上海滩可是名目繁多，总称之曰“放生意”，但随着 50 年代扫除黑势力而使那些黑词语成为陈迹。

不过，弄得不好，死灰也会复燃，比如现在也有“斩冲头”的，“敲煤饼”的。最近看到一个报道所载更有甚者：那个踩得震天动地响的“高跟鞋”忽然掉下一个“分”很满的皮夹子，就有“连裆码子”压低声音上前来对路人说：别响，钞票我俩 half。等到这位拎不清者真的要“搏一记”去点钞票时，姑娘便带着三四人围着 half 者，千求万饶才得以脱身，不过身上值钱的东西连同衣服、脚上的大兴 NIKE 被统统剥光。这种“生意经”与从前的“掷包”何其相似乃尔。

五、操双语、多语的上海人

世界上的大都会都是移民众多的聚居地,应该是各种人前往展现自己的抱负、冒险实现梦想的“大客栈”,并且彼此平等“客居”,自由进出,发挥移民城市的优势。世界各种人群的语言和文化在都市中都有存在的角落,而且各投所好,这样的城市就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其表现之一就是有不少人能说双语和多语,而且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都市人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这种根据说话的不同场合或不同对象,可以自然地转换双语或多语的现象,在上海社会交际中也已司空见惯,而且值得提倡。

过去来的上海人往往会熟练说自己的家乡母语,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多数也会说上海话,自然形成在不同的社交场合使用不同的方言。现在由于从小系统学习普通话的缘故,本地出身的上海人从老年到小孩,都会使用上海话和普通话两种话,越来越多的上海人还会说英语。学会上海话、普通话、英语这三种话将来可能会成为多数上海人的选择。90年代以后,即改革开放以后来上海的“新上海人”一般在同乡中也说家乡话,在社会交往中说普通话,有必要时说英语。为了更深入上海的社会文化,不少人也在学上海话,他们的子女会自然学会上海话。学会双语或多语只会使人变得聪明灵活,增强工作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和效率。

如果我们的文化中来自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农业文化的“乡土意识”时而冒出,缺乏流动创业的“客居”意识,缺乏合作尊重的平等观念和标新立异的自由心态,这样,城市文化生态也就难以出现异质的、创新的、高质量的海派文化。

在双语、多语同时存在的上海,语言之间也会互相借鉴或靠拢,一个人的话语中会出现一些语言混杂的现象或临时借用词语的现象。如有的人说说普通话,其中夹杂着几个英语的词语;说说上海话,夹杂着几个普

通话词语。怎样表达方便,应该随他自己。

如果一群人在学某种语言时带有共同的夹杂的特征,也会形成一种共同的变异现象。如在上海有一种“苏北上海话”即是。

在上海的市民,至今还有一些地方聚居祖籍长江以北江苏地区的苏北人,旧称“江北人”。在他们的生活圈子里,包括孩子在内,往往操双语,既说家乡的江淮官话,又说上海话。有的长辈由于文化水平较低的原因往往不会上海话,下一代由于从小与上海人生活学习在一起,都会说上海话,现在许多后代还会说普通话和英语。由于他们有比较集中的居住区,在自己的社区里又说苏北话,与别的人或在认为比较正式的交际场合说上海话,不过在许多人中,他们的上海话是带有苏北口音的,有人称之为“苏北上海话”,它是上海话的一种变体。上海话的这种差异是上海话内部的社群差异。

这种苏北上海话,具体表现为:(1)在语音相差不远的音素上,用苏北音代替说上海音。苏北话原来没有浊音声母,所以总把上海话的浊音声母发成清音。如把“旁边”的“旁 bhang”,读成“胖 pang”。上海话两个人声的字连读(如“六十”、“学习”、“剥削”时),第一个人声字末尾的喉塞音会失落,只保持短促音,但苏北人说这些词时,就读成苏北音,前字仍带有明显的喉塞音。苏北人多数人 n、l 不分,“南天”和“蓝天”不分,“连年”和“年年”不分。有些字上海话读 oe 韵,如“追、催、税”,有些字上海话读 e 韵,如“队、位、环”,苏北上海话都读成 uei 韵。有些字上海话读 oe 韵,如“半、潘、伴、满、短、团、酸”,苏北上海话读成带鼻化音的 o 韵。而上海话读鼻化音前 a 韵[ā],如“厂、张、畅”,和带鼻化音的后 a 韵[ã],如“帮、忙、狼、仓”,苏北上海话都读成带完全的鼻音 ang。在苏北话中,入声韵像上海话的 ak 和 ek 两韵的字是不分的,如客=克,杀=色。所以在“苏北上海话”里这两组音都相混。不过现在的上海的新派上海话中这两组音

也合并了,实际上是走苏北上海话的路。(2)有些字音,经过上海话和苏北话的混合,出现一种非驴非马式的骡,既非上海音,又非苏北音,如阮恒辉先生在《扬州腔上海话的语音特征》一文中记述的:“扬州话没有 oe 韵,遇到扬州归[æ]韵而上海归 oe 韵的字,如看、肝、安,扬州腔的上海话会念成[uəi]或[o]韵;又比如扬州话‘大’字说 da,上海话说 dhu,变体则是 du。”

许多上海人现在都会操双语,如又会说上海话,又会说其原家乡话,又会说普通话。现在有些外籍上海人尤其是上海郊区人,在家里对父母说家乡话,对朋友同事说上海话,经常变换着两种方言说话的现象很普遍。90年代以后,上海街头上不相识的人之间交谈,使用普通话是最常见的现象。现在在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里,子女和父母之间用上海话和普通话交际,同学之间说普通话也常见,自己的无声语言也是普通话(如用普通话阅读、思考)。以上两种情况都是操双语的现象。上海地区这种操双语的现象是语言进步的一个标志。

上海的语言环境能分能合,人们在不同场合中组装着不同层面的上海话。跟祖父母说老派的,跟老朋友说俚俗的,跟年轻新朋友说新潮的,跟老师同事说“正宗规范”的,在会议上说书面化的,跟白领说带洋词语的,跟股民说带行情流行语的,在正式场合、媒体话筒前就说普通话。这都为不同语言间的交融和互相吸收长处形成了良好的环境。

其实说到底,语言的作用就是为了大家沟通,并不是要制造高精尖标准产品,怎么方便轻松就怎么说。上海话在语言开放的环境中变得更为随意,在必要时更简化更公约数化,在需要表达深刻处又更有区别更细腻化,就这样,上海话变成了一种活跃的有丰富层次的社会方言。

六、上海普通话和普通上海话

上海话是上海城里的母语,即小时候跟着母亲说就会的第一语言,对大多数人来说,至今还是最自然、最能自由流畅表达思想的语言。普通话是全国通用语,它在上海的推广已经基本普及,几乎人人会说。因是需要推广的,对多数人来说要学,所以是第二语言。但现在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也已成为第一语言了。上海话和普通话是地方话和国家通用语的关系,在上海社会里一起承担着不同的社会使用和交际功能,最佳的语言环境应是顺其自然,不要有人为限制措施,这样一定会自然共生互补。当然,这两种话之间也会互相影响受干扰,于是产生了那种所谓的“上海普通话”和相应的“普通上海话”。

上海普通话是普通话在上海地区的一种变体,带有许多上海话词语或语音特点。比如语音上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声母 zh(知)、ch(吃)、sh(诗)和 z(资)、c(雌)、s(思)不分。都读成 z、c、s,把“主力”说成“阻力”,把“春装”说成“村庄”,把“诗人”说成“私人”。(2)上海话中读入声的那些字,声调读不准,韵母也往往读错,还带着喉塞音读得很短很急促。如“特别”读成 tekbi:k,“束缚”读成 sokfok,“接触”读成 jikcok,韵母都读不准。(3)前、后鼻音韵不分,把“成就 chengjiu”读成“陈旧 chenjiu”,“清静 qing jing”读成“亲近 qinjin”,在群众性欢迎外宾的场合,我们只要听“欢迎”的“迎”字的发音,就能区分是北京人的场面还是上海人的场面,北京人发音后鼻音很重,读“ying”,但上海人往往读成“yin”。现在上海年轻人的普通话一般都学得很准,但就是在这点上还不过关。(4)有的韵母失落韵头 u,如“春天”的“春”,普通话应是“chun”,上海普通话读成“cen”,“村庄”普通话应是“chunzhuang”,上海普通话读成“cenzang”。可是有的韵母反而会去加个 u,如“内、雷”应是“nei、lei”,而上海普通话读成“nui,

lui”，于是，“类推”应是“leitui”，却读成“luitei”。(5)b p m f 与“eng”拼的字，如“崩、捧、蒙、风”，上海普通话读成“ong”韵，把“风”读成“fong”。(7)把声母 r 读成 l，如把“任 ran”读成“len”，把“入 ru”读成“lu”。(8)把发音滑动的复元音 ai、ei、ao、ou 读成单元音，如把“开采 kaicai”、“配备 peibe”读成上海音“kece”、“pebhe”。上海普通话在用词方面有的具地方色彩，如“这部片子好看得来”、“我是老样子”、“我弄不来的”、“你去不啦？”、“这里有个洞洞眼”、“他不大开心，我倒老笃定的”。而在语法组装上，亦有变化，如公共汽车的报站器中把“车儿拐弯了，请抓住扶手”说成上海话时，词语和语法就组装成“车辆要转弯，扶手请拉好”。还有什么“体育场调头”、“开门请当心”等都是普通话的上海变体。刚来上海的北方人刚学到不多上海词语，也会说夹有上海词语的“上海普通话”，如“赶明儿咱们去南京路白相！”当今的青少年中说普通话在语音上已经相当标准，但在用词和语法上往往有上海普通话。

反过来，在上海还有一种“普通上海话”，就是只是用上海话的语音，说的几乎都是普通话的词汇，甚至是普通话的语法。现在有些年轻人由于从小在幼儿园、小学开始学话时都学普通话，家长也配合学校与他说很初级简约的普通话，结果是他先学会普通话，后来到高中、大学时才从社会上学得上海话。所以他说的上海话，实际成为普通话的上海话翻译版。上海话里的生动活泼的口语词和大量与普通话不对应的有特色的词语，他都不会说，或听见过而自己从来不说。所以他说的上海话就不是原来的多彩的、有特色的上海话，如果这样的“普通上海话”说的人很多，那真的是上海话面临衰退了。

第七章

上海话与海派文化

一、沪剧、滑稽戏和其他方言戏曲、曲艺与上海话的关系

沪剧是上海话唱的上海地方戏,历史不长,但在开埠后的上海由于文化游艺的高度繁荣,迅速发展而成为上海市民喜闻乐见的主剧。沪剧起源于上海附近农村中的田头山歌,如“私情山歌”、“对花山歌”,至今还流传着的“白杨村山歌”等都是它的源头。流行在黄浦江以东川沙、南汇一带的称东乡调,流行于松江、青浦等地的称西乡调。这些山歌形式简朴,曲调优美,内容生动,加以舞蹈动作和音乐伴奏,形成“花鼓戏”,至19世纪80年代由艺人带入上海城区和租界,改称“本地滩簧”,简称“本滩”,20世纪20年代改称“申曲”,1946年又定名“沪剧”。滩簧时期的艺人开始在街头巷尾露天演唱,后又转入游乐场上演,只是“对子戏”或三四人以上的“同场戏”,但由于演唱内容反映底层社会农民、小生产者的劳动和爱情生活,形式活泼,语汇生动,唱词通俗,深得民众喜爱。一直流传至今的《阿必大回娘家》、《卖红菱》、《庵堂相会》等,用一口上海方言,唱得像说话一样流畅和传情,乡土生活气息十分浓厚。比如杨飞飞、赵春芳对唱的《卖红菱》,整场唱段用两人对唱的形式,叙述如行云流水,从头唱至尾一韵到底,共用190个“根青”韵。如主角范凤英认出六年前被强行拆散的情人后唱道:

“对!天浪旪没跌煞鸟,地下旪没饿煞人。我俩尚还年纪轻,能扛能挑还能拎,倘然依做仔翻船汉,我也能扭扭一根橹帮绳;倘然依上山斫柴去,送茶送饭我担任。穷做穷来苦做苦,也旪没冷言冷语刺我心;就是穷得饭来讨,要比张家胜十分!打定主意跟依走,走出张家火坑门,走出张家火坑门!哪怕是受饥受寒也甘心。”

一节唱段，一气呵成。从这样一类曲调并不复杂、自然行腔的唱腔和唱词以及说白中，我们可以考察 18、19 世纪上海话的语音、词汇、语法以及俗言俚语等。

我们从自然行腔的沪剧唱段与方言语音的对应来试作分析。由于汉语方言都有声调，而声调富于音乐性，字音调值不同，因此在唱腔方面必须配合自然语言的音高和曲折才能唱得好听。比如《阿必大回娘家》开头一段，婆婆唱：

“冬天日出黄枯枯，李家娘娘想家务。侬个当家人，名字就叫来李九官，常常拉外头末贩猪猡，老夫妻只有一个独养子，身材生得来矮勿啦过，一尺三寸长衫着仔地浪拖，人人叫伊石秤砣。”

从“日出”一词的乐谱 $\overset{\frown}{3\ 5\ \overset{\hat{e}}{\underset{\cdot}{i}}}$ ，可以看出上海话阳入开头的词
日出

（“日”字声调为阳入）连读调是先低后升的（用声调五度制符号标示老派上海话是 11 + 23）；又如“李家娘娘”这个四音节词乐谱是

$\overset{\frown}{5\ 3}\ 6\ 5\ \overset{\frown}{5\ 6}$ ，“家”字最高，第一个“娘”字也是一个次高音，说明老李 家 娘 娘

上海话四字组连读调第三字应是次高调值，不同于今上海话第三字是中调值，我们在 80 年代从当时 80 岁以上的老年人那儿调查到的情况正是这样的（老派 32 + 55 + 55 + 53，新派 22 + 55 + 33 + 21）。“地浪拖”三

字的乐谱是 $\overset{\frown}{3\ 6\ 5\ 3}$ ，“地浪”的连读调是 22 + 44，“拖”的单字调为 53，
地 浪 拖

可见，这三字用的是上海话的 2 + 1 的窄用式连调，即前两字为一连调单位，后一字为另一单位，我们从曲谱中也可以看到语法词和语音词的对应

关系。“人人”的曲谱也是 $\overset{\frown}{\underset{\cdot}{人}\ 3\ \underset{\cdot}{人}\ 6}$ ，可见与“地浪”的 22 + 44 同，说明那时“阳

平”开头(“人”)和“阳去”开头(“地”)的词,连调行为相同。“石秤砣”乐谱

为 $\overset{\frown}{1\ 1}\ \overset{\frown}{2\ 2}\ \overset{\frown}{1\ 6}\ \overset{\frown}{6}$; 除去了句尾的甩腔外,“石秤砣”三字韵连调正是和
石秤 砣

上面的“日出”一样是一个低升调。可见三音节词和双音节词的连调行为相同,只是双音节词连调的扩展。“连读变调”是吴方言语音中的一大难题,我们可以从那些如说话般通俗的沪剧早期唱段中去找到老上海话的连调痕迹。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段唱词中,有两个“末”字,说明老上海话的语法,作为句中出现的提顿助词“末”经常使用。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今上海话中表示完成体的“辣 lak(入声)”字在老上海话中确是读舒声“la 拉”的。我曾调查到,现今的浦东话和过去的上海县城话中,前字为阳平开头的词的连调行为与阳上、阳去调开头的不同,在 1928 年语言学家赵元任著《现代吴语的研究》中所记的旧派上海话中也提到过这一现象,现今新上海话这个差异早已消失。但前字阳平的这个连调调型 23+44 是原黄浦江东、西岸方言的一个最有特色的敏感调型。在《庵堂相会》等剧唱腔中都还能找到这个连读调形式,如《盘夫》一场中“眼睛弹出像铜铃”的“铜铃”,《罗汉钱》第四场“燕燕做媒”丁是娥说白中有“几时学会做媒人个啦”、“请侬吃十八只蹄膀”中的“媒人”和“蹄膀”,都是阳平开头的双音节词,用的都是 $\overset{\frown}{3\ 4}\# 5$ 的调子,可以证实旧上海这个调型的存在。

又如 1929 年蓓开公司唱片王筱新唱的《小分离·骂痢痢》一段用的是“i”韵韵脚,其中“灰”字也押 i 韵,“规”也读“gui”。由此可证,上海话中的“铜钿眼里千跟斗”中的“千”,“荐便宜”的“荐”,实是“穿”和“占”的旧音在今词中的孑遗。

沪剧早期的唱腔往往与上面分析的情况相似。有的老艺人回忆那时

学戏,先是听名人或师傅唱,后来自己要登台前,师傅往往是提示剧情,要演员自己组织唱段和发挥,用自己的调子去直接联系唱词,所谓用“幕表制”,于是唱段声腔就易与自然言语合拍,听起来也就不费劲,也容易出流派。

“本滩”到了二三十年代以后,吸收了话剧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运用了舞台综合性表现手段,很快发展成为多场的大戏剧,出了《杨乃武与小白菜》、《大雷雨》、《碧落黄泉》那样雅俗共赏的优秀剧目。沪剧艺人又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加工创造了像“反阴阳、紫竹调、阳血、赋子板、快板慢唱、夜夜游”等丰富又动听的曲调。沪剧擅长表现现代生活,因此在50年代后出现了像《罗汉钱》、《雷雨》、《母亲》、《芦荡火种》剧情唱腔并美的好戏。上海人喜欢上海戏,现在通过电视等传媒,沪剧又为苏南以及更远的群众喜爱。

沪剧中为上海市民喜爱和广为传唱的唱段,都是那些与上海话声韵、句法紧贴的唱腔唱段。像《碧落黄泉》中“志超读信”的那段唱词声情并茂,如泣如诉,有时像说话一样,如“一直想如何来报答侬个好心意”,十几个字也可唱成一句。唱腔与上海话的连读变调对应率达99.3%。又如杨飞飞在《叛逆的女性》中“抢绢头”一段唱,地方特色甚为浓厚。

“喔唷,一两孔个大学生,依算身浪着西装,其实依是一个穷光蛋,喏(nao),屋里住勒辣搁楼浪,睏末要睏呀脚床,鱼肉荤腥吃勿起,吃一只个咸菜豆板汤,捱两日穷得来落落涕,呀没铜钿开伙仓,大概依个中饭还勿曾吃,肚里饿脚里有眼晃佬晃。(看呀,看呀,看呀!)饿得来嘴唇浪向清水落落涕,还要叫侬小姐出来当面讲,依明明存心不良敲竹杠。等到铜钿骗到手,马上走到饭店里,叫堂倌三碗白饭两块咸肉豆腐汤,一顿夜饭铜钿绢头浪向侬着港。”

这段唱词真是轻快流畅、风趣生动,上海话词汇语法特点的运用达到

很纯熟的程度。

尽管上海地区绝大部分人已经不分尖团音,但是在沪剧里,尖团音的分别依然保存,如精≠经、青≠轻、息≠歇。有人说,保留尖团音,才使沪剧所以称之为沪剧,因此青年演员刚开始学戏时,就要像上海人学普通话区分 zh ch sh 和 z c s 那般,把尖团音分辨开来。由此可见,戏曲语言往往会比今方言面貌保守一些,这与继承传统有关,在考察戏曲中的方言时也须加注意的。不过你如果稍加注意,有的沪剧演员有时或对有的非常用词也不自觉把尖音唱成团音了。至于上海方言中有的音变现象在沪剧中难以避免,在青年演员中亦已发生。如过去官≠干,碗≠暗,现在沪剧团的有些青年演员前字失落了 u 介音,前后两字变得同音。

从本滩到申曲再到沪剧,这固然是沪剧的进步,沪剧剧目和唱词也应有偏俗和偏雅的不同。但是近年来,令人担忧的是,沪剧中的有些剧目的唱词和说白有些过分追求文学语言,脱离上海生动的方言土语的倾向。有的唱词造得既别扭又无文采,像空说道理,唱腔也过分强调设计,有的唱腔与唱词语言的声调又不契合,这样就不易为上海观众尤其喜欢活泼语言的青少年接受和广为传唱,或者竟成为方言说唱的话剧或歌剧。把频繁出现的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故意说成群众中尤其青年中早已扬弃的上海话文读音,如“我、你、他、这个,那里”,有时又忘了而说成通俗自然的“我、侬、伊”等,别扭得很。这样改的意图可能是为了扩大沪剧听众的地域范围,但是要拥有更多的听众观众的最好办法却是应使语言更清新活泼自然,充满生活气息,而不是一二个词的改革。方言剧应该在纯熟运用方言上下功夫,在这方面,演员在唱戏时应有更多创造的余地。

近年来,上海的滑稽剧越来越得到上海人民的喜爱。滑稽是应近代文明社会发展之运而诞生的一种喜剧,它是从 20 年代的独脚戏发展而来



* 30年代发行的第一代上海滑稽演员王无能的唱片《郑元和教歌》

的,是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和群众艺术欣赏趣味的。西方的现在的电视节目中的“肥皂剧”也有一种滑稽剧类似形式。在现代社会里,说说笑笑,轻松活泼,使人心情愉快、劳乏顿消,因此深得观众喜爱。

当代的滑稽大致可以包括单人说唱或双人拼唱的独脚戏、上海说唱、单幕或多幕的滑稽剧等多种形式。演员在台上可以即兴发挥,加编台词唱句,使滑稽戏一直贴近生活、贴近演员个人的演唱风格和条件。滑稽戏演员往往编唱和配合得才能超绝,加上操用以上海方言为主的各种方言,配以上海民间说唱小调为主的沪剧、越剧、锡剧、锣鼓书等各种戏曲的活泼唱腔,题材广泛,表现出一种清新而又诙谐的艺术情趣。由于许多扎根于现实生活的新鲜的多幕滑稽剧,题材内容直接表现了上海市民社会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并娴熟地运用上海地区的方言俚语,因此就成为市民生活中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如姚慕双、周柏春的《普通话与方

言》、《英文翻译》以及表现一个失足青年奋发向上变为革新能手因而使未来的丈人看法骤变的《啥人嫁拨伊》和袁一灵的与绕口令相结合的说唱《金陵塔》等,深得群众的喜爱。尽管从唱电台、做堂会发展到在舞台演出和多幕喜剧,滑稽戏在发展,却又没有放弃其初级的易于反映生活的、重于语言表现的独脚戏形式。大剧目也继承了生动灵活使用方言口语的特点。50年代以后诞生的《三毛学生意》、《七十二家房客》两出戏成功地反映了40年代上海下层市民的艰辛生活。70年代末开始,新剧丛生,像《出色的答案》、《路灯下的宝贝》、《阿混新传》、《红房子风波》等,都反映了上海的社会风云、时代气息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工作画面,语言通俗又经锤炼,意趣横生。例如胡廷源、李尚奎、吴双艺编剧的《甜酸苦辣》中表现一个中年干部和青年工人思想冲突的一段唱:

“现在个青年真难弄,我情愿叫伊拉小祖宗。组织纪律全勿懂,我看见伊拉就头里痛。哎,想当初我年轻个辰光多好弄,要找我谈心顶多五分钟。叫我朝西我勿朝东,要我抓紧我勿放松,要命令我今朝拍苍蝇,我绝对勿会去捉老虫。阿哟现在个青年大不同,头颈像铁尺是硬绷绷。明明是他们弄坏了机器还勿上工,厂长说我简单粗暴太冲动。我是左思右想想勿通,越想我心里越翁肿。领导了解我劳国栋,要我继承好传统,谈话勿到五分钟,我思想勿通也只好通。我硬硬头皮来找罗锋,强颜欢笑来请小祖宗!”

请看,唱句多么自然通顺,简直与上海人平时发牢骚说的话一个样,只用几句简单活泼的上海话,就把两个时代的青年面貌作了对比。还有玉兰娘在女儿玉兰与丈夫劳国栋新旧观念矛盾冲突面前左右为难的一段唱,套用越剧《碧玉簪》中婆母劝说李秀英接凤冠的一段唱腔,也把人物的心理表现得维妙维肖:

“(白)玉兰哎,我个心肝宝贝啊!(唱)叫声玉兰我个肉、心肝肉啊呀宝贝肉。玉兰是我个手心肉,哎呀老头子依是我个手背肉,手心手背都是

肉,老太婆舍勿得那两块肉。玉兰呀依心宽宽气和和,有啥苦衷来向娘诉,(玉旁白:爹爹勿讲道理)那阿爹也是为依好,伊怕依轧着坏道要犯错误。伊为工作忙到西啊呀忙到东,忙得来汗淋淋来热呼呼。(劳旁白:搿句闲话还是有良心个)玉兰依是个好小囡,依气要大来量要大,吵吵闹闹依勿像样,搿种能日脚哪能过,左邻右舍要谈论,害得我末老太婆要人难做,倘然那惹我来光火啦,(白:好个,葛种日脚末我也勿要过哉,我也横势横,从明朝起头)我勿买小菜,勿生风炉,窗门一关,房门一锁,我老太婆坐仔无轨电车到外滩;光起火来去跳黄浦啊!”

上面两段唱段中,加横的词都是很平常的上海话,像随手拈来的,平贴而有趣味。

独脚戏也有许多趣味盎然的精品,如黄永生唱的《高价姑娘》中的一段唱:

“有一个姑娘叫杨玉芳,相貌长得来真漂亮。今年个年纪廿六岁,长得勿高勿矮勿瘦也勿胖,樱桃小嘴高鼻梁,一对眼睛水汪汪,高跟皮鞋脚浪穿,衣裳日日会得翻花样。花露香水身浪洒,pipi,迭个面孔浪雪花膏搨仔头二两(白:当伊刷墙壁哉)。要问伊为啥迭能爱打扮,莫非是为了寻一个好对象。杨玉芳找对象个条件真苛刻,伊是高价姑娘名气响,虽然今年只有廿六岁,朋友轧过仔两三打(白:结棍个嘎),葛末大家要问我,杨玉芳究竟要找哪能个对象呢?喏,杨玉芳找对象有十个条件,要一套高级家生,要两对沙发,要三只机,要四十平方,要五官端正,要六亲勿认,要七十元工钿,要八面玲珑,要酒烟勿吃,要十全十美。(迭个姑娘代价高个)她说道十桩条件侬具备,方是我称心如意个好情郎,如果寻勿着搿种好对象,我情愿一生一世做老姑娘!”(唱的是80年代初的上海生活水准)

语言朴实,夸张生动,娓娓动听,可见滑稽戏在方言中找寻笑料,利用吴方言的特长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从黄永胜的大量上海说唱中,我们可以了解老派上海话。如老上海话的标志 23+44 和 23+33+44 的连读调经常在他的说唱词中的阳平开头的词中出现,如“银行”、“柴灶行”、“朋友”、“头二两”、“红领巾”、“盲肠炎”;又如从“半夜里”、“唱新闻”听出老上海话的 34+44+53,从“为人民”、“女朋友”听出 23+44+53 这样的老上海话特别的调子。

说老上海话,王汝刚也很拿手。如从他的著名滑稽独脚戏《男子汉》中的老上海话(定浦东话)句子“医生话拉个,一分洋钿也勿要个”、“侬姆妈话拉个,河鲫鱼余汤末收伤疤个”中,我们听到了老上海话的过去完成时态;从“一个半钟头已经到拉特”、“我决心未定拉特”中,听到老上海话的现在完成时态用法。

姚慕双、周伯春的独脚戏《广东上海话》(后改名《普通话与方言》)中说上海人到大马路四大公司中买东西,售货员操的是广东上海话,彼此说话不理解,闹出种种笑话。如称呼“先生”听成“猩猩”,把“买点物事”的“物事”听成“木梳”,又误听作“墨水”、“米苋”,一连几次误解,把“四楼刚下来”听成“死了扛落来”,“七楼”听成“出老”,把“买袜子”当成“买镬子”,“味之素”当作“女厕所”,“热水瓶”当作“药水瓶”,“七搞八搞”当作“七块肥皂”,抱怨“喔唷”却听作“恣浴”,“喔唷姆妈”当作“恣浴拖鞋”,“触霉头”当作“吃馒头”,“勿识相”当作“拍照相”,“碰着七十二个大头鬼”听作“买七十二斤大头菜”,等等,一气呵成的误解引来一浪高一浪的笑声。从中可见“洋泾浜沪语”面貌之一斑。许多小品和大戏,都设有不同的人说不同的方言,在热闹多彩的方言中笑料连篇。

一种方言剧种越是具有地方色彩、民俗特色,它越是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近十年来,滑稽戏以“海派情景喜剧”的新面貌走上了电视屏幕,使受众面越来越大,同时也保留了所有的原始形式,滑稽戏为太湖流域的人民共同喜爱接受,这既说明吴方言吴文化的一致性,它具有共同的民俗心

理和文化特征,也说明了上海话的影响在这些地区里的不断扩大。

除了运用沪方言纯熟外,滑稽剧中还善于吸收上海市民口头的新鲜行时的词语,像青年中的“通路子、扎台型、一级”等词配上时髦的行为。有人说这会使演出不够稳重,油腔滑调;但从另一方面看,有选择地引进一些群众较敏感的生活词语,正是该剧种能始终保持清新感、与市民生活情趣保持一致的长处之一。当今滑稽戏之能吸引青年之心,正说明它不断在语言心理上与青年的创新精神合拍,在题材上与现代生活同步。我们要懂得“雅从俗来”的道理,书面语总是要从口头语中汲取营养,俗总是偏于真,而和我们最亲切稔熟的方言俗语与我们最无隔膜,最能显示我们的性情,而由它来表现的文学戏剧也自然有生气最活泼。

在上海近代社会内发展并流行起来、受群众喜爱的戏剧曲艺还有来自浙江旧绍兴府嵊县的越剧,上海人又称“绍兴戏”,以及来自苏州的评弹,又称说书。越剧的唱腔历经嵊县话、杭州话、上海话语音的糅合改造,

* 30年代唱片,杨月槎、杨星槎《珍珠塔白云庵相会》,沈
俭安、薛筱卿《珍珠塔看灯》、《啼笑因缘·绝交裂券》



特别优美婉转动听,加上流派演员的辛勤创造,在50年代时,一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简直家喻户晓,至今上海还有一批中老年人都会自唱成段成段的流派唱腔。越剧中有些剧目唱词生活气息很浓,方言也重,就是从当地方言语调、民歌中汲取营养的,如《九斤姑娘》;另有一大批剧目表现民间生活,其中文学性很强的,有徐进编剧的《红楼梦》和田汉编剧的《情探》,其唱词的文学水平可为各种戏剧之冠,因此又因高雅而为观众喜欢。由于越剧演员长期离开故土发展,也减弱了剧中用词的方言色彩,不过它却又以剧情的曲折多致和人情味、语言清雅柔美而走向全国。在上海市内长期生根的越剧中,有的唱词和读音也不免受到上海话的影响,两种方言的撞击也使它摆脱了太土的语词,甚至入声字的喉塞音也消失了,当然,古代题材的演出也使语言脱俗趋雅。值得一提的是,越剧的题材囿于古代的才子佳人为主,其生活、矛盾和情趣与当今青年相隔尚远,如果不图革新,再从民俗中发现真谛,观众将会继续减少下去。

评弹也在上海扎下了根,书场林立。30年代时,像沈俭安、薛筱卿的《珍珠塔》、《啼笑因缘》,魏钰卿《珍珠塔》,夏荷生的《三笑》、《落金扇》,周玉泉的《霍定金私吊》,蒋如庭的《文武香球》,杨月槎、杨星槎的《珍珠塔》等的弹词已在上海很风行并录制成唱片。尤其是弹词开篇的语言具有诗的精练、形象和抒情的色彩。比如《莺莺操琴》的唱词运用了巧妙的回环手法。下面是开头和结尾的两段:

“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长日夏,碧莲香,莺莺小姐唤红娘。”

“这叫长日夏凉风动水,凉风动水碧莲香,果然夏景不平常。”

评弹的唱腔充分适应了苏州方言的曲折跌宕的声调特点,“吴软细语,娓娓动听”。各流派又争相竞艳,有的听众甚至听书成瘾,上海话中因此增添了许多苏州话词汇。评弹在上海的流行促进了吴语中上海、苏州

两大方言的融合,对上海话一度受苏州话影响后吐故纳新起了很大的作用。

上海开埠以后的五方杂居和近代生活的需求,促使吴语区各种地方戏曲都带进上海,在上海成长起来,如苏州的苏滩、无锡的锡滩、宁波的甬滩、湖州的湖滩、杭州的杭滩等,上海的外籍人和本地人也熟悉并喜听起锡剧、淮剧、甬剧等各种戏曲来。上海人民从这些戏曲方言的字里行间回味故乡的乡土民俗或欣赏各地风味。

二、文学、影视作品中的上海话

清廷在 1901 年重新开始改革后,上海随即出现了白话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局面,晚清出现的《海上花列传》、《九尾龟》、《九尾狐》、《海天鸿雪记》等小说虽都在上海出版,然都以苏州话写其人物对话,可见当时苏州话在吴语中的地位。这些吴语小说与乾隆时代上海人写的小说《何典》不同,《何典》是通篇用上海话词语夹杂官话写成,可认为是一种“上海话书面语”语体。《海上花列传》等小说则是叙述部分都用官话,而人物对话完全用苏州口语。另外更为大量的文艺作品,在用白话文体写作时,常常自然夹用上海话词语。

如李伯元 1903 年开始连载的《官场现形记》27 回中有这样文字(以下加横线的词就是上海话词语):

“他不肯出力,这事岂不弄僵? 现在坍台坍在姓贾的手里,心上总不甘愿。”

又如海上漱石生 1905 年著的以清末民初的上海为背景的《海上繁华梦》长篇小说中这样写:

“有个名叫‘温玉知’的青年，因经常受人欺骗，反被目为‘瘟生’，被子富看见，一手捉住，那知用力过重，一捏竟捏死了。”

上海青浦人陆士谔作于 1909 年的《新上海》写到上海许多生活活动中也不免用上不少上海话词语。如：

“时光不早了，叫他们摆桌子，点洋烛，起手市，我们要入局了。”

“你不过一件衣裳，染了点子油渍罢了。我这一罐头油，要值得四百五十铜钱呢！两日天生意都不能做，向那个去偿命？”

1910 年出版的陆士谔的《最新上海秘密史》中有一段就是这样用上海方言来描写上海的市面的：

“铺子就在青浦马龙街，双开间门面，两副头柜台，气象很是发皇，生意十分闹忙。”

而在 1911 年上海商业会社印行的《商界现形记》，松江人“云间天贽生”自称是以“上海官话”写成。如：

“秋云呢？”那个做手道：“来浪来哉，来浪来哉！”（第二回）

这句话中“来浪来哉”表示的是上海话中的现在进行时态。

大凡客人同先生笃落个相好，定规注定来浪格，前世里就有缘分来海格。（第二回）

这句话中“来浪格”和“来海格”表示的是上海话中的过去完成时态。

活跃于近代文坛和报刊的在上海形成的、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许多作家在他们许多接近民俗的作品中运用了更多的上海话词语。

严独鹤主编的《红杂志》周刊发行在 1922—1924 年，共出 100 期，后来改名为《红玫瑰》。这两个期刊是“鸳鸯蝴蝶派”重要阵地，他们除了发表小说散文外，每期都有随笔、掌故和小品文游戏文字，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活跃在他们这些杂著中的上海话及其上海民俗。

比如在 1922 年《红杂志》第八期梦鸥的《滑稽问答》中有“问：何以剧

院理事,为天文学家?答:以其常发现明星。问:何种树林,为世间所无者?答:阿木林。问:何种账目,为算不清者?答:混账。”从此可见“明星”、“阿木林”的用法在当时已出现。像“阿木林”这样一批词语的具体用字也在他们的文章里先形成。

二卷94期(1924年6月)陆律西的《端午节景歌(仿无锡景调)》有“出风头”一语,其最后一段是这样的:“竞渡闹龙舟呀,箫鼓放中流,把持格钩轴一心想出游呀,十万末旅费难搜求,望洋那格兴叹末,怎去出风头。”同期上还有毛湘君的《滑稽食谱》一文,上有“搔头摸(木)耳汤、烂污泥汤、调枪花(虾)、阿木林(菱)、空心汤团、之乎百叫(饺)”等。其中用到的几个词都是当时的流行语。程瞻庐在这期里还写了《吴语探原》,如认为“木阁的阁是觉,弗知弗觉的意思”。现今我们认为称苏州人为“苏空头”是“爱说空话”的意思,程在91期《苏空头考》中认为“苏空头”自“空心发”而来,“苏人发尽空心”。他在96期《红吴谚》中用游戏笔墨写活了“放红老虫”一语:“三年老夥计,辛辛苦苦做生意,东家见了,和人商议,加他几元薪水,也好鼓励鼓励。那人眉头几皱,心生一计,两月嘴唇皮,凑近东家耳朵里,如是这般没多句,东家听了便生气。东家生气,苦了夥计,一只饭碗,拍的落地,饭碗落地返家中,忙了三年一场空,一场空,一场空,被人放只红老虫。”

《红杂志》第二期有吴双热的《热得来》一首说唱体小品,活龙活现地写出上海城内热天里的众生相,这里录其一部分:“电气风扇**蒺藜藜**,热得俚来真**邪呀气**。盆汤里,好生意,大家才要跑进去,活剥皮,壮格赛过出白猪,瘦个像只落汤鸡,赤身露体真**写意**,客串一出水漫金山拿手呀戏。夜花园,轧来些,少奶奶,小弟弟,大少爷,小娘姨,还有姨太太勒大小姐,乘风凉,蛮写意,男女拆白半夜三更忙来些,登拉影戏场浪寻主顾来兜生呀意。游戏场,人头忒拥挤,有点汗酸气,看长看短挤拉人淘里,热得俚来弗

有趣，臭汗搭搭涕，交关弗写意，连忙向后转，跑出去，乘风凉，透空气，爬到屋顶浪去看影戏，然而僚也去，我也去，挨勒挨，挤勒挤，那末仍旧轧得僚来热来呀些。有子铜钿顶写呀意，尽让热，弗怕俚，电风扇，装得起，冰忌廉，吃得起，到子夜里向，坐子汽车兜兜圈子去，黄浦滩浪凉来些，真写意，看看黄包车夫真苦气，两只飞毛腿，插拉屁股里，嘴里嗤哈嗤哈大透气，头浪臭汗一直滚到腰眼呀里。”“热得僚来真邪呀气，蚊虫打造新世界，臭虫开辟殖民地，叮得僚来痒齐齐，痛嘻嘻，团团宝宝皮肤嫩来些，直头有点叮弗起，二三更，半夜里，亦痛亦痒交关难撮祭(吃也)，于帝于帝啼啼哭哭出眼呀泪。”这首歌谣几乎用的都是寻常白话，吴双热是常熟人，但从他这篇文字中的人称代词用法可见当时的上海歌谣中苏州话的影响还很大，不过当时“阿拉”已进入了下层上海话语，从对民众时尚多为介入的报刊里先用出这些词来的。法国传教士布氏 1941 年的《上海方言语法》中说“‘阿拉’开始在下层用，上层依然用‘侬’”，但从《热得来》来看，20 年代前期上海就已用宁波话的“阿拉”称“我们”了。这首歌一直戏说到《红杂志》的编写，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文人生活留下一点缩影：“热得僚来真邪呀气，那么括搭红杂志，风头辣来些，编辑主任独鹤先生忙来些，亦要赶到红杂志社稿子发一披，僚僚是个小大块头笃笃肥，格种天气热得僚来臭要死，就是区区阿拉亦然难撮祭，拨拉僚，逼杀侬，讨稿子，要东西，活冤家，骂声僚，只好提起笔来写几句，放两个，香儿屁，一桩事体顶苦趣，电风扇，阿拉装弗起，扇扇子，亦是来弗及，蚊虫跑来绰白戏，叮得我来臭要死，等到打僚已经一个箸头出到子吴淞去，气得阿拉嘴唇浪向油瓶挂得起，赌神发咒一只一只阿弥陀佛死忒呀僚。”从歌中还可见，“电风扇”在当时是很奢侈的新用品。

程瞻庐写过许多很有趣味的歌谣，如《豪燥歌》中有这样一段：“天上麻雀叫，便去斩葱椒，快些快些，豪燥豪燥；三岁孩儿才会跑，便去学习撑

稿跳,快些快些,豪燥豪燥;今天会谄五更调,明天便去刻诗稿,说着风便扯篷,炒虾等不及红。”

35期枫隐《谐谈四则》中“今之时髦人物,亦有一至十字之秘诀”：“一等法螺,两斤厚脸,三句马屁,四两骨头(言其轻也),五色面孔,六国语言(谓洋泾浜话),七孔心思,八字胡须,九句谎话(即谚所谓十句九丢落),十足风头是也。”这是用轻松幽默笔墨对时事的嘲弄,这种传统流传至今。

98期王红绡写穷人的《酸语》,第一段:“人家一出门,都是乘摩托卡,我却都是乘两脚车。”其中“摩托卡”和“两脚车”都是当时的新词汇,由于他们文章接近市民生活,新词新语便立刻在他们的小品中反映出来。

33期饭牛的《失馆先生请客记》写上海热闹的吃风,把上海方言俚言引入菜单幽默一番:“菜单:桥弯西瓜子,大壳风菱,掇皮酸橘子,还潮牛皮糖(以上四素盆);外国火腿,调抢虾,黄柏炒蛋,想吃天鹅肉(以上四荤盆);汤罐里笃鸭,死斋鸡,拆烂污,吓痴白日撞,猪油嵌蟹(以上五大菜);酸百酒,料酒,倒头酒(以上酒);宕空筲箕饭,白米饭(以上饭);带累乡邻吃薄粥(以上粥);天落馒头,脚馒头,杜园水饺子,矮脚面(以上点心)。请客名单:伸手大将军,金刚殿大学士,桥头三阿爷,牛王庙董事,阴间秀才,缠夹二先生,寿头码子,蜡烛店小老板,黉刀先生。”

39期恨呆《热昏歌》写的是吹牛大王:“热昏热昏真热昏,请仔三百万匠人造门庭,一造造仔六千六百六十春,作头司务传到子子孙孙八十二代半……一根正梁还勿曾上端正。热昏热昏真热昏,油盏里排列子四十八只大兵轮,拿格矮人岛围困得密层层,一个水雷放出去,可怜矮子个个变成偷油老鼠精。”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看到上海的说唱滑稽曲艺有着深厚的土壤。

各种类型的歌谣体现了上海滩各类人的欣赏情趣。他们创作了不少乡土味较重的旧式民歌,如31期观钦的《撑腰糕歌》是做广告唱的:“二月

二,撑腰糕,老公公请来吃一条,吃了糕,撑住腰,一根拐杖不用了,丢在灶堂里当柴烧,挺胸凸肚上高桥,还把三百六十五斤的柴担挑。……二月二,撑腰糕,小妹妹请来吃一条,吃了糕,撑住腰,腰肢不像杨柳条,将来迷迷吗吗坐花轿,红毡单上立得牢里牢,鞠躬鞠躬都免了。”生根于民间,杂以民间沪语,唱给沪民听,文字自然生动,民众自然乐意接受,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对比当今有些所谓歌词唱词的语言,实离大众远矣。

“竹枝词”又是海上文人的闲趣,也反映洋场文人的生活和对新事物的敏感。《红玫瑰》第一卷第一号署名“阿拉”的《夏日海上竹枝词》写了郊游的乐趣:“携手双双上汽车,倚怀娇语乐陶如,曹家渡与北星径,兜罢归来意态徐。”

98期曼云女士的《新十希奇》调也讥讽政界,洞若观火:“一希奇,复辟筹安最惹气,旧事重提众口一词恨煞伊。银圆一见却又笑颜开,不管宣统洪宪,一齐塞进腰包里。”“七希奇,自由平等新主义,口若悬河佩服俚,只须一朝权在手,一众同胞全是伊奴隶。”

他们中有些人写长篇小说,如1920年发表于上海《新申报》的一百回长篇小说海上说梦人(朱瘦菊)写的《歇浦潮》中三段话:

“世芳一个人靠在沙发上,想起赌钱这件事,着实开心。”

“世芳因被霞仙一句话引起赌兴,一时不能安睡,索性穿衣起来,叫了两声阿凤,不期阿凤早被霞仙打发出去睡觉了,没人答应,唤阿凤端莲心汤进来,吃了起身,揩脸梳头。”

“二房东听他板这句话叉头,心想这是我的不好。”

1930年上海《新闻报》的“快活林”,连载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也用了上海词语、构词法和句法。如:

“凤喜回头一看,沈三玄已经走了,这里只剩她一人。立刻转了念头,笑道:‘喝是不会喝,可是这头一杯酒,我一定要喝下去的。’”

1941年《申报》的“自由谈”和“春秋”上连载了秦瘦鸥的《秋海棠》，虽然开头写的是北方的故事，但也用上上海话的词语：

“看梅宝这孩子的相貌，倒又是个地上少见的美人胎子，细看起来，简直一半像娘，一半像爷，假使有一分像我，这一张小脸便完全断送了……”

“直到疮口收好，血痂脱去，脸上的确不曾留下什么痕迹，他才安心睡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十分重视方言在语言文化生活中的作用，提倡方言文学。白话文运动的主将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1930）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胡适（1925）在为顾颉刚《吴歌甲集》作的序中曾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老实说罢，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只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基础就自己满足了。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胡适在《〈吴歌甲集〉序》中还说：“所以我常常想，假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用绍兴土话做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啊！……最近徐志摩先生的诗集里有一篇《一条金色的光痕》，是用硖石的土话作的，在今日的活文学中，要算是最成功的尝试。……凡懂得吴语的，都可以领略这诗里的神气。这是真正的白话，这是真正活的语言。”

鲁迅在为《何典》出版亲自写的序言中称赞书中大量运用的生动的上

海话四字格熟语说：“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

陈独秀看到当时的国语词汇还不够丰富，曾经设想过先让几个大方言使用发展起来，以此为基础再形成全国的通用语。“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主将也主张用大众口语，曾设计过多个大方言的拼音方案。上海 30 年代提倡“大众语”和“语文改革”的语言专家十分重视方言，瞿秋白 1931 年在《文学导报》第十五期上发表过用上海话写的诗歌《东洋人出兵》，摘引其两段：

一、

说起出兵满洲格东洋人，先要问问为仔啥事情。只为一班卖国格中国人，生成狗肺搭狼心。日日夜夜吃穷人，吃得来头昏眼暗发热昏。有仔刀，杀工人，有仔枪，打农民，等到日本出兵占勒东三省，乌龟头末就缩缩进，总司令末叫退兵，国民党末叫镇静，不过难为仔我侬小百姓，真叫做拿侬四万万人做人情。

八、

说来说去还是难为仔穷人，有钱人搭有钱人，轧淘轧得漫漫紧。实在既法也好逃命，纽约伦敦搭东京，外国银行吒淘成，成千成万去存进，官僚军阀有得是金银，一仗勿打就会逃得干干净净，横竖死只死得侬小百姓。

语文改革专家倪海曙曾经出版过他的《杂格咙咚》集，汇集他 1945 年到 1950 年的文章。其中收有 60 首苏州话《国风》，是他三年中陆续译成的，“翻译的动机主要是试验方言写作。”他说：“为了使文艺接近更多的人，为了使中国的文学语言更有表现力，方言文学的提倡是十分必要的。”“方言文学是一种可以直接给人‘听’的文艺，不但使人听得懂，而且使人听得亲切，有味。”他认为“人民的方言”是“活语言的源泉”。他的《杂格咙咚》收有他写的小说《三轮车》和沪剧《警察访问》和《望阿奶》。这里引录

《三轮车》开头一段：

有一日，我从一个朋友屋里出来，朋友送我到门口头，弯弯身体就进去哉。我撩起袖子看手表，辰光只有四点三刻，转去吃夜饭末忒早，再去看朋友末忒晚，想起美琪大戏院有一只片子弗曾看过，还是去看一场电影吧。不过要赶紧，弗晓得此地阿有三轮车？抬起头来一望，刚巧有一部空车子勒拉踏过来，我装出一副老上海格样子，嘴巴里点仔一根香烟，帽子拉拉歪，用两只手指头对仔车夫一揆，神气活现格话：

“三轮车！”

车子踏过来哉。

“先生！到啥地方？”

“戈登路美琪大戏院？”

“噢，美琪是伐？去格去格。”

“几钿？”

“阿拉弗讨虚头，三千块！”

我想，三千块末忒大点，两千末差弗多哉，我来还伊一还价钿，还格一千五，等伊讨好仔两千块就好坐上去。

“瞎三话四，侬路认得伐？”我一面走，一面话。

“侬话几钿？”

“一千五！”

“一千五忒苦勒，先生！爽爽气气两千五百块！”

“滚蛋！”我只管走，望也弗去望伊。

三轮车夫忽然弗响哉，踏仔车子跟勒我后头，跟仔几步路，笑嘻嘻格说：

“好！好！我踏侬去！”

我倒拨伊一呆，那能格道理一千五百块也肯哉？此地到美琪大戏院

坐黄包车末也要一千五。我人坐仔上去,心里倒暗好笑,“今朝搵仔便宜货哉!”

从这几段小说语言,我们可以看到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话的特点,这样的语法特点一直保留到 80 年代中叶的老上海口中,称为老派上海话,不同于更老的上海话,显然是一个时代受到苏州话影响而形成的。如:“此地阿有三轮车?”“有一只片子弗曾看过。”在 80 年代的中青年上海人中,已经改换为新的说法:“此地有三轮车哦?”“有一只片子既没看过。”其中前句是土层语法重新获胜,后句是换用了普通话的说法。

那些体现新文化实绩的作家写的小说、政论、散文、杂文,都善于从丰富生动的上海话中汲取词汇。

陈独秀的政论的篇目都很醒目,如:《有趣煞的总理纪念周》、《两件肉麻的事》、《呵要难为情》、《上海工统会的饭碗快打破了》。他在 30 年代还曾请茅盾介绍“老上海”,用现代语言学的记音方法调查过上海方言。

鲁迅在 30 年代长住上海,他的杂文中上海话语汇也很多。如他的篇目《吃白相饭》、《寻开心》都专用上海话词语,从它说开去。他的《且介亭杂文》书名就用了“租界亭子间”的意思,其一、二集中有许多上海话,如《“京派”与“海派”》一文的一段:“我也可以自白一句:‘我宁可向泼刺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洋活气的文人打棚。’”《阿金》一文中:“阿金和马路对面的一家烟纸店里的老女人开始奋斗了,还有男人相帮。”《论俗人应避雅人》一文中:“这真是恶作剧,将韵事闹得一塌糊涂。”《拿来主义》一文中:“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

鲁迅 1931 年和 1932 年写的《好东西歌》里有“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公民科歌》中有“做个公民弗

容易,大家切莫耶耶乎”,“蛮如猪罗力如牛”,“瘟死还好熬熬油”,“自由结婚放洋屁”,“免得大人一不高兴便说阿拉是反动”;《“言词争执”歌》中有“粤方委员叽哩咕”,“一声不响出‘新京’”,“香槟走气大菜冷”,“理论和实际,全都刮刮叫”等句子,通俗使用上海话。

叶圣陶的小说长期以来被看作现代白话文的典范,选入中学课本当范文读,他的文章也吸收了上海话的词语来丰富他的表现辞藻,使描写的对象带本地味,更为生动。如《潘先生在难中》的两段话:

“‘我要吃火腿汤淘饭’,小的孩子咬着指头说,潘师母马上对他看个白眼,凛然说:‘火腿汤淘饭,是逃难呢,有得吃就好了,还要这样那样点戏!’”

“便分付茶房道:‘我们在路上吃了东西了,现在只消来两客蛋炒饭。’”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反映的是上海民族资本家的奋斗史。小说第一段具有上海话词语:

“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去,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

茅盾短短的一篇散文《上海大年夜》里就用了24个上海话词语:年三十、天好、水汀、水门汀、市面、上坟时节、块把钱、进账、老枪、剃头店、野鸡、瞎眼、穿夹、几部汽车、转弯角、鸭舌头帽子、慢走、攒炮、年关、影戏院、打吗啡针、打强盗山、自来水龙头、两头勿着实。

1938年周天籁著的《亭子间嫂嫂》不但对话中充满上海话,在叙述里也很自然地用上上海话词语。如:

“那家伙所以叫做白相人,手段来得辣,从不吃情,触犯了他,马上枇杷叶面孔,翻转不认人,吃相来得怕。胆子小的,不知他是什么来路,那一种威势,可以使你马上屈服。”

由此可见,30年代前后主要在上海创作的作家的一些作品,几乎都受到上海话的影响,写上海的事物和风情都免不了在作品中写进上海话,同时又把上海话词语带进了当时的国语书面语。由于上海出版业的空前发达,许多上海话的语词也随着作品的流传而走进共同语里去,如“亭子间、瘪三、名堂、尴尬、陌生、垃圾、花头、蹩脚、一塌糊涂”等。

40年代上海出现市民“最喜欢看用上海俗语写的小说”的现象,这是由当时的市民文化背景所决定的。(见于“上海的小型报文化”座谈会记录,《杂志》1943年9月10日第十一卷第六期)如1948年上海小报《罗宾汉》上西平在《洋场燃犀录》中的杂文,有的都用上海话来写。又如40年代活跃于上海小报和电台上的杨乐郎1948年出版的《洋泾浜猎奇录》第一集中的海派小杂文《天文台》中有这样一段:

“抗战胜利之后,从内地出来的一批仁兄大人,掳了抗战八年野人头,到上海住现成洋房的固然不少,可是在内地住了好几年白鸽笼,回到上海寻勿着房子而借干铺的照样也有,打样鬼赵夹里,拨大世界门口一只炸弹一响,就此吓得卷铺盖,二夫妻游码头游到内地,结果比你我勿动身朋友,苦头吃得说勿出话勿出之深,一份人家全部铲光,险介乎在内地讨饭。胜利后直到今年春天,刚刚别着盘川回到上海,到了上海没有等身之处,二夫妻在备褚家桥小客栈里,又孵了一个多月‘抽斗’,后来大家朋友看勿过,写公份替他在自来火街顶着一间‘楼外楼’,此乃一间在晒台外面搭出来的一只阁楼也。一间房间小得实头像只自来火壳子,一只三尺半铁床摆进,面积已经占去三分之二,赵夹里几年来苦头吃得套裤深,有迭能一间安身,心满意足,夜里漚在床上,天窗里望出去,一轮明月满天星俱在眼前,赛过漚在天文台上一样也。近来天气渐热,子码二夫妻每日沐浴发生问题,因房间小得连一只脚桶亦放勿落,子码到底是打样师,一想横里无法扩充,就朝空中发展,所以请一个木匠,将四只床脚接高三尺,利用床底

下余地，摆只大脚桶进去，作为浴室，家老婆汰起浴来，只要将被单朝下一拉，赛过浴室门帘也。”

有的散文小品和小说，也有用上海话书面语创作的。如有本1949年出版的小说有这样的对白：

“各位小开，今朝弗巧之至。迭味先生难板来来，应该招待；各位方面，准定明朝奉陪，爷娘只生我一个身体，实在分身弗措，原谅原谅，抱歉抱歉！”

“捉着哉！勿能再逃哉！敬酒勿吃吃罚酒，阿要难为情哇？”

50年代以后，由于要求“语言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上海地区的文学作品一般都用普通话创作。80年代以后，由于创作题材上的多样化，一些与上海生活比较接近的小说中，上海话的词语重见活跃起来。

被上海知青称之“知青作家”的叶辛，在他早期发表的长篇《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中，就不乏使用当时上海青年中的最新的流行语词，如“刮三”等，主要用于表达较顽皮人物。

而后来在程乃珊、王安忆、王小鹰等的小说中，上海话已经渗透到各种人物各种情节中去了。如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中有这样两段：

“弄堂里有几个保姆在造反派的教育启发下，提高了觉悟，向东家贴了大字报。保姆的起义，好比后院起火，是顶顶要命的事。鸡毛蒜皮的事一经抖落，便无限膨胀，落到造反派手里，件件派得上用场。”

“她说：‘阿姐你评评理，精肉，烧到后来是不是要缩的？两斤肋条肉，能有多少？一烧要缩，她不相信，买菜回来，朝我菜篮里张张，快到中午了，又揭砂锅瞧瞧，就说话了：‘阿姨啊，蛮大的一块肉，烧烧怎么就成这么点了。’这话的意思，不就是说偷吃了吗？你不晓得，就像防贼一样防我，帮人家，苦啊！’”

程乃珊的《女儿经》有这样两段：

“‘哼，伊拉的女儿跌煞铺盖般一只（原注，指无身段），上海人要她也不错了’，沈家姆妈摆出一副不屑一听的神情说。”

“‘我看看，你倒有点潏不醒，一提到简雄，就是如此的兴奋。’‘当心他，简雄这种男人，上海滩上捞捞有一大把了，不值得与他多搭讪。’”

《女儿经》里还用了当时表示青年男女正式确定恋爱关系的新词“敲定”。程乃珊在运用上海话词语时是很灵活和大胆的。她在《穷街使我成熟》一文中还用了新词“上只角”，后又拍成电视剧的《穷街》就是在引人注目的新词“下只角”上大做文章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 1986 年 9 月 29 日刊登了她《洪太太》一文中，有这样一段：

“亏得他们搬进来住，没有人敢欺侮我了。抄完家，钞票一分也不剩，人也给弄得半死。我正在哭，阿菊跑来对我讲，把她男人叫来住，她男人是工人，人家不会欺侮我了。我说我怕连累他们，她说：‘我反正是做粗人，再坏也是做佣人，阿拉不怕。’真亏得阿菊一家。”

程乃珊在 21 世纪写的随笔散文中还常常必以上海话词语自然表现出上海人的民俗和气质。如：“上海女人称结绒线为‘绒线生活’，是很海派的近代女红。”（《结绒线》）“长衫，确是一种身份象征。至少，代表了知识分子，旧上海从来有‘短打’之称，以与长衫界别。上海俗语，一身西装笔挺，不过也只称‘西装革履’而已。唯一身长衫，才称‘长衫先生’。旧时上海有‘洋装瘪三’之说，轻蔑不屑之感尽在四字中。如‘太阳帝国’中那两个外国瘪三，是奸、恶、刁的代名词。”（《长衫》）“‘小开’很百搭，不管酱油店公子，南货店少爷，百乐门少东家……都没有‘小开’传神，口语化。‘小开’十分神髓地描绘出这样一簇上海男人：一般没有自己独立打理的一片生意或赖以作主要生活来源的专业，只恃着老爸或老家的财务，却一

样过得鲜亮风光；因为是小开，凡事不知轻重，不分尊卑，喜招摇过市……因为有的是时间和铜钿，小开棋琴诗画，跳舞桥牌沙蟹麻将网球玩票，都知一点，又因为天生懒散，大都是三脚猫。”（《上海方言的绝版——小开》）“因为其市场定为的特殊性，冰淇淋的零售点大多设在租界地沿马路公寓大楼底层的洋烟纸店——洋烟纸店之有别于上海人的夫妻老婆店，在其是以一众西洋侨民和上海生活西化的中产专业人士为对象，老板大多为西崽(boy)出身，熟谙西方人生活习惯口味，并能扯几句洋泾浜英文，上海人俗称这样的洋烟纸店为‘士多(store)’，即英语杂货铺的意思。也只有这样的士多，才有经济实力置一只电冰箱。士多出售的冰淇淋，有家庭包装的，如半加仑装、一加仑装的，价钱相对零星小买要便宜，但购买家庭需有冰箱。士多里最受小孩子欢迎的，是蛋卷冰淇淋、纸杯冰淇淋和涂上一层淋淋漓漓的巧克力——Ice-cream Bar，上海人称之为紫雪糕，以此区别纯白的香草冰淇淋。”（《冰淇淋——永远年轻的情怀》）

在国语、普通话成为汉语书面语的主体后，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现在呈现两种情形：一种在普通白话文字中的夹杂形式，使有口语特色或地方特色的内容能得到更为细致的描述，丰富了普通话的书面语表达；另一种是直接用方言写文章，主要是给该方言区的人阅读，保留着民间生活、心理的原生态，没有经过头脑里的“翻译一遍”，真正做到“我手写我口”。这两种方式使用方言，都会对丰富汉语的表达作出贡献。

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叶辛编剧的电视连续剧《孽债》全部语言都用上海方言，曾创造了当年上海收视率之最，万人空巷看《孽债》；隔了十多年，在2005年重播，仍然取得最高的收视率。从中可充分看出方言电视剧在地方上映之受欢迎之程度。在90年代初期，上海还拍摄过上海话电影《股疯》，由潘虹和王汝刚主演，市井色彩十分浓厚。

根据王安忆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长篇连续电视剧《长恨歌》是用普通话为主要叙述语言的,但是全剧中穿插着许多上海话的词语。电视剧《长恨歌》是一部具有浓郁的海派特色的经典作品,不但情节的安排自然而富有海派韵味,剧中环境和种种道具使人对接上了上海人跨几个时代的生活情景,就是剧中插入的上海话,也是精雕细刻的,处处表现了上海人的生活情趣和海派风味。编剧蒋丽萍是从上海话出发的,是用上海话的长处去丰富普通话的表达,这是对上海话中优秀的味道重的词语内容的发掘,而其中有不少是普通话中没有对应的词语,则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是把普通话转成上海话讲。由于许多生活情趣浓厚的上海话词语在活跃轻松处说出,使得剧本具有浓郁的本土性。比如王琦瑶的一句“姆妈”,从声调中就带出了上海人的称呼中亲热的嗲味道。一句“侬走好噢”,就把上海人亲切送客的模样传神地表达出来了。一句“侬晚饭吃过了啊?”听了比“你好”感觉亲热得多,那是上海的标准问候语了。还有那些有标志性的上海话的称呼在要害处冒出来,如“大亨郎头”、“白相人”、“十三点”、“滑头”、“小赤佬”、“十足的阿木林”,把各种类型的上海人的人品或特征活生生地点了出来。

而片中的那些带有上海时代特色的语言,如:“面孔红得像杜六房个叉烧一样。”阑尾炎用那个时代称呼为“绞肠痧”,还勾起了老上海对生活的回忆,而“当我是救火会?当我是巡捕行?”却责问得真是有情有景。70年代的小菜场有“配盆菜”的摊头,用一个“配盆菜”词语表达引申出去说搭配的事,只此一词,就自然使剧情巧妙地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让人感受到片子中表现的深厚的生活底子。上海话特色的语气词和叹词运用塑造和烘托了本土气氛,如“喔唷”有时表现了上海人的厌恶和埋怨,有时却表现了对人的惊讶,“喔唷紧张杀了,紧张杀了”又表现了不耐烦。性格刻画得很是细腻。“喏!住院费,治疗费!”一个“喏”,就表达了一个潇洒的

“给你”的神情。叹词“咸”还表示了“是啊”的意思，“侬省省哦！”又是一种温和的警告和劝听。

写上海人不冷不热的一种性格，用“像温吞水”；批评人花言巧语，说她“说得花妙”；称赞对方沉着，“涵养来得个好”；说那人看过来的样子，“眼睛定洋洋定洋洋的”，讲出话来使人“冷丝丝”的，这种达意又清淡的描画都是不紧不慢的，细腻刻画了上海男女的处事待人的各种风貌，“心相倒是蛮好个”。一下闷住，不能灵活处事了，说是“全都不活络味”。描写其多，还带有动作性，说“多得跟造反似的”。叫人别大声激动，还有拟声词的加入：“侬横冷横冷地做啥！”煞是传神！

片中在表达上海人遇事的心情，也用了许多不可替代的词语，如一听到他这样说了，“我心里就瘟塞。”如此诉说自己的苦衷和烦闷，十分深刻，别的词再也不能表达这层感受的了。这类词还用了“乌苏”、“头大”、“疙瘩”。说我做这事的诚恳和卖力程度，“吃奶力气也用出来了”，其表达自己的用心，多么到位！叫人看到利害，忠告“侬勿要笃定泰山”，勿要“假痴假呆”，都是贴切的。

上海话词语还可用来塑造上海的气氛，如用了一些表现上海风物的名词。片中，如在市内，就提到“旗袍的花头经”、“天生的衣裳架子”、“弹性女郎”；到小镇上，就有“乡下的景致”、“吃满月酒”等。还有那种拷贝式话题强调的句式：“缠绵是缠绵得来”，“忙是忙得来”，“烦也烦杀脱了”，“葛末再犟犟不过年纪的”都可以把海派的地方氛围搞得浓浓的。

说一个人“心荡到什么地方去了”，“越说越不入调了”会“搭架子”，“最欢喜轧闹猛”，“搭讪外国人”，“骗骗野人头”，叫一个人“侬不要腾我来”，“侬不是横对吗？”“不要兜圈子来”，从这些“熟门熟路”对上口径的上海话中可以看到上海人的典型行为。

上海熟语谚语在片中也有很贴切的运用,如:“死了荷花还有藕”,“少年夫妻老来伴”,“萝卜不当小菜”,“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做生意千做万做折本的生意不做”,“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床上是夫妻,床下是君子”,等等,它使深奥的事理明白化,还能呈现幽默锐利的话锋。

这个片子最珍贵之处是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榜样。有特色的上海方言词语的运用,不但优化了剧本的表演语言,而且挖掘展现了上海地区的民俗文化风土人情,说明不论京派、海派等,都要各有浓郁的地域特色风味,汇集起来,中华文艺才会有更丰富多元的异彩。

这不仅仅是一个传承好的上海话的语言问题,还是一个艺术作品本土化的问题。许多到现在还站得住的作品,都生根于地方文化的深层土壤中,因此有较强的生命力。如以普通话为载体的大量电影文学作品,实际上也渗透着深层的地方文化的底蕴。像《白毛女》音乐以河北方言中形成的《小白菜》为基础,《江姐》中融入了激越的川北号子和吴侬软语的越剧唱腔才如此优美。《洪湖赤卫队》中的楚文化,《刘三姐》、《五朵金花》中的少数民族风情,这些剧目由于传出的是中华民族各地不同的风情,因此强大。积极审慎地在文艺作品中使用方言中优秀有特色的词语,可以丰富普通话的语库和表达方式,并不会妨碍推广普通话。

一个地方的具体风貌,自有一地的方言词语给以完整表达,一方的水土滋养了一方的人,一方的民俗深处必紧贴着一方的方言。越是植根于本地沃土的文化,越能在世界上走得远。那是因为文化越是本土,就越是拥有细致入微的乡情民俗异彩,就越是贴近本真,其语言和文化形态中便蕴含着世界文化的普世精神和永恒价值,深藏着人类人性中共同部分的精髓。

三、上海话童谣

记得还在穿开裆裤的时候,骑在母亲双腿上,跟着母亲咿咿呀呀地唱起那悠悠的童谣:“唧唧唧,骑马到松江。松江老虎叫,囡囡心里别别跳”;“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伴随着有节奏的乡音,感受着母爱的温馨,似懂非懂地体会着那含义若明若暗的韵文。当我舒舒服服地驮在母亲背上时,又听得母亲疼爱我的歌谣:“背背驮,卖猪猡,开年卖脱依!”有时妈妈会问:“卖脱依?肯哦?”两人异口同声说:“勿肯个!”到了静静的月夜,母亲携着刚会走路的我,一边数着月影,一边又轻轻地念着:“月亮亮,家家小团出来白相相……”

就是从这些短小平常而又意味隽永的童年顺口溜中,嗷嗷待哺和蹒跚学步的儿童第一次沐浴着爱的上海民风的熏染。

到了开始上学的年龄,生活就变得多彩起来,童谣也变丰富起来。“排排坐,吃果果,幼儿园里朋友多。”这是第一个老师教的,也就在这齐声欢歌中初次体验到集体生活的乐趣。听着琴声,拍着手,唱起“一闪一闪亮晶晶,天上星星数不清……”“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一只没尾巴,一只没耳朵,真奇怪,真奇怪!”在上海,从小就接受到了外国优秀儿歌的影响。至于孩子们自己做起游戏来,口中的顺口溜就更多了。如果两个人对坐,就可以做搓擗手掌和交叉对拍的游戏,儿歌往往依附游戏动作,有节奏地念唱起来了:“一箩麦,两箩麦,三箩开手拍大麦,劈劈拍,劈劈拍。”交叉着拍对方的手,越拍越快,直到一方输了,就摊开他的手执行罚打。几个孩子把食指顶住一人的手心,唱“金锁银锁,轧辣辣辣一锁。麻荔子开花,锁到啥人算数”。一手抓下来,谁被抓住,就要罚打,一面打手心,一面又唱将起来:“本来要打千千万万记,现在辰光来不及,马马虎虎打十记,一、二、三、四……”有时候,几个孩子用小凳排成一长条:“笃笃

笃,卖糖粥,三斤蒲桃四斤壳。吃依个肉,还依个壳。张家老伯伯辣辣哦,问依讨只小花狗。”女孩子们在跳橡皮筋时,一边跳,一边用顺口溜来积数升级:“小皮球,小小篮,落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三五六,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还有伴随动作的:“孵下来,立起来,电灯开开来,钞票摸出来,搓搓小麻将呀,来来白相相呀!”正当玩得有趣之时,忽然下起雨来,于是大家高嚷着:“落雨喽,打烊喽,小八辣子开会喽!”一窝蜂地躲到屋檐底下去了。

这样的城市童谣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还在里弄里广泛流传,夏天孩子一起乘凉,自愿结合集体做游戏的多,儿歌便常常听闻。如对婴儿的:“鸡鸡斗,共共飞,飞到高山吃白米。”如同字联句的:“小三子,拉车子,一拉拉到陆家嘴。拾着一包香瓜子,炒炒一锅子,吃吃一肚子,拆拆一裤子,到黄浦江边汰裤子,拨拉红头阿三看见仔,拖到巡捕行里罚角子。”“山浪有只庙,庙里有只缸,缸里有只碗,碗里有只蛋,蛋里有个小和尚,嗯牙嗯牙要吃绿豆汤。”如:“山浪有只老虎,老虎要吃人,拿伊关辣笼子里。笼子坏脱,老虎逃脱,逃到南京,逃到北京,买包糖精,摆辣水里浸一浸,密西密西拉胡琴。”“‘阿哟哇!’‘做啥拉?’‘蚊子咬我呀!’‘自家上来呀!’‘呒没路梯呀!’‘快点上来呀!’”这是两个人各用一手,分别扭着手背轮流放到上面的小游戏。还有一种循环式的顺口溜,如:“从前有只庙,庙里有棵树,树下有个老和尚,老和尚对小和尚讲故事:从前有只庙……”有谐音取乐的,如:“从前有座山,叫黄昆山;山浪有条路,叫叽里咕噜;路边有只庙,叫莫名其妙;庙里有只缸,叫四大金刚;身浪有把剑,叫看勿见;来了两个官,一个叫笔套管,一个叫痰孟罐……”上了幼儿园课本的:“小老虫,上灯台,偷油吃,下勿来,骨落骨落滚下来。”

50年代,学校里已开始普通话教育。有些儿歌可以用上海话味很重的普通话唱。比如在操场上两队人面对面比手臂拉力时唱:“‘我们要拣

一个人,我们要拣一个人!’‘什么人来拖得去?什么人来拖得去?’“王小明来拖得去,王小明来拖得去!”接着各人就站稳脚跟伸出一手来比拉力,看谁能被拉过去。这里用词“拣”啊、“拖得去”啊,都是上海话的用法,可见当时向普通话转变中的儿歌的普通话水平不高。这样的儿歌能回忆起的还有几首,如能用普通话也能用上海话唱的:“三三三,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哭来不许笑,还有一个不许动。”有的是从小学的语文课本上的课文唱开的,如“狼和小羊”的一段:“(狼唱:)小孩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孩唱:)不开不开不能开,妈妈没回来!”这个儿歌是可以表演的。在幼儿园里一度甚为流行的两栖儿歌还有一首可唱的“催眠曲”:
“弟弟疲倦了,眼睛小;眼睛小,要睡觉。妈妈坐在摇篮边,把摇篮摇。盎盎我的小宝宝,安安稳稳睡一觉。今天睡得好,明天起得早,花园里去采葡萄。”

百年童谣之最的“摇啊摇”,原自乡镇中来:“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外婆买条鱼来烧。头勿熟,尾巴焦,盛在碗里吱吱叫,吃拉肚里豁虎跳。跳啊跳,一跳跳到卖鱼桥,宝宝乐得哈哈笑。”这是一个版本,口头文学往往有多种传说。还有两个流传的“摇啊摇”,一个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请吃糖,请吃糕,糖啊糕啊莫吃饱。少吃滋味多,多吃滋味少。”这个寓教的成分较重,曾被选进小学国语课本。另一个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我叫外婆洋泡泡,外婆骂我小出老!”这个多带有调侃味,是后来市内的孩子自己编造的,流传也较广。另有一个表达孝心的儿歌,笔者在80年代去南市调查,一位70多岁老年人还能背诵:“梁山头浪一只羊,远往松江粳米粮。大斗量来小斗卖,升箩头浪养爹娘。爹娘养我能长大,我养爹娘勿久长。”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吴歌,在上海也有流传,如:“康铃康铃马来哉,隔壁大姐转来哉。啥个小菜?茭白炒虾,田鸡踏杀老鸦。老鸦告状,

告拨文王；文王卖布，卖着姐夫；姐夫关门，关着苍蝇；苍蝇扒灰，扒着乌龟，乌龟拆屁，拆得满地。”

在许多儿歌里，我们可以窥见从孩子们幼小纯洁心灵中表白出来的是与非。他们最不喜欢一碰就哭的女生，“一歇哭，一歇笑，两只眼睛开大炮。一开开到城隍庙，城隍老爷哈哈笑。”就是嘲笑她们的。有的孩子调皮逃学，大家就讽刺他：“赖学精，白相精，书包贯辣屋头顶，看见先生难为情！”对跟在别人后面说的人，则嘲弄说：“学人家样，烂肚肠！”有的同学爱显宝而又吝啬，于是奚落他：“稀奇勿煞，卖样勿煞，烂泥菩萨，一脚踢杀！”

充满稚气的孩子有时也会戏谑。“大头大头，下雨勿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这是孩子们对头大一点的孩子的揶揄。“冬瓜皮，西瓜皮，小姑

* 1946年商务印书馆沈百英编的《幼稚园读本》第108版第四册上的儿歌《摇摇摇，摇到外婆桥》，1950年仍在使用的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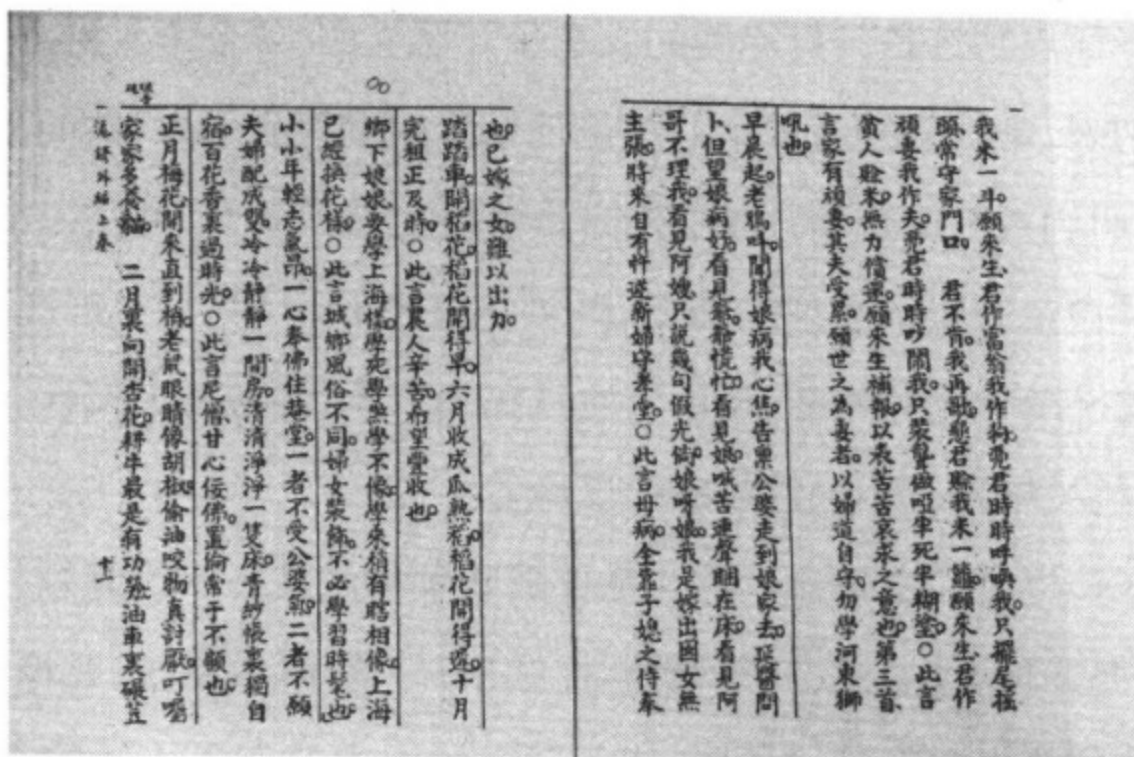
娘赤膊老面皮!”这是与打赤膊的女孩子开玩笑的。“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勿来,密细密细炒咸菜。”这是他们无故嘲笑乡下人,然而从这条顺口溜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孩子们对言语差异已有所感受,并加以滑稽的比喻。那是孩童的童话心理的流露,既诙谐又传神。到了60年代,就有了一些带有斗争味的顺口溜,但由于它从民间产生,都带有调侃性。如:“汤司令到,机关枪扫,热水瓶爆,癞蛤巴跳。”

这些孩提时代童趣盎然的儿歌伴随着种种游戏——挑绷绷,采东采,办家家,捉猛猛,逃界山,钉橄榄橛,捉帖子,打菱角,踢毽子,跳橡皮筋等,将永远驻留在大人们的记忆里,成为对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的最甜蜜的回忆。好的童谣应该会代代相传的,它时常会被人们记起,因为它是孩童心声的真实流露,是充满着人类情感的产物。

但是,童谣在“文革”中受到摧毁性的打击,以后就一蹶不振。由此可见,一种文化,要摧毁容易,要恢复就很难,埃及古文明的消失是这样,一个地方优雅的文化氛围也是这样。也许是幼儿园、小学的老师已经不会了,传统隔断了,也许是商业社会的节奏更快了,快餐文化、电视游戏机取代了它,也许是现在独生子女的不合群性消解了集体游艺,也许是考试测验之多挤光了时间,也许是……对此,我们不妨从文化兴衰的角度思考一番。

四、上海话民歌、情歌

上海的山歌民谣,都属江南吴歌一脉,各种题材十分丰富,粗粗分类,有劳动歌、市政歌、仪式歌、生活歌、情歌、儿歌、传说歌、中篇长篇叙事歌和其他杂歌。但要到上海的郊区乡下去找,城里人对之已很陌生了。



* 1923年胡祖德《沪语外编》中的民歌有“乡下姑娘要学上海样”

民谣是反映民众心声的，它尤其流行于民间底层文盲和半文盲之口，又在群众自娱自乐中表演，具有清醒的巧合天工的艺术魅力，如：“山歌好唱口难开，樱桃好吃树难栽，白米饭好吃田难种，鲜鱼汤好吃网难扳。”唱来十分自然，其比兴虽带朦胧，但充满了生活的张力。

在农业劳动中，山歌表达了劳动的愉快和收成心理，如反映稻作和蚕丝生产的一首：“苧秧要唱苧秧歌，两手弯弯苧六棵，六棵头上结白米，桑树头上出绫罗。”

不少民歌反映了人们的勤劳的谋生意识。如：“游火虫，夜夜红。公公挑担卖胡葱，婆婆养蚕摇丝筒，儿子读书做郎中，新妇织布兼裁缝，家中有米勿落空。”这一首歌颂了一家老小，小吃小做，各尽其职，勤俭谋生。

另一首《萤火虫》歌则表现乡里间朴素的人际关系，描写了乡间重要

的人情交流即亲戚来往活动,亲热情景可见一斑:“萤火虫,夜夜红,飞来飞去望舅公。舅公勿在家,回去望阿爹。阿爹屋里客人多,猫扫地,狗烧火,活狮拿凳客人坐,客人吃酒笑呵呵。”

歌咏自己小农生活的自给自足的有:“勿做中,勿做保,一生一世勿懊恼。日里勿做亏心事,勿怕半夜把门敲。”

但是,大量的民歌反映了小农生活之穷困。如下面一首描绘非常形象:“风扫地,月点灯,灶里柴草呒半根。有个地方千层布,呒个地方肉露露。朝天睏,望见满天星;侧转睏,看见过路人。”

各种身份的人的诉苦歌谣也颇有内容。如写“寡妇苦”的:“东南风起削竹梢,后生寡妇最苦恼,日间头生活呒人帮,夜里向困拉床浪怕狗咬。”又如《梅香苦》:“阿妈娘,呒商量,三岁卖我去做梅香。做梅香,苦难当,吃末吃个咸菜汤,着末着个破衣裳,困末困个呒脚床,走末走个暗弄堂,打末打个冤屈棒。东家贪财心肠硬,再卖我出去做偏房。大娘做凶多管束,时常闲气塞胸膛,害我终生终世泪汪汪。”再如《孤儿苦》:“小小鸡,怕翻窠,晚(读作慢音,是古音)娘进门我最苦。跟爷睏,爷嫌我;跟娘睏,娘摘我;自家独睡冷呵呵,半夜三更碓脱被头啥人照顾我。”这类歌谣在文学史上溯源可以上推到汉魏乐府吴歌。

唱各种典型的人际矛盾的歌谣也有不少。如《黄花郎歌》:“黄花郎,就地生,我是婆婆亲外甥。有事走走做正经,无事走走勿白文。外婆请我堂前坐,舅母看见勿殷勤。一双筷,水淋淋;一碗饭,冷冰冰;一碗菜,呒荤腥。今朝勿是走来借钱文,饿是肚皮就动身,永世勿上舅家门。”又如“赶亲眷”一首:“雨落乒乓响,柴米纷纷涨。亲眷勿动身,只好拿小囡打。”还有:“隔重肚皮隔重生,隔重夏布勿风凉,讲声闲话两样个,到底勿是自家养。”“姐妹兄弟合爹娘,小小事体有啥争,同胞和睦看娘面,千朵桃花一树生。”这两首也是从不同角度写人间伦理关系的。

夸张调侃的歌也很有趣味。如《大姐小姐》一首：“姐女生来三丈六尺长，登拉虎丘山浪乘风凉，龙华塔拨伊当枕头暍，电线杆要当出牙杖。姐女生来三寸长，登拉落苏园里乘风凉，拨拉长脚蚂蚁扛仔去，笑煞仔青蛙哭煞仔娘。”还有唱“小丈夫”的歌：“十八岁姑娘嫁三岁郎，还要喂茶喂饭着衣裳。因说道娘啊，郎小姐大姐吃亏，万百样事体托勿起：前几日叫伊到园地里去采落苏，落苏虫吃拉肚皮里；叫伊去摘个三瓢葱大蒜，拨黄鼠狼衔拉阴沟里；叫伊到街坊镇浪买豆腐，豆腐滑来盛篮底：有一日落仔阵头雨到家东头，家西头开个塌水缺，勿拷佬同田鸡蛤端相打满头泥。爹妈嗨（许）拉爹娘去，我永生永世勿到夫家去。”

民歌的形式丰富多彩。较长的民歌有问答对歌，有采用花名的，也有以月份连缀的，如下面一首：“正月正，家家人家点花灯；二月二，花芥落苏侬落地；三月三，荠菜开花结牡丹；四月四，一个铜钿四个字；五月五，买条黄鱼过端午；六月六，蚊子叮仔菜籽壳；七月七，买只西瓜切个切；八月八，买点百合扒个扒；九月九，九个姑娘吃老酒，十月十，十个姑娘侬嫁出。”（最后两句，笔者已记不清了。）

还有许多“对花山歌”，它们和中篇叙事民谣就是后来沪剧和上海说唱的源头。形式和唱腔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内容也与此一脉相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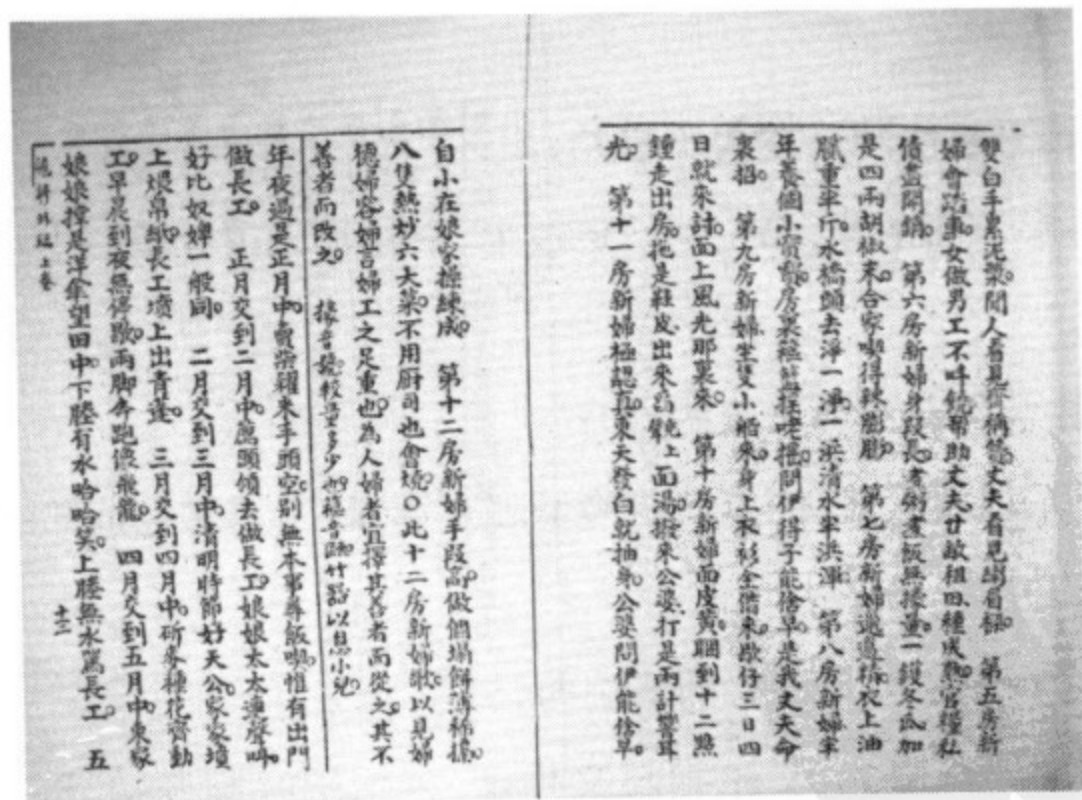
后来，在商业文化刚起步时，伴随小本买卖的“小热昏”说唱一度在上海城里兴起。有一首《小热昏调》如下：“乡下姑娘，嫁到城里。兄弟到城，望望阿姊。光复以后，还留小辫。身上衣衫，样样古气。一件马褂，宽大无比。一双套裤，两脚带泥。酱色布袜，后跟拔起。杜做布鞋，毛铺鞋底。手中折扇，倒有尺二。半篮荸荠，四只小鸡。乡下土宜，一点心意。走进门来，东张西嬉。一见亲母，就要见礼。亲母回话，请坐用烟。殷勤留饭，颇有场面。谦言便饭，无啥东西。圆桌拖开，十碗摆齐。清炖鲥鱼，红烧猪蹄。鱼翅鹿筋，海参鲍鱼。鱼圆肉圆，羊肉鲜鸡。雪里蕻汤，加点蛋皮。”

乡下客人，坐是头椅。对此大烹，不免垂涎。酒壶打翻，赶快扶起。快唤饭来，畅饱肚皮。吃落饭后，无啥事体。话话亲情，私谈几句。阿姊开言，多时不见。我在这里，身体适意。婆婆袋我，大家欢喜。捌姆姆里，还算客气。你的姊夫，尚能勤俭。弟弟回家，禀明娘前。带买果饼，两块洋钿。要请母亲，保重身体。还有杜布，两双鞋底。交与嫂嫂，骗骗小弟。酒在肚里，事在心里。凡百事体，不可忘记。东家妹妹，西家姐姐。代我望望，有烦致意。送出大门，慢去慢去。”（刊于1923《沪谚外编》）这个小热昏调把城乡对比，时行接客民俗，亲族邻里的朴实关系铺陈得活龙活现。

民歌中最动人的是情歌。上海地区的情歌非常丰富，语言朴实，感情深挚，具有浓重的乡土气息，真切地反映了青年男女的恋爱生活。有反映青年男女的朴素恋爱观的，如：

“车沟里水开白花，妹妹爱我我爱他，小妹爱我会车水，我爱妹妹会削花。”

* 1923年胡祖德《沪谚外编》中的民谣《长工苦》



“场角有朵白菊花，娘搭囡儿拣人家。我勿要高行大屋田百亩，我只拣小伙子出众做人家。”

有表达相思重重叹息难以相会的，如下首：

“结识私情隔块田，旧年相思到今年，六月里浓霜难见面，黄昏星难到月身边。”

有表现初恋中的慌张心理的，如：

“太阳下山黄又黄，郎扛木犁姐背筐，本想谈句知心话，话到嘴边心里慌。”

“姐垃拉园里拓落苏，郎垃拉外头唱山歌。郎阿郎，依四句山歌八句山歌要到别处唱，依为啥句句山歌带着我，害得我三十棵落苏拓脱仔廿九棵。”

有唱私情缠绵而怯于人前言明的，如：

“结识私情隔条河，手攀楝树望情哥，娘问囡儿依望啥，我望楝树头顶上花结果。”

有急切盼望机会早日见面的，如：

“南云涨来北云推，指望老天有雨来，落仔三寸阵头雨，明早就来看小妹。”

也有相思起伏却又假装不言的，如：

“新造房子面南开，郎拉门前走过来，小妹是风车肚里心上转，假做牵纱头勿抬。”

有满腔情丝却遭遇失望的，如：

“月上东墙白茫茫，西窗口姐等情郎来笃窗，三更勿见情郎到，等到五更泪汪汪。”

有因为相思所以见面反而情怯的，如：

“大树底下遇情郎，又想招呼又想藏，要想招呼难开口，要想藏起情

难忘。”

一旦坠入情网,山歌细腻地唱出了种种异常行为和心情,如:

“姐来河边汰衣裳,南边来了有情郎,眼望情哥棒捶手,只怨棒捶勿怨郎。”

有对爱情信物恋之人迷的,如下首:

“阿哥送我银丝镯,阿妹当作心头肉,蒨秧田里看三看,睏梦头醒来摸几摸。”

有愿意为情人牺牲自己的,如:

“六月太阳红似火,晒得情哥没处躲,摘下凉帽让哥戴,宁可太阳来晒我。”

多么真切的思念,多么温柔的情怀,在这些歌谣里用很寻常的白话流水般地唱出。

情歌中唱男女秘密偷情的歌,表现出青年男女异常的机智、勇敢和痴情。如:

“月照东天凉爽爽,萤火虫飞进姐拉房,照得姐拉房里亮堂堂,只看见踏板头浪鞋一双。”

“结织私情窗里来,鞋子落拉梳妆台。娘问因儿啥个响,老鼠窜梁跌下来。”

“结织私情隔顶桥,为依私情夜夜跑,朝吊露水夜吊霜,伤风咳嗽自家熬。”

“约郎约拉吊桥西,打煞仔黄狗养雄鸡。黄昏头郎来呀狗咬,天亮时郎去雄鸡啼。”

“私盐越紧越好卖,私情越紧越要偷。大麦上场坏要打,韭菜长来备割头。杀人场浪自有偷刀贼,铜墙铁壁有郎钻。”

“结织私情勿要结啥隔条塘,郎闯穷祸姐去挡,若拉姐双膝馒头跪在

官门前，一口咬定姐偷郎。”

这个情歌的意境在吴歌中普遍都有，如流行在无锡、江阴的一首：“心底里爱你横竖横，做仔黄鳝勿怕烂泥浆，油锅刀山闯过来，勿会撑船只会横。做仔黄鳝勿怕浑泥浆，哪怕闲人话短长，有心做事勿满人，咬金嚼铁姐爱郎。”

我们在吴地情歌中到处可以看到青年女子出自本性的主动大胆追求爱情的真相，这与那些受封建意识影响的文人所写的“雅文学”中的女性确实不一样，也许倒和当代上海城里的姑娘以及“新女性小说”中的女性更相像一些。

相近的情歌在明末冯梦龙的《山歌》中可以找到，如：

“结织私情勿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

以“结织私情”开头的情歌在上海市郊有一大批，与上面一首面对私情被迫最终公开相比，下面一首则表现了私情初始期的女子的羞涩：

“结织私情隔条河，菜花杨柳望情哥，娘问因五拉做啥？河里鲫鱼实在多。”

情切切，意漫漫，满怀柔意藏于心底，一往情深皆在言外。其情调和意境与明代末年冯梦龙收集的江南山歌也是一脉相承的。请看《山歌》上有这样一首：

“结织私情要放乖，弗要眉来眼去被人猜；面前相见同还礼，狭路上个相逢两闪开。”

歌中表现的少男少女的初恋心态和直率的语言风格与上面那首上海情歌真可谓是异曲同工了。

在我们收集到的不少情歌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窥见青年男女的求爱情趣以及性心理。比如认为情爱性交能使人变得年少滋润：“山歌越唱

越新鲜,柿子经霜蜜能甜,冬瓜经霜雪能白,阿姐经郎活少年。”(这里的“能”是“那样”的意思)这是有生理根据的。又如女子一见相貌出众的后生便心动,这与男子见女子美貌时的心理同样重要。在中篇叙事山歌《卖红菱》中有这样描写女性初看由身材到扁担爱屋及乌的感受:“只看见小小客人生得勿长勿矮能有样,勿知啥个村中出迪个俏后生。远望小小客人挑拉仔细条子脚篮排竹口,白杨树煞白扁担又一根。”山歌中的美貌男女的互相吸引都出自人的本性,与现代女青年追星族等摆脱外加条件心仪出众的“奶油小生”的心理是一样的。至于像“千条锦被勿如郎”、“阿姐经郎活少年”那样用最淳朴的语言表现出来的深刻的人生体验更是民歌的精粹。

五、上海话的绕口令、谜语和上海话 Rap

人们需要贴近人生的艺术,也喜欢远离真实的娱乐。有一个叫《和尚偷酱缸》的顺口溜,是这样的:“月亮白茫茫,有人偷酱缸,聋彭亲听得,瞎子看清爽,哑嘴高声喊,跷脚追得忙,坏手去抓发,痢痢反心伤,眯细先看出,原来是和尚。”这类顺口溜取其逻辑颠倒,轻松神经。后来在上海城里一度流行的“小热昏”调,也有一个类似的唱词:“说起来个稀奇,啥个事体?上海个地方,大来个邪气。徐家汇朝南,龙华宝塔有名气。昨日夜里,出仔个事体,掰里个宝塔,拨贼骨头偷去。正巧拨拉,瞎子里个看见,哑子喊捉贼,拨聋子听见,拨风瘫人捉牢,算伊晦气。捉牢仔个小贼,呀啥客气,拿伊送到,邮政局里。”这种“冬瓜缠辣茄门里”的噱头说唱也为市民欢喜。“小热昏”唱词轻松活泼,用于招徕买主,属上海早期的商业文化了,如在城隍庙推销“梨膏糖”等。一般是取里巷琐闻,随编有韵小曲,击

竹板为乐器,沿门卖唱。还有一种“瞎七搭八”的接词头也是民间喜听的游戏,如:“喂喂喂,侬姓啥?我姓黄。啥个黄?草头黄。啥个草?青草。啥个青?碧波青。啥个碧?毛笔。啥个毛?三毛。啥个三?高山。啥个高?年糕。啥个年?一九六零年,那姆妈养个小痢痢,养辣袋袋里,贯辣河浜里!”还有用宁波口音说的:“一个大大个小喂(‘娃儿’的合音),坐辣高高个矮凳浪,拿一把厚厚个薄刀,切一块硬硬个软糕。”这是巧妙地利用词和词组的组合层次不同构成的貌似悖论的语句,其原理像我们平时说的“大小因”、“大老王”一样。

文字游戏中还有一种标点符号游戏。有一个客人借下雨想留宿,主人不愿接待,就在墙上挂了一张纸,上面写着:“雨落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他的意思是:“雨落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但由于没点标点,客人见了就在上面加上了标点,变成“雨落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流传的顺口溜中往往滞留着一些老词语旧语法形式,搞语言学的人可以从这个流传的标点故事中了解到:老上海话保留更多的“宾动式”的词语,如“落雨”说成“雨落”,此外,还有“响雷”说成“雷响”,和“潮落”、“霜打”、“冰胶”等。

利用上海方音相近易混的声韵调特征交叉排列在一起,编成的“绕口令”,要说得越快越好,可以当游戏玩,也可以对孩子进行语言能力的训练,在上海独脚戏或上海滑稽说唱里也常运用,获得良好的演唱效果。

“庙里一只猫,庙外一只猫。庙里猫要咬庙外猫,庙外猫要咬庙里猫。到底是庙里猫咬了庙外猫,还是庙外猫咬了庙里猫。”“山浪有座白庙,地浪有只白猫,白发老公公落脱一顶白帽,白猫叼着白帽逃进了白庙。”这是[ɔ][iə]两韵母字交叉的绕口。

“墙浪有面破锣,台浪有只破锅,床浪有条破裤,包里有块破布。破布补破裤,破锣套破锅,卖脱破布破裤换破土布,卖脱破锅破锣调火炉。”这

是[u]韵字配不同声母的绕口。

“天浪七只星,地浪七块冰,树浪七只莺,梁浪七只钉,台浪七盏灯。星冰莺钉灯,灯钉莺冰星,呼卢呼卢扇隐灯,嘎嘎嘎嘎拔去钉,哦嘘哦嘘赶走莺,飞过乌云盖脱星,抽起一脚踢碎冰。念是七遍就聪明。”这是[en]韵字的绕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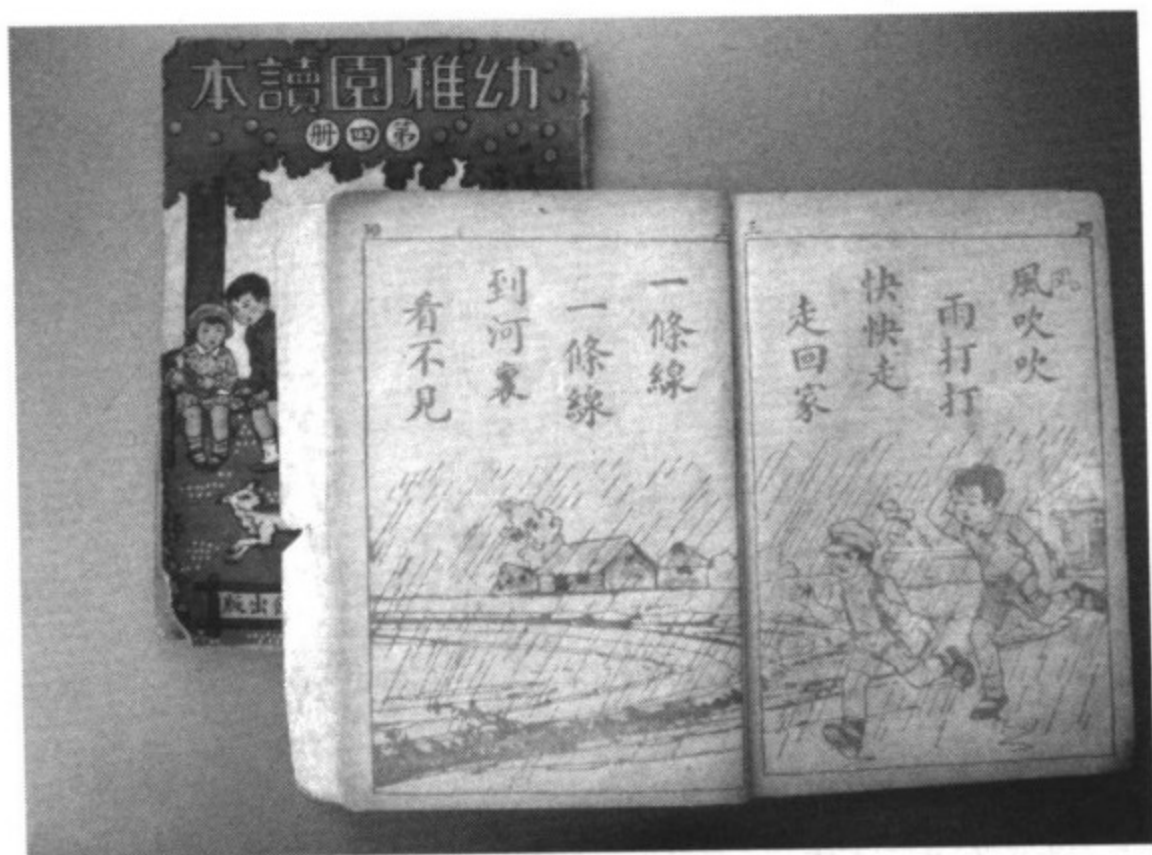
“一个驼子,挑担螺蛳。一个胡子,骑了驴子。胡子个驴子,碰翻驼子个螺蛳。驼子扭牢胡子个驴子,要胡子赔驼子个螺蛳。”上海话“驴”原读 lu。

上海利用入声韵构成的绕口令很多,入声韵因其收口的急促可以取得听感上的响亮脆快效果。如:

“上海有座龙华塔,麻雀飞过擦一擦。阿甲问阿达:‘是雀擦塔,还是塔擦雀?’阿达答阿甲:‘迭个是雀擦塔,勿是塔擦雀’。”这是[Aʔ]、[iAʔ]两韵交叉形成的绕口效果。

又如:“吃橘子,剥橘壳,橘壳乱拉北壁角。到底是橘壳碰壁角,还是壁角碰橘壳。”用老上海话或今郊区话来读,构成[ioʔ]、[ɔʔ]、[iAʔ]、[oʔ](橘、壳、壁、角)相近韵母的交叉,这是全部入声字的一则绕口令。

利用上海话中“拔麦”和“白袜”的韵母和连读调的不同,构成了一个难度很高的绕口令:“一个老伯伯,脚浪着双白袜,到田里向去拔麦。为仔拔麦,弄齧齧脚浪双白袜。拍一拍脚浪双白袜,掬起田里向拔个麦,到了房间里向,肩胛浪放下拔个麦,脚浪脱下弄齧齧个白袜,马上汰白袜。又要汰白袜,又要摆拔麦,又要晒拔麦;又要晒拔麦,又要汰白袜,又要晒白袜。为来为去到田里去拔麦,弄齧齧脚浪向掬双白袜!”老上海话的入声“a”韵有发音前后不同的两个韵,音近易混,“白袜”读[baʔ][maʔ],“拔麦”读[baʔ][maʔ],极难读好,再加上上海话中的偏正式词“白袜”和动宾式词“拔麦”在声调方面的连读调不同,所以这个绕口令就格外难读。现在上海话里前后“a”已经合并,但这个绕口令仍然有趣。



* 1946年沈百英编的《幼稚园读本》第130版第三册上的儿歌《一条线》和第四册封面,1950年还在使用

上海人称谜语为“谜谜子”，它以其广博的知识性和浓厚的趣味性吸引着大批的谜迷。

娃娃们最早接触的谜语大都是通俗的民间口头创作，用形似、暗示等方式形成谜面。当爷爷奶奶携着孙子孙女游戏时，常用代代相传的谜谜子来启迪儿童的才智。像“四四方方一块田，划碎仔老卖铜钿（豆腐）”；“驼背老公公，胡苏翘松松，杀脱旆没血，一烧就变红（虾）”；“连牢三只小摇篮，胖胖囡囡淡红衫，再要剥开来，白白屁股两半片（长生果）”；“一把年纪，贼邈兮兮，推伊一记摇三记，还是笑嘻嘻。（不倒翁）”；“日里向开箱子，夜里向关箱子，箱子角落里有个新娘子。（眼睛）”；“一个黑小囡，从小口勿开，总算开仔口，舌头跌出来。（西瓜

子)”;“圆头小人排排坐,拨一拨,动一动。(算盘)”;“一头烧,一头吃。(香烟)”。这些谜语谜面是韵文,如诗似歌,描写事物惟妙惟肖,常常引得孩子们瞪大了眼睛猜啊猜。

四五十年代是这类谜语传播的高峰期。记得笔者初读幼稚园时,时常读到夹有上海谜语的课文。如:“石山高,石山低,石山洞里雪花飞。(石磨)”“一条线,一条线,落到河里看不见。(雨)”“两只小船,不在河里,跟着人走,到东到西。(一双鞋)”意境含蓄韵律和谐,触发孩童的遐想奇思。那时在小摊上用二三分钱就能买到一本每页正面印有谜面背面印着谜底的豆腐干大小的小书,对象是小学生,十分普及,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在童年时被这些诗画般的谜语打动,一头栽入迷宫,如今成为闻名全国的业余灯谜骨干。

把汉字的笔画、含义扣入谜语,就是灯谜。这类谜语是成人的游艺活动中由谜迷们创作的。上海的灯谜游艺里有不少用沪上方言俚语制成的谜语。比如打上海话常用语的,如:“假肢工厂(做手脚),采购小排(收骨头),酒后严禁驾驶(吃勿开),望晴(想勿落),流离失所(舍勿得),发烧(火头浪),正宫调(娘娘腔),托牢脚后跟(拉倒),石头浪向撞乌龟(硬碰硬),稀客(鲜得来),黄浦江浪挨手(搭勿够),忌嘴(吃不准),天文爱好者(空欢喜),冰肌玉骨(白露身不露),暗藏活棋(勿显眼),贾谊(买交情),闷想(一门心思),却嫌脂粉污颜色(好白相),远航留影(出洋相),其貌不扬(难看相),走边(外行),上门服务(做到家),行行都在大干中(帮帮忙),群情激愤(通通气),小巷夜话(弄勿明白),残花纷飞满庭院(谢谢一家门)。”反过来有的谜面用上海话写成,如:“老白酒(曲不离口),救命车(乘人之危),晓得哉(知了),厚刀钝刀勿卖(薄利多销)。”还有打上海的事物的,如:“松绑(宽紧带),不食荤腥(味之素),书面总结(文汇报),群众呼声(人民大道)。”有打上海店名地名的,如:“鸡犬升天(大鸿运),不落的太阳(老日

升),稀客(鲜得来),参观古刹(张庙),佛院悄悄然(静安寺),八只双人床(十六铺)。”

用儿歌唱的谜语:“排排坐,猜迷迷,猜得准,吃果果,猜勿出,敲屁股。大哥摇船勿用橹,二哥哥余米勿用箩,三哥个买鸡勿用秤,四哥个敲更勿用锣。东想想,西想想,依看我,我看依,猜着了,猜着了,一是鸭,二是鼠,三黄狼,四公鸡。”

民间流传的比较通俗的谜语有:“告化子唱山歌(穷开心),阎罗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弄堂里拔毛竹(直进直出),三岁吃羹饭(小老鬼),嘴浪搨石灰(白话)。”字谜如:“关云长云头跑马,杨六郎四路招兵,孙悟空月里偷桃,花木兰女中豪杰,吕纯阳凡人得道,白娘娘水漫金山。”打一字是“瀛”。

利用上海话中的同音字构成的事物也别有色彩。比如“初一动身,十六到京,若要太平,耳朵上拎拎(秤)”,其中“京”和“斤”谐音。“和尚头,尼姑脚,后生姑娘猜勿着(桥)”,用的是“河上头,泥裹脚”谐音。“看看有节,摸摸旣没节,两头冰冷,当中暖热(日历)。”过去上海读“归”音如“居”,有个谜面“半夜回家勿点灯”,谜底是“乌龟”。

21世纪初开始,青年游艺活动中,以上海话为载体的,上海话 Rap 比较活跃,做出了 hip-hop 的味道,反映了上海人生活真面貌。“上海人网站”上可以下载不少,如:《No. 1》、《阿拉上海》、《上海嗲囡囡》、《我老勿爽》、《回去种田》、《一个人的 2 月 14 日》。2005 年出版过一盘《有啥讲啥》的 CD。《申江服务导报》2006 年也曾随报发行过一支《白相上海滩》的上海话 Rap,上海的“新天地”等地也有上海话 Rap 的专场演出。一种文艺,有青年创始或积极参加,它才有生命力。

此外,青年导演程亮等开始拍摄具有上海风情的上海话 Video《霞飞路》、《上海小姐》、《亭子间嫂嫂》、《存盘》等,反映上海生活原生态。

六、沪语广播、电视和沪语网站

上海第一家广播无线电电台建台于 1923 年,是美人奥斯邦组织的中国无线电公司所设,1 月 24 日下午 8 时在上海第一次播音。以后官方和民办的无线电台在上海林立,这些电台很多是用沪语播音的,上海的许多戏剧、曲艺也经常去唱电台。有的电台的播音者为了吸引听众,除了操一套软熟的上海话外,还特地加上一些沪语口头禅,据一本旧资料所载,华东电台的唐小姐口头禅有:“乃末乃末、阿拉勿关、对哦对哦、对勿起噢、既末啦、阿是、抱歉抱歉、再会再会。”用上这些上海方言词,播音自然更为亲切。

50 年代以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成立,播音的语言主要是普通话,这是推广民族共同语的政策决定的,但“对农村广播”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是采用上海话播音的。现在,除了沪剧、滑稽等戏曲节目外,也有一个电台的部分节目用沪语广播。

* 2005 年 7 月发行的《有啥讲啥》@shanghai 上海话 RAP 专辑



现今沪语广播中的上海话,除了有的仍分尖团音保留了旧上海话的语音特点外,基本上反映的是上海大部分人说的语音特点,有的青年播音员在语音上已倾向青年新派上海话,如 ak、ek(客、克)不分, uoe、oe(管、干)不分, iak、ik(脚、级)不分。沪语广播中的上海话词汇都倾向于新派,但在涉及上海城乡生活特有的事物和习惯名称上,则适当用了些上海土语词。代词“我、你、他、这儿、那儿、这会儿、那会儿、怎么、怎样”等,都用上海话的说法:“我、侬、伊、迭搭、伊搭、迭抢、伊抢、哪能、哪能样子”,“这”和“那”倾向用老派的“迭”和“伊”,很少用新派的“搿”和“埃”。“我们”有时用新的“阿拉”,少数也有用老的“侬、我侬”的。上海话的播音很受百姓欢迎,收听率较高,有的沪语播音员曾被评为“最佳播音员”。现在有一档“阿富根的幸福生活”很受上海百姓欢迎。国外电台也有上海话广播。

由于上海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多次提案呼吁以及上海人民的要求,上海电视台的文艺频道除了增播上海话的“海派情景喜剧”和其他戏曲节目外,现在又新开辟了“三人麻辣烫”等上海话的专题节目,有的其他文娱节目中也偶尔穿插上海话的小品,很受上海市民和部分“新上海人”和外来民工的欢迎。这些节目对传承和学习上海话是很必要的。

9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经济的重新崛起,外来人口的急速增加,像《上海话900句》一类的上海方言学习课本发行又像20—40年代那样热闹起来,上海话的培训班也在开办。

网络的诞生改变了人类生存的环境。一些热爱上海话和上海民俗的上海青年,近来办起了上海话或吴语的网站。如“上海人网站(www.shanghaining.com)”有“谈谈山海经”、“领领行情”、“翻翻行头”、“熟门熟路”等栏目,很有亲和力。有一个专门介绍上海话词语的板块,如“吃生活”、“发嗲”、“有腔调”等等,不断刷新。也登载上海话写的散文,上海话 Rap,学习上海话的课本等。还有个“弄堂网站(www.longdang.com)”,

偏重上海话、上海民俗风情、上海典故、饮食男女、马路消息、弄堂小菜、童谣民歌等,搞得也很热闹。“清籁山房网站(www.sinolect.org)”是吴语和江南文化汇集的网站,不但有上海话的散文小说,还有其他吴语的,网站上的上海话拼音方案和北部吴语拼音方案曾争论得热火朝天。“江南雅音吴语网站(www.wu-chinese.com)”则转载了大量上海话和吴语的重要学术文章,刊载了许多各地吴语的音系。吴越江南——江浙语言文化网站(www.wuyuese.com)有江南雅音、吴越春秋、吴越文艺、吴越风等栏目,其中不乏方言的记载和讨论,还有西方传教士在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上海出版的上海方言著作的pdf文件。其他网站和私人的博客上青年的上海话写作还有不少,如“毛豆子”的散文等,《申江服务导报》上也有上海话杂文“轧山河”的专栏。此处简作推荐,读者可以自己上网看报阅读。网络上和报纸上的上海话文章,用字不够一致,影响阅读。首届国际上海方言学术研讨会2006年11月在深圳召开。会上三代上海方言研究专家和学者、网络代表认真讨论共同审定了“上海话拼音方案”,审定了上海方言中大量常用的和难写的字正确写法,在本书后的附录中选择部分发表。一部收入一万五千条上海话词语的《上海话大词典》也在2007年8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第八章

保护和传承上海话

一、推广普通话和保护上海话的关系

语言的基本特点是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语言最好是顺其自然发展,这样的语言最合常态。因此自有人类至今,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存在方言。语言不但有地域的变体,还有时间的、社会的和语用的变体。一个国家有了一个通用语后,方言的丰富反而会对各地区各阶层的语言 and 文化的多样化有益处。通用语的推广并不意味方言的消亡,通用语和方言并存是语言发展的普遍现象,事实上,说通用语和说方言、外族语言可以各得其所,和而不同,社会生活会变得更为润滑更为和谐。大都市的各地移民之间的互相交际需要普通话的推广,在像上海这样一个普通话推广得相当成功的城市里,提出同时保护和传承好上海方言,也是必要的。这就像为了人类的需要,造了很多的工厂,盖了很多的高层住房,这时就会有人出来提出保护好生态环境,情况相似。作为共同语的普通话,也应该从各地民间口语中积极吸收新鲜和有特色的词语丰富自己,保持活水源头,避免脱离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口语而僵化,为此,应把各地群众方言口语中源源不断产生的新词或表示生活和人性、人类感情细处的有特色的词语通过媒体自由传播推广开来,丰富通用语。

语言是多功能的,它不但是交流思想表达感情的交际工具,而且是每个时代文化信息的载体。伟大的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绚丽多彩,就是因为它自古以来是一种多元的文化,从来就包容着中国广阔大地上各地人民创造和长期积累的精神文明。上海话是上海本土文化的根基,上海地域的语言文化是上海一方水土独自的创造,是上海人民对人类多元文化的一己贡献。传承上海话,就是传承上海地区的文化基因。

我们主张上海话积极吸收普通话中的长处丰富自己,同时也在使用中继承和发扬方言积累中的表达细致和有特色的词语。推广普通话不是

使普通话急于覆盖上海话,而是要发挥双语使用的优势,也就是说普通话和上海等方言要互相吸收长处,达到很自然的互补双赢境界。

当今,在上海城里,出身上海的在上海接受幼年、少年教育的上海人都会说普通话。但语言文化的主体性和多样性都不可忽视,我们应创造良好的环境,从孩子起,在学好普通话的同时,好好珍爱上海话。一个缺失本土文化的城市不可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上海要建成世界性的多语、多文化的国际大都市,应具有屹立于世界又区别于其他国际都市的色调,或者说应该具有丰富而感性的本土文化特征。

在 21 世纪,虽然世界经济是有全球化的趋势,然而语言文化应该是多元化。21 世纪的大都市一定是一个语言文化多样化的城市,更多的人学习和使用双语是很自然的现象。上海要建成一个语言文化多样化的乐园,使这个大都市的语言文化变得更深厚,人人生活得更舒畅更有个性。

二、展望上海方言的未来

上海话是在上海悠久历史中形成的方言,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上海原来处于吴地并不发达的海滩,上海话在开埠前是吴语中发展相对滞后的语言,因此在上海话中至今还保存着比别的地方更多的古代语音、词语和语法现象及其反映出来的古代江东文化信息,甚至还保留着历史上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百越民族语言文化遗迹,可以说,上海话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很大的。

上海文化又是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勇于创新的文化。上海方言中所包容的这些上海文化的精神积淀,和上海的石库门、近代建筑这些物质文明融和一起,交相辉映,是上海人民智慧和勤奋的结晶和遗产。这种繁荣的

都市文化,是中西融合的,博大多元的,雅俗同赏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的显著特点是融和传统的文化和拿来的西方文化,创造了大量有自己特色并精益求精的新文化样式,如“海上国画”、“海派京剧”、“西装旗袍戏”、“时代曲”、“月份牌画派”、“连环图画”等,这是文化荟萃和思想活跃的结果。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思想情调以及多样化的文艺趣味都溶化在上海话和上海海派文化中,吴侬软语伴随着上海人的亲乡情结,荡漾在那些有浓厚乡土情的上海话民歌、童谣、绕口令、顺口溜、谜语、老古闲话、文艺作品里,总是缭绕在民众的闾里巷间。没有上海话,就没有这些海派文化。

上海是一个有容乃大的城市,上海的文化还融汇了江南语言文化的精华。比如上海的滑稽剧很早就以上海话为主,汇聚了江南江北的方言和南腔北调,使五方杂处的移民都享受着娱乐的温馨。晚清以来的上海,汇集着长三角这个明清以来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吴语地区的知识精英,成为江南吴语文化的荟萃之地,发行了用上海话、苏州话写的诸如《何典》、《海上花列传》、《九尾龟》、《商界现形记》、《海天鸿雪记》、《三笑》、《描金风》、《珍珠塔》等文学作品。即使是用普通话写作的大量海派小说、散文、电影、流行歌曲,也不同程度地打上了上海话文化的烙印。30年代至60年代前期,上海的本土文化非常活跃,在国内可谓首屈一指。就地方戏曲看,江南江北诸如沪剧、滑稽、上海说唱、浦东说书、沪书、越剧、评弹、甬剧、锡剧、淮剧、扬剧等十多种地方文艺,都在上海从草创、汇聚到迅速成熟。这种城市文化生态的繁荣使上海成为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大都会,上海也成为具有鲜明上海本土特色的城市。事实说明,上海话和吴语的良性生态可以创造高度繁荣的地方文化,为博采的中华文化作出贡献。

上海人应该珍惜上海语言文化的这份遗产。它会使上海社会更和谐,使上海人民更有凝聚力。近年来,有的上海话文艺节目又开始出现了

新的生机,比如上海话电视剧《孽债》相隔 10 年两次播放都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海派上海情景喜剧《老娘舅》、《开心公寓》等在上海东方电视台播出,占领了黄金时段,也创造了高收视率。这充分说明上海人依然迷恋海派文化。在新世纪中,上海话文化将会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上海社会加快发展联系更为频繁的形势下,一方面是年轻人从小受到良好的普通话教育,整个市民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另一方面外来人口越来越多,现今外来人口的涌入,不像 50 年代之前那样大家都必须学上海话用上海话交际,而是与上海人之间通用普通话为中介语进行交际,这就加速了社会用语使用普通话的进程。上海的语言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上海人几乎天天在创造和汇总新词,更新上海话的同时也参与更新普通话,上海话和普通话的和谐交融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上海走向现代化的同时社会知识化、文明化的必然趋势。

21 世纪既是一个经济走向全球化的时代,又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同发展更加文明的时代。世界上任何语言或方言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等级之分,保护少数,尊重世界上各种人群的母语、信仰、习俗、文化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在这个既融合又独立的世界里,在上海这块热气腾腾的土地上,前 200 年的语言史,证明了上海话作为一个历史长久的方言,既具有对外来语言因素慷慨大度的吸收力和融化力,又保持着她本土语言文化的强大稳定性和独特性。上海话的发展使使用她的人越来越多,她的声誉越来越大,越走越远。上海话的历史充分说明了杂交就有优势,竞争带来发展,大度才会丰富。上海人永远展开着她海纳百川的宽宏襟怀,所以上海话永远是存古的和怀旧的,又是创新的和年轻的。我们展望未来,上海人的普通话水平将越来越高,同时上海方言由于活在上海人民的口中,在上海人的生活中也必将会创造出更多生动的新词语,吸收更多的普通话和其他外地人外国人的语言中的精华,继续变化得更前卫更丰富。

跋

近来十分流行“创意”二字,如美术创意、建筑创意、文学创意等等,因其名目繁多而目不暇接,又因大多陌生而超然处之。但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伦新同志提出编辑《海派文化丛书》的创意使人精神一振,耳目一新,对我们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来讲,正是思之无绪的良策,事之无措的善举。

此创意特色有三:

一是纵横驰骋,自成体系。该系列丛书将由海派书画、海派戏剧、海派建筑、海派文学、海派电影等方面近三十本书组成,基本囊括了能反映海派文化的各个领域,其中6本书将在2007年8月的上海书展上面世。此后每年出版7至8本,争取在2010年出齐,向世博会献礼。

二是叙述简洁,形式新颖。上海,不管你是否喜欢,它在近两百年内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并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的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因此,上海是一个世人瞩目的、值得研究的、又众说纷纭的一个课题。论述上海、反映上海的书籍纷繁浩瀚,它们各有见解,各具特色,拥有各自的读者。有的是学术性的,史料详实,论证严密,但曲高和寡;有的是文学性的,情节曲折,故事生动,但内中难免掺杂作者个人的情感,而有失公允;有的是纪实性的,历史掌故和人间悲欢离合尽收其中,但珠玑散落,难于荟萃。丛书力图博采众长,“合三为一”,以纪实为主,兼顾史料的真实和文字的优美,并采用图文并茂的编辑方法,使之成为一套新颖的研究上海,介绍上海的书籍。

三是内容丰富,面向大众。丛书对海派文化的各个领域,诸如:戏剧、书画、建筑、文学、风俗等,既有宏观的研究与阐述,又有具体的描绘与剖析,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海派文化起源、发展、形成、深化的历史

长卷,令人信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海派文化造就了被誉为“东方巴黎”和“东方明珠”的上海,形成了“海纳百川”、“精明求实”、“宽容趋新”等上海人的社会人格。丛书既是研究上海的学术著作,又是介绍上海的通俗读物,具有书柜藏书和案头工具书的双重功能。

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是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专门机构,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世界先进文化为己任。协会成立20年正是上海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20年。协会乘势而为,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积极拓展外联渠道,构筑中外交流的平台,广泛开展国际间的社会科学、金融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交流,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理解,成为上海的一个有影响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我们在获悉丛书的编辑思想和出版计划时,就感到双方是心心相印的,所以决定对丛书出版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我们认为此举是对建设上海文化事业的支持,是对弘扬民族文化的支持,也是对自身工作的支持。


因为工作的缘故,经常有外国朋友赠送一些介绍他们的国家或城市的书籍。这些书籍装帧精美,内容言简意赅,形式图文并茂。由此联想,在丛书中选择若干本或若干章节翻译,汇编成书,那也是一种十分可取的介绍上海和宣传上海的内容和形式,特别对于将在2010年举办世博会的上海来说尤为如此。

本丛书的出版已引起有关单位的重视和关注。文汇出版社已将本书列为2007年出版计划中的重点书,并配备了业务能力强的文字和美术编辑;外宣部门认为这套丛书是很好的外宣资料,是世博会的一个很好的配套工程;有的图书馆反映查阅上海资料的读者日渐趋盛,这套丛书的出版适逢其时,将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方便。

还必须强调的是丛书的编辑和出版也得到了作者的大力支持。去年年底,编委会召开部分作者参加的笔会,其中不乏畅销书的作家,编委会

对他们提出了创作要求和交稿时限。尽管要求高、时间紧,但是作者均积极配合,投入创作,为第一批丛书在2007年8月的书展上与读者见面创造了条件。为此,有的延误了申报高级职称的机会,有的推迟了其他的创作计划,有的不厌其烦数易其稿。

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护佑着丛书的面世。丛书是时代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The image shows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The characters are '郑家尧' (Zheng Jialiao),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The signature is positioned above the date.

2007年7月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后记

上海是个特别的城市,在数千年中国历史的最近 160 年间,她从一个三等县城,一跃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话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方言,它在这一个半世纪中,从一种在吴语中比较保守滞后的县城及其周围的小方言,发展成为变化速度最快的中国第一大城市方言,成为全国三大方言(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之一,成为全国第二大方言区吴语的代表方言。以上海话为母语的人口从保守的估计来说有 1 000 多万人。

上海方言里蕴含着上海这个城市发展成长的历史,浸透了在江南水土中孕育起来的上海市俗民风,闪烁着上海人五方杂处中西交融中形成的襟怀和睿智,深藏着多元博采的海派文化的密码和基因。了解上海方言,可以从深度上了解上海,了解上海人民,了解上海文化,了解上海生活。

上海方言,就是上海话。江南人习惯把“话”称为和写作“闲话”,所以上海方言,又叫“上海闲话”。但是这里的“闲话”,不是作“闲谈”或“与正事无关的话”解的,而就是“话”的意思,实际上是“言话”这个词的俗写。“言话”与“闲话”在久远的老上海话里完全同音,不过上海和江南许多地方的人后来渐渐放弃了“言”字的口头白读音,而用文读音即读书音读成了“贤、现”这样的音,于是人们就用与“咸”同音的“闲”来俗写“言”字,彼此随俗把“上海言话”写成“上海闲话”。但是我们只要走到松江方言地区和原上海方言地区的乡下去听一听,在那儿“盲肠炎”的“炎”、“现在”的“现”、“谚语”的“谚”,老年人至今还用白读音说成和“咸”同音的音,而“炎、癌、现、衍、谚、雁、言”这些字在古代江南发音都是相近的。上海人丁卓研究华语与日语 20 多年,在 1936 年编成的《中日会话集》是一本

对上海话分析得相当好的著作,在该书 85 页上有上海话“近来依两句言话,好之较惯者”一句,此页上面他写着对译的北京话是:“近来您的话,说得好多了。”

笔者写《上海方言》这本书,是向希望了解上海方言的读者介绍上海方言的概貌和风采,上海方言的形成,上海周边一些重要方言对上海话的影响,以及上海方言在海派文化的多元快速进程中发达起来的过程。

上海的飞速发展和当时人的感受,都在过去出版的上海方言著作的例句中有着记载。1868 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Edkins)著的《上海口语语法》上记有这样上海话句子:“上海勿比苏州。”“人住勒拉花花世界,大有福气拉。”1922 年上海人胡祖德著的《沪谚》上有:“走尽天边,好勿过黄浦两边。”1941 年法国传教士蒲君南(Bourgeois)著的《上海方言语法》上在比较句中有这样的话:“苏州比勿上上海。”“上海搭之巴黎比是比得过个。”从这些例句里可以看出上海在 1843 年开埠后的 100 年中的变化。在这以后,上海又有近 70 年的变化,尤其是近 20 年的快速变化。

上海的发展带来了上海话的发展。这本书汇集了笔者十多年来研究上海方言的一些成果和体会。笔者写《上海方言》,是想通过这本书表述这样一个事实和道理:经济发达、思想活跃、多元并存、杂交融合,是上海这个大城市方言兴盛起来的根本动力,这种生态环境顺其自然发展就是这个城市语言文化荟萃创新鲜活的源泉。

我爱上海,我爱上海的语言。我们要十分珍爱上海方言的语言资源,在上海提倡多言多语生活。在新世纪中,更新观念,建设好大都市中多言多语和谐共生的语言环境,使各种语言及其方言在上海都得到保护和发展。

本书中的语料有些地方涉及上海方言的语音,一般都用 2006 年 11 月首届国际上海方言学术研讨会上集体审定的“上海话拼音方案”来注音;不方便之处,则用国际音标注音,除第三章第三节排列音系部分外,凡用国际音标的地方,两边都加上了中括号“[]”标明。这次会议上审定的“上海话拼音方案”和审定的“上海方言用字”见于书后的附件。

钱乃荣写于 2007 年 4 月 15 日土山湾畔云起台

附录一

上海话拼音方案

在2006年11月深圳召开的“首届国际上海方言学术研讨会”上,经过讨论,集体审定了《上海话拼音方案》正式和副式两套。本书使用的是正式,它的特点是与普通话的“汉语拼音方案”所用字母比较接近。拼音方案的设计原则是:只用26个拉丁字母,不带任何其他符号;声调在所用的字母中得到体现。共分四个部分。在声母、韵母两部分的排列中,最前面的是拼音字母,“[]”中的是国际音标注音,后面的是念此读音的例字。

一、声母

b[p]巴搬兵百 p[p']怕攀捧泼 bh[b]婆拌旁别 m[m]母满闷木
f[f]夫反方福 fh[v]符犯坟佛

d[t]多单丁德 t[t']体滩通脱 dh[d]地段同特 n[n]乃年南热
l[l]溜乱拎落

z[ts]子专张责 c[ts']超参撑促 s[s]书三松说 sh[z]字传陈食

j[te]居尖精级 q[te']千劝青曲 jh[dz]求件琴极 x需宣相血[ɛ]
xh[z]谢钱墙席

g[k]盖干工各 k[k']苦铅肯客 gh[g]葵环共轧 ng[ŋ]熬岸硬额
h[h]灰汉烘忽 hh[ɦ]害汗红合

凡带“h”的双字母声母都配阳声调,不带“h”的声母和“h”声母都配阴声调。

鼻音、边音声母有两种读法:m[ʔm]闷美、n[ʔn]拿扭、l[ʔl]拉拎、ng[ʔŋ]我研,配阴声调;mh[mɦ]门梅、nh[nɦ]难牛、lh[lɦ]赖领、nhg[ŋɦ]鹅牙,配阳声调。

在三个或三个以上音节的语音词的第一个音节里,“勿”字的声母 fh [v]变读为 v[ʔv],配阴声调。

二、韵母

i[i]低西变现 u[u]布乌初多 yu[y]虑须雨鬼 y[ɿ]试资朱处

a[A]拉鞋街泰 o[o]沙哑瓜画 e[ɛ]海悲推难

ao[ɔ]少包炒老 ou[ʊ]否头口周 oe[ø]半看最川

an[ā]硬杏朋长 en[eŋ]根恒能春 ang[ā]刚方双偿 ong[oŋ]功龙中翁

ak[Aʔ]八法麦白 ek[əʔ]泼渴合得 ok[oʔ]绿俗角作 ik[iʔ]锡极一立

er[ər]尔而儿饵 m[m]姆亩呀 n[n]唔 ng[ŋ]五鱼

上面 22 个韵,都可以单独做韵母,i、u、yu 又可以做介音,介音可以与其他韵合成以下韵母:

i——ia 写谢、ie 甘械、iao 表桥、iou 就流、ian 香将、iang 旺、in 丁今、iong 荣穷、iak 甲削、iok 肉浴、ik 跌结。i 与 en 拼,读 in[iŋ]。

u——ua 怪坏、ue 会惯、uoe 官欢、uan 横、uang 荒王、uen 困昏、uak 刮滑、uek 活骨。

yu——yuoe 卷软、yun 君允、yuik 越血。yu 与 en 拼,读 yun[yŋ]。

i 行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写成 yi(衣)、ya(呀)、yao(腰)、you(忧)、yan(央)、yin(英)、yong(雍)、yak(约)、yok(郁)、yik(乙);ie、iang 只能与声母拼合或用在阳声调里。

u 行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写成 wa(娃)、we(威)、woe(碗)、wan(横)、wang(汪)、wen(温)、wak(挖)。

上面说的是在阴声调的情况。当 i、u、yu 行的韵母在阳声调里,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都带浊流,写成 yhi(移)、yha(野)、yhe(也)、yhao(摇)、yhou(有)、yhan(羊)、yhang(旺)、yhin(淫)、yhong(荣)、yhak(药)、yhok(浴)、yhik(页)、whu(胡)、wha(坏)、whe(为)、whoe(完)、whan(横)、

whang(王)、when(魂)、whak(滑)、whek(活)、yhuoe(远)、yhun(云)、yhuik(越)。

yu 和 yu 开头的韵母,在与声母相拼时,除了与声母“n、l”外,都可省去“y”,只写作“u”。如:贵 ju,券 quoe,血 xuek;女 nhyu,旅 lhyu。

韵母 iou 和 uen 在与声母相拼时,分别省去第二个字母 o 和 e。如:救 jiu,困 kun。

三、声调

阴平 52 江天飞高心书

阴去 334 懂好土对去太

阳去 223 来同有稻外大

阴入 55 笃各脱出黑级

阳入 12 六学白石木极

在阴平声调的音节里,声母第一个字母重复写一次,但声母 h 则用 hr 表示。如:天 tti、高 ggao,烘 hrong。在连读的语音词中,只标第一个阴平字的声调,如:天空 ttikong、高山 ggaose。

阴去、阳去、阴入、阳入都可不标调。第二个字母是“h”的音节为阳声调,阳去韵母不带 k,阳入韵尾是 k;第二个字母不是 h 的音节为阴声调,阴去韵母不带 k,阴入韵尾带 k。如阳去字:来 lhe,稻 dhao;大 dhu;阴入字:六 lhok,极 jhik;阴去字:懂 dong,去 qi;阴入字:不 bek,级 jik。

四、连读调

两个音节(即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音节(即两个以上的字)连在一起发音,构成一个连读单位。说话时,每个连读单位,就是一个语音词,它的两端有小停顿,内部没有停顿,必有一个连读调。语音词也可以是单音节的,它的声调就是单字调,一般称之为声调。上海话的单字调即第三节中所列的 5 个。

上海话的连读调大致上是单字调的扩展和延伸,不过阴入字开头的连读调调型与阴去开头的连读调相同;阳入字开头的四音节词的连读调有 A、B 两式可任意读,B 式和阴入开头的调型相似。

一个语音词用哪个连读调念,只要看它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单字调。上海话的连读调的规律是:第一个字定调,后面的字都是附着的,失去了原来的单字调,与第一字共用一个连读调,它的调型是第一个字的声调的延伸。下面是连读调调型总表:

单字调	两字连读调	三字连读调	四字连读调	五字连读调
阴平 52	55+31	55+33+31	55+33+33+31	55+33+33+33+31
阴去 334	33+44	33+55+31	33+55+33+31	33+55+33+33+31
阳去 223	22+44	22+55+31	22+55+33+31	22+55+33+33+31
阴入 <u>55</u>	<u>33</u> +44	<u>33</u> +55+31	<u>33</u> +55+33+31	<u>33</u> +55+33+33+31
阳入 <u>12</u>	<u>11</u> +23	<u>11</u> +22+23	A. <u>11</u> +22+22+23 B. <u>22</u> +55+33+31	<u>22</u> +55+33+33+31

举例:天 tti,天堂 ttidhang,天落水 ttiloksy,天下世界 ttihsosyga
快 kua,快手 kuasou,快手脚 kuasoujiak,快手快脚 kuasoukuajiak
后 hhou,后头 hhouhou 后天井 hhoutijin,后门口头 hhoumenkouhou
一 yik,一级 yikjik,一末生 yikmeksan,一天世界 yiktisyga,一本三正
经 yikbensezenjin

热 nhik,热煞 nhiksak,热天色 nhiktisek,热汤热水 nhiktangniksy 热
侬大头昏 nhiknongdudhouhun.

在连读音节的第一个音节后的各音节里,如果遇到原阴平声调的音节,不再将声母重复写一次;如果遇到原配阳声调的鼻音、边音声母的音节,声母不加“h”。

附录二

首届国际上海方言学术研讨会上审定的上海方言用字

这次集体讨论审定的上海方言用字,是那些在过去书写上海话时有多种写法的、有争议的或者原来有音而写不出来的字。对原来写不出来的字,选用字的原则是选择意义接近的字或其他在上海话中同音的常用字。

一、常用词

括号中是普通话释义。

阿拉(我们) 侬(你) 娜(你们)如能打出字来时用“单人旁加‘那’”
伊(他) 伊拉(他们)

搿个/迭个(这个) 搿搭/迭搭(这儿) 埃个/伊个(那个) 埃面/伊面/埃面搭(那儿) 啊里一个(哪个) 啊里/啊里搭(哪儿) 搿能介/迭能介(这么) 介(这么,只用于形容词前) 搿眼/迭眼(这点儿) 搿歇/迭歇(这会儿) 搿抢/迭抢(这阵子) 哪能(怎么) 哪能样子(怎么样)

辣辣(在,在那儿) 辣海/辣盖(在那儿) 了(了,完成体助词,语气词;得,带补语的助词;) 仔(了,旧完成体助词) 哉(了,旧语气词)

几化(多少) 葛末(那么) 啻(表示连接或原因的连词) 葛啻(所以)

老/邪气(很) 瞎(极了) 蛮(相当) 戆兮兮(傻乎乎) 坏来死(坏得很) 共总/一塌刮子/亨八冷打/搁落三姆(统统) 侪(都) 常庄(常常) 有辰光/有常时(有时候) 大约摸/大约摸作(大约) 作兴(也许)

一道(一起) 乃、乃末(这下,于是) 拨(被;给) 脱/得/告/帮(和、与) 伐(吗,吧)如能打出字来时用“口字旁加‘伐’” 呒(行、排)

汰(洗) 趣(漂亮) 赞(好)如能打出字来时用“女字旁加‘赞’” 灵(好) 茄门(没兴趣) 艮(倔,犟)

弹砾路 大闸蟹 淘浆糊 混腔势 扎台型 退招势 茄山河 瘪的生司 刮三 肮三 小八腊子 腻心八腊 霍险(闪电) 懒柴耙 麦率头(麦穗儿) 差头(的士) 瞬太阳 道伴(伙伴) 铤手(小偷) 抄(羹匙) 盹干 斩冲头 挺剩 坍铤(难为情) 猴极 木觉(麻木) 打朋(开玩笑)

飙(bbiao,液体从小洞中喷出:水飙得老远) 拦(lhak,拦部差头,) 挫(pan,拍:挫台子) 霍(hok,贴,霍膏药) 得(dek,粘住,得邮票) 笃(dok,筷笃笃齐;笃蹄膀) 踵(cong,跌跌踵踵,头踵出去) 掴(guak,恨打:掴耳光) 跼(ghu,萎缩成团:身体跼下去) 孜(zzy,埋:孜倒点头) 耗(hrao,哈喇) 呀(yya,主动躲:呀辣墙壁角落头) 喻(oong,成群地拥挤:喻来喻去) 岳(nhgok,昂:头岳起来) 夯(hrang,气喘:气夯) 呼(hru,吸:呼香烟) 钝(dhen,说反语对付:钝钝依) 挺(tin,剩) 埭(dha,拖延:埭到明朝做) 突(dhek,掉落,遗失:突脱) 兵(ppan,飘洒:雨从窗口兵进来) 扞(zzen,从小孔中挤出:扞牙膏) 鲜(xxi,分量足而秤翘) 透(tou,步高不稳重:走路勿要透格格。)

二、能考出本字的上海话词语

一般用本字,如:囤(kang藏) 隍(ghe,靠) 槩(qqi轻削) 聩(ji撑直房屋为“聩屋”) 揞(jji,夹:揞菜) 捷(jhi,举起) 纛(qqiao,卷起:纛袖子管) 龇(nhgak,缺:龇脱一块) 掇(oo,善意强予,掇拨依) 抻(dhoe,揉成一团:抻脱一张纸头) 溲(yin,凉:天气溲了) 殓(wek,不舒服:心里殓塞) 戩(dok,丢,扔:戩手榴弹) 贯(扔,甩:贯垃圾)

有的本字太生僻而俗字已广泛运用且是常用字的,则选用俗字。对于有些本字,在大字库中也没有字的,考虑改定,尽量在常用字中选字代之。

参考文献

Albert Bourgeois (蒲君南)1939: *Leçons Sur le Dialecte de Chang-hai, Cour Moyen*. Imprimerie de T'ou-sè-wè

Albert Bourgeois(蒲君南) 1941: *Grammaire du Dialecte de Chang-hai*. Imprimerie de T'ou-sè-wè

C. E. Darwent 1902: *A Handbook for Travelers and Residents*, Shanghai: M. A. Church, Minister of Union,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Joseph Edkins(艾约瑟)1868: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初版:1853)

F. L. Hawks Pott(卜舫济)1907: *Lesson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byterian Mission Press .

John Macgowan(麦高温) 1862: *A Collection of Phrases in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byterian Mission Press.

阿弥 2003:“洋泾浜英语”上海人灵动的表现,《申江服务导报》上海开埠 160 年特别策划——从“老外滩”到“新天地”,11 月 12 日

曹聚仁 1996:《上海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8 月

陈伯熙 1924:《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 6 月重版

陈无我 1928:《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年 1 月重版

陈忠敏 1992:上海地区方言分区及其历史人文背景,《复旦大学学报》第四期

池志澄 1893:《沪游梦影》,上海古籍书店出版社,1989 年 5 月重版

丁卓 1936:《中日会话集》,上海三通书局

- 范敬宜 2000:话说“洋泾浜”,《新民晚报》8月24日第20版
- 高本汉 1913:《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1940年汉译本
- 葛元煦 1876:《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重版
- 胡适 1925:《吴歌甲集》序一,《吴歌甲集》,北京大学歌谣学会
- 胡适 1930:《海上花列传》序,《胡适文存》四集,卷六,亚东图书馆
- 胡祖德 1922:《沪谚》,上海棋盘街著易堂书坊
- 胡祖德 1923:《沪谚外编》,上海棋盘街著易堂书坊
- 黄式权 1883:《淞南梦影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重版
- 乐嗣炳 1935 大众语决不是国语,《大众语文论战》,上海启智书局
- 李浩然编著 2006:《上海人的市民精神》,中国电影出版社
- 陆谷孙 2005: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网 BBS, 12月31日
- 李维清 1907:《上海乡土志》,著易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重版
- 倪海曙 1981:《杂格咙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钱乃荣 2006:《新世纪上海话新流行语 2500条》,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阮恒辉 1988:《扬州腔上海话的语音特征》,《吴语论丛》,社会教育出版社
- 阮恒辉、吴继平 1994:《上海话流行语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上海通社 1936:《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 1984年版
- 汪仲贤 1935:《上海俗语图说》,上海社会出版社
- 吴汉痴主编 1924:《切口大词典》,上海东陆图书公司
- 佚名 1908:《土话指南》,上海土山湾慈母堂,初版 1889年
- 严独鹤主编 1922—1924:《红杂志》,上海世界书局
- 严芙孙 1924:《上海俗语大辞典》,上海北车站云轩出版部
- 杨乐郎 1948:《洋泾浜猎奇录》第一集,上海文化企业公司

- 姚公鹤 1917:《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重版
- 张南庄 1933:《何典》,北新书局
- 赵元任 1928:《现代吴语的研究》,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四种
- 朱大可 2001:上海语境塑造了“鲁迅精神”,《世纪中国》网 10月4日
- 祝鹏 1989:上海市沿革地理,学林出版社
- 邹依仁 1980:《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